河南文革资料汇编

目录

插图（TXT 版本略）
我的一张大字报　刘建勋 1966.08.19
刘建勋接见北京高等院校及开封师范学院同学时的讲话 1966.08.29
纪登奎与开封师范学院师生的谈话 1966.08.31
二十八个为什么--当前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值得得深思的问题 1967.02.10
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的指示 1967.02.17
就谈判问题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电报
毛主席　河南人民想念您--侧记河南的白色恐怖 1967.04.12
毛泽东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 1967.04.23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5.29
康生陈伯达接见外事口单位和红代会代表谈河南问题及抓叛徒问题 1967.06.03
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记录 1967.06.04
肖华杨成武关锋戚本禹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1967.06.10
从夏邑县看河南的“独立王国”1967.06.10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6.13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6.14
撕开河南“独立王国”的黑幕 1967.06.21
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1967.06.23
康生接见纪登奎耿其昌谈话纪要 1967.06.24
戚本禹与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的谈话 1967.06.28
戚本禹与河南“河造总”代表的谈话 1967.06.28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7.02
周恩来对河南各派及铁道部军管会代表的指示 1967.07.03
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7.04
戚本禹关于河南问题的谈话 1967.07.06
戚本禹在河南部队领导人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1967.07.09
戚本禹与河南省三派代表的谈话 1967.07.10
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 1967.07.10
周恩来戚本禹与赴京汇报的河南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 1967.07.12
戚本禹刘建勋接见河南各方代表谈话纪要 1967.07.14
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7.18
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1967.07.21
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 1967.07.25
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 1967.07.28
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 1967.07.28
控诉河南走资派对我一家的迫害 1967.07.28
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1967.07.30
周恩来接见河南省兰考县张钦礼焦守凤谈话纪要 1967.07.30
何运洪是残酷迫害兰考革命派的罪魁祸首 1967.08.03

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司令部 1967.08.05
坚决打倒何运洪、李善亭！ 1967.08.12
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及驻军负责人的讲话 1967.08.14
刘建勋对河南“二七公社”省直革联服务员的讲话 1967.08.20
中央首长接见刘建勋王辉时的指示 1967.09.05
康生吴法宪在武装干部会议河南组汇报会上的讲话 1967.09.12
康生第二次接见武装干部训练班河南组代表时的指示 1967.09.13
刘建勋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 1967.09.26
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谈河南两派问题 1967.11.25
刘建勋对河南两派谈周总理的指示 1967.12.06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1.25
河南革命委员会常委中群众代表名录
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01.30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 1968.01.30
纪登奎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8.04.25
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8.01.31
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　申茂功 1968.11.05
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1972.11.04
江青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1974.01.28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谈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革
不再沉默
张钦礼魂归故里--送行散记
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一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好教材

我的一张大字报　刘建勋 1966.08.19

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昨天，我和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和郑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六位主席和同文化革命委员会意见有分歧的同学，谈了当前的运动情况，并看了一些大字报。现在谈一谈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中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的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

二、他们从北京返校后，召开大会向同学们汇报北京文化革命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这不仅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

三、郑大有一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此，有的同学自动酝酿串连，建立了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他们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成是非法的。

四、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从北京回来后，和赞成他们意见的同学，自动到校内校外进行宣传，互相学习，交流革命经验，是一种革命行动。当然，各校革命师生员工的主要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五、我在北京同党言川等几位同学谈过话，完全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并说我回去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放手发动群众，大闹文化革命。要动员省直机关群众，对省委和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展开彻底地揭发批判。我说过“炮打司令部”这句话。就是要充分发杨民主，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把领导机关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揪出来。

六、党言川同学就我知道的情况，他没有欺骗过我。他说我批准改选郑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当时我在场，党言川的话，同我说的虽略有出入，但不能说是欺骗。十五日大会上，我作了一点说明，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和改选，完全由革命师生员工自己讨论决定，我没有批准之权。

七、运动初期，省委曾经坚决反对和制止了王培育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现在，我再次郑重提出，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不准转移斗争目标。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灼情处理。革命同学之间的争论，随意就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一类的帽子，我是不赞成的。

八、前一段，一部分同学贴大学报，批评省委工作组和省委的缺点、错误，这是完全应该的，我代表省委欢迎你们批评，支持你们批评。

九、我建议，在当前的争论告一段落后，仍然回到辨论工作组和省委对郑大文化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以十六条为最高指示，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检查缺点、错误，团结一致，奋勇前进。

十、昨天，有些同学们问我，“造反有理”这句话对不对？革命，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反动派的反。我们要有这种革命的造反精神。

在革命的进程中，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们郑大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是革命的、都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字字句句照十六条办事。我相信，你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一定可以经过正当的充分的辩论，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我相信，郑大革命师生员工，一定能够进一步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以上仅是我个人意见，不一定对，可以同意，可以批评，也可以反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革命师生员工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万万岁！

刘建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说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学生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炮打"我这个司令官"。八日十九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因给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被压制、围攻的学生党言川及河南省第一个大学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对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河南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并一度成为河南两派辩论的焦点。而毛泽东却表扬了刘建勋和这张大字报。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刘建勋接见北京高等院校及开封师范学院同学时的讲话 1966.08.29

你们开封师范学院的情况，我知道，你们要借北京高等院校的东风。开封师范学院问题很大，同学们不能一下子冲破旧秩序，就来郑州搬兵求援。北京的同学来这里，我们表示欢迎。北京的文化革命比我们早一个来月。河南在十一中全会前也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的结果吃了亏，十六条下达前我们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正象毛主席说的，对这次运动的领导不得力、不理解，群众路线走的不够。十六条下达后，我们下决心把运动进行到底，凡是错误的，不符合十六条的，就坚决改正，按十六条办事。这次革命运动没有经历过，我们才摸着了一点经验。会见北京同学，我很高兴。你们到开封去点火，好得很，我代表省委表示感谢，开封师院的问题比较严重，冲破旧秩序需要自己（师院同学）努力，也需要北京同学的帮助，局面一定会改变，我十二万分地欢迎

北京的学生去开封，把火点起来，点得旺旺的。

现在河南各高等院校的大方向我是知道的，但是具体问题不太清楚，希望你们能够冲破阻力，我完全相信同学们会搞好的。给你们撑腰，没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提一提？

问：现在大争大辩，辩论那些问题？同学之间是否辩论？同学给领导贴大字报是否其他同学可以进行辩论？

答：不同意见是可以辩论的，同学们互相争论是可以的，给领导提意见可以辩论，不赞成在次要问题上争论不休。领导当中有好的、比较好的，修正主义的，大批判是对领导而言。学生当中没有当权派。

问：看着学生斗学生不制止怎么办？

答：那是极端错误的。

北京一个学生说：同学去到开封师院，被围攻了，把我们关到楼上。

刘建勋说：这是个好事情，对左派围攻为什么不好，不围攻还暴露不出他们的面目。

问：省委派工作组犯了错误，错误肃清了没有？

答：很多工作组是好的，就是好的工作组也有错误。工作组是拐棍，偏听偏信的情况多得很，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开始肃清了。

问：造反队去郑州，后面跟去四百余人，是否是革命行动？

答：不是革命行动，革命者不去。

问：省委什么时候提出炮打司令部？怎么引火烧身？采取什么措施？

答：炮打司令部是 8 月 25 日提的，这个口号是从北京学来的，现在正在号召炮打我，好人不怕打，坏人打出来是好事，炮打司令部要发扬大民主、大揭发。群众自己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统统不参加。许多学校，少数派看来是革命的，要把革命的多数团结起来。

问：请省委谈谈对开封师院党委的看法？

答：我不认识韩倩之，这几年没有抓学校工作很抱歉，看来，韩倩之这个人应严加处置。你们到那提出办法算了，回去后组织人，提出罢官就罢官，阻挡文化革命的一律罢官，毫无姑息。开封师院的同学和北京的同学一起回校革命，串连是革命行动。我决心跟毛主席走，有错误你们可以提，你们（指北京同学）帮助我们清理了许多司令部。现在革命派还是少数，还受压制，你们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炮打司令部。

（刘书记把我们送了出来，纪书记说："祝你们胜利归来！"）

纪登奎与开封师范学院师生的谈话 1966.08.31

〖8 月 31 日晚，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初书记纪登奎同志，在郑州大学接见了开封师范学院部分师生代表并举行了座谈。出席座谈的有“八·二四”造反队，“红旗”战斗队、红卫兵战斗师的代表以及来河南进行革命串连的北京部分高等院校的学生共 67 人。纪登奎同志根据大家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问题和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解答，进行了辩论，交换了意见，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活跃，现将谈话的主要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问：

（1）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指示，省委什么时候传达到基层的？韩倩之 8 月 27 日晚上在欢迎造反队的会上说，24 日以前并不知此事。

（2）8 月 12 日韩倩之在全院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解释”《十六条》，说省委指示：党的领导就是院党委要领导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省委有无此项指示？

（3）8 月 24 日，韩倩之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说，院党委研究决定：三个常委完全自动撤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请问：这是院党委的指示，还是省委的指示？

（4）8 月 12 日，韩倩之说省委指示要好好学习《十六条》，掌握文件精神实质，掀起革命运动新高潮，绝口不提是根据《十六条》指示进行对照揭发，请问省委的指示究竟是什么？

纪：

“炮打司令部”的指示，8 月 17 日刘建勋同志在郑州市大中院校师生大会上讲的，同时也给开封市委传达了，至于开封市委什么时候传达到你们学校，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你们可以查一查。

“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这句话是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成立自己的组织，有权审查各级党组织，院党委成员应一律接受群众的批评审查。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省委没有指示“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如果有指示，就是要停止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

17 日晚上，省委在郑州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革命师生对学校当局党政负责人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满意，学校院系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统统退出文化革命委员会，如果不退出，同学们起来把他罢免，听候同学们审查，揭发批判以后再说明是哪一类，未揭以前，一律退出。

省委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是，省委原来就指示要大揭发。

另外，再顺便回答两个问题：

“工作组完成了历史使命”这句话是错误的，只能说是完成了一个“历史错误”。为党完成了一个错误历史使命。派工作组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过去包办代替就不对，当然个别的例外，但不是开封师院。

如果有人喊“保卫校党委”、“保卫某书记”（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如果校党委喜欢听，我劝他赶快承认错误。

问：韩倩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一类干部等等，这些口号对不对？

纪：据我对韩倩之的了解，这些口号都是错误的，这无非是安个帽子，不许人家揭发。应该赶快承认错误。

问：“八・二四”事件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起来造反对不对？

纪：造反是对的，造韩倩之的反可以。造省委的反也可以。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外都可以造，只要他有资产阶级思想，都可以揭他一下，只能是热烈地欢迎，不能有别的态度。反对革命造反，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说革命造反无理，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就不行！（拍案而起）占总机，把大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没有呢？

问：如果在文化革命运动中间，党委领导干部和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利用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挑动学生斗学生，把革命的行动说成是反革命行动，对这样的干部应该怎么办？

纪：你们说应该怎么办？（齐喊“罢官!”，全场活跃）同意！

问：资产阶级保皇派怎么办？

纪：你们说应该怎么办？（齐喊“打倒!”）同意！学生中绝大多数是革命的，不要给学生戴保皇派帽子。

问：欢迎多数派赴郑归来的会上，我们曾经两次递条子，给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侯志英，写上《十六条》条文，不许他挑动学生斗学生，他不理，这怎么办？

齐喊：罢官！

纪：这怎么能罢官呢？他是学生，选掉！（有人说他是老师）怎么是老师？是教师支部书记。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大家要罢免他，回去把他罢免了。

问：8 月 26 日下午，系领导小组传达院文化革命委员会意见，说造反派向省委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要钱，二是要毛主席语录，三 要红袖章，是不是这样？

纪：据我了解他们没有提出这三条要求，他们提的是另三条要求：一、让我们去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二、“保卫院党委”、“保卫韩倩之”的口号对不对？三、要造反，他们不叫造怎么办？那三条全是假的（拍案而起，情绪激昂），是造谣！省委招待要什么钱！好像人家就不是闹革命的，为了几个小钱花花。这是侮辱我们的革命同志，欺负我们的同学，无非是资产阶级官老爷的作法。我们的同志完全是搞政治斗争的，要什么钱？回去给他们讲：纪登奎说：“根本无此事！”

问：多数派的代表中的某些人说你没有接见造反派。

纪：那天晚上两汽车 150 多人，我统统接见了他们，而且他们冒雨开会，我冒雨讲话。把我接在他们的汽车上，会场十分热烈，情绪十分高涨，这是事实，当时我就说，如果需要，我可以去作证。

问：多数派的 400 人说省委先接见了他们。

纪：那 400 人我不知道。

问：27 日北京串连同学到校，晚上，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侯志英就在广播里说：“现在来串连的同学很多，值得欢迎，但他们有些话我们很不理解，他们讲的很多话是错误的，也有少数坏人混水摸鱼，我们要防止坏人破坏”等等，以后就有人围攻他们，打他们，同学们很气愤。

纪：北京串连的同学听说开封师院的情况后，要求去支援，是我送他们去的，我对他们说，那个地方镇压学生很厉害，你们怕不怕挨打？要不要担架？他们说：我们为了革命，我们死都不怕。还怕挨打吗？要担架干什么！

问：有人斥责他们是干涉开封师院内政。

纪：什么内政不内政！全国是一个整体，革命同学是一家，门户要开放，学生可以到北京、南京、上海，其它学校同学统统可以进开封师范，哪有那么多框框。（又插话说：）党委书记兼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是绝对不合法的，这不符合《十六条》。

问：有的人说北京来的同学是在郑州被轰出去的，散发反动传单，在机电学校弄出了事，打伤了人，事实如何？

纪：回去给他们讲：省委对北京的同学热烈欢迎，每天接见，是我们的最好的参谋，是我们的有力助手。他们南征北战，哪里需要到哪里，说他们是从郑州轰出去的，这完全是造谣，我还不知道。

问：我提请大会主席注意，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人民日报》6 月 24 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起了极坏的影响，对不对？对开封师院的事，河南省委是否作过调查研究？8 月 24 日以前对开封师院的情况是否了解？

纪：24 日社论有点影响不大好，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这个社论发表后，你们那里出问题，我们这里也出了问题，很多党组织，利用这篇社论对群众运动压了一下。关于开封师院的情况，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但是“保卫院党委”，“保卫韩书记”，什么“遣反无理”，“韩倩之当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这些我已经问过市委书记徐学龙，他说确有此事。这些统统违背十六条，所以我答复那么快，市委已经调查，一天选举三级委员会也是事实。

问：我想说说“保卫院党委”，“保卫韩倩之”的问题。政教系三年级的大字报一份二张，下午六点半以前贴的，有人叫韩倩之来看了，韩倩之就在晚上八点召开各系总支书记会议，批评了政教系总支书记胡玉元，叫他写检查，胡玉元又去找辅导员，晚上三点同学劳动下班，辅导员没让休息叫写检查，天没明就提着糨糊，把那大字报贴住了。有人说多数人是保皇派，我想说说事实，看看有几个人是保皇派？

纪：“保卫院党委”，“保卫某书记”这口号不对，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如果要人有改正，也要欢迎，并要有实际表现。多数同学是革命的，怎么样？你说是不革命的吗？

问：“造无产阶级的反我们是造定了。”“我们就是要造革命的反”，这口号对不对？

纪：这个我不了解，如果有的话，当然不对。

问：北京的同学说，“有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斗争。”对吗？

纪：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斗争。”是可以的，烧烧嘛完全可以。

侯志英：我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同学们敢于大胆给我提意见，我大力支持。

纪：你是主席呀？对我的答复有什么意见吗？

侯：现在是炮打司令部，我们对斗争不理解。文斗，就是《人民日报》解释的大揭发、大批判；文斗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适用于处理敌我矛盾。一开始揭发，有些人看着还不够牛鬼蛇神，因此双方都要斗，一方认为是内部矛盾，有一条揭发一条，斗一条；一方认为是敌我矛盾。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没戴高帽子。

纪：对一切牛鬼蛇神都可以斗，他不扣（帽子）可以，愿意扣也可以，大胆放手吗，提高一点也可以，又不是最后定案。

侯：当前来串连的很多，原来门禁，要这要那，我已经给他们说了要大力支持。

纪：你姓啥？

侯：我姓侯。

纪：我回去把门开开，把门拴砸掉，开放开放。

候：我那天（指 27 日）晚上的话，主要是要大家提高警惕。

纪：提高警惕可以，但不要提高的不叫人家出来，统统叫出来，即使出来几个反革命分子也不要紧。无非是打碎块玻璃。我问你：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会对不对？

候：十六条指示以前，感到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是谭枝生同志讲的。

纪：我现在讲的你同意不同意？

候：你现在讲的我同意。

纪：你们那里有个历史研究所吧，还有个刊物《史学月刊》（大家一致说："有。"）有个副主编赵希丁怎么样？

候：我不太了解，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没有好好看过。

纪：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刊物是帝王将相的刊物，和翦伯赞办的没有什么区别。

候：那上边的文章我一篇也没看过。

纪：我建议，你大胆一些，第一条放手，第二条敢字当头。回去以后，一个字"放"。你革命造反，我就领着干，学生造反闹革命，你领着造反，如果不领就不行，乱就是乱，就是不怕乱。

问：韩倩之在开封师院当了七八年党委书记，前几年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引起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慨，可是在昨天晚上（30晚）斗争韩倩之时，一部分人喊"打倒韩倩之！"另一部分人就不举手；有的在会上念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另一部分人就强调"文斗"。这两种态度你看怎么样？

纪：我赞成前一种态度。

问：我院"八·二四"事件基本清楚，省委对这个问题的指示没传达到群众中去，有些学生受迷惑。我不是那一派，我是历史研究所的一个干部。我感到炮轰司令部虽然贯彻下达一星期了，但这个高潮未掀起来，请省委负责同志去开封一下。

另一同志问：听说你上次接见我院革命造反队时，说韩倩之在农村搞两次四清，分团都不大满意，犯了错误还不虚心，这个材料 是不是让公布出去？

纪：可以整理一下给你们。

纪：（向侯志英）你是支部书记吗？你最好不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我个人建议。

办法是你自动退出，学生为主体吗！支书、系主任担任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无论如何是不能不退出来的。领导干部一般地不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个别的可以，像聂元梓就是一个。

（会议开到半夜三点，很多同志还要发言）

纪最后说：不管哪一派，大多数都是革命的，大方向，大原则统一起来，一些枝节的问题不要争执。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当前是要集中目标炮打司令部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很好，大家辩论的空气很浓，不扣帽子，不讽刺挖苦，很好。其实有些问题，你们自己是能搞清楚的。你们要我到开封，去了要好好听听，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北京同学给我们很大帮助，他们都很有水平，大家回去要开门，一切革命同学都可到开封师院。我提倡你们到北京去，到北大、师大、清华去学习，好多问题，一讲你们就可以解决了。要分批去，一下子都走光了也不行呀！

二十八个为什么--当前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值得得深思的问题 1967.02.10

一、为什么正当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决战时刻，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千方百计破坏左派大联合？破坏这场极其重要的夺权斗争？这究竟为什么？！

二、为什么郑州、开封、新乡、信阳等地有名的、斗争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新保皇派"和"反革命组织"？为什么一些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却以极"左"的面孔出现，从"左"面杀过来，到处招摇撞骗、大放其毒？这究竟为什么？！

三、为什么正当我省革命造反派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向河南省委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极力排斥和恶意中伤被保守势力恨之入骨的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最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什么他们和保皇派一个腔调？为什么亲者痛、仇者快？这究竟为什么？！

四、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来郑后，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保皇势力大抬头，空前活跃，跳得格外高？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则感到倍受压抑、处境困难？这究竟为什么？！

五、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来郑后，一屁股坐在保皇窝里，站在保守势力的立场上？为什么他们到处给郑州地区的保皇派撑腰打气？这究竟为什么？！

六、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含沙射影，恶毒攻击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什么这株大毒草抛出后郑州地区刮起一股翻案风？它到底说出了谁的心里话？这究竟为什么？！

七、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受到真正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抵制？为什么一小撮保皇派则急忙为之大加转抄、翻印、广播、拍手称快？这

究竟为什么？！

八、为什么把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安排在国家金融重地河南省人民银行？为什么革命造反派找他们辩论时被诬蔑为"破坏"国家银行？是谁设下这样"巧妙"的陷井？是谁有意保护他们？这究竟为什么？！

九、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于元月十五日来郑，而复制的介绍信上的日期却是元月二十五日？为什么他们元月十五日来郑时不持证明信，就能住金融重地省人民银行？为什么他们持着"首都三司"的介绍信(只见到复制品)，带着"建立三司驻郑联络站的任务"，但不敢打"三司驻郑联络站的旗号，而打着"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的招牌？为什么北京接连来电否认他们是"清华井冈山总部"派的"驻郑联络站"？这一小撮人不是冒牌货是什么？这究竟为什么？！

十、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来到郑州，俨然摆出一副：救世主的面孔，诬蔑郑州没有发现一个明显的左派组织？为什么臭名远扬的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和国棉六厂赤卫队等缉织却格外对他们亲近和支持？这伙人为什么臭味相投？这究竟为什么？！

十一、为什么一些人口口声声喊着"炮轰省市委，火烧刘建勋"，而他们却在大街飞小巷、马路、墙上到处写着"打倒郑大革联"，"打倒党言川"之类的大字标语？为什么这样的反动口号甚嚣尘上，充斥整个郑州城？郑大"革联"是反动组织吗？党言川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这一小撮混蛋为什么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郑大革联和党言川同学？这究竟为什么？！

十二、为什么最近几日每天都有上万人到郑大校门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革联"示威？为什么省委直属机关几千人，二月一日上午也明目张胆地来到郑大门口向"革联"学生挑衅？这不是空前规模的群众斗学生，干部斗学生又是什么？试问这些老爷们，你们对省委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示威过几次？这不充分暴露了你们，保其主子、镇压革命学生的罪恶本质吗？这究竟为什么？！

十三、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抛出攻击郑州地区革命造反派的《二十七个为什么》以后，河南省委的第二号人物纪登奎亲自"登门拜访"？为什么这群冒牌货在纪的"拜访"后又抛出了一个《十个为什么》(即"几天来的形势发展说明了什么？")这株大毒草？为什么《十个为什么》比《二十七个为什么》更凶狠、更毒辣、更赤裸裸地攻击和咒骂郑州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纪登奎到底给了这群冒牌货什么黑指示？这究竟为什么？！

十四、为什么一些人把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张耀东等隐藏起来，不交给全省革命造反派批、斗？到底是谁在保省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底是谁在当前夺权的关键时刻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学生？这究竟为什么？！

十五、为什么当前河南省，尤其是郑州和开封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了一次比过去更加全面、更加疯狂的大反扑？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遭到空前严重的政治迫害和压制？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得不到河南省军区的支持和保护？这究竟为什么？！

十六、为什么河南省当前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疯狂反扑的黑风恶浪？为

什么这股逆流相当强大？它的幕后策划者是谁？它的急先锋是谁？它的帮凶是谁？这究竟为什么？！

十七、为什么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文敏生，长期住在河南省军区医院里？为什么当河南省革命造反派炮打省委司令部时，省军区却把文敏生保护起来？为什么省军区能成为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防空洞？这究竟为什么？！

十八、为什么在毛主席发出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伟大号召后，河南省军区的某些负责人偏要支持代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冒牌“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偏要支持河南地区的保守势力？是哪个胆大包天的混蛋公开违背毛主席的命令？这究竟为什么？！

十九、为什么郑州、开封、信阳等地的驻军和公安部队都直接参与了支持保皇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为什么河南省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和保皇派穿一条连裆裤？为什么他们有着鱼水之情？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为什么河南省军区在元月三十日上午调动大批军队，打着欢呼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支持真正革命造反派的旗号，联合郑州地区的保皇派进行声势浩大的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全副武装，擦着大炮究竟向谁示威？为什么在这次游行示威后，郑州地区笼罩着空前严重的白色恐怖？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一、为什么部队游行队伍走到郑大门口时，格外起劲地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他们究竟把矛头指向谁？要专谁的政？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二、为什么部队游行后，保皇派那样兴高彩烈？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却对此无限愤慨？为什么到省军区“报喜”的几乎都是保皇派？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三、为什么在省军区部队游行示威的前一天，公安部门的两个参谋突然于深夜到郑大“革联”等革命造反组织检查枪支？他们心里到底怀着什么鬼胎？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四、为什么省军区起劲地为冒牌“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辟谣”？为什么他们拿不出“辟谣”的根据来？为什么省军区极力保护清华的托派唐伟？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五、为什么保皇派围攻郑大“革联”等造反派同学时，省军区的宣传车和军官赶到现场为保皇派摇旗呐喊，帮腔助威？为什么最近几天省军区故意找岔无理扣留和大批逮捕郑大的学生？河南省军区在两条路线的大撕杀大搏斗中站在了哪一边？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六、为什么河南省军区那样敌视郑大“革联”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什么反对一个军区的负责人就被诬蔑为“反对解放军”？这和“反对河南省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一反动口号有多大区别？为什么河南省军区负责人的老虎屁股摸不得？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七、为什么不能说河南省军区半个“不”字呢？这究竟为什么？！难道河南省军区就没有“三反”分子吗？难道河南省军区就没有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吗？

二十八、为什么二月二日郑州市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时省军区不予支持？为什么指使人暗地记录参加游行的造反派组织名称？他们不是准备“秋后算账”是什么？这究竟为什么？！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河南省委和河南省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都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他们必然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猖狂的反扑。但是，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有同阶级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有“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革命英雄气概。为了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捍卫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坐牢不怕，杀头不怕！我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凡是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

《闹天宫》独立纵队（《河南日报》1967 年 2 月 10 日）

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的指示 1967.02.17

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

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

三、接管后停刊几天；

四、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代表包括省军区、省委、武斗的双方，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代表。由何政委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再来北京。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五时三十分

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各方代表谈判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河南省军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六时

就谈判问题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电报

就党言川之流对抗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破坏赴京谈判问题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电报：

二月十七日总理对“河南日报事件”及时作了四点指示後，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热烈拥护，并坚决执行了小央命令和总理指示。为全面地实现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尽快派遣代表赴京谈判，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一方，于当夜和十八日上午，根据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精神，认真地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派遣谈判代表的具体意见，并于十八日下午报告给召集人何政委。此後，我们一直在积极准备谈判。但挑起武斗的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对谈判毫无诚意，一再拖延。在军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多次催促下，直至二十二日中午才提出有关谈判的六条意见。其中提出参加谈判的负责人是党言川、申茂功。召集人於二十二日晚通知各方：由所报谈判负责人在二十三日举行会议，商讨拟定选派代表名单。

二十三日上午，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竟不按通知规定，另派了两名所谓“全权代表”，代替党言川、申茂功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无理取闹，使上午的会议遭到破坏。下午後，联委等组织一方的负责人党言川等，拒绝出席会议。致使商谈又无法进行。对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连续破坏会议的罪行，我们都当即提出了强烈抗议。

更令人气愤的是：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极为卑鄙的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在郑州竭力拖延，破坏谈判，一面竟早在十九日就非法单方组成所谓“代表团”偷偷离郑，公然抗拒中央命令，无视总理指示，欺骗省军区和革命造反派。二月二十四日，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从北京给何政委来电，说什么“二七公社”的代表已相继到京，并诈称“代表名单已报小央审批”。

我们对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肆无忌惮地对抗中央命令，公然无视周总理的指示，丝毫不尊重召集人的意见，千方百计地蓄意破坏谈判的严重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

我们决心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必须在郑同我们协商拟定谈判代表名单，由召集人上报中央，待中央批准后，再赴京谈判。

我们强烈要求，以党言川为首的非法代表团必须立即解散，党言川等人必须立即回郑，不得再继续对抗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必须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罪，向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载于《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丁望编，香港中报月刊出版，1969 年。该书有编者按："此件刊于河南红卫兵的传单（一九六七年，缺日期）。"）

毛主席　河南人民想念您--侧记河南的白色恐怖 1967.04.12

目前，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正在河南泛滥！

河南告急！

毛主席啊！毛主席！处在白色恐怖中的河南人民想念你！顽强奋斗的二·七公社的战友们想念你！河南五千万人民眼望着北京，盼望着听到您老人家的声音！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八个月的战斗中，郑大革联的战友们，河南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同志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敢打、敢拼、敢革命、敢造反！他们向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为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怎能忘记啊！二月七日这一天，就在二·七罢工的圣地——郑州，红旗漫卷，锣鼓喧天，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了大联合，二·七公社诞生了！然而，革命正在蓬勃发展，革命派的大联合正在进一步形成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凭着他们反革命的嗅觉，感觉到朝不保夕，马上就要彻底完蛋了，于是，便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拼死同革命派进行斗争，一时，黑云滚滚，妖雾弥漫，白色恐怖再一次笼罩着河南，一场大厮杀又要开始了！

风云突变！

几天的时间内，郑州市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均被保皇派砸了一遍！

三月五日晚，郑大革联门口，一辆吉普车嘎然而止，从中跳出四个人，对郑大革联下达通牒：明天我们要开大会，不许你们捣乱，如果破坏会场，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三月六日上午,我们在郑大革联与党言川交谈。党言川，他中等个子，蓬松的头发，戴着眼镜，摸着长头发对我们说："过去有些作法不对，今后应尽力与军区搞好关系，然后搞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正在这时，门外人声嘈杂，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把郑大革联包围了！保皇师的广播车疯狂地叫骂：郑大革联是非法组织！要坚决取缔郑大革联！……

保皇师的干将在外大叫大嚷，并强行冲入搜查，情况万分紧急。在匆忙之间，党言川写了封简信，并把郑大革联的印信交给我们，托我们带出。说时迟，那时快，保皇师一窝蜂地破门而入，就要绑架党言川。“把我们的情况带给中央！”党言川仅来得及说出这么一句心里话，就被架走了！

别了！同志！别了，亲爱的战友！暂时的分别并没有什么！地质东方红的战士坚决地支持你们！坚决与郑大革联并肩战斗！

我们充满了必牲的信心，背起了书包，带着郑大革联战友们的委托，大步地向门口走去。要出门时，保皇小丑们瞪大了眼睛，疯狂地吼道：一律不许走！好一幅看门狗似的耀武扬威！“告诉你们，你们没有权利戒严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保皇派毕竟是保皇派，在我们的凛然正气面前，他们不得已而退后一步，让我们登记一下。向老保登记是对地质东方红的污蔑！要写，你自己写去！于是，我们昂然地跨出了革联的大门。

我们刚走出不久，保皇师们由于没有搜到革联的印信，便望眼欲穿地死命盯着我们的书包，他们派出大批的侦探，盯梢、跟踪，甚至要强行搜查！一场激烈的斗争开始了！

在一大群保皇卫士们的“保护”之下，我们来到郑大门口，门口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仅留一个门洞供钻来钻去，两侧还立着几十位打手。大门不让走，我们走旁门！这下可忙坏了保皇师，几十个人往返护送。可怜的保皇师，动手抢吧，又不敢，放我门走吧，心不甘！只得甘当我们的随从，在郑大周游了五个小时！

为了不辜负战友们的委托，为了带出郑大革联的印信，我们决定：打开书包让校门栅栏外边的广大群众看一看．我们打开了书包，在众目睽睽之下，保皇小丑们不敢细看，只得允许我们出去。我们胜利了!我们雄赳赳地跨出了郑大的大门！

这是一件小事，它比起河南革命造反派的斗争业绩，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本不值得一提。但是，我们写出来，是给那些保皇小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你们跳吧！骂吧！跟踪吧！盯梢吧！就在你们几百人的重围之中，我们四名地质东方红战士通过你们的层层搜查，终于带出了革联的印信，这不是对你们绝大的讽刺吗？

我们写出来，是让郑大革联的战友们看到，这是我们对自己战友的支持！顽强战斗，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我们写出来，是让二·七公社的工人、农民同志们看到，地质东方红的战士水远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郑州，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并没有屈服，他们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他们在浴血战斗!

三月六日，郑大附中红旗等二·七公社的小将们，冲破了郑大的圈墙，冲入郑大，冲入党川被因的楼房，向党言川告别！他们把心爱的语录牌和毛主席像送给党言川！

是他们，在楼下给党言川扔馒头，让党言川“不吃保皇派的馍！”

是他们，在房上写下了巨大的标语：二·七公社必胜！

然而，战斗师却对这些红小将恨之入骨，对他们连推带打，使他们的鲜血洒在郑大的土地上！

三月六日，郑州，黑沉沉的夜！

消息传来，党言川被打，凌晨四点，失踪！粮院革命造反派被砸！河医东方红被砸！……

多少人彻夜未眠！多少人对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像片，热泪夺眶而出！

三月七日，各厂革命造反派的广播均被管制，并强迫命令他们解散，加入保皇组织！

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有的在睡梦中被抓去；有的，在车床边被抓走；……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种种借口……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河南五千万人民是怎样地盼望啊，盼望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忘不了，在郑大被围的那天，一个衣服被撕烂的同学，不顾战斗师的监视，拉着我们说：你们回到北京，千万别忘了把我们的情况向中央汇报！

我们忘不了，我们临走前，国棉一厂的革命工人保护着我们，送我们到车站，帮我们甩开盯梢的小丑，直到深夜四点。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使他们凌晨六点半钟还要赶回车间，为国家创造新的财富！

我们忘不了，国棉一厂的一位老工人颤巍巍地捧起毛主席像，含着眼泪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日夜想念你啊！

我们忘不了，一位工人同志含着眼泪说：“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指保守组织)，杀头我也不干！”

革命才知主席亲!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河南五千万人民是怎样地向往啊，向往北京城！是怎样地渴望啊，渴望听见毛主席您老人家的声音！

当我们提笔写到这里，心头压不住满腔的愤恨，现在，河南革命派的战友，我们共同浴血奋战的同志，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被逮捕，遭毒打，受迫害！而那些保来保去，一保到底的保皇干将却死灰复燃，成为当然的“左派”，甚嚣尘上，耀武扬威，毒打郑大革联的战友，是可忍，孰不可忍！

何ＸＸ，这个在河南十余年的老混蛋，当初和吴芝圃一起打击迫害潘复生同志，今天

又妄图搞垮刘建勋同志。正是这个败类，开动造谣机器，蒙蔽广大人民，残酷镇压革命派，实行反革命复辟。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仅派一时的猖狂，丝毫不表明他们的强大，却充分说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了！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五千万河南人民！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在中原大地高高飘扬！

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

豫磊（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7 年 4 月 12 日）

毛泽东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 1967.04.23

林彪、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5.29
周恩来 康生 陈伯达
〖时间：1967.5.29，21 时—0 时 30 分，地点：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厅。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出席代表：二七公社 22 人，河造总 10 人，省委干部纪登奎等三人，（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等三人。列席：首都红代会 4 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 1 人。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1 人。〗

（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进入会场。）

总理：何运洪同志来了没有？

何：来了。

总理：你给郑州打电话了没有？

何：打了。

总理：那三位书记来了没有？

何：还没有到。

总理：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中央请他们来了，怎么把他们弄回去了？

何：（未答出。）

二七：这是何运洪捣的鬼！（高呼口号：打倒何运洪！砸烂河南独立王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总理：同志们，不要激动，到了中央摆事实讲道理么。

康老：摆事实讲道理最有力么，一个一个讲，不要吵么。

总理：党言川同志来了吗？

言川：（站起来）来了。

总理：纪登奎同志，来了吗？

纪：（站起来）来了。

总理：三个书记明天也来，何运洪你负责。

何：好。

总理："造总"来了吗？

造总：来了。

总理：来了几个人？

造总：十个。

总理：北京这么大，你们怎么不告而走啦？

造总：我们有意见，他们把我们逼走的。

二七：造谣，是个大阴谋！（双方争吵起来）

总理：别吵，别吵么！今天我们开三个钟头的会，9 点至 12 点，二七公社翻过来，一边一个讲。还有纪登奎么，军区么，党言川，你们谁先讲？（对造总）你们的代表什么时间来？

造总：明天来。

康老：不要激动，不要吵架，这是在中央开会，摆事实讲道理，问题好解决么。

总理：不要吵架，不要骂街，摆事实讲道理，二七公社先讲？

郑大联委：我控诉何运洪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总理：你的名字？

郑大联委：寇学济。

总理：噢！噢！二七的，先讲吧！（寇讲了一段，很激动）

总理：多摆些事实。

王力：这是中央开会，向你们作调查的。

康老：心情平静些。

寇：（点名控诉何运洪，当寇检查把二七公社与军区的矛盾公开化时，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当讲到河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二月黑风中跳出来要抓“右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时，康老注视着寇点了点头；当讲到何运洪对纪登奎迫害时，谢副总理站起来用目光寻视纪登奎同志，纪登奎起身向谢副总理点了点头；当讲到在河南竟有人说：“何运洪他老人家说……”时，总理、康生、王力等首长大笑。这时‘造总’起哄为何运洪辩护。）

总理：（生气地）别吵！让别人讲完！

康老：（对造总）何运洪在场么，叫他们讲，你们干什么？

（寇继续讲。当讲到不同观点调查表时，总理伸手接过这种调查表；讲到何运洪利用河南日报制造反革命舆论时，二七代表把几期河南日报递给总理。刘生揭露何运洪在河南日报搞假夺权的阴谋和在报纸上犯下的罪行时，总理、伯达、康老看河南日报；讲到何运洪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时，二七代表把赵文甫二月黑风中给何运洪的三封黑信递给总理。接着河医东方红黄天亮控诉了（何）操纵公安公社制造五・二六惨案的罪行。）

总理：我们从二月份起就着手一直解决河南问题，你们要摆些事实，“造总”哪位同学讲？节约点时间。（郑工造总孙孝先就 5.22 事件攻击二七公社，诬蔑二七抢了他们的人。）

总理：你们走了干啥？我们派武装警卫嘛。（郑大战斗师李志江就 5.22 事件继续攻击二七公社和首都红代会，陈伯达、谢富治、王力、关锋等首长陆续走出会场。当他谩骂“二七一小撮混蛋”时）

总理：（生气地）你们不要骂人！

李志江：我心情太激动了，骂人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是不对的。

总理：这个地方不要骂人嘛！

孙孝先：二七公社没有谈判的诚意。

康老：你们的人是不是回去了？是回去了，还是藏起来了？

造总：真回去了。

总理：（对造总）你们说完了？（造总又站起来一个要说话）

总理：你讲两次了。（造总一个人还要说话）

总理：（对造总）算啦！（对二七公社）二七公社，你们谁讲？

（二七公社十三所红色造反军的张保怀同志痛斥造总发言中对二七公社的诬蔑，申明五·二二事件与二七公社无关。向中央首长汇报说，二七代表都是陆续坐煤车来的。）

总理：何运洪，叫你安排双方代表，你没安排吗？

何：他们不要安排。

二七：我们上了火车，他们还拿棍子打我们，把我们从火车上往下拉呢！（张保怀继续控诉对首都红代会战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所欠下的血债，并向总理要求让红代会和军事院校战友参加汇报。）

总理：红代会的同志没有进来吗？我以为进来了。（派人到门外请红代会及外地战友参加会议）（造总一女代表又借 5.22 事件嚷起来。）

总理：你还吵，有什么意思？

康老：（严厉地）你们抓这一件事，就说在北京没有人身安全，借口北京没有人身安全把代表弄走或者藏起来，这不对。

（造总那个女的还要吵）

总理：不要吵！

康老：还是把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谈谈吧，把河南的关键问题提出来，不要抓住这件事不放。（二七代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首长指示，谈大方向。）

康老：何运洪，你负责他们来！中央老早就叫你们来，你们是不执行的，为什么河南问题一直拖到现在？二月份就在解决河南问题了，有很多问题你们是不执行，（何运洪站起来想说话）你不要站起来，中央有材料，以后给你说！（何运洪呆板地坐下去）（郑大联委党言川同志控诉何运洪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当讲到何运洪在河南搞大逮捕时）

总理：最多逮捕多少人？宣布非法组织多少？

（二七公社代表回答以后，总理暂时离开会场）

王力：郑州市宣布非法组织多少？！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后是不是撤消了？

言川：四月十六日军区付政委余嗣贵还在大会上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还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

王力：这些重要材料，刚才你们都没有讲清楚。

总理：（向党言川）你什么时候被捕的？

言川：三月九日在商丘被捕的。

（二七公社新华社河南分社"铜墙铁壁兵团"战士刘建生同志发言控诉何运洪对新华社记者的迫害，当讲到河南目前"非法"盛行，新华社记者进行采访，没有通过河南军区也是非法的时，总理、康老都笑了。首长们很注意地听刘建生发言。）

总理：工学院还有谁？算了，不要讲了，让纪登奎同志讲一讲。

纪：（站起来）抄造总的材料是不对的，我的确不知道，后来在北航韩爱晶同志告诉我的。他们说我是后台。（总理、康老都笑了）我把这事说一下。我被关了四个月。

康老：什么时候被关的？

纪：一月中旬到五月。（康老没听清，总理对康老说了一遍，康老点了点头。）十六条以前，我执行了反动路线，压了郑大联委，十六条以后，我也有些错误，我愿意检讨，今天时间少了，我暂不讲这个。河南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支左问题上搞错了，去年八月份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除了一小部分，摧垮的面相当大，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摧垮了，信阳、商丘全部被摧垮了。现在当权的"三月左派"整天喊着与公安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公安公社是什么人呢？是死保王一鸣（公安厅厅长）的人，军区搞"三结合"结合他们，各县公安局都是这样。他们把四大民主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省直机关、十大总部是怎样起来的呢？就

是原系统、原机构、原部门把真正造反派压下去以后，其余都成了“造反派”。省直机关负责人李伟是省监委付书记（原公安厅付厅长）丁石的秘书。省直机关不许有一张反面的大字报。丁石一贯支持多数派，在工学院也是支持多数派的。现在的郑工造总原来确是造反派，郑工造总也是清楚的。他们看到自己的阶级兄弟都压下去了，原组织一百多人造了何运洪的反，质问何运洪为什么把造反派压下去。我曾问何运洪这矛盾是什么性质？他不听，很顽固，把所有大学的造反派都说成是我的御用工具，本来这些造反派都是从对本单位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何运洪抓住了所谓“冲军区”、“打、砸、抢”，把造反派都说成是“御用工具”。他们利用专政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谁冲公安机关就把谁打成“反革命”，平顶山公安局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在一起，搞便衣活动，镇压学生运动。安阳、商丘，开封都是这样，反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说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认为是错误的，我写过一份检查中说：“如果把冲军区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那么我承认我错了。”我说：“你们不要逮捕学生，逮捕我好了。”（农学院李天祥插话：“军区又向学校派了工作组，军区宣布说，工作组是经过军区挑选的。）造反派被压得很惨，也有个别很好的人，据说洛阳 344 部队一部分人、硬骨头六连、林县武装部支持造反派。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非法后，下面乱宣布非法组织，中央十条命令下达以后，他不仅不改，还开大会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就这样群众组织翻了个个儿。把好同志打成了“反革命”。革命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

王力：（拿着所谓“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十二条”的传单说）这个十二条是谁搞的？

总理：何运洪，你说！

何：有，我们没有看到。

××：是郑工一同志搞的！

造总：我们是从红代会那里搞来的。

陈新民（红代会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战士）：是我们从公安厅机要室得到的，何运洪是篡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王力：（高兴地笑着）行了，这个情况清楚了，我们知道就行了。第一是从公安厅机要室得到的，第二下面有传达。（纪插话：安阳传到十七级干部。）军区至今没有否认，没有辟谣，是不是哩？

何：（狼狈不堪，吱吱唔唔）我们不知道。……

康老：不要说了，已经印成了传单，大家都知道，你不知道？

纪：（接上边话）赵文甫、杨蔚屏跑出来说：“形势很好。”杨蔚屏在前一段运动中被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了，这时他便说：“我死到棺材里也要记住这件事。”省委机关干部大部分过去了，戴苏理也过去了，还骂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大杂烩”，还要出来“三结合”。何运洪这样搞下去结果是什么样子？公安厅的权交给了保守派，造反派炮打公安厅是对的。“河南日报”社也是这样，还有电台。准备“三结合”的付省长李庆伟是支持保守派

的。叛徒齐文俭过去带着日本人到处抓人，也被结合起来了。“三结合”净搞“中间人物”，搞到底全部来个倒退。法院结合了一个伪县长，公安厅把权交给了保守派，报社也是这样，生产指挥部结合的李庆伟支持保守派，齐文俭是个叛徒。谈判前应该悔改了。军区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来中央，要把问题解决一下，带枪的不好办。

张保怀：敬爱的周总理、康生、伯达同志及参加会议的各位首长同志：根据今天会议的情况，我代表二七公社特提出以下几条建议，报请总理考虑。

总理：可以。

张保怀：第一，何运洪幕后操纵破坏谈判，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何运洪负责。第二，何运洪在河南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郑州市仅是一个小部分，河南除郑州以外的广大地区同样处在何运洪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地方比郑州更严重，为了全面地反映河南的情况，请敬爱的周总理批准以下几个地区各派一名正式代表参加谈判：开封八二四、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偃师八二五，焦作矿院八一八，平顶山选煤 224 战团、鹤壁、兰考造反派。

康老：派不派由中央考虑决定，我问一个问题，反对派可不可以派呢？

二七：可以。

戚本禹：八・二四可以多派几名代表，八・二四派是很有名的。

总理：可以来 2－4 人。

戚本禹：（点头）来四个吧。

张保怀：第三，首都红代会与二七战友一直浴血奋战，应该派代表参加谈判。

萧华：（对何运洪）你们怎么对待军事院校的同学？

总理：是不是军区打了军事院校的同学？

何：没有打他们，没有围攻他们。（二七：（众）胡扯！造谣！002 部队战士讲了开封 5.12、5.14、5.25 事件。）

总理：首先命令军区对待军事院校的同学不要有什么歧视，一定要让二百五十个人回来（指开封被扣学员），红代会同学站在二七公社一边，在河南受压制，作了很多工作，了解了很多情况，我们了解了，明天派有关同志单独和你们谈谈，另外不要再派人去了，已经有一千多人，在北京汇报解决行了。派人去了，已经有一千多人，在北京汇报解决行了。

张保怀：（接着提）我们要求中央责成何运洪立即制止郑州的武斗，停止对二七公社的继续镇压，并要求派医疗队到河南。

总理：何运洪，对武斗事件军区要负责，不要再发生武斗，压得很厉害么！要出去劝阻，要打电话，每天要向军委汇报。

康老：何运洪、一军（野战军，驻开封）有医院，（省）军区也有医院，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都是阶级兄弟么，对伤员要一视同仁，如果真的歧视的话，杨代总长在这里，军队是有军纪的，明天派医疗队去。

张保怀：五，为了更好地揭发批判何运洪在河南犯下的滔天罪行，让受蒙蔽的代表回去，等觉悟过来再来参加谈判。

（总理、康老都笑了。）

康生：这一条不是和刚才说的同意他们来矛盾吗？

张保怀：这一条不要了。坚决收回，宣布作废。

康老：就是么，收回就好。

张保怀：六，我们要求敬爱的周总理批准革命干部耿其昌、王庭栋等同志参加会议。他们支持造反派，二月份以来受压制的。

总理：何运洪，由你保证这两个同志来京。

康老：张树芝（河南省军区司令员）为什么没有来？

何：他有病正在休养。

总理：叫他来，为什么不来？在北京也可以休养嘛！还有余嗣贵付司令员。

何：付政委。

总理：叫他也来。

张保怀：何运洪在粮院讲话，表示要和老保八八团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还说八八团可以宣布我们粮院联委为非法组织。

总理：他是挑拨的。

张保怀：七、请敬爱的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代二七战士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林付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转达我们的决心，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决不丢，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我们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作的，我们二七公社战士的共同口号是：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彻底砸烂河南独立王国；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誓不罢休！（二七代表高呼口号："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砸烂河南独立王国！”）

康生：你们拥护不拥护解放军？

二七：拥护！（二七共同呼口号：“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坚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康老：（大笑）

张保怀：何运洪派到粮食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付×××说：“要想为郑大联委翻案，就必须打倒解放军！不打倒解放军，不用想为郑大联委翻案！”

总理：（很生气的）这不是挑拨军民关系吗？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结束，有些事可以马上解决，答复几个问题：1、造总代表明天赶到，你们负责让他们回来，材料北航归还，问题很清楚，不在材料多少，道理摆清楚，问题一清二楚。在毛主席身边，在北京安全没有保证，那么在河南有保障？靠谁？

二七：（众）靠何运洪保护他们。

总理：2、增加代表，由我们的记者同两方面商量一下，对方也要来，对方没人，不来也可以，时间定了，以后通知军区。（戚本禹插话：八·二四可以多来人。）八·二四比较有名，可以来二个至四个，谈判不等，继续进行。

3、革命干部王庭栋、耿其昌要他们来，何运洪负责打电话，把他们送来。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你们说他们也在郑州，他们一块来。军区来人少，司令员张树芝身体不好，来么！来北京可以治病，好不好？付政委余嗣贵也来，政治部主任也来，一共四个人；八·二四来了，一军支左负责人也来一个，可以一块谈。

4、郑州武斗很盛，军区可以制止，劝解一下就打不起来了，何运洪负责，你要打电话。军事院校赴豫调查团的人牺牲了两个，二百五十人在开封被扣，一军要马上放，北京尚有学生与军区对立，可以劝说。马上放，给自由，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文化大革命么！

王力：上你们军区楼上的也要把他们放出来。

造总：前天发了公报，让他们回去。

何：他们不下来。

（空军 002 部队代表籍保军很激动，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何运洪）：何运洪，你当面欺骗中央首长……把 796 部队的战士往死里打。

总理：对军事院校的同志不能有任何歧视，让他们安全离开，也告诉开封军分区、一军，保证二百五十人的安全，武斗你负责。郑州、开封大武斗要劝嘛！能劝下来？你今天打电话，明天汇报。

5、红代会去做了许多工作，支持二七公社有材料，记者站（红旗杂志）去找你们谈，弄清楚再处理，北京不要再派人去了，在北京汇报好了，事情总要转过来，不要扩大。

6、明天派医疗队去。何运洪也要负责，军区一军有医院，要好好的治，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那些都是阶级兄弟，拥军爱民嘛！

何：我们是这样做的。

二七代表：何运洪你胡扯！

总理：我们要调查，明天派一个医疗队去，一面医疗，一面调查，你们二七公社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可以住在两个地方，你们受压抑了，你们在北京完全可以公开出来，不要让我们不好找。今天的事谈了马上就做，但不要回去打电话，出大字报，大标语。

造总：二七公社靠北京来电吃饭。

总理：（对造总）这是什么话！嗯？怎么这么说，这不对。

康老：有的说不打电话，回去还是打，各取所需，增加我们的麻烦。

二七：保证执行中央指示。

康老：刚才王力念的“十二条”，军区马上查明，要辟谣。

王力：也可能是军区说，下面记的。

关锋、戚本禹：中央文革没有搞什么“十二条”。

伯达：我们知道“九条”、“十二条”肯定不是中央的。

王力：（微笑）不是中央文革的。

杨成武：也不是中央军委的……

总理：好！散会，同志们再见。

（0：30 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要给毛主席争气！”的口号声中，挥手向代表告别，离开会场。第一次汇报到此结束。）

康生陈伯达接见外事口单位和红代会代表谈河南问题及抓叛徒问题 1967.06.03

〖六月三日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摘要。〗

康生谈河南问题有关部分摘抄如下：

对河南二七公社的同情和支持是完全对的，大方向是对的，河南的问题很多，当前分为三派：有二七公社、造总、公安公社。军区有错误。毛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主席指示我们解决。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康生同志在讲到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

（1）你们（指首都红代会）派到全国各地的联络站及其工作人员，作了不少工作，但也犯了不少错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你们必须立即撤回北京，搞本单位斗、批、改。在外地用中央文革的名义，这是不对的。

（2）六月三日，你们开大会，声援河南（二七公社），不应该开。你们这样做是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

（3）中央叫河南双方来谈判，你们把河南造总的材料、粮票、钱抢走是极端错误的，是无政府主义。给中央解决河南问题带来很大困难。

（4）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陈伯达：

河南三分派，河南造总一派，二七公社一派，公安公社一派。你们不能把河南造总说成保皇派。要那样说，这是极其错误的。河南造总来京汇报你们把人家材料抢了，这是不对的。人家第二次送材料来，你们又抢了，这是错上加错。红代会到四川和河南包办了两省的运动。在河南和四川的红代会同志要全部撤回，一个不留。要相信河南五千万人民和中央会正确处理河南问题的。主席是很关心河南问题的。主席授权周总理、康生和我负责解决河南问题。

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摘抄如下：

抓叛徒的问题，我不详细讲，以后中央要发文件。红卫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多贡献。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关于刘少奇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照片也发了下去，大家很重视这件事，做了调查工作。外事口也好，其他学校也好但是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处都区抓叛徒。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工作，可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你用一个“抓叛徒小组”的名称，去调查别人，一听这个组名就有意见，

很不好。

另外这件事情不简单，做结论要慎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不能根据未核实的材料，宣布某一个人是叛徒，这实际上制定了一个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这和西方新闻记者抢新闻不一样，你也抓，他也抓，被利用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若都有问题那不就把毛主席的结论推翻了吗？

进监狱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个很好的考验，也很光荣。不要一进监狱就怀疑人家是叛徒，不要随便贴大字报，有些群众组织做得比较好，得到材料交给中央，不立刻宣布结论，这是好的。你们革命组织要掌握方向。不要丧失警惕，也不要特务如麻。对历史上有政治结论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历史问题的决定权绝对在中央，必须由中央决定。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他是叛徒。担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今天可以向同志们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特务。今天我们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就联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调查要结合本单位文化大革命，不要超越本单位，偏向的去搞叛徒。这样会把文化大革命方向改变了。四川军区个别同志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因为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反运动。因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同志们，要清醒地估计这个问题。

关于李先念，总理讲，李先念不是叛徒。即使有这个问题，也只是个大错误，是个立场错误。

为什么要将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材料那时发下去呢？那是为了证明，刘、邓不但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现在同志们有了偏向，故向同志们交待一下。

……研究了有关刘、邓的许多材料，知道刘、邓不是“三和一少”，而是“三降一灭”，对帝国主义降，对修正主义降，对反动派降。灭革命。他们不是走中国的道路，而是走印度的道路。

在外事口和在军队中有一些人，在国内硬得很，在外国人面前却象绵羊一样。我说在军队中的贺龙，他在马利诺夫斯基攻击毛主席时一句话不敢说，在修正主义面前是小丑。

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记录 1967.06.04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时间：下午四时，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肖华、杨成武、王力、关锋等接见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的首长。〗

陈伯达同志问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时总理指示，让你们同各派代表都谈谈，谈了没有？

何运洪同志答：当时没有听见。

陈伯达同志又问王力同志：总理不是让他们同各派谈谈？

王力同志说：是要他们同各派谈谈，河南来的同志要找各派都谈谈，问题还是要通过你们去解决。

陈伯达同志说：不要有成见，要找他们谈，反对你们的去谈谈也好嘛！

总理说：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主席二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以后我们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我们讲只有一派了还有啥谈的，就没有谈的了嘛！但是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总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把他们压下去，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嘛！你压了他，他就要闹。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你们来了，二七控诉你们，我们说不能叫控诉，他们提了些意见，你给你们刚来的同志讲了没有？

何运洪同志答：给他们说过了。

康生同志说：去年南大、交大、郑大运动起来得快，南京、西安是派工作组进去镇压，河南开始就支持学生造反，主席称赞过。（总理插讲：现在翻过来了。）赵文甫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何运洪同志答：收到过一封。）这封信很坏，是挑战性的，搞不好，你们和内蒙一样。

总理说：你们谁谈谈。

接着何运洪同志代表军区向总理和中央首长作检查，当检查到二月十七日中央指示要派代表来京谈判，我们没有坚决执行，把郑大联委当作右派时，（总理插话说：毛主席当时说即使是右派也来，右派也不能压。）

总理说：你们是不是谈谈省委问题。

何运洪同志说：由李善亭同志谈。

总理说：李善亭同志你谈。

接着由李善亭同志汇报省委的问题，当汇报文敏生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问题时，（余嗣贵同志插话说：刘建勋也说过读毛主席著作也要一分为二。）

关锋同志插话说：看刘建勋同志说一分为二是咋说的，如果说毛主席著作里有辩证法，讲对立统一，讲一分为二，这就不错，如果他是说主席著作有正确有错误，那就错了。

康生同志插话说：这是个复杂问题，看刘是怎么说的，是什么意思？

李善亭同志继续汇报，当谈到文、纪叫郑大联委假冲省三级干部会议时，关锋同志插话说：你们咋知道这样详细？李善亭同志说：是张耀东等揭发的。

关锋同志插话说：这个人怎么样？要把事情弄清楚。

杨成武同志插话说：河南问题很清楚，现在是怎么检讨的问题了，你们要和二七公社讲清楚，要检讨。

关锋同志插话说：刘建勋在北京三结合，郑州就出现了坚决打倒刘建勋，打倒刘建勋的后台谢富总理的标语，还有打倒江青同志和总理的标语，你们为什么不表态？

杨成武同志插话说：还有那个十二条，你们为什么不辟谣？

康生同志插话说：是不是符合你们的口味？！对你们有利，你们不吭气。

杨成武同志插话说：起码你们很欣赏。

康生同志说：你们还有要和赵文甫结合的电报。李、余、何诸同志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电报，我们可以再查一查。

康生同志说：二月叫你们谈判，你们不来，不管有意无意，是和主席思想对立的。

关锋同志说：你们想把人家拖垮，造成既成事实，再来谈判，这是很不对的。

总理说：当时你们拖，你们压了人家，所以人家反对最强。

下面接着李善亭同志继续汇报，刚谈到纪登奎问题时，总理插话说：对纪登奎的问题，主席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

关锋、王力同志插话说：你们还继续谈，可以谈你们的看法。

李善亭同志汇报完省委的问题后，余嗣贵同志汇报二七公社的问题。

总理说：郑州八大总部是怎么一回事？

余嗣贵等同志作了回答。

总理说：对八大总部，你们要想法让他们和二七公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当然现在距离很大了。河南不是军管，实际上军区说了他们还听，你们这次立场要站稳，谈判才能谈好，八大总部要求要派代表来，可以和他们双方协商，（王力同志插话说：二七公社不同意）可以和二七公社商量，一个总部来一个。

王力同志说：军区的问题就是几个字，方向、路线错了，打击了革命造反派。

总理说：要把立场变过来。

王力同志说：要听造反派（二七公社）的意见，要到群众里面去，听听他们的意见，不要靠什么百分比，搞繁琐哲学。

康生同志说：你们这一段是什么路线，什么方向，要好好检查。

王力同志说：你们说人家（二七公社）大方向不对，人家抵制你们，说明人家的路线对了，人家如果跟着你们，相反的路线错了，你们把革命的当成保守的，把保守的当成革命的，就是搞错了，对干部也是这样（省委领导干部）。

康生同志说：你们说人家（省委领导干部）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这一段就是和毛泽东思想对立的。

总理说：你们这一段没有按林副主席说的活学活用的办，你们把这个弯子转过来。（康生同志插话说：你们有个电报，体现了你们的思想，说给郑大联委平反是冒险主义。）只要你们承认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是会提高威信，不会降低威信。

王力同志说：你们要到二七公社主动做工作，不然的话就不好办。

陈伯达同志说：你们回去先议论一下，再听就听进去了，要议一议。

总理说：钟生益不是支左办公室主任吗？你们也可以让钟来，和一军同志一起讨论，还可以找肖华、杨成武、关锋同志给你们帮一帮。

康生同志说：你们糊涂，你们没看主席是怎么批的，你们说人家（郑大联委）是右派，主席批的即使是右派也来。

王力同志说：关键是你们路线错了，要到二七公社那里去谈谈，他们说的不好听，这不要紧。

杨成武同志说：你们干干脆脆承认路线错误就算了嘛！山东省军区有个报告，中央批了，批语有三条：一条是公开检讨比不公开检讨好，二条是承认路线错误比不承认路线错误好，三条是早检查比晚检查好，你们要好好学习这个批示。

陈伯达同志说：不要怕丢面子，怕丢面子，反而面子丢得更多。

杨成武同志说：二月叫你们来谈判，你们不来，别的地方都巴不得要来，你们不来，你们犯了路线错误，但不是刘邓路线，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犯了路线错误。

王力同志插话说：犯了路线错误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总理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一军同志没有谈，可以找全军文革，可以找肖华、杨成武、关锋同志谈谈。

何运洪同志说：向总理请示一个问题，家里没有什么人了，又很紧张，看钟生溢还来不来？

总理说：既然这样就不来了。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肖华杨成武关锋戚本禹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1967.06.10

〖时间：下午六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戚本禹参加接见。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的首长出席〗

杨代总长说：总理指示，叫肖华、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听听你们上次谈了以后，还有些什么意见，一军还没有汇报，也谈一谈，总理就不参加了。你们不是讨论了几天？把你们讨论的情况谈一谈。

何运洪向接见首长汇报讨论的情况。当谈到刘建勋在北京三结合后，河造总和八大总部喊打倒刘，我们有个错觉，以为群众喊不好制止，没有坚决提出不让他们喊。

关锋同志插话说：听说八大总部过去名声不好。余嗣贵插话说，还不是那样。

当何运洪汇报结束时，何运洪说：我们想，请能明确一下，如果我们支持错了，是八大总部支持错了，还是造总？我们好给家里说一说，通一通气，先作工作，这几天下面就造我们的反。

关锋同志接着说：这个问题不是关键，关键问题是看我们领导同志怎么认识，能认识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就好了，山东就是这样。另外，我昨天看了份材料，不知确实不确实。据说，造总在这里谈判，想在郑州把二七公社搞垮，八大总部以为自己名声不好，把希望寄托在造总，如果造总胜利了，他们也有希望。还说军区给他们发了枪。如果确实，这就是个问题。

张树芝、余嗣贵说：民兵武器是按枪弹分开、分别保管的，我们没有给他们发过枪。

接着，张树芝、余嗣贵发了言。

关锋同志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谈点意见，不一定对，我们说的不算数，这个问题是中央决定的，我讲的供同志们参考。军区的同志检查认识错误，把自己想不通的问题提出

来，这是好的。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不是把二七公社的问题看重了，把河造总的问题看轻了，是不是一边听你们的话，一边不听话，甚至对你们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

二、是不是你们支持那个、不支持那个，是以他们对刘建勋的态度去区分的。如对郑大联委，你们的认识就是这样。刘建勋六二年以前搞借地是有错误，去年调北京，表现还不错。（戚本禹同志插话：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错，主席称赞过他。）你们对支持的或不支持的，是不是以对刘建勋的态度为转移，如果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想下去就错了。（戚本禹插话：刘建勋在北京参加三结合了，你们还报要打倒刘，和中央对抗。）造总提出打倒刘，还要打倒刘的后台谢富治同志，这是不对的。要不要从这方面去想一想。

提出这样两个问题来，供同志们考虑。

杨代总长：二七公社不能从纯不纯去考虑。主席说，天下没有清一色的东西。主席说坚定的左派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至多百分之三十。你们从纯不纯这个框框去看问题就错了。他们打砸抢可能有些过头，但他们是年青人，他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二个问题说，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对二七公社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要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说二七公社有好处，但又说他不好。是不是感情上搞不过来。

戚本禹同志说：错误肯定你们是有错误，但是怎么认识，你们可以找二七公社去谈一谈，多听他们几次。这次，我们想让军区自己认识错误，同各派协商解决，作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好典型。我接触过二七公社，他们还是讲道理的。

何运洪说：我们是不是回去一趟，给家里通通气，给家里作作工作。

肖、杨首长：你们这里还没有搞通，中央还没有定，就回去，回去怎么说？还是先在这里搞通。

杨代总长：你们要学山东。山东省军区、六十七军都转过来了。开始，大军区还转不过来。你们要学习山东的经验。

那天，总理、康老讲了，你们犯了路线错误，和刘邓的不一样，你们要正确认识问题。

当张树芝谈到我们的工作不好作时，戚本禹同志插话：关键在你们两位（指张、何）。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从夏邑县看河南的“独立王国”1967.06.10

天津市防疫医疗队造反总部赴豫医疗队

我们天津赴豫医疗队，到河南省夏邑县支援流行病防治工作，一个多月的农村生活，我们亲身看到了何运洪等河南省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欺上瞒下，搞独立王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农村文化大革命，企图以农村包围城市，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在这里，我们愤怒控诉河运洪之流扼杀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和对我医疗队的迫害！

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我们分别到达商邱市和夏邑县，只见满街贴着“打倒郑大联委”、“打倒八·二四”、“打倒刘建勋”、“打倒党言川”，从专区到县，从公社到生产队，都是这样的标语。另外，贴得最多的还有公安局逮人“通告”。不但是当地的，而且鹤壁、焦作、新乡、砀山、天津的都有。他们用这样大的精力翻印公安局逮人“通告”，而不去翻印中央文件和重要社论，就是企图用“坐牢”来恫吓群众、利用公安部门作为何运洪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这些革命造反派组织，何运洪发动全省围剿。我们在夏邑县李集公社，向老乡询问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老乡只知道何运洪宣布这些革命组织是“反动的”，并不知道他们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因为这是由何运洪自上而下灌输的，是愚民政策的结果。县里印发了大量的唐伟之流的传单和何运洪的讲话，散发到生产队，作为文化大革命学习材料。县里的御用工具“大联合”，编印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五项标准》要农村学生、卫生员学习，却闭口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桑[土固]公社，我们要求卫生员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大队书记不答应，却要学习他们的所谓“标准”。

在欢迎医疗队座谈会上，夏邑县ＸＸ部长李ＸＸ说：“支持‘八二四’的大部分是学生、教师，他们百分之九十是不革命的”。四月六日，在医疗队工作会议上，他又说：“‘八二四’的九个头头逮了七个，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李集公社ＸＸ部长苗ＸＸ一提开封师院“八二四”，他就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就是知道造反！造反！”他们不谈中央指示，张口闭口都是何运洪怎样讲的。

夏邑县自去年十二月开展文化大革命。开始，群众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后来，自上而下地出现了一种谬论：“文化革命就是搞有文化的”！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教师、机关干部。一月份，开封师院“八二四”到该地煽革命风，点革命火后，以夏邑高中、初中学生、小学教师、水力局工人为主，成立了“1.17”的革命组织，以后吸收了贫下中农，发展到一万多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在夏邑县公安公社支持下，以公社、大队领导为主，成立了所谓“大联合”的御用工具。发展办法是生产队集体加入，而贫下中农有的还不知道，这难道不是欺骗群众吗?御用工具成立两天后，那些被群众罢了官的“四不清”干部又上台了！县里借“解放一大片”之名，行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实。五月八日，“大联合”召开广播会讲：“对待公社，小队干部的态度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给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真是反动透顶!他们在夜间用五十分钟从县到公社就夺了权，演出了“让权”的丑剧。

二月底，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打成“反革命”后，夏邑县公安公社便逮捕“1．17”骨干，开始了白色恐怖。他们的逻辑是：“八二四”是反革命组织，支持“八二四”的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周围的几个县，凡支持“八二四”的组织也都被打成“反革命”，无数革命造反派战士受到迫害。“八二四”被逮捕入狱的，公布了十四个人，还有被秘密逮捕的，

大约五十多人。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革命小将在狱中学习毛主席语录，看押的人说："你们学了没用，学完也是'反革命'!"这个县里，不让学生搞串联。农中三十多名学生，因为到首都参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回去后竟被打成"反革命"，进行了十八天批斗。这个县整群众，有所谓"消毒"：就是强迫"八二四"、"11.7"的人戴着孝帽扛着幡，站在高台上自己喊："我是反革命"，有的人被捆着"消毒"，手都捆得发紫了。这种"消毒"甚至连十二岁的小学生也不放过，老乡们见了"消毒"的就哭，可是公安公社一小撮混蛋。却以"消毒"为乐，带着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到各村巡回，有的"消毒"达二十五次之多。一个姓李的开封师院"八二四"的学生，因为"消毒"，得了精神分裂症；当地防疫站一干部的爱人因为"消毒"也得了精神病，至今未愈。李县公社李县大队民兵排长，因为支持"八二四"，参加了"11.7"，被斗多次。但公社干部李ＸＸ还带着人去斗他父亲，斗他爱人，并喊："不老实就往嘴里抹屎！"

夏邑县是重灾区，毛主席党中央对当地贫下中农非常关心，发了救济粮款。但是，凡"八二四""1．17"的，他们都不发给，反对的可以多给；凡是"八二四""1．17"，的，还被扣发工资。一个民兵排长(贫农出身)，因是"1.17"观点，就被扣了三百五十个工分，撤销了一切职务。全县去年开除了支持'8．24"、"1．17"的二百多人，在我们撤出时，又有陆续被开除的。

由于这里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好，生产也就上不去，特别是"1．17"成员因为在政治上受迫害，又不给救灾物资，所以被迫外流。李集公社后司集大队菜园小队一百八十人中，一夜就跑了八十人。这笔严重破坏生产的帐，要记在县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要算在河南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算在土皇帝何运洪身上！更为严重的是，农民从一月份以来，就没见过报纸，听不到广播。县社那群混蛋，利用他们的权，扣压中央文件，迷惑群众、欺骗群众。由于他们封锁消息，这里有些农民对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半信牛疑，有的还称之为"刘主席"[原文"刘"字倒着印]。四月十六日公社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誓师会。会前，他们演出"十哭'八二四'"之类很庸俗、很反动的文艺节目。会上是公社ＸＸ部部长、公社秘书起来发言，他们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都不喊。四月中旬，公社斗争开封师院"8.24"学生ＸＸＸ，有一公社干部公开喊道："中央还没有公开批判反动路线，还没打倒刘少奇，喊打倒刘少奇，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真是混帐透顶！充分暴露了他们死保刘邓路线的丑恶面目。

对于这种反动统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能等闲视之！我们一边搞卫生工作，一边向贫下中农揭露刘少奇的罪恶，搞调查研究，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四月十九日，我们公布了中央四月一日的五条指示(即中发 117 文件)触怒了专区、县、社的老爷们，公社组织人贴标语大骂："谁替郑大联委、二七公社、'8．24'翻案，就砸烂谁的狗头！"并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公社团委书记崔ＸＸ在会上恶毒地骂医疗队是"冒牌驴"，是"反革命"。他们还布置特务活动：我们下村看病，有个叮哨：我们给卫生员讲课，受到监视，他们还威胁群众："医疗队来了，就要报告我们，报告有偿！要是不报告，他们也不能把你们带到天津去！我还是掌权！"公社干部李ＸＸ又亲自召开群众会，在会上讲："中央五条是伪造的，这是替郑大联委、二七公社、1.17 翻案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联合"的骨干还到群众中去散布："中央五条是大毒草，是反革命传单！"这些情况我们向县、社ＸＸ部反映，他们对这样恶毒攻击中央文件的严重事件却置之不理。四月廿九日，商邱专区书记冉Ｘ、县ＸＸ部长李ＸＸ和姓陈的副部长，亲自坐车到我队采施加压力。他们威胁说："你们贴的传单很不好，要是闹到ＸＸ部门就不好办啦！你们还年青嘛!目前有一股反革命逆流，你们要站

稳立场。”他们又给我们大讲“郑大联委”、“8．24”所谓反革命活动，告诉我们以后宣传什么要和社ＸＸ部门联系，和他们一块贴。公社苗ＸＸ三次找我们谈话，说：“如果和我们观点一致，经费给个百八十元没问题！如果不改，今后一切都困难”。但是我们决不怕这些，我们对他们讲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于是，公社对我们监视更严了，偷听电话，扣信件、拆信，生活上也刁难我们，使出不给灯油、不给留饭，不给水等可笑可卑的小动作。他们还煽动小学生骂我们，连五岁的小孩都喊：“打倒冒牌驴！”

但是，广大贫下中农是支持我们的。在白色恐怖之下，贫下中农冒着危险帮助我们甩掉叮哨，掩护我们了解情况，他们说反对医疗队的是公社个别人，贫下中农是支持你们的，有个贫农老大娘说：“你们要是工作队就好了，我要和你们好好说说。”贫下中农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河南省的资产阶级专政总有一天要垮台的。

我们到河南工作原订三个月的时间，但只工作了一个半月。五月十七日，河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河南卫生厅突然通知外地医疗队全部撤出。医疗队撤出后，不几天他们就大打出手，许多阶级弟兄身受重伤，无医无药。我们认为把医疗队突然全部撤出是有阴谋的。医疗队撤出前夜，公社团委书记崔ＸＸ与“大联合”策划一夜，第二天上午煽动群众贴大字报诬蔑我们替反革命翻案，强迫我们交出印发的传单。下午，他们又煽动六百多人，把我们宿舍围得水泄不通，踢门砸窗，高喊“打倒医疗队！”“打倒冒牌驴！”我们全体队员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被围攻整整十一小时。这次围攻是公社蓄谋已久的，是ＸＸ部支持的，他们企图用围攻医疗队来威胁群众，达到他们压制革命的目的。在被围攻时，我们向ＸＸ部反映情况，一个自称李副部长的说：“ＸＸ部不负责，当地群众负责。”这次围攻又一次暴露了何运洪黑手伸进农村，扼杀农村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而围攻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只不过是一次锻炼，一次考验，没有什么了不起！

五月二十一日我们离郑州返津，恰遇Ｘ区给郑大联委“平反”，老保们阻扰二七公社战士进入会场，大打出手。我们还亲眼见到西安交大几个同学被打昏，惨不忍睹。我们的许多阶级弟兄被暴徒们迫害，有的英勇牺牲。在这里，我们向死难的二七战士表示沉痛地哀悼。同时，我们以一个革命卫生工作者的身份，向何运洪提出强烈抗议，必须立即制止武斗，并必须保证河南省造反派受伤战士的合理医疗！何运洪你要记住，革命战友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要求中央同意我们医疗队打回河南去，为河南真正的造反派服务。毛主席说：“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英勇的二七战士们，奋勇战斗吧，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胜利必将属于英勇的二七公社！

打倒何运洪！解放全河南！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河南二七公社《二七战报》（地址：北航五楼 309）1967 年 6 月 10 日）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6.13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时间：六月十三日晚十点三十分至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出席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出席代表："河南二七"、"河造总"双方代表共 37 人和"开封八·二四"等。省委：纪登奎、王庭栋、耿其昌、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军区：张树芝、何运洪、余嗣贵、李善亭等。8172 部队（一军）：徐文礼、李××二人。列席：首都红代会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六人，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赴豫战斗队 1 人。〗

六月十三日晚十点二十分，首长进入会场，代表们欢呼，学习主席语录，二七公社代表尚未进完，就被唐伟和河造总一伙拦在大会堂门外，另外还有纪登奎和红代会代表均被拦在门外。

总理：今天还是来听听你们的，各地方代表都来了吗？上次郑州的讲了。

康老：还有一件事，先给大家说一下，下面还有一个节目呢，今天的会准备开两个小时。

总理：听听开封的。

造总：报告总理，我们上次没有讲，这次我们要求首先发言。

二七：讲了，讲了……

总理：噢……噢……（对造总）你们都来了吗？上次他们（指上次造总参加会议的非正式代表）都替你们讲了……那你们就谈吧，谈短些。

（造总王宝生站起来，欲发言）

总理：你叫什么名字？那儿的？

王：郑工造总，叫王宝生。

（总理、康老查对名单）

王：我今天汇报三个问题。（王宝生讲了所谓"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为首的河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事实"和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唆使其御用工具镇压文化革命等三个问题。他讲了十分钟左右时，张保怀（二七）：报告周总理，我们的代表还没有到齐，在外边，他们不让进来。）

总理：谁不叫进来？

二七：河造总不叫进来，

造总：他们的代表够了。

二七：还有纪登奎几个代表，他们不让进。

总理：纪登奎上次就是代表嘛，怎么不让进来！

康老：（对造总很生气地）你们为什么不守纪律？来中央要守纪律。在中央面前还能这样吗？上一次你们就没有守纪律。要有科学性，组织性，还有纪律性。你们这样做，越搞越没有道理！这种现象是不允许的。在这儿说一下，（对双方代表）到了北京，你们都不守纪律，二七抢人家的东西——这个我不知道。

二七插话：不是我们抢的！

王力同志笑着对总理说：不是二七是北航。

（总理摆手示意让到外边叫纪登奎和二七公社的代表，一位警卫员俯首向王力汇报。）

王力：一个叫唐伟的，不叫二七代表进来。

总理：唐伟有什么权利！这是中央开会，唐伟是清华的嘛，他们有什么权利不让进来！（纪登奎和二七代表入场已 11 点左右。）

二七：我们等了两个小时，他们不让进来。

（总理、康老等首长很生气。王宝生继续发言，讲了几分钟后……）

二七：报告总理，受到阻拦，直到现在，红代会的代表还没能进来。

总理：谁不让进来？

二七：河造总把着大门，不让进来。

王力：（对总理）他们强调对等。

总理：什么对等，红代会么，北京的红代会么！（河造总起哄）这个事回去再调查，不会是这样的。

二七：就是河造总把着大门不让进来。

警卫员：我讲了许多道理，还是不让进。

总理：（生气）胡闹！把中央的大门！

康老：（摘掉眼镜，生气）胡闹！你们还没有中央？把中央的门，这叫闹革命吗？

（伯达同志气愤地站起来到门口去叫红代会同学。河造总的代表慌慌张张说："赶快出去个人看看，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立即派人去。）

王力：本来就没有道理，你们这个要求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代表么，谁多少，按中央决定办。

总理：警卫员出去看看！

（门口，伯达同志出来，唐伟和河造总等在门口闹事的人静下来，伯达同志让点了红代会的名字，红代会代表进会场。唐伟等人失望地坐在门口。）

（会场上，王宝生继续发言，首长们有的在看材料，有的在批阅文件，均未对发言做记录。当王讲到二七公社的宣言时，说他们如何揭开河南省委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时）

总理：抽象的太多啦，你讲具体的好不好！

（王攻击解放军赴豫调查团时）

军事院校代表：这是造谣！

（王继续讲）

总理：你讲快点吧，你一个人已经讲了一个小时啦。

（王攻击郑大联委。当讲到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时，省委总部周洪运要站起来发言）

总理：哎，哎，你们还讲？

周：很短，主要是刘建勋的，最近揭发的。

总理：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

周：周洪运，干事。

康老：什么干事？

周：宣传部干事。

康老：宣传部，部长是谁呀？

周：宋玉玺。（他继续讲。首长们又在看材料，批文件。中途造总一个代表又想插话）

总理：（摇头示意不让讲）你们这样讲还有没有个完，两小时都被你们占了，你们不说话了，二七还要讲，还有开封吗！（周洪运只管讲，当讲到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时）你们说来说去，还是那几件事，你们交的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你们说别的。

周：对，对。（继续讲。讲到刘建勋在河南五年零三个月的三反言行时。）

康老：你们不要在那儿念文章，有具体事可以讲点，材料我们这儿都有。

周：都是新的。（总理笑了）

康老：你们不是印一本一本给我们了嘛！

总理：你们讲的那些，我们都知道，不要再大做文章。你们有自由，你们可以写成书嘛！那些东西我早晓得了！

周：这是新的。

（郑大红卫兵战斗师要求发言）

总理：不行，听我们安排，你们已经占了一个小时零一刻了。

战斗师：我们不是造总的呀！我们是战斗师的呀！我们要求发言！

总理：（指周洪运）时间都叫他给占去了，两面都是攻击郑大联委的，他们还要回答嘛！

（周洪运继续讲。当提到赵文甫、文敏生时）

总理：现实的你不说，文敏生、赵文甫都在这里嘛！你这些事情材料交出来嘛！

（河造总方面的代表抢着发言）

康老：听中央安排好啦！

（周说：快了，快了。周继续讲……）

（总理、康生等首长看河造总转抄的郑大战斗师编造的"北京谈判消息"的传单，均笑了。）

总理：我提一件事，（对河造总）你们搞了个北京谈判消息报导，你们知道不知道？郑大的谈判消息，这是哪个搞的？（非常生气地说）简直是造谣！莫名其妙！你们把我和康老分开，说康老见你们，我见他们，这简直是造谣！大家都在这儿嘛！

康老：（非常生气）请你们考虑，中央叫你们来汇报河南情况！是不是谈判，你们以为你们一个党，我们一个党，你们一个国家，我们一个国家，你们那个党，那个国家和我们谈判了。

（河造总抢着发言："这不是我们的"……）如果你们河造总说不是你们的，我们要彻底批判，追查什么人搞的。反革命。（康老双手篡着拳头，激动地）我们是和你们谈判，两党两国，你们赞成不赞成？（河造总代表惊慌万状，不知所措。少数人说，不赞成！）反对不反对？（造总答：反对。）反对就要有表示，必须彻底批判。（河造总代表楞了一会站起来要赖掉：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

总理：（拿着那张传单）你们说不是你们的，那你们给我们写的东西可以作证明，你们是跟我们谈判的。你们中医学院给我们写的东西，下边就是谈判代表团（指落款）。

康老：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把住门，把我们包围住，跟我们谈判。

王力：你们说谈判，我们派到河南的记者，你们有什么资格和他们谈判？还要唐伟来。

总理：你们的意思就不是来汇报解决问题的，是来讨价还价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反毛泽东思想，你们思想就是不纯！你们大概谈判不好就要回去，象内蒙那样给我们造成一种形势，强迫中央承认。你们要想一想，你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你做对了，我们支持；错了，中央什么时候也不会支持的，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六月十四日零点十分，谢副总理和戚本禹来到会场，谢副总理下车后，坐在大会堂门口的唐伟一伙又一哄而起，围上谢副总理，无理取闹，硬要进入会场。谢副总理说："我不了解情况，我不管！"就和戚本禹同志进入大会堂，唐伟一伙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个地坐了下来。在以后时间内唐伟一伙不断有人硬往门口冲，均被警卫坚决阻止。）

（二七代表吕以尧站起来要求发言）

总理：你叫什么名字？

吕：吕以尧。

（吕以尧以五月廿九日第一次汇报后发生的国棉六厂"五卅"惨案等控诉何运洪等拒不执行周总理指示，继续制造流血事件，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当讲到六厂事件时，总理、伯达、康生、王力等十分注意听，并长时间作记录。）

总理：你们工人赤卫队有多少人？

工人赤卫队代表：原来 3000 多人，后来被镇压到 1000 多人，现在在厂的有 400 余人。

总理：全厂多少人？

六厂工人赤卫队代表：5000 多人。

（吕以尧继续讲六厂事件。当讲到六厂工人赤卫队大楼被烧，工人被打的惨况时，首长们显得心情十分沉重。总理看二七公社交上的有关照片时，气得皱着眉头，手直发抖。当吕以尧讲到 12 岁的小孩眼睛被铁军用弹子打坏时，二七代表把那颗钢珠交给总理）

总理：谁参加的？

吕：有郑州铁军、河造总，最多的时候达十万人。围攻大楼时，他们用推土机、吊车、消防车等机械，最后他们把楼烧了！

总理：谁打的？是工人多还是农民多？

吕：工人多。

总理：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兄弟嘛，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打得这样惨呢？

（吕又讲了一个事实经过）

总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打？你别光讲现象不讲实质嘛！

吕：这是何运洪一手策划，是何运洪一手搞的。

总理：噢，是这样……

吕：总理指示何运洪他们徒手隔离，制止武斗，（总理点头）可是不执行总理指示，何运洪对抗总理指示。（吕又继续揭发了何运洪策划与挑起武斗的事实）

六厂赤卫队代表：造谣！没有解放军，解放军根本没有指挥，是军区的××来制止武斗的，被他们抓起来了。

康老：（摆手示意，让赤卫队代表坐下）叫他（指吕）说完嘛！

红代会代表：（拿出传单、汽车牌照、照片）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你们的车牌照，这就是你们的照片！

六厂工人赤卫队代表：我是现场受害者，我要控诉，我把六厂工人赤卫队受害的情况讲一下。

（略）

（六厂赤卫队代表抢着发言，诬蔑说他们之所以围攻工人赤卫队是因为工人赤卫队打伤了他们 400 多人。……）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六厂赤卫队代表：有 3000 多人。

总理：你们人多，3000 多对 1000 多，怎么能打伤你们 400 多个男的？

（六厂赤卫队又诬蔑说二七公社廿六号游行时都是拿着铁棍，戴着安全帽打他们）

二七：造谣！我们根本没有拿铁棍，我们只拿语录本！

总理：（对六厂赤卫队代表）叫你们谈六厂的，你怎么又回到 26 日去谈过去的事情，叫你们谈谈你们为什么包围他们嘛！都是阶级兄弟，怎么打起来了！

赤卫队代表：（张口结舌地）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起的。8202 部队师长彭辉是到现场制止武斗的，可是在离现场二里多远的地方就被他们逮住了，并且审问……

刘生：报告总理，我有个新问题，我是郑州支左办公室，六厂情况我最清楚。（刘是河南支左办公室唯一支持造反派的人，后被调走。现在北京。——抄者注）

王力：（丢开手里拿的材料）叫他说嘛！叫支左办公室的说！

（刘生站起来）

总理：你姓啥，叫什么名字？

刘生：我姓刘，叫生，生产的生。

总理：（用铅笔在代表名字的下面写下了刘生的名字）你什么时候来的？

刘生：今天下午。

总理：你们和他们住在一块吗（指二七）？

刘生：对！（刘生以其亲身体会揭发了何运洪支保不支左的事实及他自己思想认识转变的过程，他说他原来是绝对相信、坚持和宣传何运洪的意见和决定的，但通过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命令、《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等报纸杂志的有关社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青海、四川等地的问题的决定，对照河南的情况，越来越觉得何运洪的作法是错误的，他又通过周密而深入地调查，认为二七公社是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他逐渐倾向支持二七公社了，但正因为这样，他于五月被调开了支左办公室。他曾给中央文革写过两封信，反映河南军区在支左中的几个实际问题，但是，均被扣。他在发言中还强调指出，如果说何运洪在前段的错误还可以说是认识问题的话，那么，在中央军委十条下达以后，依然坚决不改，便是严重的立场问题了。首长都很认真地听取了刘生的汇报，总理、康老都频频点头，王力同志不时发笑。当刘生同志谈到何运洪与八大老保总部是如何难分难舍时，王力、戚本禹都笑了。特别最后，讲到何运洪的性质分析认识时，康老点了点头。）

总理：你把这些事情整理一下材料给我们。

刘生：是。

（河造总的一个代表又站起来抢着发言。）（二七发言）

吕：我还没有讲完！

总理：好，你说吧，简短些。多长时间？

吕：时间很短。

总理：十分钟行不行？（吕：行。）好，你说吧。

吕以尧：最近在郑州、开封、洛阳等地，出现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的反革命逆流，这类传单很多，仅郑工造总廿八、九两日就出了 26 种。

（河造总起哄，说造谣，二七公社代表陆续将有关传单、照片递给王力。首长们在传阅。）

郑工造总代表：我们一直认为谢副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官。

（总理、康老看着谢副总理笑。谢副总理摇着头、摆着手，笑着说："还是谢富治，还是谢富治。"）

吕：正当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的时候，他们这样做其目的要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河南问题的态度。（念洛阳红师 6 月 4 日贴的大标语"打倒刘建勋，揪出谢富治，炮轰中央文革，江青靠边站！"总理和首长听了以后很惊讶！吕又念了郑大战斗师和郑工造总的两张炮打谢富治副总理的传单。）

总理：这些内容你们都不要说了，你们有材料报给我们嘛！

吕：（再次强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河南问题的态度，为进一步制造反革命暴乱造舆论，他们已经把枪发给老保了，他们的家属已经转移了，他们准备中央一旦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以后，和我们干，干不过我们，就拉到山里去。

总理：一军的谁来了？

（一军的两个代表站起来）陈红兵的问题，他们提出来要让放。

（八·二四代表插话：我们还有许多工人没有放。）

先解决陈红兵问题，你们（一军）说他写有反动标语……

（一军的代表：材料已经报上去了。）

我们要叫记者联络站跟你们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写了反动标语。

八·二四代表：开封赵静生是支左的主要负责人，但也没有来，而叫徐文礼来了，这里面有文章，我们要求让赵静生来。

（总理把赵静生的名字记了下来。）

总理：休会。

造总代表：总理，我们说两句……

（总理没理，首长站起来准备离开会场，河造总纠缠不休。）

（二七公社代表喊口号：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

打倒何运洪！

打倒河运洪是最大的拥军！

砸烂河南独立王国！

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第二次汇报结束。）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6.14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时间：1967 年 6 月 14 日晚 9 点 40 分至凌晨 2 点 40 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戚本禹。出席代表：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以及新乡、洛阳、焦作、鹤壁双方代表。省委干部：纪登奎、耿其昌、王庭栋、纪的秘书、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军区：何运洪、张树芝、余嗣贵、李善亭。〗

开始“二七公社”高呼口号（略），对方也呼。

总理：你们的口号喊清楚点，不要把自己的口号也加在里边，不然我们不举手。这是我们戚本禹这个青年人提的。……（大笑）

康老：我讲一点，在中央开会时，用不着读语录，用不着呼口号。我再说一遍（又重复一遍），另外，不管你们那一边，千万要遵守纪律，要摆事实，讲道理，要讲慢点，讲清楚。

总理：你们年纪和我差一大截，你们说那么快，我怎么跟得上。（哄然大笑）我们把各地都请来了，有开封的、有新乡的、有焦作的、鹤壁的，信阳的、洛阳的、偃师的，兰考的也来了。郑州的听得多了，这次听听外地的。

郑大战斗师：我们郑大战斗师还没发言。

总理：等一下（造总代表不由分说起来发言）

康老：（发火）等一下嘛，我再三地讲你们要守纪律，听总理讲嘛！

总理：开封八·二四讲。

八·二四：我，李福来。

总理：查名单（戚本禹插话说是李福来）

总理：好！李福来讲，不要太长，最多 20 多分钟。

八·二四：何运洪和赵静生都是一个腔调，要不把八月的造反派打成御用工具就糟了（对方跳起来说造谣）

（总理、康老阻止对方发言。）

康老：你们这成习惯了，一触即发这是要犯错误的，我给你们介绍经验，一触即跳必定要犯错误。

（李福来继续讲）

总理：什么时候定你们反动组织？谁定的？

（李回答了时间，李谈到军队宣传车喊“贺龙万岁”。）

戚本禹：谁喊的？

八•二四：8172 的宣传车。

戚：有这事吗？

八•二四：不仅一次，16、17、18 连续多次（李举出时间地点并举出一车号是午 4－16－94）

总理：你们把主席象砸烂了吗？

八•二四：纯粹造谣。

戚：你们搞了个四条吗？

（李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拿出笔记本上的原始材料说明是断章取义，政治陷害。）

戚：（满意地点了头，并接过笔记本仔细阅后面带微笑地转交给陈伯达同志。）

（李谈二•八事件、二•一一事件、二•一八流血事件打死二人时，戚和总理在一块研究记录）

康老：打死的叫什么名字？

八•二四（黄泽生）：杜聚明，化建公司木工，35 岁。

康生：哪里人？

八•二四：开封市人。

康老：女的？

八•二四：孙爱英、开封青年农场女工，被赤卫队掐死的。

总理：那女的当时送家里了？

八•二四：是不是送家里的不清楚。

总理：等了几天？

八•二四：八天。

总理：怎么死的？

八•二四（黄泽生）：掐死的。

总理、戚本禹：谁运走的？

八·二四（黄）：八·二四同学。

戚：谁开的枪？

八·二四（李）：一驻军战士。

戚：弹头？

八·二四（李）：出来了。

戚：没找到？

八·二四：没有。当时队伍打乱了，有医生诊断，有伤口分寸。

戚：材料带来了？

八·二四：带来了，下边可交首长。

总理：（仔细听李讲。）

八·二四：八·二四被捕 615 人，占八·二四的 34%。

康老：打死在二月十九号？

八·二四：二月十八日晚上。

戚：八·二四多少人？

八·二四：1600 多人。被捕 600 多人。

（作记录）

戚：被捕 600 多人。

总理：劳动改造多少？

八·二四：57 人。

总理：放了没有？

八·二四：放了。

戚：宣传车是你们砸的吗？有这事吗？

八·二四：没有。

戚：抢了枪了吗？

八·二四：没有。

总理：六号门有枪吗？

八·二四（黄泽生）：公安公社逮捕六号门负责人秦俭时，群众气愤地把公安公社枪下了，当时交给电厂武装部。

八·二四（李）：从 2 月 8 日至 3 月中旬开封捕 4 千人。2 月 18 日抓一千多人。

总理：师院抓 2000 人？

八·二四：600 多人。

总理：你讲快点，你讲的差不多了。你别把今晚的时间都讲了，要集中点，有材料把材料交上来。我们记者站的同志明天还以座谈的形式找各地谈，把材料交上来，不然每个地方都要听，时间不允许。四川就是这样。

八·二四：好，快点。摧垮的保守组织复活，以开封师院为例。

康老：他们现在成造反派了（李讲到井冈山时），噢，你对井冈山有什么看法？

八·二四：地地道道的保皇派。（这时开封师院井冈山跳起来大叫：造谣。）

总理：你是开封师院的？（井冈山：是）

总理：井冈山的？（井冈山：是）

总理：哈哈，对头啊！（井冈山起来发言）

康老：你讲快些，人家还要讲嘛！（……）

总理：兰考有人来吗？（有，总理，我要求发言）。

总理：你等一等，还让他讲。（井冈山又讲，当他否认自己是保皇派时）

总理：你们杀出来是今年了吧？（井冈山：不是！）（八·二四欲反驳）

总理：（对八·二四）你不要接人家的话，你把东西拿出来嘛！

（八·二四交给总理一份井冈山成立声明）

总理：（对井冈山）你们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声明，（把声明举起来一股劲地摇）承认井冈山兵团前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井冈山：当时他们压我们很厉害，把我们压垮了。

总理：压是一回事，你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一回事，你讲一下。

井冈山：那……那时……（吞吞吐吐地）

总理：你们自己的事嘛。

井冈山：那是几个人起草的，没通过……

总理：起草没关系，怎么能油印呢？这下边落款还是你们兵团的名字嘛！

（井冈山吞吞吐吐，狼狈不堪，又讲八·二四的"罪状"，拿出许多照片……）

康老：你要扼要点，这里材料比你还多。（井冈山又讲了一会）

总理：你等一下，我问一件事，北航×××来了吗？

红代会：没有。

总理：你们来几个？

红代会：六个。

总理：都是哪个学校的？

红代会：地质二人，农机二人，石油一人，北大一人。

总理：通知另一方面，清华、北航、北工有人支持造总的，也让他们进来。（红代会答：支持是少数。）不管多数少数，有支持的让他们进来。

红代会：是这样的，他们每个总部，比如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总部都是支持二七的。

支持造总的只是个别人，不能代表总部的观点，没有经过红代会的批准。

总理：你们是红代会批准的。

红代会：我们是红代会特派河南战斗队，是红代会批准的。

总理：噢，你们是正式批准的，（造总递了条子要求让他们进来）这个事交给谢副总理。（总理将条子递给谢副总理，谢看后没吭声。）

（井冈山又讲，总理和康老等首长在看材料）

（井冈山讲到纪登奎、开封第一书记徐学龙收买八·二四，给了 70 万元）

总理：（不满地问）谁给的钱？什么钱？有什么证据？你要快一点，离题太远了！（走出去了。）

康老：听我讲，我们现在要听一下洛阳的情况，因为现在洛阳情况很严重。请洛阳拖拉机学校的常春波同志讲。

（洛阳的常春波讲了，讲得很慢、很生，没有感情，主要讲洛阳的武斗的情况）（二七群众很生气；老保得逞，跳起来说什么不会造谣，我们讲。）

康老：（仍然非常耐心地听他讲，仔细地询问）你讲的是军区还是军分区？

常：是何运洪搞的……（对方嘲笑）

（康老点了点头）（当常谈到洛阳武斗影响了生产）

康老：（惊讶地问）拖拉机厂停工了？！

（老保门不承认是他们挑起武斗，乱吵吵）你们八一六是什么组织？包括不包括工人？工厂是什么组织？（常作了回答。）

红代会：（尤红）：拖拉机厂筹委会去围攻的。

康老：现在还围着吗。（常答：攻破了！）

（公安厅红色公安几次要求发言，想在首长面前无情地揭露公安公社黑幕）

康老：等一下，围攻哪里？（常答：机务段。）我没听清，噢，机务段……

公安厅的张××：发生在六六通令后。

康老：（点头）张捷是什么人：（常答：洛阳市武装部长，参加围攻）

（老保：造谣！）

康老：（对老保）我说了，你认为他是造谣，那不是对你有利吗？逮捕了二百多人放了没有？有没有再捕人？

张××：洛阳捕人了（老保：造谣。）

（张××同志要求揭发公安厅内幕，老保急得跳了起来，攻击张××是投机倒把分子。这时红代会同志要求发言，场面较乱。）

康老：慢慢地让他（指常）讲吗。你是红代会的，等一等，你有材料送上来好了。

常：有 1000 多人跑出来到八机部住着，还有的跑到其他地方。

康老：有没有捕人？（常：没有。）

常：八一六大楼被围，上面有 300 多人。

尤红：我要发言。（老保跳起来指着尤红：你尤红是专门挑起挑斗的！）

康老：你哪一位？（老保：我洛阳的。）洛阳的正在讲吗！（老保：我们有材料补充。）你有材料交上来好了！（常继续讲）

康老：火车停了？

常：6 月 9 日全部停运，工人不敢上班，被毒打被抓走！

康老：扼要点！（常：在洛阳出现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妖风，写出了许多反动标语。）（老保：我们没有，是你搞的，欺骗中央。）

尤红：有！是你们干的！（老保反驳，要压制尤红发言，攻击首都红代会战友挑起武斗。）

康老：他们（尤红等）是中央请来的，发言不发言中央有权力，不能由你们决定（对老保）（后又对尤红）你是红代会农机学院的吗？人家点了名啦！你有权利反驳，你把材料整一下交上来，交给戚本禹同志，这关系到你们红代会的声誉。（说着和戚本禹、周总理同时大笑……）

康老：（对老保）你讲！不要激动，造反有理，一激动就没有理啦！

戚：那是观点不同？（老保讲……）

康老：我想现在请洛阳的同志说明一点，现在还有没有武斗？有武斗如何制止？这是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洛阳是重工业城市，（在洛阳武斗）对国家不利。（老保还要继续讲）

谢：停下来！

戚：停下来！

（常又讲。老保：造谣！）

康老：你们让人家讲嘛，何必左一个造谣右一个造谣。

刘生：制止武斗我有办法，只要解放军站在公正的立场就能制止。

康老：对！军队应该徒手解围制止武斗。双方都要制止武斗。破坏了国家财产，损坏了身体，不好！（老保又讲）我谈一句，有个叫刘峰的是哪一位？（河造总的捣乱分子站了起来（康老发火了）你递了两个条子，说有要事告诉我们，你有什么事怎么不写出来呢？这事并没有什么好保密的！请新乡的讲吧！新乡已发出呼吁了，你（老保）到过新乡吗？（没有，）你没有到过新乡，你讲啥！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有材料你写出来吧。

（新乡八一八李德森讲，最近八一八被围困、断粮断炊的情况，康老很关切地询问了情况。接着新乡李玉坤讲，当讲到他是参加了老红卫兵时）

康老：你是老红卫兵，什么时候成立的？（李回答）噢，你老红卫兵是八月二十四日成立的，八一八红卫兵是 9 月 1 日成立的，相差一个星期就老了。在北京老红卫兵人家就从另外地方想……（说着笑了）

伯达：(对李玉坤）时间很宝贵。

康老:新乡最近逮人没有？刚才那个同学讲八号捕人了……粮食站封锁了没有？老保李玉坤讲他们也被断粮的情况欺骗中央首长，李玉坤油头滑面地讲个不停）。

康老：你把材料交过来！

伯达：你说的多了把主要问题都冲淡了。(新乡师院八一八要求辟谣。)

康、陈：你们可以辟谣。(新乡八一八发言，李玉坤立即起来吵吵。)

总理：焦作的谈吧！(焦作矿院八一八刘文学讲，焦作老保不讲道理的抢着发言，刘文学一看是个四不清干部，气愤地说：你没有资格发言）

康老：这儿谁都可以谈。(老保讲了下去，当他骂耿其昌老混蛋时）

康老：在这儿不要骂人，摆事实讲道理，在中央开会不要骂人！(面带怒色）你是不是抢了章子（指假夺权）的？你要讲扼要点，你从开始讲，讲一天也讲不完！焦作矿院八一八讲，讲了大方向，很有声色，时间到了……

戚：今天就停下来。

总理：今天谈到这儿，以后谈，以后来谈。郑大战斗师不属于两派，可以写材料。下一次十大总部各总部来两个人。

康老：尤红把材料送上来。

总理：洛阳打群架很厉害，不符合六条通令。要百分之百地执行六六通令，军分区无论如何要劝阻，派不带武装的。军区除一军负责的地方要多负责任，把武斗劝阻。生产下降的尤其是洛阳，还有煤矿，平顶山，焦作，还有铁路全部军管。有权制止武斗，我刚才……去广西那边，一国际列车 94 个小时停在柳州，复杂了。把农民调到车站打司机，司机受伤，把车开到柳州停下来。要交打人凶手，不交出打人凶手不开车，这多不好！运往越南前线的，国际影响也不好。徐州也搞得不好。郑州是关键地方，不管怎样打架，不要打到铁路上来，一切为运输服务……你们双方打电话，不要讲下去，算了。

康老：总是讲过去，这怎么行呢？

总理：军管会，大军区管，武汉军区管，不得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军管会是站在中央的立场上……散会。（双方吵，总理很生气。）（大家呼口号！）

（二七战士高呼，毛主席万岁！第三次汇报结束。）

撕开河南“独立王国”的黑幕 1967.06.21

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摘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伸向河南的黑爪牙文敏生、何运洪、赵文甫、杨蔚屏等，多年来，大肆贩卖修正主义货色，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文、何、赵、杨又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血腥镇压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血腥镇压全国赴豫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把河南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河南“独立王国”的班底

文敏生：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陶铸的忠实爪牙。四年内，被陶连提三级。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地政策，就是他以“党性保证”提出，陶铸同意后由他贯彻下去的。毛主席提出批评后，他仍然负隅顽抗，并对急于改正错误的刘建勋同志说：“何必那样紧张。”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并指使召开高干子弟会，控制群众组织。他还追随陶铸、王任重发下十七、八道黑指示，背着党中央，强令县以下中学停止运动；他还领取叛徒金明(中南局书记)的黑命令，强制全省地直机关停止炮轰以他为首的黑司令部。

何运洪：河南省委常委，原中南保卫部长，三反分子罗瑞卿的亲信。长期以来，和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互相勾结，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今年二月份以来，与省委内文、赵、杨一小撮再次勾结起来，刮起了二月复辟黑风，造成了三月的白色恐怖，挑起了四月的频繁武斗，制造了五月的血腥屠杀，并且一再对抗中央指示，竭力煽起反革命暴乱，妄图篡党、篡军、篡政，把河南搞成"独立王国"。

赵文甫：河南省委书记，副省长，是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反分子。多年来，他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搞假材料，欺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结党营私，招降纳叛，为牛鬼蛇神大开绿灯；残酷实行阶级报复，阴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元月份以来，又与何运洪勾结起来，上揪革命领导干部，下扫革命小将，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

杨蔚屏：河南省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因陷害潘复生同志被陶铸、吴芝圃之流提升一级。一九六〇年，他听到信阳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后，置之不理，却坐上轿车、带上剧团到鸡公山享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镇压学生运动，是刘、邓、陶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包庇他的实行阶级报复的儿子、杀人凶手杨继凯，并将其母(地主婆)接到省委，逃避监督改造。

大搞"独立王国"

刘、邓、陶的黑爪牙文敏生、何运洪、赵文甫、杨蔚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对抗中央，在河南大搞"独立王国"，罪恶累累，必须彻底清算！现将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初步揭露如下：

一、破坏赴京汇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总理指示何运洪召集双方代表(以二七公社为一方，"河造总"为另一方)赴京汇报。命令下达后，文、何、赵、杨立即疯狂镇压革命派，把我二七公社一方代表抓起来，并大肆造谣，颠倒黑白，把破坏汇报的罪责强加在我二七公社头上。现已查明，周总理指示下达后四天，文、何、赵、杨集团的杨ＸＸ就说："我们根本就不跟他们谈，谈判个屁!河南的问题我们自己就能解决。看吧，到不了一个乱拜他们就完了!"话音刚落，他们的御用工具公安公社立即行动，开封市仅一天就逮捕了三千多人；郑州仅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在一天内就被抓走二百多人。

四月廿六日，周总理第二次电令双方赴京汇报。文、何、赵、杨又制造重重障碍，妄图再次践踏周总理指示。其一，继续监禁我方代表。经过两千余名二七战士和全国革命派战友英勇斗争，他们才被迫把我方代表释放出狱。其二，于四月二十八日一天之内，在郑州砸了河医东方红等十四个革命组织，血洗了新乡师院八·一八，紧跟着制造了"五四""五五""五六""五·二六"等一系列的大屠杀，妄图在赴京汇报前把革命派一口吞掉。其三，他们用飞机把自己的代表文、何、杨等送到北京；相反，千方百计阻挠我方代表赴京，封锁经济，封锁交通。在迫不得巳的情况下，我方代表乘煤车来京，有的被他们发现后拉下车进行毒打。对于我方革命干部代表纪登奎、耿其昌等同志则严密看管起来。后来，纪、耿等由二七公社和外地战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层层岗哨才抢救出来；耿还被迫绕道太原、由山西革

命委员会帮助来京。王庭栋是周总理点名才要来的。

这时，他们又耍花招，一半以上的代表返郑，拒不出席周总理于五月廿九日召开的会议，要挟中央把汇报地点改到郑州。

总理召集一次汇报，他们竟抗拒了三四个月，而要总理三令五申。文、何、赵、杨究竟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服从谁的命令，又对抗谁的命令，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

二、对抗、封锁中央指示

文、何、赵、杨只公布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关于处理青海、内蒙、安徽、四川问题的决定等都拒不公布，拒不执行，甚至有人诬蔑为大毒草。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否！在文、何、赵、杨看来，中央这些命令和决定太不合他们的口味了，所以不能接受。

文、何、赵、杨还对抗中央关于不得把矛头指向群众的指示。在他们操纵的《河南日报》、《郑州晚报》头版上大登“打退郑大革联的翻案风”，特别是删掉人民日报四月二十日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关于彭真旧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捅不进的“独立王国”的那段重要报道。

这难道又是偶然的吗?否!单从文、何、赵、杨集团的通讯处长亲赴电讯局，指示公安公社成立六人监信小组，扣压二七战士重要电报、电话和信件，封锁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之事，就不难看出文、何、赵、杨搞的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独立王国”。

三、伪造中央文件

三月六日，何运洪背着中央，擅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之后，拼命宣传他们的决定是“上呈下达”的，何运洪还亲自说过：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他的行动“不是冒然的”“是有根据的”等等，力图制造“中央批准”的假象。当四月六日军委十条命令下来后，他一面封锁，一面又重申郑大联委非法，不仅如此，文、何、赵、杨竟假借中央之名，伪造了一个所谓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十二条”。中央发现后，他们拒不辟谣，还层层向下传达，蒙蔽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狗胆包天，到如此程度，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一切的一切，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政治背景的。

早在一九五九年，吴芝圃、赵文甫、杨蔚屏在陷害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事件以后，吴便将赵、杨各提了一级；吴、赵、畅一起提出和实行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所谓“三高”政策，以对抗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九日亲自起草的《给生产队的一封信》；吴、赵、杨又拒不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九年三月两次郑州会议的指示，毛主席曾批评吴是左倾盲动；吴、赵、杨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以后，毛主席曾亲自给河南省委写信，指示要以小队为核算单位，他们仍然拒不执行，何等狂妄!

在今天河南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回顾这段历史不是发人深省吗?!

二月黑风——反革命复辟

正值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河南的“独立王国”面临崩溃时，以何运洪为中心，结成了一条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阵线。

文、何、赵、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三步曲开场了：

一、大造反革命复辟舆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廿四日，文、何、赵、杨利用唐伟，抛出了臭名远扬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并一手扶植了“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特别是其中的“红刺刀”等战斗队，以“知情人”的权威身份出面，充当反革命舆论工具。在全面否定刘建勋同志的同时，把“御用工具”的帽子扣到郑大联委头上。经过半个多月全付宣传工具的煽动，河南反动的和保守的势力就都在“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统一口号下聚集到了文、何、赵、杨的周围。

二、上打革命干部，下打革命群众；

上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替保守组织翻案

何运洪集团首先利用造反派之间的一些矛盾，抓一点，打一片，利用他的同党刘ＸＸ的女儿在郑工造总作内线，想把整个河南革命派一口吞掉。

现已查明，仅仅郑州、新乡、焦作、洛阳、开封等八个县、市，直接由公安公社和何运洪亲自批准宣布为“反革命”的组织就有十五个，宣布为“非法”的有七十多个。而在他们的影响和纵容之下，一个党支部书记、商店经理和办公室主任，也可以擅自决定解散革命组织。象这样，仅洛阳地区上报给省公安厅的“非法”组织、就有一百多个(实际数目远不止此)。郑州市郊十个公社就被解散了三百四十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桐树洼大队二十八个组织就被解散了二十四个。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中的成员，大批被捕、被斗、被劳改和勒令到公安局登记，搞人人请罪。如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共三千多人，被迫到公安局登记的就有近一千人；郑大革联共一千人左右，登记就有近二百人。大逮捕中，全省上报了四千三百多人。实际上，仅据七个县十个市的调查，有名单可查的就有一万七千多人；连十三岁的小学生也逃不脱毒手。

与此同时，文、何、赵、杨又残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狂喊“打倒刘建勋”，特别是四月廿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们更加声嘶力竭地要“坚决打倒刘建勋”，诬蔑毛主席表扬刘建勋是“不了解情况”，“受刘建勋的骗”，恶毒散布对伟大领袖的怀疑情绪。近来，又把“打倒刘建勋的黑后台谢富治”的反革命标语贴上了街。他们对坚定地支持革命派的省委候补书记纪登奎恨之入骨，把他软禁了四个月，拳打脚踢。把周总理点名要到北京担任我方代表的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斗了一百多次，强令他披麻

带孝。还害死了辉县县委书记胡占春等人。

与以上相反，文、何、赵、杨拼命扶植保守组织。首先，他们支持了三反分子罗瑞卿在河南安置下的爪牙所组织的公安公社，作为镇压革命的工具。然后，为周总理点过名的保守组织“郑大红卫兵斗师”翻案，使这个只剩十七人的典型保守组织又死灰复燃……

已被揪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时又是一番景象，一个个从阴沟里伸出头来，拼命企图钻进“三结合”机构，实行反攻倒算。赵文甫和何运洪紧密配合，何说“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赵应道“你们做得对”；何对专程赴京揪刘建勋代表团的杨蔚屏秘书胡X说：“你们揪不回刘建勋，我在谈判桌上也要绞死他!”赵立刻呼应：“我就是回家种地也要打倒刘建勋!”他接连给何运洪等写了三封信，狂呼：“你们干得好”，“要干到底！”激动地大叫：“我的头脑豁然开朗了，我不能再沉默。”并跑到何运洪门口高嚷：“现在形势大好，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不但应邀参加斗争纪登奎大会，还动手打人，进行报复。郑大附中红旗等革命小将一再要求揪斗他时，何运洪却把他保护起来。就这样，他一直逍遥法外。杨蔚屏也先后给何运洪三封信，打气献策。自然也被邀请参加斗纪登奎大会，他咬牙切齿地说：“你斗了我二十多次，我就是死到棺材里了也都记得这笔账！”早在去年七月就已被揪出在报上点名批判的三反分子、大叛徒郭晓棠居然也无耻地说：“我是黑邦打成的黑邦。”企图翻案。

就是这样，河南革命的历史被文、何、赵、杨颠倒了！洛阳竟出现了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开封竟有人喊：“贺龙万岁！”到处是“摧毁郑大革联反动思想体系”的巨幅标语，河南出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三、反革命的“三凑合”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当文、何、赵、杨自恃时机成熟，就迫不及待地于三月六日搞出一个干部“亮相”会，还跟大叛徒齐文俭(付省长)等结合起来，搞了个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在文、何、赵、杨之流的亲自指挥下“分系统按部门”建立了十个“总部”，他们想篡夺革命成果，要摘挑子了。这还不是典型的反革命“三凑合”吗！？

这一切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二月以来，河南的确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文、何、赵、杨的确是一批打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招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最阴险的敌人。

反革命大屠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中国，这种白色据点能长期存在下去吗?当然不能!河南革命人民不容许，全国人民也不容许，毛主席和党中央更不容许。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关于青海、安徽、内蒙的决定、《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等中央指示陆续发表了，鼓舞和激励着二七战士。二七战士满眶热泪日夜想念毛主席！

三月份以来，首都红代会、工代会、各地军事院校革命派，中央各部及上海、哈尔滨、西安、武汉……等全国的革命派都相继发出了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和声讨文、何、赵、杨之流的檄文；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友，牢记着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教导，奔赴河南斗争的第一线。暂时被打下去的河南革命派又站起来了，二七战士又成千上万的走上街头，革命派的大字报重新占领了阵地，没有广播器材用口喊，没有印刷工具用手写，黄河两岸又沸腾起来了。与此同时，周总理四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召集向中央汇报的命令已下达了。文、何、赵、杨外惧全国革命派的声讨，内忧河南革命派的壮大，陷入了天罗地网。同时机校“八・二六”、郑工指点江山兵团等举起了义旗，何运洪的后院起火了!他们预感到末日的来临，就使出了最后一着——没有枪声的反革命大屠杀。

五．四、五．五、五・六、五・一七、五・二一、五・二六、五・二七、五・卅、五・卅一等一系列的反革命大屠杀，都是有组织有指挥的杀人放火！五・二六事件中当场捉住的何运洪的忠实爪牙彭Ｘ就是铁证。何、文、赵、杨集一切反革命策略之大成，他们调动大批人马，团团围困革命造反派，断水，断电、断粮，动用汽车、起重机、消防车、推土机、炸药、雷管、六六六粉和化学药剂以及烟幕弹、燃烧弹……仅五月二十七日一天，就打死打伤我二七战士千余名，有名单可查的重伤号就有五六百名，比青海“二・二三”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种反革命屠杀环境下，全省大批工厂停工，郑州铁路机务北段工人被打走，京广、陇海两线货运受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了援越抗美和全国的生产运输。

现在，何运洪等已把枪发给保守组织。同时，由于上下压力而一度被踢开的公安公社，再次被捧了起来，并急剧强化；他们还向四川产匪“取经”，并已到山区和农村去大肆活动……种种迹象表明，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迫在眉睫，河南革命派的战友们，全国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一切受文、何、赵、杨蒙蔽强制的群众，我们热情欢迎你们掉转矛头，造一小撮幕后操纵者的反，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打倒刘、邓、陶!打倒文、何、赵、杨!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郑大联委反刘邓兵团（河南二七公社《二七战报》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1967.06.23
康生 杨成武 戚本禹
〖时间：夜，地点：京西宾馆。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的领导同志出席。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康老说：你们这两天考虑得怎样？八大总部的人来了没有？

何运洪、余嗣贵答：八大总部的代表来了。

康老说：这两天河南武斗情况怎么样？你们谈谈。

何运洪：武斗还有，没有完全停下来。现在由洛阳转到焦作了。焦作武装部长、政委都被抓走了，有的被打的很厉害。

康老说：焦作不是军管了吗？

余嗣贵答：是电厂军管了。

康老说：想听听你们对解决河南问题的意见。最近作了点群众工作没有？两派的工作做了没有？

何运洪答：前一段做过一次。

何运洪、余嗣贵、张树芝先后向中央首长汇报了军区领导同志所犯错误的认识，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提出了我们准备分两步走，先向军区党委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接着开党委扩大会，请分区、各师的领导同志和军区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参加，传送中央首长指示，组织学习讨论，然后，再向群众公开检讨。

汇报后，提出了几个问题，请中央首长予以明确：

一、河造总的性质我们还不清楚，我们不好同他们讲。

二、对省委领导人还摸不到底，怕再搞错了，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

三、八大总部是什么性质的，将来怎么样作工作？它们现在攻我们攻得厉害。

四、河造总、二七公社都是跨行业的组织，不符合中央按系统大联合的精神，以后怎么解决？

五、我们怎么检查，是等中央决定了讲，还是我们先检讨？在部队内部，我们只是在

党委常委里讲了，没有敢往下讲，怕讲错了。我们也想早检查、快检查，变被动为主动。

杨代总长说：你们准备怎么办，谈具体些，两步怎么走？

何运洪说：准备先向军队内部讲，已让赵复兴来过，对他讲了中央首长指示精神，让他回去传达。

杨代总长说：这个办法好，要来可靠的，不要来反对的。

康老讲：可以来人，也可以打电话。

杨代总长讲：济南军区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内蒙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济南军区党委统一，杨司令、袁政委一站出来检查错误，表明态度，原来抵触较大的炮兵、工程兵也都转过来了，内蒙则是内部出了问题，只要你们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主任通了，你们真正转过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对各师、分区要请他们来开会，不能让他们帮倒忙。

康老讲：我看你们的意思是不是等中央表了态，你们才表态？如果你们等中央作了结论，你们再表态，那你们就又被动了。二月叫你们来，你们不来，被动了一次。这次再不先表态，不就又被动一次？等中央作了结论，你们再表态，群众会说中央已经表了态，你们不表态也不行了，这不就是被动？我提出这个问题，请你们考虑。

开了几次大会，河造总保你们，你们连一句话也不起来说，你们应该起来说，你们说："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不就好了吗！？

你们有错误，应该告诉河造总，人家忠心耿耿地保你们，你们有错误为什么不告人家呢？要告人家。这些也请你们考虑。

我们等你们觉悟，把主动给你们，我们才好讲话，我们才好保你们。我看何运洪，你的思想这个弯子还没有转过来。

我告诉你一个经验，四川杨超我们几次让他讲，还给他写了信让他讲，他不讲，中央想保他，但保不起来了。

戚本禹说：你们还是姿态不高。

康老讲：你们应该主动检查，要不河造总会怨你们有错误不告诉他，二七公社认为是中央给他平反的，不是你们主动认错的。你们回去后，可召开群众大会检讨。

河造总讲郑大联委是省委的御用工具，值得注意。主要讲刘、文、纪，这三个人要分析，文的问题大，刘、纪当然有错误。

河造总，你能说他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他们的错误，你们是有责任的。河造总，二七公社也没说他是反动组织、非法组织，相反，河造总说二七公社是御用工具。

现在是公开向二七公社和郑大联委平反的问题，不是想河造总的问题。你们应对二七说：我们错了，把你们搞错了。给河造总说：你们支持解放军，支持我们是好的，但我们有错误，我们准备检讨。

二七不能说是没有错误，但总比你们抓人好得多（戚本禹说，你们抓了几千人。）

戚本禹说：康老讲的很清楚，这是方针。你们要争取主动，你们抓了人，把杀出来最早的造反派党言川抓了，还开斗争会，还让人家游街，中学生这些小孩带着牌子上街请罪，这你们都是知道的。

我们觉得很惊讶，就是你们说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运动搞了一年多，你们支左，把左派都抓起来了，却找不到一小撮啦，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你们要主动，要高姿态地检查错误。这些小将，你们不要把他们当作小孩子，他们很敏感，他们不简单。

杨代总长说：小将们比我们强。

戚本禹说：赵文甫的材料我看了，问题很严重。

何运洪：我们是把他当作已揪出来的。

康老说：赵文甫给你们写信，很恶毒，你们没有反击，只是说被揪出。何运洪同志，你们的话不能说服人。

戚本禹说：康老说的话，就是让你们主动检讨，康老保你们的。这是个方针。但能不能作到，就要看你们的了。主席说三依靠，其中之一就是依靠解放军，你们要自觉，这就要看你们的了。要不主动检查，就象四川、内蒙了。

康老讲：一军对“八·二四”发展组织的四条还坚持，这就不好了。

戚本禹说：康老已经提醒你们不要追了，你们还把四条当成宝贝，这就不对了。

杨代总长说：一军还有个打死人的问题，错了就错了，不要掩盖，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是保你们的。

你们对反动组织也缺乏分析。

康老说：开了几次大会，二七觉得他胜利了，河造总觉得他胜利了，都是往自己身上想得多。

八大总部压军区，压造总，对军区、造总不满，但主要矛头是对二七公社。据联络员讲，来这里的方针，是对二七公社。受压制的平反后要压别人。

戚本禹说：对二七公社要做工作，不要压造总，将来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搞大联合。

康老说：省军区的同志，一军的同志，你们先想一想自己错在那里了，不要老是看人家不对，这就好考虑问题了。

杨代总长说：总理、康老一直向你们讲的都是要你们很快转过来，把总理、康老讲的记下来检查就行了。

军区、一军都有点怕字当头，错了就错了嘛！改了就好了嘛！检查一定要深刻地、高姿态地、诚恳地去检查。深刻地、高姿态地、诚恳地去检讨认识错误，要本着以自己在这次运动中接受教育的态度去检查认识错误。

康老说：你们不要觉得犯了错误灰溜溜的，相反，只要你们能主动检讨，就会提高威信。

戚本禹说：济南军区检讨后，十万人给他报喜。

杨代总长说：你们没有转过来，就是只看人家的错误，不看自己的。主席讲，要对已严，对人宽，你们应当这样做。

康老说：你们要转过来，要做好下面的工作。

戚本禹说：关键在领导，在首长。

杨代总长说：就是你们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副政委、参谋长、主任，你们要搞通，你们要转过来，要很好地学习山东的经验。你们检讨，不要说成绩，检讨错误就行。你们的成绩让康老去说。

康生接见纪登奎耿其昌谈话纪要 1967.06.24

〖时间：晚 6 时至 11 时 30 分〗

康老：主席让抓河南问题，有些情况我们还不太熟悉，再了解一下，你们汇报一下，河南的情况，河南的领导班子，军队问题。

纪、耿向康老汇报，康老笑着细心听，并不时插问。

康老对文敏生、杨蔚屏（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七公社打倒对象）很注意，特别是杨蔚屏。说他进过高级党校，当过党校党支部书记，和杨献珍关系很密切，杨献珍经常找他看戏。又谈到山东大学，西安交大彭康，南京大学匡亚明，郑州大学王培育等，康老说，彭康早就该打倒，王培育挑动群众斗群众。

运动初期，全国有三个大学有问题（南大、兰大、郑大）。中央对河南的处理很满意（即刘建勋在河南时对郑大的处理），对六六年河南的情况也较满意。

康老非常关心开封“八・二四”，问开封“八・二四”的情况较多：

1．康老谈到 2.18 事件占开枪的问题时说，作为野战军开枪打死群众，开封是全国第一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不是开了八枪吗？军队（驻开封的部队野战军一军）只承认开枪了，不承认打死人。

2．康老说：对方反映八・二四提了反动口号，我看提“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错误的，不是反动的，更不能从这抓人，打倒谢富治这口号是反动的，要以此抓人，以此抓人得抓多少？

3．八・二四“四个入队条件”是否这样，反革命是不肯把自己说成是反革命的。康老说，一军说井冈山（原开封师院战斗师，反八・二四的）是最早反院党委的，是造反派。纪说根本不是这样。康老又谈：“曲乃生是八・二四的后台”，这是一军军长来讲的，纪又回答：八・二四从来没有和曲乃生有什么联系。他们是反曲乃生的。康老又问到徐学龙，纪回答了八・二四对徐学龙的认识过程：八・二四初起时，徐学龙受省委批评，写了支持八・二四的大字报，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比较缓和了，后来八・二四就把他当作第三类打，又当第四类打、打倒了。康老说，别人支持自己的革命行动就必然欢迎嘛！

康老又问：八・二四为什么揪住赵静生不放？

纪答：因为他是镇压八・二四的幕前指挥。

康老说：二七公社组织纯不纯？

纪答：现在发展全省了，我不敢保证。

康老又谈工人总部时，问工人总部和公安公社能否一样看待？

纪答：不能一样看待。

康老又问：公安公社是谁主持的，操纵的？

纪答：是河南军区。

康老的秘书说：都是何运洪搞的。

康老：保守组织里有没有高干子弟？

纪答：有。如郑工造总有一个。新乡红卫兵总部就有何运洪的女儿何泰廷在里边，与李玉坤（总部负责人，曾炮打中央文革）乱搞。

康老：李善亭作的坏事很多。

纪说：他是何运洪的参谋（李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康老又问：余嗣贵怎么样？

纪说：是镇压二七的总指挥，出头露面的都是他。康老又问张树芝好象不太管事了吧？又点了几个名，纪都不熟悉。（张树芝、余嗣贵为省军区司令、副司令）

康老还问：军队内部有没有不同意见？

纪答：我知道的消息不可靠，据说有军区几个军管和一个参谋。

汇报共同用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康老讲：我们接到一些人民来信，反映你们二七的事，你们还打、砸、抢，河南报馆是你们搞了吧？

纪：是我们，他们在报纸上天天写我们是非法组织，是反革命，小将们急了，把他们砸了，我们保证今后不再搞了。

康老：二七过去是受压制的，现在又活跃起来了，现在有一个规律，当他受压制时，他的大方向是对的，当他解放了，他自己又重复别人犯的错误，给他们平了反，他们就用别人压自己的办法压别人。二七对这个问题不觉悟，犯的错误就会更大些。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毛泽东思想，这是最重要的，有的革命组织，不当权的时候还好，一当权地位就不同了，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他就变了，各地的规律都是这样，发展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最近中央对两派发了六条，双方都要执行，望二七做工作，请他们办到。

1. 不要上街游行，上街容易引起冲突，写标语要有所克制。

2. 双方保证不搞打、砸、抢、抄、冲。

3. 双方不要抓人，不要违犯十六条。

4. 保证铁路、公路交通运输，军事工业，尖端科学部门正常生产。

5. 不要动员农民进城。

6. 不要抢夺武器，军队要坚守岗位。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河南联络站 67.7.1

（注：整理与原话可能有出入，但意思不差）

戚本禹与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的谈话 1967.06.28

〖时间：1967.6.28 晚 9：30 分—10：30 分，地点：西苑旅社，二号楼二楼会议室。〗

戚：都来了吧！

戚的秘书：都是二七公社的吧！

戚：党言川来了吗？

党：来了！

戚：你给他们写了个什么东西？在监狱里面？（当党言川说到不要给军区干时）不要给军区干，不要公开干，这还是对的。河造总人数比你们多吗？

二七：多！

戚：十大总部和河造总一样不一样？

二七：一样！

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十大总部和河造总是有区别的。我今天来是来得罪你们的，不准备给你们讲什么好听的。准备让你们把我赶走（众笑）。我在清华的讲话你们抄出来了吗？

二七：抄了，抄了几句……

戚：我不想给你们说一句好话，好话你们自己已经都说了，你们研究一下，怎么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你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和“河造总”搞大联合，否则，河南的问题不好解决，我今天讲的不做纪录，不要外传，对河造总这个组织，我们了解一下，大部分还是杀出来的，他们的错误是打刘建勋、保军区的错误路线，你们怎么看？

二七：他们还镇压造反派，炮打谢富治……。

戚：大部分还是好的，河造总整个不能说成是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可以说是“保守派”，你们那个看法我是不同意的，公、检、法我从来就是反对的。

二七：他们同样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戚：我今天说出来是个人意见，但也不是个人意见。怎么办？距离这么大？没有调和的余地吧？

二七：我说一个情况，十三所造总，粮院（郑州粮食学院）八·八团，豫农造司等……

戚：我不要具体的，我说大部分是造反杀出来的。有 60%，总超过 50%，你们要承认这一点，才好搞大联合。

二七：（解释……）

戚：你们要承认，你们是有错误的，汇报了几次，没有一点姿态，我是不赞成的，我们都是不太赞成的，你们有没有错误呵？

二七：有！对待军区，报纸问题……（陈新民讲）

戚：你这个人好心帮倒忙，说话太尖锐了，我几次都不让你讲么！（对二七）你们至少有三个缺点，第一，你们那个组织有不纯成份，也有不好的，个别组织有坏人，这不能全怪你们，抓的人放出来，全进了二七，有坏人是不好的。你们要研究。第二，有小团体主义，不大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统一战线也不讲。我们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还搞统一战线，你们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什么都正确，说你们这，你们一定不承认，或者口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还是私字作怪，所谓小团体主义那就多了，什么风头主义呀，山头呀……，第三，方法不对，所谓方法不对，无非是打、砸、抢，你们说有没有？（二七：有）对，你们要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概括起来三个缺点，你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是我的认识，（又重复一遍）不是说你们方法都不对，也有对的，不过今天我不讲，只讲不好听的，三个缺点，其它还有缺点，这里千万要注意，如果不注意，会向反面方向发展，会向对立面转化，你们不知从那里听到消息，说中央支持你们，你们有些组织就非常骄傲。将来要站不住脚的。我看现在就有点站不住脚，我今天来是不讲你们一句好话的，这是我的领导交待我的，要是讲了是我自己的，都不算的，要你们和河造总联合，看起来，你们抵触情绪很大。何运洪有错误，你们反他我们支持你们，保刘建勋我们也支持你们，但是你们不注意，就要走向反面，要犯错误，最后被人家打倒，这是个预言吧！可能实现，也可能不实现。第一：你们的组织有些不纯，又不注意情况，大发展，当然是要浩浩荡荡的了，但你们不注意让坏人钻进来了，还有小团体主义，老子天下第一，再搞点打砸抢，你们会不垮台！？不垮台才怪呢！以我看，你们面临着垮台危险，你们有没有办法不垮台呀！（二七：有！）你们胜利了，中央会很高兴的。

二七：我们学习毛著。

戚：你们要很好学习毛著，到中央来会谈事情不多，不过你们学习抓的不紧，听说你们不好好学习，我派了联络员给你们指导，今天造总一个人，领我到这里来，你们也不欢迎，来了客人嘛！（二七：不认识）河造总也有缺点，我去他们那里，他们正在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今天也没有通知嘛！你们在干什么？

二七：我们刚刚开了一个会，（另一人）我们去欢迎你。

戚：我到他们那里去，在学毛选，到你们这里来，在乘凉。

红旗杂志记者：二七也不错。

戚：你也站在二七立场上了，成了二七公社的通讯员了。你们还有别的缺点没有？方向恐怕还有点问题，你们对文敏生怎样？我又揭你们短了。

二七：我们元月份就起来提出打倒文敏生！

戚：你们对文敏生就那么正确？！恐怕是认识不够吧！你们认识的那么清楚吗？那么说你们就没有错误了。

二七：认识不够，十二月份以前我们搞刘建勋，没有注意文敏生，他要两面派，没有彻底搞，元月份我们提出要打倒！

戚：对的，是认识不够！

纪登奎：这个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把盖子揭开，表现出来的，我们还认识不够！

戚：你这个说法也不对，完全是二七立场，怪不得二七保你哩！你所说的那个所谓表现出来的认识不够，这可说不通，就是认识不够，相当时期的认识不够！

耿其昌：我到北京才认识到{笑}

戚：对！这才是个老实人！

纪：我有个心理，想他刚当了三个月的第一书记，就拆他的台。

戚：不！以前就是第一书记，刘建勋算什么，他听刘建勋的吗？他的后台硬，陶铸的人嘛！你们为什么不造反呢？你也认识不清吗？下不了决心，就没有揭开。

纪：就是认识不清。

戚：你这才是老实话，河造总对这个问题认识怎样？比你们早，比你们晚？

二七：他们喊打倒文敏生是假的，打倒刘、纪是真的。

戚：打倒刘建勋不对，打倒文敏生对了。

二七：假的！

戚：我不管真的假的，那怕是乱搞也搞对了，你们不要认为你们对了，他们不对，你们不对的，他们也不对，河造总他们是把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刘邓司令部的人合到一起打倒了。

二七：他们的口号喊对了，实际不是真心打，没打倒。

戚：口号上只对三分之一，刘、纪是打不倒的，文是要打倒的，口号只对三分之一，

你们要承认他们对的一面，他们自己检查他们打倒没有打倒，你们怎么样他们心里有数，你们学毛著开始整风好不好？

二七：好！好！我们不能集中，一集中他们就围攻。

戚：问题不在于集中不集中，你们现在不就集中了吗？你们发表一个整风公告，不好好整风一定要失败的，造反到底就是胜利，这个“底”在那里？“底”就在自己，（用手指指自己）不革自己的命，失败无疑，上海不是有个“反到底”吗？反自己才能反到底，不反自己必定失败，我们去了郑州好多记者，他们回来都非常同情你们，他们生怕你们搞不好，但是，也不得不向我们汇报，有些事情也的确作得不好，小团体主义，组织不纯，打砸抢，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也不对，你们说是不是？

二七：我们已经给家里写了意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纪律、整顿作风，学习五篇文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保守组织》等，康老六点指示，总结前段斗争经验，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

戚：你们这样作，好！这才有希望，首先要制止打砸抢，河造总他们有错误，你们说怎么办呢？你们也消灭不了他， 他也消灭不了你们，怎么办呢？能不能联合呢？有没有联合基础呢？如果一个保守组织，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能不能团结？

二七：能！只要他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

戚：你们能不能用自己的行动促进这种联合呢？

二七：能！

戚：河南问题恐怕要两派群众之间怎样解决的问题，何运洪好办，关键在群众，对军队你们有些组织，一部分组织，就是没有头脑，一见了军队就反，这是错误的，河南军队很多，你们都反，都搞成对立面了，军队里的战士也是群众嘛！军队的大多数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有一部分是受何影响的，这个你们要负责，战士对你们看不惯，关键在群众嘛！表态以后要敲锣打鼓的欢迎他们，青海八·一八风格很高，他们作出了榜样，他们作的很好，主动和军队联欢，战士们都很感动，青海八·一八的特点是以工人为主，你们二七公社以谁为主？有多少工人？

二七：现在站起来能干的至少有一两万人，……

戚：真正有希望的是工人同志们起来，学生有小资产阶级风味，工人是不同的，在这里，我不隐晦，我是学生出身，我到工人中生活了一段，很有体会，学到了许多东西，在青海，在赵永夫开枪的时候，工人挺着胸膛抢上前去掩护学生，表现了英雄气概，高尚风格，我们要向工人学习，学生不要指挥工人，……你这个人（指红代会大庆公社陈××）我就喜欢刺激你，你在这里起了一些作用我是知道的。

二七：我们跟河造总的大方向不一致，他们仍然死保何运洪，坚决打倒刘建勋。

戚：刚才我跟他们说了一下么！他们也不想保何运洪了，刘建勋也不打倒了，今天晚上就挂电话回来，你们对何运洪也不要提打倒，可提炮轰，改成重炮猛轰，万炮齐轰好不好呢？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出去不要讲。

二七：他们现在的《中州烈火》上还喊打倒刘建勋。……

戚：事情在变化，地球在转，变化这么快，你怎能知道呢？刘建勋问题他们接受了，他们有他们的错误，你们也有错误，你们要不承认，我就不承认你们是造反。

二七：我们承认。

戚：河南问题主要是反对文敏生，文敏生的问题你们要自觉点，不要那么傻，你们还不快点承认错误，重新提出口号，发出传单，把材料全部公布不就行了吗？

二七：河造总是省委总部操纵的。

戚：河造总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联合，就是对于保守组织的群众，只要他们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我们就要团结么！

二七：让他们内部造反，必须改变他们的大方向。

戚：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们说话还算数不算数。

二七：算数！

戚：你们越是这样，人家越不内部造反，对个别头头你们可以提出撤换，但这要由人家内部来办，十大总部和河造总是有原则区别的。

二七：他们一起镇压了我们。

戚：你听我们的好不好！

二七：好！

戚：铁路看一段是直的，但从郑州到北京整个看是曲曲弯弯的，你们这里有没有铁路上的？

二七：有，他就是，还是个司机！

戚：（笑着说）对不对？

二七：对！

戚：你们说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一致不一致？

二七：完全一致。

戚：完全一致？世界上没有那么完全一致的东西。

陈（红代会石油大庆公社）：基本上一致！

戚：基本上一致吗？那么不一致的有没有？

二七：有！

戚：你们现在应该坐下来仔细研究研究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不一致的地方，从而制造一种使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条件。你们怎么来研究这个东西，我今天来讲个人东西的，你们跟那么多工人对立，你们能站得住脚吗？

二七：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是一回事……

戚：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们交出来那么多材料我都看过，这不是我个人意见，一般来讲，我是不愿表态的。

二七：河造总中大部分是老保：比如说，粮院八八和联委怎么合呢……

戚：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你们应该研究研究，怎么能使二七公社站得住，这里干部来了几位呀？

二七：纪登奎，那是王庭栋，耿其昌……

戚：你们这五位同志不要作群众的尾巴，你们的造反精神比小将差远了，要向小将们学习，但理解党的政策还强些，要帮助小将，（对二七）你们赞成不赞成？（二七：赞成）今天就到这里，下面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我十一点还有个会，下面也要见见十大总部，让他们到这里来，我不到他们那里去，十大总部我不见，只见九大总部（对秘书说）公检法抓人的我不见，对开封一军的态度要比何运洪好，对一军的态度要更好些，特别要注意区别对待。

八・二四：他们现在还不老实，还欺骗中央！

戚：你们要看到他们是有进步的，你们八・二四的问题，错误厉害些，回来我再说。

二七：各厂确实有老保加入河造总怎么办？

戚：不要紧，一个一个都能解决，我没有叫你们现在就联合，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慢慢地联合嘛！

二七：我们只有一个担心的问题，怕何运洪耍两面派，表面上改正了错误，我们欢迎了他，他又掌了权，暗地里害我们。

戚：我不叫欢迎何运洪，叫你欢迎军区。

二七：军区里有没有何运洪派？

戚：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公安总部的不要叫他，公、检、法抓人的我不见。（对秘书）二七的你们走吧！十大总部的你们欢迎吗？来了你们还要吵！

刚开始上楼时，问：十大总部来了多少人？（二七：一两万人）来了那么多！

二七公社赴京汇报代表团整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

戚本禹与河南“河造总”代表的谈话 1967.06.28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廿八日晚 8：20 分一9：15 分，地点：北京西苑旅社。〗

戚问：你们都是“河造总”的吗？

答：是！

陈××问：二七公社在外面写的你在清华讲话是你说的吗？

戚：是我说的，你们看了有点不舒服吗？

众答：没有。

戚：你们递了很多材料，关键问题只有一个，抓着一个关键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在内蒙问题上，主席说抓一个主要矛盾，其他就解决了，我们照办就解决得很好。河造总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都是杀出来的，我的看法，你们都是造反派组织，但你们有错误，后来你们在军区问题上盲目支持军区错误的东西，军区在支左是错误的。二七公社是个造反派组织，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成份不纯，方法不对，他们大多数组织是杀出来的，他们方法上不对，但他们对军区问题上，敢于斗争，何运洪有啥反不得。

主席二月份叫来京谈判，他就不来，谁敢对抗中央呢？内蒙那样独立王国，还不敢咧！他敢！军区抓那么多人，你们看得过去吗？军区的大方向是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你们总指挥部是三大部分：工人、学生、干部，干部在你们这边多吧！干部在你们这边很吃香。

（河造总服务员做自我介绍，略）。

戚：河南问题中央是很清楚的，中央在河南、湖北有一条线是专跑河南的。远的不说，潘复生、吴芝圃以来，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潘、刘、纪是一条线，吴、赵、杨是一条黑线。赵文甫很坏，杨蔚屏也很坏。刘、纪是一条线。陶铸调刘建勋是为了使文敏生掌实权，这中央是比同志们清楚的。

北京叫刘建勋亮相，光谢富治他敢吗？这是中央决定的，可是你们刚见报，你们就来电报，以后又反谢富治，二七公社大方向我支持，你们不是反二七公社吗？可是，很多干部调查后站到二七一边了。中央大方向是支持二七公社，他不反刘建勋，他反对军区错误路线。

众：他们挑起武斗打死人等等。

戚：他们打死人，有缺点错误，这是革命群众搞的吗？主要责任在军区，他们有一个错误路线。二月份军区就不来谈判。我建议你们和二七公社搞联合。

众：他们有些组织很坏。

戚：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要整风，你们也要整风，你们说他们，他们也是一方群众嘛！你们对军区错误不要支持，军区介入地方后，大方向是错误的。在三月份还坚持。你们也看看二七公社的材料，听听他们的意见，就是毒草也要看看，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你们希望这样局面下去吗？河南朝那里去？

王××答：跟毛主席走！

戚：刘建勋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他到处检查错误，就很好嘛！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纪登奎也要支持的。

朱××汇报了纪的情况。

戚：这个我们回去考虑。你们盲目保军区。

众：我们没有保军区，我们准备下次就汇报军区支左工作。

戚：不保他？我有很多记录，保的没法再保了，还说不保。有一篇文章是空司红尖兵写的，人家敢革敢保。

众：我们要批判当权派。

戚：批省委的谁？

答：刘、文、赵、纪。

戚：刘建勋是主要的吗？

朱道晏：（汇报文敏生情况和二七公社保文敏生的情况。）

戚：我告诉你们个实际情况，困难时文敏生是掌权的，对刘建勋问题中央早表过态了，你们还揪。

中央十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就是个好同志，当时中央和河南最大的分歧就是刘建勋问题。

你们是否研究一下方针路线，今后怎么办，要分清是非搞大联合，你们研究一下咋办！你们吃不了二七，二七也吃不了你们。

对省委要一分为二，不能一概都打倒，杨蔚屏怎么样呢？为啥河南当权派一个没有打倒呢？

日报社：都是二七公社保来保去，组织与组织干仗。

戚：你的观点我不赞成，一切都是二七公社，这样说法是不对的。

众：我们说是他们的头头。

戚：你们的服务员和二七公社的大部分服务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众：他们所做的一切超过了人民内部矛盾了。

戚：我支持二七公社的大方向，陈伯达也支持二七公社的大方向，我支持错了，陈伯达同志也支持错了？你们过去造反我支持，今天保军区错误路线我不支持。

陈金海：我就是要揭发军区支左工作中的问题。

戚：你们是一保二揭发嘛！你们有个大缺点，光听人家说你们好的话，就你们是天下唯一的造反派。总理、康老都说你们保嘛！还有接待人员都在场，都对你们不满意。

众：二七公社一直把矛头指向军区挑起武斗。

戚：武斗主要负责人是何运洪。喊打倒何运洪就打嘛！二七公社挑起武斗，打人都是二七公社？二七公社是被抓的，他敢打人吗？

众：确实都是他们挑起的。

戚：我有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记者，都在河南，天天都给我们来电话，我们知道情况。

粮院八·八团一女哭诉……

戚：你的这样哭诉，在二七公社听了很多！支持刘建勋，反对军区我说是对的。

李惠芳说：二七公社在社会上笼络的都是牛鬼蛇神。

戚：你说这话我不赞成，他们组织领导有错误是不好的，但不是主流。你们也考虑一下我的不全面的意见。你们的立场要根本改变，不改变就要复辟，抓人只能抓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不能抓群众。

粮院一同学说：可能抓错一点。

戚：一点？！百分之九十八都不对，你们和十大总部搞统一战线吗？

三厂一同志说：我们根本不和他们搞统一战线，他们在下面镇压我们，他们和公安公社是一个总部。

（……遗漏 96、97 两页）

老保反问：就有一万多人？

戚：军区都承认了你们还不承认？

财贸总部：（女）请首长派人调查。

戚：（非常生气地说）我不是首长，我说的话都没有调查吗？中央已经派了好多人调查了。我不是首长，我不是首长，我不是首长！

财贸总部：首长！你不知道我们在河南的情况，根本抬不起头来！

戚：你们不是抬不起头来，是压倒一切！

十大总部：我要向首长汇报。

戚：（生气地讲）：我不听！你要讲，给我们联络员去讲。联络员领导你们学习，希望你们认真检查错误，起来造反。

十大总部（插嘴说）：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根本没有错误。

戚：我给二七公社提的缺点，他们还听进去了，你们根本听不进去。

铁军代表：我是铁军的。

戚：（生气地说）铁军不要讲了，你们的成绩我都知道。

铁军（插嘴说）：首长，听我给你汇报！……

戚：（打断他的话说）我不是首长，我是个小组成员。不听你的汇报，（生气地站起来说）我说的不对，你们可以贴我一百张大字报，可以炮轰我，我还是要坚持。你们贴"十大总部必胜！"我说"不胜！"

十大总部：首长！那不是我们贴的。

戚：怎么不是你们贴的！

铁路老保站来说：我是铁路工人……

戚（打断他的话说）：你不是铁路工人，你是代表！

铁路代表：二七公社是内保、外保！

戚：看保的是什么人！看谁保的对！

工交公社石油公司的人说：我们是起来造反最早的一个单位，给李先念写过报告。李先念亲自批了我们的报告！

戚（发脾气了）：李先念批准你们的报告，我不知道。你们先起来造反，可能；但是后来还可以变坏！（最后并用手指着说）你们就是老保，就是老保！

工交代表：（发脾气，质问戚本禹同志）你有什么根据说我们是保守组织？

戚：（一拍沙发站起来，非常生气地说）我看，你们就是保守组织。你的这个态度就是保守组织。不讲了！我今天来，就是宣布联络员领导你们学习，认真检查错误。下一次听你们汇报。

十大总部：（女）我们欢迎，我们就是要向中央汇报的。

十大总部：（又站起来说）我们要汇报。

戚：（很生气地说）我不听！我要回去了，有什么事向我们联络员汇报，群众大部分是好的，总部的头头，比如公安公社到底是什么人，我怀疑！

市委代表：（站起来说）我们是最早起来造市委反的。

戚：我看不见得。

（戚本禹同志起来，离开了会场）

（十大总部代表们个个垂头丧气）

1967年6月28日晚

首都动态组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7.02
周恩来 康生

〖时间：1967.7.2 晚 9：40-7.3 早 1：40，地方：人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周总理、康老、肖华、戚本禹、叶群、刘建勋同志出席，总理等人坐在前排。汇报单位：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十大总部、河南军区并驻军师级以上部分干部，首都红代会及军事院校部分代表。省委干部、纪登奎、耿其昌、王庭栋。另有：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

在开会前，由 8250 等部队首长到纪登奎位前，与纪热情握手。河南军区陈桂昌付司令员与纪亲切交谈。纪：我们早就盼望你来。两人都笑了。刘建勋同志去后，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等都去到刘建勋那里交谈。

总理：我们刚才商量一下，先听八大总部讲讲。后来的么！（铁军要求发言）

总理：有个铁军。那一个讲话？你们准备了没有？

铁军：……

总理：你们是哪一个单位的？

铁军：十一中的。

总理：你们铁军什么时候成立的？

铁：67 年 2 月 11 日。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铁：7000 人。

总理：这么多，都是郑州的吗？

铁：都是中等学校的。

总理：好，你讲吧，时间不要太长。一个同志发言，别的同志不要插话。不要喊口号，

对吵，什么“造谣”、“阴谋”。便于弄清是非么！

（全场笑）座谈么！

（铁军讲到王黎之时）

康老：王黎之是什么人？

铁：是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我们认为他是三反分子，要打倒他。（铁军讲到中学情况时）

康老：你是几年级的学生？

铁：高三的。……（当讲到铁军历史时）

总理：简单一些。

铁：……我们听了戚本禹的讲话，给家里的群众作了传达。家里一致有这样的要求，有一些联络员扣压了我们的消息。听汇报的漫不经心。我们说，他们也不记。对我们封锁消息。蒙蔽中央。我们相信中央。但是那些蒙蔽中央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总理：（大笑）他们没有记录，就不要求他们记录。什么下场不下场！

铁：（继续攻击二七）

总理：你们对二七公社这样对立啊！

铁：我们是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什么路线斗争？

铁：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还不是路线斗争？（气愤的）他们保王黎之（市委书记）

总理：省里的呢？

铁：开始我们主张打倒刘建勋……

康老：（对铁军）对军区怎样啊？

铁：支左大方向基本上是好的，但有严重错误。……我们铁军是革命组织，军区不支持。

康老：你们既然是革命组织，军区不支持，军区大方向又是正确的，这不是矛盾吗？你们讲一下这是什么道理？

铁：（……吞吞吐吐，回答不上来，然后继续讲）

总理：你们认为造总是什么组织？

铁：我们基本上认为造总是个造反派组织。

总理：你们中学有造总组织没有？

铁：有。

总理：公安公社来人了没有？（无人吭声）。

总理：公安公社的王子现是不是公安公社？

王：我是公安公社的成员，我不代表公安公社。

（大笑，并用手指着王子现说）他是公安公社的人，但不代表公安公社。

戚本禹：（对总理小声说）那天我批评了公安公社。

总理：张治安是哪里的？

张：我是公安公社的，但代表省直总部。

戚：（大笑）他是公安公社的人，但不代表公安公社！

总理：（指王，张二人）那个代表公安公社？

（没人吭气）

戚本禹：（对总理）他不就是公安公社的人吗？

张：……

总理：你担任什么工作？

张：省人事局工作，担任一处秘书。

总理：你们总部多少人？

张：一万九千多人。公安公社是二百九十六人。省直总部包括党群、政法、农村水利、宣传、财贸、工交六个战线。

总理：你们八大总部呢？

张：我们和八大总部不是一回事，我们占省直机关总人数的 65％。

康老:：你们总部主要负责人是谁?

张：杨全志。

康老：他是什么人?

张：他是工会主席。

康老：勤务组有多少人？

张：十五个人。

康老：你是个吗?

张：我是个。

康老：丁石（省监委副书记）参加不参加?

张：他是当权派，没有参加。

康老：杨全志这个人怎么样？

张：杨是省直总部的发起人。

戚：丁石是河造总的吧？

张：河造总的（主要讲省直总部的历史）

总理：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二月二十四日成立，……二七公社根本没有提过炮轰省市委……对刘建勋四月二十四日前提出口号“打倒刘建勋”是应该的，四月二十三日省委机关发出通知“坚决打倒刘建勋”，我们讨论了半个月……我相信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联络员今天给我们扣了打倒刘建勋就是方向错误，刘建勋的问题我们应该揭。

康老：刘建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省直机关内有什么表现？

张：没有什么表现……我们没有见到他一次检查。

康老：也没有支持造反派？写过什么东西没有？

张：八月十九日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支持郑大联委。

康老：这算不算表现？

张：算（康老大笑）。

张：（关于“坚决打倒刘建勋”问题）升级的不是我们，是河造总。河造总之所以这样干，是军区何运洪支持的，我们的录音（攻击刘建勋的）稿是经过军区修改的，录音是省委机关造总发下来的，我们放了十天。

总理：他们不在你们组织？

张：他们是河造总的。来两个代表都在他们那边。

总理：你们省直机关不大办事了。

张：我们还办公，抓革命促生产，今年的公粮征购很好。（当他谈到当权派来京时）

总理：来了多少人？

答：四十多人？有名字的三十八个，还有几个没写上。

总理：占你们机关人数多少？

答：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戚：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张：例如张柏园……

康老：张柏园来北京了？（张柏园是副省长）

张：来了。

康老：住在什么地方？

张：不知道。

康老：张柏园参加了什么组织？

答：什么也没有。

康老：是他自己来的还是象你说那样，纪登奎、二七公社把他弄来的？

张：是纪打电话，二七公社叫他来的。

康老：在座的有没有知道张柏园住在什么地方？（无人回答）

康老：我们找他调查材料找不到，是不是在京？

造总：我们在西苑旅社门口见到他和二七公社的说话。

康老：二七的谁？叫什么名子？

造总：不知道？

省直：军区镇压运动不支持工人总部，压一派打一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军区支左大方向基本是正确的。

康老：你刚才讲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又说大方向是正确的？

省总：我们对反动路线是有抵触的，文、纪公开攻击军区，纪在 5.29 日向总理汇报 12 条，在中央首长面前欺骗中央。

康老：军区一点不晓得 12 条？

省总：我不知道。

康老：同情军区的人搞的？还是反对军区的人搞的？关键在这里。

省总：查明是一个有反动言论的人，劳教后到工厂，对军区不满支持二七公社的人搞的。

康老：怎么对军区不满，12 条是支持军区的么？那么河南二七公社支持军区吗？

（省直造总继续讲：开始说二七公社是群众组织，后来又说二七公社是御用工具时）

康老：你不是刚才讲是群众组织吗？怎么又是御用工具呢？

答：它是一个群众组织，但它的作用是御用工具。

康老：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是御用工具还是群众组织？

（答：无理狡辩。……）

康老：那我就明白了。

郑大战斗师：我们战斗师要求发言。

总理：你是新来的吗？

战斗师：从 5 月 1 号接到总理指示后就来了，一直没有发言（欲发言）。

康老：你等一等，听总理讲一讲。

总理：你们等等，十大总部再找一个发言，让工人组织讲，三厂停工了吗？

省工总代表：没有停，停了一个星期天。

省工总：（电缆厂复员军人）……

总理：七月一日游行是哪个方面的，是你们方面的还是二七、造总方面的？

答：我们十大总部的。

总理：停产一天吗？

答：停了一天。

总理：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不要把群众集中起来开大会，过节更应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停工，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和学生不一样，学生放假，你们工人不能这样，他们学生么！在学校读书都读呆了，让他们到工人农民中、到社会上去锻炼。你们是工人么，你又是军人么，不应该这样么！不管哪方面，都不应该停产闹革命，这些是违犯毛泽东思想的。挤出时间学毛著，不是集中过多开会，一开会就要打架，不要动不动就把工人拉出来停产打架，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

省工总：（插话）我们没有停产，我们是倒班。

总理：你这话是说服不了我的，纱厂三班倒么！

省工总：我们停产后又补上了。

总理：噢……

省工总：对革命小将看得多了一些，对军区的错误斗争不坚决。

总理：军区宣布郑大联委非法，他们（二七）是你们压的！

（省工总想解释）

总理：你们接近官方。

（省工总拿出许多照片，污蔑二七公社写反动标语）

总理：那是不是他们写的？

省总：有照片为证。

总理：照片现在有各种照片。我说可能是坏人这样写的，假如别人写的，造他们的谣，给他们脸上抹黑，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省工总：（继续讲）……二七公社的骨干组织都是右派势力，的确也有些造反组织。河南军区对工人阶级重视不够，一直不公开支持、不表态，对二七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对待不够……

总理：我想问一下铁路。河南铁路几处都中断了，你们三方面说好不好？

二七：不好（河造总、十大总部也说不好）

总理：既然你们三方面都说不好，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使我们的铁路交通能够畅通。

十大总部：我们不知道，与我们无关。

河造总：这个事我们管不了，不是我们搞的。

总理：豫北纱厂归哪派管？你们这里有没有豫北的？

十大总部：我们除了郑州以外，也不管其他地方，他们二七是全省的。

总理：那不对，听我们念一下我们铁道部军管会的消息……（总理念……）豫北纱厂归哪一派管？

河造总：不知道。

十大总部：不知道。

（此时二七沉默，全场暂静）

二七：（鹤壁）豫北纱厂不是二七观点，是反二七的，他们听说要宣布他们是保守组织，他要到北京告状、要卧轨、扒车，解放军再三劝说，他们不听。

（老保着急了，跳起来说："总理，我要控诉二七公社一小撮混蛋制造反革命停车事件。……"总理摆手制止）

总理：我要知道的是当前的情况。（老保张口结舌）铁总不停车，工总扒车。

十大总部：我们只管郑州。

总理：你们八大总部不管全省，河造总呢？

河造总：我们只在郑州。

总理：你们两方都是郑州地区，其他地方都不管了。那末为什么河南那么多地方告急？

二七：河造总派人到豫北去，对我们二七派的说："只要你们不打二七旗号，我们就承认你们是造反派，就支持你们。"

总理：一点不往外发展，我不相信，二七是全省的，那是观点相同么，你们观点不同，那你们为什么派人煽动啊？观点不同就要吵架不行就要打架，打架以后先到郑州，郑州解决不了，就要到北京告状。

（老保起哄，抵赖）

原因说不完，你们调查一下就知道这么一回事了，你说你们反对停车，那位也反对停车，你是造总的，你说你更加反对，你们三方面都派人立即出发，铁道军管会帮助你们一起去调查。

康老：不光是调查，现在的情况是停车了呀！不要光说抓革命促生产，情况是车停了呀。运输不通，总理已讲了，五列，最快车一列，客车一列、货车三列，主要是往北京方面来的，为什么停了，什么原因？是豫北纱厂三百人，要到北京来告状，从今天下午起多次劝说无效，石家庄也是往北京的列车停下了。为什么堵塞？是河南一千二百多工人扒车不讲道理，进行工作无效。第三种情况，洛阳和郑州车站军管会被扒车的人包围了，现在同志们面临着这种情况，车运关系到国计民生，整个国家的问题，面临着这种问题，这不仅是郑州的问题，河南的问题，更不是关系到哪一派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国的国家问题……总理说包括你们也在内到那里去，说服那里的工人，不能堵塞铁路，有的地方正在卧轨，这是很不好的，保证通车，这是第一个任务，然后再调查情况，发现情况，看是哪一方面的，这是第二个任务，如果光调查，车仍然停着，不如不去，你们要承担这个任务。

总理：要三方面一道去，康老把任务交待清了，我还说第三个情况，过去二七公社在北京多了一些，因为过去受压迫么，二七现在不要来了，因为中央对二七有一定估价了，要动员在京的二七的人回去，有这些代表就可以了，过去你们不知来了多少次，还有刘建勋在这里，一有问题就来了（二七说还有一二百人），那就好啊！（老保攻击）人家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你们还要重复一句。你们作领导还得学习几年么！河南是人多，但人多压力往中央，中央是要讲道理的。

康老：你们想人多，跑到中央来几千人，压中央，一压就压垮了，那还象个样子吗？毛泽东思想是不怕压的。

总理：我们承认二七公社不会把你们压垮的，不会的。你们犯了错误。他们帮助你们，

你们不要想着过去，过去你们压人家了，现在还要压你们。群众组织么！我们都会报告你们走对的，大联合么，都站到毛泽东革命路线上来么！

你们先去打电话，电话不通，你们还是要去的，到石家庄那一千二百多人，那后天就来了，河南太近了，不象四川。你们提出学四川，四川大乱，你们也大乱，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河南是中原要地，以后变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们希望各省都有份，同意不同意（答：同意）。第一要打电话，不要扒车，查查是哪个观点的，还是劝他们回去，吃的住的都很不方便，交通也停顿了，铁路关系到工厂，铁路不畅通工厂就窝工了，因为郑州四通八达，郑州这个关键不通，安阳不通，很不利了。

现在请郑大后来的讲……

战斗师：……

总理：你们战斗师多少人？（回答 400 人），（二七说：原来有 1000 多）变化了，郑大总数多少人？革联多少人？我问你们和郑大革联在什么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在什么地方？（战斗师说：革联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整总理材料）总理笑着摆手，说具体点，讲你们学校嘛！你们保了些人吗？党委的问题我晓得，工作组来了以后？（战斗师：我们最先反党委），你们两派我都知道，我想听现在。二七公社、郑大联委受压迫，还是你们受压迫？（战斗师扯以前的）不说那些了，军区管制以后，你们那时算非法还是合法？

战斗师：不合法。（革联同学拿出平反传单）

总理：三月六号以后你们还不算合法？那么你们两方面都不合法，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恐怕过去太对立了，那时你们两个组织都存在。

康老：以后郑州大学没有捕人？郑大学生中被捕的人有没有？（战斗师答只捕三人）党言川不是也被捕了？郑大革联 39 人（革联：被捕 39 人）。

总理（问战斗师）：你们被捕了多少人？

战斗师：没有。

总理：你们两方有没有联合的基础？

二七：有！只要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总理：去年在北京也是这个数，后来他们发展了，（指革联），你们减少了。

战斗师（象哭）：我们几乎被压垮了。

总理：不要那么激动，第一，你们没有被压垮，第二没有被捕。现在你们选择共同基础联合（战斗师继续攻击革联），你们这样互相攻击就没有联合的基础，不是让你们来了吗，你们今后应当怎样做？来两个月要好好学习 5.16 通知，毛主席的伟大著作，红旗、人民日

报社论要好好学习。不是也让你们来了吗？你们今后应该怎么做，你说说前途好了，旧帐少说一点。

康老：你们三派有一个共同点，一讲就算旧账昨天如何如何，前天如何如何，大前天如何如何，就没有听你讲明天如何如何。你们这些年青人，不象我们这些老头子，我还向前看呢！

（战斗师又摆旧帐）那你不要算旧帐了，还是得向前看，拿这个指导思想，在前进中间看经验教训，不断总结再前进。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你们的思想摆正，毛主席说过：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革命的大联合嘛！应千方百计地搞好大联合嘛！原则问题当然要弄清楚，看是否有共同点。刚才有四个铁路上的同志都反对停车，这就是共同点嘛，如果你们光算旧帐，等你们把帐算完了，车越停越多！

战斗师：我们保证和革联同学……但是……

总理：说了半天，还是算旧帐？

（战斗师一面讲，一面把所谓二七打人凶器交给总理），我们就从打人说起吧（战斗师又讲过去）还是过去的事情，你写材料交给联络员（战斗师要求单独汇报）什么单独汇报？！

康老：你们有个抓叛徒组织？有多少人？

总理：只限于河南？没有贴大字报公布吧？

康老：你先给我一个材料，你们要把抓叛徒的指示好好看一看，好好把那个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关系几个组织，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关系到每个人的政治生命。一确定是叛徒就是政治生命的枪毙。千万不要在大街上公布。一个是人家不是叛徒，你一公布，把人家的政治生命枪毙了，不管是什么观点，二七观点的也好，造总观点的也好，不同于御用工具，牛鬼蛇神，要负法律责任。另一个真正叛徒，你先告诉了他这一条，怎么对付，那一条怎么作，你先告诉了他。好人你们冤枉了，坏人把你们的秘密公布了，要好好分析一下，我找人和你们联系，先把那几条学一下。

（战斗师：革联、粮院联委、革委会东方红都与大叛徒有关系）

总理：你说你不宣布，又宣布了，当面答应不印，回去为了派别的需要又印了，你连这个都不懂了，不要捕风追影，掉以轻心，信口开河。

康老：在这个问题上，有的造反派由于不了解情况，吸收了一个历史不清的人，作结合对象，这是常有的，你们河造总不至于没有吧？问题是，不能因一个人就说这个组织是叛徒组织，那些人，不能因为一个人牵连整个组织，革命小将不晓得么！我们反复讲，那是他的个人问题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抓对立面的辫子。彭罗陆杨过去我们不是也不知道么，也还在中央工作过，我们的党内也有混入的叛徒，投机分子，特务。不然的话，你捉出一个来说你的组织如何如何，我捉出来一个说我的组织如何如何。揪出是好事，不要以此攻击，混入我党的也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革命组织中混入坏人也不要灰溜溜的，

要挺起腰杆子，革命是革命的，反革命是反革命的。

总理：革委会我们有材料，你们再给我们一些材料，这个不要讲了，哪个组织也不敢保证（战斗师继续讲）。你讲了半天，前途还是没有讲么！（战斗师不听）你还是谈这，你不是讲前途吗？（战斗师提出要让纪登奎、文敏生站起来时），不要采取这个办法，不要采取斗的办法（生气地）你还是说过去的，我要中止你的发言了！不是要讲前途吗？你听我讲，你们闯了中南海的门，我们见了你们，搞了一天多，头一次嘛，进来还是守纪律的，坐在草地上学习毛主席语录，我让他们进到屋子里来，他们不进来，我看外面太冷了，给他们水喝，劝到小礼堂去的么！我是没有说的，后来传出去了，两方都知道了，他们就抓住这个小辫子，你们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主席批评了安徽问题，说冲了没有什么，中南海、国防部都冲了，不要看得太严重了，不要请罪了。要说不是错误也不行，不是错误，大家都去冲了。四月六日发了十条以后，冲的事情多了，第一要见要负责人，第二我们下了命令，卫戍司令部不得开枪，最近两个月冲得多了，不但是见负责人了，只是要见负责人，军队也不会打的，四川打架是不对的，青海是反革命政变了，内蒙犯了严重错误。前几天，江西冲军区夺枪了，我们劝他们，后来还了，是好的。中央通令是有时间性的。犯了错误，不要抓住不放，不应该冲的就不要冲，随便冲不对，路口也堵了，领导机关不要看得太严重了，群众也不要来找事，每一件事都要一分为二，河南乱出一个好的局面，只要大家努力军区已经认识了，调来了几个野战军的同志，都来了，都有认识了。你们把六条学习了，三方面达成一个协议，不要写得太长，一、不要示威游行，二、不要互打互冲，再加一点，不要停工停产。现在许多厂在停产。还有一条，不要阻拦铁路公路运输，不要扒车卧轨，你们达成协议的文字打电报回去（老保喊让我们撤除工事）

康老：不要急，你怀疑我，我怀疑你，彼此不相信，就是撤除了，也是会筑起来的。因为农民进城带枪要打他们，他们不敢放下。

总理：给军区下命令， 不准动员农民带武器进城，民兵的枪支弹药，统统都封存起来，要建立互相信任，不要压倒一方，你们那样要求多了，就写这三条，军区，军分区要象江西一样，下命令责成军区人武装部、县城下命令，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河南军区行吗？（何运洪：好）只要不武斗，那些东西都要撤除的。问题还不在这，仅仅在于凶手，这个东西都会打人的（手指着烟灰缸），石头砖块都会打人的。这个要达成协议的（问康老），是不是还开下去？（各方都要求发言，战斗师还要求发言）你们发言一个钟头了，各讲十分钟吧，从十分钟就可以看出各派的倾向性了，各派的水平了。

二七：（发言……）

康老：时间超过了一分钟，遵守总理的指示嘛，河造总也只能超过一分钟，（将二七发言稿要去）

（十大总部发言时）

总理：你们共同达成协议，搞一个联合发言。战斗师你们回去想一想！

（十大总部互相争着发言）

康老：刚才你们有个条子，不能把八大总部看成一个总部，你们回去商量一下，今天时间到了，军区还要讲，省委干部还要讲，明天还要再搞一次，战斗师明天发言。

总理：我有两个比较紧的事，今天，有一部分冲开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对立起来了，我们希望八·二四打电话回去，八·二四说：电话不通），我们给你们叫。

康老：一定要按照周总理指示去讲，不要添枝加叶的（对八·二四）。

总理：十大总部，实际是八大总部，听说军区支持二七公社，八大总部就冲军区了，他们的办法是轮换班搞。

（十大总部否认）

戚本禹：不管那个总部都要退出来。

康老：你们不能主观，说没有冲，我还听说不光冲了，还将一个刘副司令员搞走了。

（老保不承认）（余嗣贵站起来说：有！一个是撤出来，第二要把刘副司令员放回来。（老保造谣说：二七公社抢赤卫队衣服）

昨天有一点外事，缅甸刺伤我们的人，还要去接，有些兄弟党明天下午还来，明天时间怎么分配，以后再通知你们。

总理：记者站，联络员回去把协议搞好，浙江的搞了一个很好嘛！拿给他们去看看。

（老保攻击我们说：二七公社煽动农民不交公粮）

康老：你们刚才这个同志不是说公粮收的很好么？！

周恩来对河南各派及铁道部军管会代表的指示 1967.07.03

七月三日凌晨二点三十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王二杰）、河造总（王庆明）、八大总部（郑州铁路造反总指挥部胡年运、蒋克敏）以及铁道部军管会杨杰、副主任王世范、业务协助小组娄铁成。对各代表作如下指示：

河南几派都是群众组织，中央都是承认你们的，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你们各派都派有代表在北京会谈协商，不需要再来了。来那么多人，成千上万来北京，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又影响三线建设，又妨碍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符合最高指示。再具体的说，这么多人怎么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呢？你们应相信三方面的代表，应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中央一定会商谈出很好的解决河南问题的办法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既能抓革命、促生产，又能把河南的革命群众组织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

合，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河南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革命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最光荣的任务。现在我派三方代表去，希望你们回到本单位闹革命。

王二杰、胡年运、蒋克敏、王庆明

杨杰、王世范、娄铁成共同整理并签字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于人民大会堂

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7.04

康生 戚本禹 周恩来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晚 9.50—七月五日凌晨 2.0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出席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康生、戚本禹、叶群、曹轶欧、刘建勋。出席代表：二七公社、河造总、八大总部、省委领导干部、河南军区、开封驻军负责同志。〗

（9 时 50 分康老、戚本禹等领导同志进入会场）

康老：开会吧？总理事情很多，晚来一会儿，为使会议进行好，提一些意见，由戚本禹同志谈一下。

戚：据反映最近由各方代表纷纷往回打电报电话，传达首长讲话，内容互相矛盾，并以此互相攻击。对首长讲话精神有歪曲，这是不恰当的，中央决定公布以前不要传达。

二七：二七公社坚决执行。

康老：最近有的用电报、电话，写信往家里传，家里的同志也很想知道这些。代表也觉得很有责任，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边就有个矛盾，有个缺陷，有些会不是一次就完的，要经过反复讨论，是听各方面意见，听取各方面意见，核实情况，因此开一次会，不是这个问题的全面，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面。有时这个组织讲讲，那个组织讲，中央首长有时对这个问题问一下，对那个问题问一下，是调查情况，有时还没有弄清楚，拿到家里去，家里同志不了解这个会议，对某一个问题的结论，可以发生不同的理解，即使真实传达，也有不同理解，因为一个会议有个过程的，另方面打电话、写信、打电报不那么准确，所以有时这一派打对这一派有利的，另方面打电话、写信、打电报、不那么准确，所以有时这一派打对这一派有利的，各取所需。或者有的加以夸大，有的误解，家里得不到确实消息。这样，文革小组向同志们提一下，这个传达在中央有个结论性意见，定了再准确传达，能使代表真正完成任务，给家里消息。在会议过程中，希望不要打电报、电话，当然中央要求你往家里打电话的要打，如停车啦！武斗啦！放人啦等等，应该打。一般的反映情况的不要乱打电话，不要把会议中的讲话歪曲，这个建议你们各方面看行不行？

（河造总攻击李天资同志往郑州打电话歪曲戚本禹同志讲话，开封左司周树凡提出八·二四往回打电话，歪曲中央精神）

康老：恐怕这个问题检查起来各方面都有，大家以后注意。这些天工作进行有成绩，你们各方面赴京汇报代表团共同讨论一个协议书，是不是有这个事？（众答：有！）很好！中央文革小组听到很高兴，我们的会议前进了一步，很好，得到了一个文字的东西，我念念是不是这样的？（念协议）河南省各方面赴京汇报代表团，这个名字我也很高兴。以前叫谈判，这又不是两个国家两个党派嘛，是向中央汇报情况，又是各方面赴京代表团。（康老继续念，当念到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以及周总理的指示协议书，河南省各方面赴京汇报代表团向中央首长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首长指示时，说）：协议中有个地方叫中央首长，提议不用首长两字。此两字在军队方面用，在中央党的方面不常用这个字，是不是用这个，可用中央领导同志或同志，不是你是头，我是脚，你是手，苏联他们是用这个称呼，苏联有的还叫首长同志。你们是很尊敬我们的，但有个缺点，我们还是同志关系嘛，谢谢你们的尊敬，我们还是不愿作首长。

（康老继续念协议书，当念到协议上提到不超过半个月串连的串连学生回到本单位，说：）不超过半个月，是对外地还是对本地？如果在郑州，本单位也在郑州，那就用不了半个月，一个是到外地的串连，如果到北京，应该分开，说清楚。

（当念到若某一方面偶然违犯了协议应协商解决时，康老高兴地说：）若某一方偶然犯了错误，违犯了这个东西，应当协商解决，不应你违犯了我也违犯，为什么你能违犯我不能违犯。（念完）

康老：现在大家没有签字？大家同意吧？（众答：坚决执行）这不是两个记者商量的吧？（众答：双方协议的）过去我们的记者，就犯过错误，协议定好后，双方都不执行，就是记者搞的，你们不要说是记者写的，我有这个经验啦，现在你们说不是，这就好啦。你们签字是怎么个签法？（众答：现在就签）。

康老：铁路问题怎么样？（指郑州、洛阳保守派爬车，造成铁路停车）。

河造总：十大总部作了回答。

康老：这都很好啦？我现在关心一个事，郑州、洛阳是不是已经通车？

河造总：还没有得到消息。

康老：应该问一下。这方面希望同志们努力搞一下。我不管外交，但我了解一些兄弟党来参观我国文化大革命情况，阿尔巴尼亚等一来，总想到各地看看，特别是武汉长江大桥，韶山毛主席旧居，广州革命遗迹，但车不通。满腔热情来看文化大革命，留下个印象是不愉快。这在国际共运中宣传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的英勇斗争，受到些损失。北京有一个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有越南的、非洲的，他们没有调查清楚，要到井冈山，结果不通，他们向本国说了。

（铁道部一同志发言，谈了目前铁路中断的严重情况）

康老：从这个情况看，我们很欣赏你们达成的协议。这样我们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抓

革命，促生产”的重要。另外我们的铁道部工作同志要搞秩序，须要进一步做工作，从政治思想上去做，据我们所知，尤其八大总部的同志要注意，其他当然也要注意，在河南流行一种谣传错误法，意思是那一派不顾大局，不顾生产，动员许多人到北京、中央、到毛主席领导的中央施加压力，以为中央就向那些人屈服了。这种想法完全错误。这里边据我们知道，有幕后指挥人，也可能有军区的人，公检法里边甚至有反革命，工人总部想不通还要走，这要栽筋斗，栽大筋斗，已经走到边缘。（10 点 40 分，总理到会场）

总理：铁路已经完全中断了。十大总部要特别注意，说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十大总部也没有说解散，自己退的。本来是群众组织，这样一搞会走到反面，对抗中央、压中央是不行的。

康老：这是很痛苦的教训，如果幕后有指挥人，更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是再次爱护同志们，有的以为向中央施加压力中央就会改变态度。军区党委也有问题。

总理：四川后边有人。

康老：群众组织千万要注意，我们是诚心爱护。……这是幼稚的想法，毛主席领导的中央，你们这样搞就解决问题了？（对河造总）你们受骗了，因此各面达成协议很好啦。总的方面看，我还有信心，总会向前发展，还要做工作。这里有洛阳拖拉机厂的没有？

（众答：没有）

总理：农机学院的同志？

（八大总部发言攻击二七公社，表白此次停车事件与八大总部无关）

总理：郑义爽你替哪个来的，对换了你是哪个名字。

（答话发言，后又一个要求发言）

总理：你叫王景安？

（王答后。谈了停车原因，胡说什么军区支持二七公社，广大指战员和人民不满，哭着要把亲人要回去）

康老：军区自己报告的，跟你说的相反（笑）。

总理：从洛阳开的车到郑州，十大总部支持要改变 238 次列车方向，当时“铁军”，都到军管会，叫往北开，说：如果 238 次不北开，别打算从郑州开出一列车。

（十大总部狡辩）

总理：铁道部有人吗？给郑州打个电话。

（十大总部又谈，二七印发戚本禹讲话与停车有关，并交传单。）

戚本禹：（笑）我给你们讲的，二七怎么能听见？我看看。（接过传单）。

总理：黄河水涨，铁路堵塞，如果黄河决口，全民动员，你们各派还闹不闹？

河造总：不闹。

总理：这是对每个组织的最大的考验！

（十大总部念了呼吁书）

康老：要马上尽一切办法，保证铁路通行，抓革命，促生产！可以写么！我帮助你的！你上当的！你不要怕。

总理：十大总部不听么！郑义爽同志，你说的根本不可能吗？（郑辩解说三方代表只到石家庄！）

十大总部财贸代表：二七公社组织不纯，（并威胁说：）要头有一个，说二七公社是造反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康老：二七公社也讲过，你们的组织有些不纯，你不能看一个，不看全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也不能因为那一个组织有问题，不看全体，要看全体。

总理：（拿传单）你看，郑大战斗师，六三赤卫队，说周总理已说：以省工人总部为首的十大总部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说过没有？（郑大战斗师辩解）各个造各个的，你们革命小将不过 30 岁，要老实点，谦虚点，将来到我们这么大年纪，会作更大的成绩。大家都“造”，这最不好，这是彭、罗、陆、杨、刘、邓、安子文叛徒，他们的作风。（指传单）我什么时间说的？

戚：关于我的讲话，你们也可以传达。财贸工人要求读。总理：你就叫常春年？康老：你有材料送上来，签字签到那里去了，去把（财贸代表发言，当他讲到二七公社不要贫下中农，不要红卫兵，不要党员时康生边笑边摆手）（当他讲到一个坏分子是二七的时）字签完。

康老：是那个单位的？

戚：查一查，你看。

总理：粮院王海潮你去查查那个不纯情况，你是粮院的。（对河造总）人家自己开门整风，欢迎你们提意见。

（造总一人要讲，康老摆手不要讲，坐下）

康老：你们刚刚订了协议，你们又违犯，你们相信不相信中央，我讲，你们又把会场

搞乱了。

总理：（一工作人员向总理汇报后）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238 车通车了，好事是能做出来的。

康老：都是往后看，不往前看，国计民生，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么，你有材料给我们，可以解决嘛！

（黄造司一女代表讲防讯问题）

总理：你们一共多少人？（答）黄委会呢？（答）二七观点多少人？（答）黄委会真有意思，每一次换代表，黄河水利就你们两派观点（答）没有十大总部，你们可以在防汛问题上达成协议？

二七代表：可以。

（黄造司又讲防汛器材被抢）

总理：谁再抢就抓起来，以前抢的送回来，以后再抢抓起来，你们关于黄河水利达成协议，联合通告，为劳动人民广大利益，你这个女同志，（指财贸总部代表）也是这样，人家愿意达成协议，你就不承认人家是革命，就你一个革命派？

康老：不要你一个人革命，人家都不革命。

河造总：他们是好话说尽，坏事作绝。

总理：你这话不对，态度不好，是骂人的话。蒋介石才是这样，人家骂你蒋介石，你愿意吗？本来我不是批评你十大总部的，你们这样的态度就要批评了，以后要好好说你一顿！

康老：人家达成协议，你在中间破坏。这是什么态度？这是革命的态度吗？

总理：代表就你们两个。达成协议，明天一早钱正瑛去，军管问题我正在考虑，你们群众达成协议军管也好办。这牵涉到河北、山东、江苏、你们东方红有多少人？

二七黄委东方红代表：一千四百五十人。

河造总：五百人，他们当面欺骗总理。

康老：他报多是他们的错误，你报少是你们的错误。

总理：人家（指二七）要达成协议就达么，就是要保证做到，考验考验你们么！

康老：你们签字我很高兴，这正象总理讲的，是个考验，在中央面前报告，签字，这是严肃的事，不是开玩笑，将要考验每一个同志品质的问题，每个组织的态度问题，这个事

情不是儿戏。我相信同志们能执行自己的诺言，因为是革命群众，但又使我担心，从开会情况看，我有些担心，同志们需要注意的。作的时候，我们要坚决执行协议，要么不签字，签字就不能朝令夕改，这不是一个革命者作的。现在军区的同志们几次要求讲话，要听听他们的意见，检讨，何运洪来了没有？（联络员下去找何运洪）

总理：如果三方面代表，把石家庄、安阳、郑州铁路搞通了，这是一个好事么，防汛达成协议，你们三方面都要打电话，任何东西，人力不能挪动，挪用、抢走一个石头一个人、一个麻袋都不行，都要用在防汛上。这是最大考验之一，谁也不能在这个上面讲价钱，今天讲的如果打防汛的人，非抓起来，非严格处理不行，这是千百万人民的生命问题。

何运洪：（十一点四十五分何站起来检讨。）

总理：坐下。

何运洪：这次来京，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二七公社等革命造反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而且长期不承认，不觉悟，不改正，给河南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经过中央首长的帮助，吸取了革命造的派的意见，才使我清醒过来，军区犯错误的责任在我，是错误领导的结果。我是有罪的。现在我向中央首长，向革命造反派检查错误，军区支左一开始，大方向错了，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错误地把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了打倒对象。把郑大联委看成“御用工具”错误地把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二月份连续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干部，革命群众，没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月中央指示各派赴京汇报。……

康老：二月十七日，主席第一个给河南军区下命令，几次命令他不来，他拒绝来。

总理：主席叫我们打电报，不管左的，右的都来，这件事河南军区犯了大错误。他们要把几派变成一派才来，结果也没变成一派，还是三派。

何运洪：对二七采取了压垮、拖垮的办法，这是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公开与毛主席思想对抗。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非法组织，起了恶劣影响，引起了链锁反应，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流毒”。让他们上街请罪，军区接待站不仅不制止，还压制，严重地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二、三月抓一批人，是从郑州开始的，被抓的大部分是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党言川也被关押，压制群众运动，破坏了“四大”的正常进行，此影响在全省造成恶果。造反派被打下去，保守势力抬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风作浪，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四月底传达了林总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安徽省问题的决定，军委十条命令，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但并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我们主观盲目自满，自以为正确坚持错误，把当时二七公社向我反抗当成是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操纵下的翻案妖风，所以四月十六日又重新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并且说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还登了报。打击了郑大联委，我们越来越被动，直到五月二十日才撤消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根本搞错了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认识不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保守思想严重，缺乏群众观点，怕字当头，骄傲自满，不爱听不同意见，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辜负了革命造反派对我的信赖和期望。现在我代表河南军区党委宣布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向革命造反派公开检讨，向受害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责任要由我负，我向毛主席、向党中央请罪，诚恳听取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批评，我诚恳地请求毛主席、党中央给我处分，今后我决心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公开检讨，彻底改正。坚决不移地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上只是初步检查请中央首长，总理、康老批评。

总理：（对何运洪）你身体不太好，早一点休息。他作了书面检讨说明了对错误的认识，现在由一军徐文礼讲一讲。

徐文礼：（先念主席语录）总理、中央文革、全军文革、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中央汇报期间，中央首长对我们的亲切关怀，耐心教育，开封双方代表对我们的帮助教育使我们受到了最生动，最深刻地教育，对中央对河南问题的正确处理坚决拥护。我沉痛地检讨，对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路线性的，错误地提出了口号：“打倒八•二四幕前幕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二•八事件看得太严重了，军队开了五枪，还有三枪没查出来，打死一人尚未查清。总之开枪的性质是严重的。一共抓了 294 人到现在还有 15 人未放。三月十四日赵静生同志在师院宣布“八•二四”为反动组织是非常错误的，在这里我向毛主席承认错误，向“八•二四”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对首都红代会，军事院校汴同学，四、五月份发生了很多错误作法，我们负有很大的责任。这加深了军内外群众的对立，影响了革命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主要原因就是对两条路线的斗争学习不够，认识不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在军委十条命令和安徽问题的决定下来后，还没认识到错误。这次汇报，经领导同志耐心教育，热情帮助，才认识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认识的慢，改正的不快，归根结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我们的错误，如向群众开枪、错抓人，宣布“八•二四”为反动组织，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脱离群众的。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而且没有调查清楚打死了，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不郑重，缺乏阶级感情。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做群众的学生，和群众在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我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既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力量，又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则革命革不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头脑中私字破得不够，公字立得不好，老爷架子，骄傲自满，主观片面，在看待“八•二四”问题上有框框，形成错误。为坚决彻底改正好：

（1）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的伟大指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开封问题的决定，一定向山东军区学习，向广大群众检讨，给“八•二四”平反，向他们承认错误，向他们道歉。对开枪打死人的问题，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坚决支持开封市的一切革命造反派。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斗、批、改。

（2）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3）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4）部队和支左，要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景联同志要求发言，揭发徐文礼错误。）

总理：你不是递材料吗？

戚：你下次发言。

总理：你们三方面有了一个协议签了字，我们印刷出来，昨天说八大总部和其他地区发言，让他们发言。

（河造总洛阳地区代表发言：认为军区支左大方向正确，坚决支持戴苏理革命干部站出来，纪登奎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老实检查，开封八•二四，洛阳八一六，新乡八一八是顽固的保守派，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但只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愿意同他们组织中的群众结合）

总理：你是代表几大地区的？八大总部是不是还有一个人要讲吗？（四个工人总部代表发言；认为文敏生、赵文甫、纪登奎必须打倒，戴苏理是比较好的干部，关于刘建勋问题，中央已经表态，不再喊打倒。认为二七公社没有区别对待，对群众没有做思想工作，在革命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最近中央解决河南问题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康老：是不是你要求军区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象过去那样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我听你这个话里似乎有这么一点意思。过去因为你们不了解军区，干了一些事情，这不是解放军的问题，也不是战士问题，也不是军区党委问题，也不是其他干部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抬高声音）是何运洪，当时他那种作法很多同志是满意的。

总理：你们又提到二七公社，下次答复你。

康老：你们十大总部注意这个问题，河造总，你们过去是受蒙蔽的，从二月十七号起啊，你们受蒙蔽。你代表的工人总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不明白，这不是整个军区，更不是整个党委，更不是军区的所有干部，不是严重错误，而是他讲的，是方向路线错误。他现在要改正错误。

省工总：我们一定要与何运洪做坚决斗争，反对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学红总李广连发言，发呼吁，言二七公社砸其锅，抢其粮）

总理：你们家里来电话了？这几件事，请你们（指二七）查一查。

李广连：他们去年就冲砸了总理办公室。

总理：（笑）我有什么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从来没有被冲过。……你讲你现在的，你们过去的材料交上来。

总理：省直机关谁代表？叫什么名字？

丰长录：丰长录。

总理：你代表不代表公安公社？

丰长录：代表。

总理：哪听听你的意见。

（丰正讲时，总理打断话问）

总理：我问你，你们公、检、法在军区的影响下逮多少人？

丰答：不知道。

总理：那你怎么代表？

康老：我肯定你们公安系统里有坏人，同志，我做过公安工作，我懂得。你们逮了多少人，要老实告诉我，掩盖不着的，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与丁石有关系的，丁石来了吗？

戚本禹：我看公安公社可算是保守组织。

康老：这个问题和丁石有关系的。

总理：（对丁石）你不知道你干的什么事情？

丁石：（从角落里站起来，故作镇静地）哪个事情与我有关系？

戚：（气愤地站起来，扇子摔在桌子上）干的坏事与你有关系的！你干的坏事么！你怎么不知道！

康老：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我问你，过去你做过公安工作吗？

丁石：做过十年，做付处长。

康老：你以后做什么？

丁石：付厅长。

康老：是么，我没有错。

总理：（对省总丰）你这个发言怎么不弄清楚哇？连一点自我批评都没有。

康老：你们有一点阶级感情吗？成千上万革命小将坐牢，你们无动于衷，你们一点也不检讨，摸摸胡子就算了，一点也不检讨。

总理：你对公安系统揭发些什么东西呀？

康老：一点也没揭发，我们不满意。都是空话，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的。你是代表么！怎么搞的，一点不揭发。

总理：郑州打群架，你们八大总部都没有参加？你这个人不老实！对丁石问题，你们今天晚上可以揭发。我们专意把他找来，他是怎么在幕后指挥的，他是公安厅付厅长，你们是受蒙蔽的，战斗师还讲吗？你昨天讲了很多，简单些！

郑大战斗师：（当讲到因他们冲中南海，总理三次单独接见他们时，他们说这是总理对战斗师的最大关怀时，总理对戚本禹笑了），（战斗师继续发言）（总理和康老、戚本禹在交谈，刘建勋一直在写东西，看文件，不知写了什么东西递给戚本禹，修改后交给总理看，总理看了点点头，又把文件交给康老）

郑大战斗师：……刘建勋同志是在我们广大造反派的炮轰下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的。

（戚本禹、刘建勋都笑了）我们希望刘建勋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刘建勋点头笑了）

郑大战斗师：（发言完。呼口号。）

总理：继续埋头苦干，与造反派联合。快点！快点！完了嘛！你们算八大总部？还是河造总的？

郑大战斗师：都不是。

戚本禹：（对总理说）独立师！

总理：独立师！（大笑）我问你，你说埋头苦干、要联合，现在有一个埋头苦干的事情，就是铁路的问题，安阳、邯郸、石家庄这一线上，很多人都在步行北上。

康老：有些人听到这个消息，他还很高兴！

总理：我要求你们再派三个组，（对战斗师说）我指定郑大战斗师派一个人（对郑大联委说）你们派二个人，十大总部派三个人，不要派公检法，我不信任公检法。

康老：我们不相信公检法。

总理：郑大联委二个，他们一个（指战斗师），好好地大联合。他们犯了错误（指战斗师）你们也有错误（对革联）。我希望你们郑大，好好在大联合上作出成绩，郑大作出成绩。北京有刘、邓，中南有陶、王，可以批判陶、王么！郑大是全国开始闹起来的四个闻名

大学之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郑大。北京大学联合也不好么！南京大学两派分裂，交大内部还不错，和社会上闹，你们郑大要做出榜样。

（当谈到王培育翻案时）

总理：你们打内战，被他们利用。搞大联合，郑州、洛阳工人很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铁道上再派一个小组，河造总三个，十大总部三个，郑大（联委）二个，战斗师一个。铁路已经全线军管了，都分了区，郑州是武汉大军区管，石家庄是北京大军区管。要硬扒车就把头头抓起来，这样子向中央施加压力，不能再等待了。

康老：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总理：去年大串连，造反派和红卫兵上北京是好意，是见毛主席和付帅，一辈子忘不掉。货物积压，受点积压，我们原谅嘛，那是关系到第三代、第四代的问题嘛！大学生都见过了，中学生原来不让来，又说三分之一，最后都来了，有十多岁的、小的八九岁。现在就是解决那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交待。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王逸伦这个特务也暴露出来了。

康老：王逸伦这个特务也暴露出来了。

总理：今天就谈这些。你们先回去，关于何运洪、徐文礼检讨，你们讨论一下，何运洪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欢迎，但不要乱传，犯了错误允许改正嘛！你们学好人民日报社论，好好读一读，那里有好些是主席常说的。（二七代表答：团结——批评——团结）

戚本禹：不要传达，起反作用。

康老：刚才何运洪、徐文礼作了检讨，检讨错误是欢迎的，这一点同志们有何看法，可以讨论。他们犯错误，但同志们，绝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信赖和信任，毛主席讲过“三相信、三依靠”嘛！“三相信”……三依靠……绝不要动摇对解放军的信赖，更不能在群众中对解放军的信赖有所动摇，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文化大革命最坚强的支柱。毛主席说过：解放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没有解放军你们怎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呢？怎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得到一个消息，好的消息，河南出现了好的现象，拥军爱民，革命群众爱护军队、军队爱护革命群众，这是好的现象，这证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两位同志检讨自己的错误，也是一个好的现象。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在你们还没有把这些问题了解清楚，没有好好把何运洪、徐文礼检讨研究好不要往下面乱传。（戚插话：传不好起副作用）有人乱传说解放军犯了错误，一军犯了错误。要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解放军。第二，我讲了，何运洪自己也讲了，不是军区所有干部犯都犯了错误，有许多干部有正确观点，愿意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能笼统讲整个军区犯了错误，更不能讲解放军犯了错误。这个问题主要由何运洪负责，不能说都犯了错误，这一点要弄清楚。要爱护我们的解放军。至于一军，他们比何运洪的错误还要轻，赵静生宣布八•二四是反动组织是错误的，徐文礼

能初步检查是很好了。一军是全国第一军，野战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错误就改，一军有很多作法有缺点，但八·二四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不要乱传，要爱护解放军的荣誉，要相信解放军。

总理：那一个组织将军区的话断章取义，或全文贴大字报，都不对。

康老：说河南军区来了个 180°的大转弯，也不对。

戚：过去冲军区，军区有错误，可以谅解，现在军区改正错误。你们冲军区，你们犯了过去二七公社，八·二四犯过的错误。

总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我们还要再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现在铁路问题，就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不要听到批评就垂头丧气，不要认为你们一受称赞就翘尾巴，这很不好。

戚：二七公社、八·二四要特别注意。

总理：你们的协议，我们印发给其它省份，刚才我来的晚，就是去解决广西问题。一个司机的脖子上打破了皮，一条腿打破了，裤子被撕拦，非要叫交出凶手不可，不然不开车，我接见了他们，我说，受伤了，衣服撕烂过去了吗？车停了凶手又找不到。在铁路上你受了伤，这我们政府有责任，我代表国务院给你们道歉，脖子上伤也好了，我说裤子破了从铁路工人补助金里给你搞新的！他听了说：我不要了。我要他们团结起来，保证了铁路的运输。我分别送给他们两册政策汇编，铁道上可以有两个组织吗？我们得出个经验，你们工作时间不要辩论，业余时间辩论不要打架，不要和外面联系，铁道本身不要与地方上串联，不然会出问题，要广西做出个样子，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戚本禹关于河南问题的谈话 1967.07.06

讲三个问题：

一、是对河南军区的错误；

二、是省市委群众组织的看法；

三、是对军区的希望。

第一、军区的错误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打击了造反派，但不是刘邓路线错误，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说，成都问题是对群众态度问题。四月份，毛主席有个指示，就是对河南说的，毛主席说，冲军区是对军区的信任，因省委瘫痪了，他们就要依靠军区，冲击军区他们住够了就走了。郑州冲军区毛主席说，叫他们暴露一下，以后叫他们谈判嘛！二月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左中右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对革命群众施加压力，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你压他，他就要闹事，把党言川压下去，对群众开斗争会，搞游街，中学生带牌上街请罪，这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二月不来谈判，不管你们有意无意都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想把人家压垮拖垮，造成已成事实再来谈判，这是不对的。你们把革命的当成保守的，把保守的当成革命的，这就错了，对领导干部也是这样。你们说人家不学毛著，这样就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你们是否有这样两个问题：

（1）是把二七公社错误看重了，把河造总错误看轻了。一边听话，一边不听话，斗争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

（2）是支持哪个是否与刘建勋态度区分，对郑大联委态度是否这样，这样一系列的想下去，就错了。

刘建勋在北京三结合了，郑州就坚决打倒，还要揪出后台谢富治。郑州还出现了反对周总理、江青的标语，你们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表态？十二条你们为什么不辟谣？看来对你们有利的，你们就不吭气，起码这些很对你们的口味。刘建勋在京三结合了，你们还要打倒，这就与中央对抗，赵文甫写的信很恶毒，你们不报告也不反击，我们看到很惊讶，这样的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你们支左把左派都揪出了也不到一小撮，这就是很严重的错误。

第二、省委负责人和各派组织，对刘、文、纪三人要作具体分析，文敏生问题最大，刘、纪当然也有错误，刘建勋搞借地是错误的，调北京后表现不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表现不错，这是毛主席称赞过的。（如写大字报，欢迎南下的学生，炮打司令部，到群众中十七个小时不休息等）。对纪的问题，毛主席与你们看法不一致。赵文甫问题很严重，写的信很坏是挑拨性的，搞不好你们会与内蒙古一样。你们说二七公社一成立大方向都是不对的，他们抵制你们，这说明他们对了，跟着你们的相反错了，对二七公社不能从纯不纯来考虑。毛主席说天下没有清一色的东西，坚定的左派只占 15—20％，最多也不过是 30％，从纯不纯看问题就错了，他们打砸抢可能有些过头，但是他们是些年青人，这些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讲话中指出，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对二七公社问题，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要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就比较能看清楚了。你们对二七看是否从感情上转不过来，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二七公社不能说没有错误，但总比你们抓人好得多，这些小将跟小孩不一样，他们很敏感，比我们强，将来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搞大联合。

河造总不能说不是革命组织，他们的错误与你们有关，二七没说他们不是革命的，相反河造总说他们是右派。

八大总部对你们不满，但主要是对二七公社，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

第三、对河南军区的要求和希望，要把立场和观点转过来，主要的在于领导立场要坚定，旗帜要鲜明，干脆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就算了。学习山东三条经验，只要承认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不会降低威信，相反会提高威信。怕丢面子就会更丢面子，这次叫军区自己去承认错误与三派协商搞个典型，你们与各派去谈问题，还是你们自己去解决。要听造反派（二七）意见。不要搞百分比，到群众中要听群众意见，到二七公社方面要主动地做工作，不做就不好办。要去谈，他们说的话不好听也不要紧，错误肯定是有的。你们到二七公社去谈，要多去几次，你们是否想等中央表态后再谈，那就被动了，二月份你们被动了一次，这一次

再被动人家会说中央已表态，你们不表态不行了，这次把主动权交给你们，要吸取四川经验，听康老的话，毛主席说要三依靠，你们不主动就是四川、内蒙的问题，河南军区、一军就是怕字当头，检查承认错误就行了，你们转不过来就是只看人家错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主席说："要对已严，对人宽。"现在要公开给二七平反，不是河造总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要开大会承认错误，济南、内蒙都有经验教训，济南杨副司令员、政委公开检查，问题就转过来了，只要你们公开检查，问题就好解决，要召开军分区会，按照总理和康老的讲话去开会就行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

戚本禹在河南部队领导人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1967.07.09

〖七月九日晚，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政委何运洪和 8172 部队（野战军一军）徐文礼、赵静生向戚本禹同志汇报请示问题时，戚本禹同志做了如下。〗

当何运洪汇报河南日报问题时，戚本禹同志说：这要和两派商量，和河造总谈一谈，出红色电讯比较合理。

在张、何汇报完后戚本禹同志说：

你们回去几个人先做部队的思想工作，这很好，给中央首长汇报是会同意的，你们可以回去。

检讨很快同群众见面，中央一批时间就不会长了。你们要做好部队工作，不需要层层作检查，主要是你们作检查。部队和二七公社对立情绪这样大，主要是你们过去宣传灌输的结果。如果这个工作作不好，就会出现内蒙的情况，就会有象张杰这样的人鼓动群众来北京。内蒙有人鼓动，四川也有人鼓动嘛！对你们河南，中央是有准备的，准备你们来十万人，别的省也可能来一些人。昨天告诉傅崇碧同志，准备一百万人的接待工作。希望你们学山东，做好这个工作。能不能做好靠你们，你们要承担责任，对部队对群众都要承担。要说服部队、说服八大总部的群众，转好这个弯子，如果搞不好，必然出现内蒙的情况。如果你们中的那个人在后边出点坏主意，煽风点火那就更坏。内蒙王良太就是这样，原来做了多少工作都不行。他把部队弄来，总理、江青、叶群都做了工作，经过教育转过来才认识到他们受了蒙蔽，受蒙蔽只是暂时的，河南会不会有这个步骤，我们是有准备的。总理康老也讲过希望不要出现这个情况，河南地处中原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希望你们作好工作。中央对河南问题很重视，主席对河南很关心，希望你们立新功、赎旧过。你们要做好部队的工作，做好群众的工作。如十大总部他这样搞说明他不顾大局，这就暴露了他，一边谈判，一边这样搞，与中央对抗。你们要教育部队，用部队去带动群众。河南来这么多人，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是不可能的，不会是没有组织的。我估计中央批了以后，就告一段落，如果部队工作做得不好，就赶不上，所以你们赶快做好部队工作。

河造总与二七公社，以谁为核心，文字上不一定写，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驻马店二

七公社力量比较大，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郑州怎么样提，你们考虑，你们在工作上，要依靠二七公社。河造总说他们（指二七）只有 40％多的造反派，那就很了不起了，他们是首先造反的，你们那么大的压力，抓那么多人，连党言川这样的革命小将也被你们抓了，就这样他们也没有垮，你们说二七公社不纯，河造总纯么？他们正是在你们支持以后才犯了严重错误，你们抓人他们就不管，你们把你们的电报从头到尾都翻一翻〖注：口头传达时是讲：军区把电报给河造总从头到尾都翻了〗，你们工作的落脚点应该是二七公社，那怕是 40％的造反派，他们敢于抵制你们的错误，“疾风知劲草”嘛！河造总我说过大部分是造反派，这两个组织不能并提，这你们要考虑，要有一个中心。有一个中心就可避免混乱。你们要敢于依靠反对你们的人，不要有情绪。

关于刘建勋回河南的问题，给中央首长反映后再说。

戚本禹与河南省三派代表的谈话 1967.07.10

〖戚本禹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三派的部分代表。出发前，铁军代表蛮不讲理，因为让他们去两人，就与中央文革办事组及总理联络员吵闹，阻止开车，当即受到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义正词严的责备和广大群众的斥责，可铁军代表耍无赖硬爬上车两人。十二时戚本禹同志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代表起立……〗

戚本禹：（手拿八大总部总名单，指二七代表）这那里是八大总部的？这不是二七的吗？二七的我都认识…

工作人员：刚才换了一下会议室，八大总部的到那个会议室去了，到那儿去吧。

戚本禹：你们怎么搞的，那就在这儿吧！让他们先等一会。

工作人员：好……。

戚本禹：你们一派来了五个人（拿起二七名单念）来了吧？

二七：都来了。

戚本禹：十大总部……铁军也来了？

铁军：来一个。

戚本禹：今天我来和你们三派商量一下，上次不是说总理指示你们三方达成协议吗？这很好，有个好的开端，今后对河南问题怎样解决，对河南各派怎样解决，你们三派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拟定一个方案？你们对二七公社怎样分析？是个什么组织，而对河造总，十大总部又该怎么办？能不能三派在一起商量，你们考虑一下怎么办？而不要象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由中央作出决定，如果这样能做好的话，你们写好，中央批准，这样给各省创造一条

经验，四川、青海、内蒙……等省中央是下决定了，这里当然有斗争了，甚至是很尖锐的，你们能不能达成统一的那么几条，我们有那么个设想。二七公社那天作了个检查，这很好，总理和我们都很满意，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这很好。第一个是方法有些不对，有的组织搞打、砸、抢。第二个是二七公社个别组织有不纯现象。第三个是什么？

二七：小团体主义。

戚本禹：对，小团体主义，当然，二七公社是个造反组织罗！河造总那天也作了点检查，下来我们听首长议论，在打倒纪登奎问题上，我们还有些看法，我们不同意喊打倒，但是还有些进步了，河造总部分组织是杀出来的，二月以来在军区问题上犯了错误，执行了军区的一套反动路线，矛头不对。对于十大总部，我们是有分析的，公安公社是坏的，不好的，抓了好多人，工人总部，财贸总部和省委机关总部具有区别的。是不是你们共同商量一下，对刘建勋同志可以达成协议了吧！那些能够达成协议就先达成，不能达成的就放一下，要报给联络员同志，公安公社也能达成了吧！二七公社、河造总不都是反对的啦吗？当然这里说公安公社是坏的，不是说公检法都不好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达不成的你们向联络员反映，我们再商量，能不能在中央首长同志关心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实在不行，中央将来再定。上次你们三方达成的六条协议，中央对这个事件是肯定的，上次给毛主席汇报了这个事情，这是良好的开端，当然有个别人也作了不少坏事，个别的要处理，打死人了嘛！

也有的是两方对打误伤，但大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是好的，要向前看了，不久军区何运洪要向全省作检查了。军区有成绩，有错误，主要错误是支左方面的错误，只要你们三方能否在军区检查以后把你们商量的意见拿出来，今天和你们研究一下，一些问题怎样对待，经过你们共同研究，是否对河南的问题达成一个协议，我看你们二七和河造总也说不服，你看怎么办，是打破脑袋呢？还是怎么办？还是商量个办法。不然，坏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钻空子，想尽办法，挑拨煽动看你们打，你们不要上当啊！洛阳有个武装部长，这个人就很不好，这个人在后边挑动搞些事情，就象洛阳拖拉机厂停工总是不对的吧！你们说是停工好还是共同讨论一个意见好，你们各派一定要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是作坚决不疲倦的斗争，而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的错误什么这一段保了，什么搞过打砸抢了，这些错误要解决，要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如果是敌人，那当然不能那样做，你们这次到这里来的，我们看大部分是要革命的，你们是把二七消灭，还要能把那个消灭，总理不是讲了么？河南各派都有份么？你们能不能开创一个先例，各省问题自己讨论解决，实验一下，不行失败了再想办法，比如：军区抓人问题，你们说对不对，经过讨论，不就认识了吗？哪是对的，哪是错的，你们三派代表或全部坐在一起讨论嘛！会开不起来，不要紧嘛！轮流坐庄，你今天主持，明天他主持，主席对河南很关心，亲自写几个指示，河南地处中南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交通，军事……都很重要，你们在那里搞三国演义呢！还是怎么办，还是在毛泽东思想思想基础上，很好地解决，当然这不是不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毛泽东思想，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改正么。

你们自己在这儿讨论一下，我先给工人总部讲几个问题。现在军区转过来了，这是一个很好地条件，有些东西也就认识了，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有个结果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么，铁路中断，这就是个大道理，这关系到国际名声问题，很重要，谁搞谁倒霉。时间短了还好说，长了性质就要变，还有个造反派，中断铁路十八天，一点没有道理，结果越不想承

认问题越大，越弄越被动，骑虎难下，一天天压力很大，结果性质就会变，破坏了国家利益，破坏革命，就非走向反面不可，造反是有理的，但你这是没理，一点道理也没有，有些地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骗工厂不行了，现又到农村，去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这个我们也有准备，四川李井泉搞的产业军，不是讲农村包围城市吗？那是毛主席讲的，我们伟大领袖讲的农村包围城市包围蒋介石，国民党，而军分区，李井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坏人提出这个口号，这是反革命口号，他们包围谁呀，是反动的。对农民一天两天可以欺骗，时间长了，他们必然觉悟，那就不行了，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事情我们那一派都不能搞，不管二七，河造总，还是十大总部。

铁路：（河）上次总理讲铁路军管，不介入地方，怎么理解呢？

戚本禹：就是铁路的两派斗争时，不要再请外面的人，要自己解决，当然要参加河南的两条路线斗争，既不要别人，别人也不包办你们，铁路是个很严格的问题，是不能随随便便的，你们看怎么办。

铁军：我是铁军……

戚本禹：啊，你们这个铁军，是不是作些检查，起码在打砸抢上是很严重的。

铁军：我们是有错误的，在军区……对二七……在四月二十七日前后有打砸抢……。

戚本禹：就这一点吗？我看不是实事求是。

铁：反正前后都有吧（众笑）。但二七是革命造反派，我们想不通。

戚本禹：你们有多少人？

铁：一万多人。

戚本禹：这一万多人你都保证没搞打砸抢，那么有，就由你一个负责。

铁：（不语）

戚本禹：你不是代表么？

铁：是！

戚本禹：对军区的错误是他们二七抵制的，还是你们铁军抵制的？

铁：是二七。

戚本禹：既然是抵制的，为什么不是造反派呢？有些东西认识不理想，你们打回去的电话、电报我都看了，还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先说二七，你们搞的那个我的讲话，当然有些是确实的，有些是不正确的，结果人家给我们提了好些意见。再说河造总，你们说我们

说的大联合以你们为核心，我什么时间说的？

河造总：造谣！从来我们没有说过我们为核心，而流传的是二七公社为核心。

戚本禹：别说了，你们的传单我都有一大堆了，我看你们各派都有小团体主义，以派为重，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重。文化大革命，这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的一个大斗争、大战役，这个战役不胜利，刘少奇上台，不管你们那一派都得抓起来，不然是投降，剩下统统抓起来，什么四大，象青海一样，象赵永夫一样一扫光，什么二七，什么……统统一样，要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省市内党内一小撮坏人，否则让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上台，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千百万人头落地，我们都要坐牢，彭罗陆杨上台，还搞什么四大，他就是抓、捕、杀。你们如果不能把河南搞好，客观上帮了刘邓的忙，如果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团体，那就会迷失方向，别看现在方向对。不要打内战，要联合起来，不要支持错误路线，错了就改嘛！不就完了嘛！当然除了个别在两方打架中误伤外，打死了都是反革命、坏蛋，往死处打人，把人的眼睛挖出来，你们想这样的是什么感情啊！这些都是坏人，这些人难保你们的组织中没有，对在你们组织中的也不能包庇。十大总部和河造总，对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给你们出的坏点子，一定要揭发出来，他们在灭亡以前要失去一切，就丧心病狂地挣扎，采取多种手段，他们喜欢你们群众互相斗，搞打砸抢，坐山观虎斗，破坏生产，真是不择手段，这是决战啊！他们要灭亡，你们觉悟以后要揭发，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子弟，为维护父母失去的天堂，但有些也是好的，比如向三东，就是和他父亲划清界限，要跟毛主席走。有的黑帮子女，对革命造反派有刻骨仇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要他们回头，我们就要欢迎，全国要都象你们这样子打内战，就要上当。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鬼点子很多，别看现在他挺可怜的，一遇时机他们就又出来的，比如虎子、长蛹苍蝇它们都会装死，等一会突然跑了，这是动物的本能。装死，自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帮家伙能死吗？他利用群众之间的矛盾，你们联合起来共同整他，他们肯定要失败的，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不要以为他们死亡了，到时候他们就又突然跳出来了，那就没有什么四大民主了，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死亡了，可以打内战了，那就上当了，那就要犯历史的错误。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你们想想看，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刻骨仇恨，为什么不能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呢？二七工人总部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工人都是不好的？我看大部分是革命的，老工人、党团员犯了点错误不奇怪，不要以为人家犯了点错误，改正了就可以联合。我走过一个工厂，树立一部分老工人、产业工人、党团员，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党团员一边，但我知道这些人并不是坏人，站在保守派一边，这里有好多原因，过去受了黑修养的影响，比如过去北京市委贯彻的一套就是黑修养，再者长期以来，对党有感情，长期以来，把党委书记和毛主席，和党并列联在一起，因此他们不能接受，打倒党委书记就是反党了等等。而革命造反派中又有一部分人是吊儿浪当，有的长期对领导不满，还有的有个人主义，造反派一起来，因此老工人，党团员都看到这种情况就更保了。他们还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家伙！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挑动，就更厉害了。这里说一句，你们决不能用这一点来攻击造反派，我去一个工厂，一个工人说我，你认识的那些人，没一个是好人。我说那么你也不是好人，事实证明大部分是好人嘛！你们说他保我可以理解，但坏，我不相信，有的老工人作用很大，他可以说服好多人，两派对立时就有这种观点，更严重的是打起架来，保守组织中的工人、党团员他们在困难时期很坚定，还能教育别人，表现很好，以自己过去阶级苦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而造反派中，我说我不揭你们的底了，但这里再说一次，绝对不能拿这一点攻击造反派。这些问题从历史

上看，你们比我们体验得多，打了架你们冷静的坐下来想一想，过去有的青年表现不好，但在这次活动中，造了反，有了很大进步这就很好，你们不要光看人家过去的缺点嘛！有个工厂，一个调度有历史问题，有一个工人非常清楚，这个工人吊儿浪当，这个调度对这个工人非常打击，因而这工人小病大养，他一次也没有得到奖金，对调度很不满，因此这次运动一开始，他就造反，揭发出很多修正主义的东西，记得非常清楚，一年一年的揭发，那个调度给特务情报，保密厂这样人当调度当然不合适，就要调动嘛！第一个他写了大字报，我看了大字报的质量还很高，揭发很具体，文化大革命人家造了反了，大家不服气，但是从此以后，人家表现很好，大改样子，小病不休息，一个新的面貌，他成立新的组织，刚成立都不参加，后来这个同志进步很快，也取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所以说对造反派要分析，过去不好，还要看现在，不能因过去不太好，而不看现在，造反派也不要看人家错了一段，不看全面，要全面评价考查每一个同志，不能武断片面。就拿斯大林的问题要三七开，有很大的原则错误，我们的主席还三七开，对同志是不是还采取这个办法？但对敌人没有什么开不开，就是一棍子打死，没有一个敌人还是好的，对敌人没有什么谅解，对变节分子没有什么评功摆好，敌人没有什么好坏之分。都是坏的，都要打倒，对同志过去犯了错误，只要改就联合，改正就欢迎，不要去煽动对立，要开展自我批评做好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我们的愿望，希望你们讨论，大的问题解决了，具体问题你们再研究，人最容易感情激动，激动就什么也干不好。

老保：二七公社抢公粮了！

二七：我们的汽车送公粮，你们抢了，还反咬一口，真可耻！

戚：这些具体问题不说了吧，据我们的了解，河南小报很多，但差别很大，你说这些要调查。

河造总：我们有证据。

戚：河造总吗？！你们要注意，如果大联合搞不起来，要拿你们河造总是问。我越（来越）发现你们的问题很多。

铁总：戚本禹同志今天的讲话我很佩服，我以为你从不理解工人运动，今天的讲话还是很理解的，上次你说我们八大总部都是保守组织……

戚：我说你？！我看你就象保守的。

铁军：上次你就说我们是保守组织。

铁路：说了。

戚：大家都谦虚点吧，我不想在这里争论你们这事情，你们说我说了，没关系。你们也可以按这个传达吧！军区的错误路线你们就是保了嘛！改正了就不保了，再造反嘛！（铁路支吾不语）只要我那样说，你们就那样传达，的确有一段保嘛！你们当时气焰很高，请你们开会都不愿来，我们认为你们当时那个思想是不好的。军区抓人，本来就不对，你们还指向毛主席，我是不能容忍的！我的脾气本来不是那样的。当时我很气愤，我还压了呢！就拿联动来说，主席说：小孩子，放了他们，对李洪山也没抓，让我们接见了他们，……（铁军：……）

你们不是土联动？（铁军：我们不是）毛主席对群众不是用抓的办法，你们把抓人强加于主席，世界上从古到今那有那样的领袖，河南军区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向八·二四开枪，他们的检查，中央是不满意的，开了五枪，打死了人，还说不知道，（对二七）你们不要对军区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检查，军队是伟大的，主席让他们介入，开始认为只要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就是好的，既然错了，大部分是认识问题。

（铁路辩解刚才说的上次接见的情况。）

戚：你那个意见是拿主席来压我，同时把河南的问题加到主席身上。什么抓人是根据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是主席批的，难道是主席让你们抓人了？（指省委总部）你们怎么不说一句话？到现在为止我对你们有意见，军区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你们让工人出来讲，你们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党性那里去了？坐山观虎斗，错了也不圆圆场，坐到那里听到不符合党的原则，听之任之，这是自由主义第十一种，对你们省委总部印象不好，有三种或是缺乏敏感，一种是兴灾乐祸，他们还可以原谅，但你们不行！你们可不能这样认识，你们干部是整天研究学习党的政策，难道党错了吗？千万要相信党中央，抓人问题先不说，但打死人要处理，不管那一方不能包庇，铁军，打死人了没有？

铁军：没有，刚才你说“你们是土联动”，上次你说“你们铁军成绩我早知道了”，这次又问我们打死人没有。我们铁军是一贯不主张动手的，不打砸抢的，我们大部分都是造反派。

戚：我对你们的印象不太好，起码军区问题你们就保了嘛！打砸抢没有吗！？要老实，你现在不要和我争了，你们自己总结缺点错误，我想你们对你们铁军自己的错误缺点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你们说造反，既然造反你们对军区错误路线就没造反，上次会还说，大方向是正确的！（指军区）保了几个月。今天就到这里，以后再说。

铁军：我们要求单独接见。

戚：只要你们达成满足五千万河南人民的协议，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我也接见你们。

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 1967.07.10

中发 ［67］ 216 号

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

生产。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附：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1967.06.27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并武汉军区党委：

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坚持错误，越走越远。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给河南省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对这一严重错误，在中央首长指出以前，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越陷越深，以致不能自拔。经过中央首长指出我们的错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才使我们逐步的醒悟过来，这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坚决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无视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

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压制了群众运动，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又给了我们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这些重要决定，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盲目自满，自恃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当时河南二七公社向我们的反抗，看作是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军区领导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群众大会讲话中，又重申宣布郑大联系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并且还把这个讲话登了报，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河南二七公社，致使我们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直至赴京汇报前夕，才作出宣布撤销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是根本上搞错了。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别是三月份我们在急于夺权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原则，组织了几个总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赵文甫给军区写信，挑拨离间，用意极其恶毒，但我们政治上麻木不仁，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以及时揭露和反击。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立场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党委书记何运洪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并应作深刻检查。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不觉悟，不认识，不改正，根本原因是：

一、路线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始终体现着斗争的大方向认识不清，把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搞颠倒了，对他们非本质的和属于支流的缺点错误看得太重了，错误地把他们当作右派势力，进行压制和打击，自觉不自觉地站错了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保守思想严重。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墨守陈规，习惯于按常规办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很不敏感，很不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反感，对他们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态度暧昧。支左工作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

三、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委领导成员很少深入实际，到群众里面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即使对我们所支持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提出的善意批评和宝贵建议，也听不进去。患得患失，不敢挺身而出，冒风险，担担子，缺乏勇于负责的精神。怕群众，怕革命，怕丢面子，怕丢官，一句话就是怕革命。

四、党委领导不力。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闻不问，很不关心，参加省委文革小组有名无实，没有积极主动了解情况，因此介入后，心中无底，仓促上阵。在支左工作中，常委没有形成核心领导力量，工作忙乱，处处应付。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的方针和有效的措施。作风不民主，工作不深入，情况不明，决心不大，犹犹豫豫，朝令夕改；包办代替，听不进不同意见，未能充分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

五、归根结蒂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得不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份力量多，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

很好的触及灵魂，破私立公，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

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最高统帅毛主席、副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深感万分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河南五千万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地检查错误，坚决地改正错误。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定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决心以山东省军区为榜样，公开向群众作检查，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对二七公社坚决支持。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对部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路线觉悟，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努力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以上仅是我们的初步检查，还很不深刻，恳切盼望给予批评指示。

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1967.07.05

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各方代表一致认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保证"四大"；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坚决做到：一、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

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坚决贯彻执行总理七月三日关于"不停产、不停业、不爬车"的指示，以促进河南问题的顺利解决，保证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上述指示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各方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协商，特提出以下六条具体措施，共同遵照执行：

一、立即将"六·四"《通知》和总理的上述指示，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所属组织的全体人员，严格遵守，坚决执行。

二、保证不停产、不停业、不爬车。动员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群众，在本地的应立即返回原单位。在外地的最迟不得超过半个月，迅速返回生产、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

三、保证互不围攻，各方主动拆除武斗工事。

四、凡群众组织之间如有互抓、互扣而未放的人员，三日内一律放回。

五、各方所占用的生产车辆、机具、设备、器材，一律送还原生产单位，用于生产；其它公私财物主动送回。

六、各群众组织的宣传广播车，三日内全部拆除，用于生产。

各方应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遵守上述协议。当发生某些争议时，应互相协商解决。

上述协议由省军区、驻军、军分区和各方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

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代表（签字）：

河南“二七公社" 张保怀 党言川 龙一兵 规奇克

开封师院“八·二四” 李福来

洛阳“八·一六” 常春波

焦作矿院“八·一八” 刘文学

平顶山“二七”联络指挥部 赵冠雄

河南“二七公社”新乡“八·一八” 黄宗万

河南“二七公社”信阳分社 郎显庭

河南“二七公社”鹤壁分社 王元青

河南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 李玉祥

河南偃师高中“八·二五” 史宏西

郑州大学红卫兵战斗师 职承平 傅宗耀

河南“造总” 刘建亭 王计礼 贺长有 陈金海

开封师院“井岗山” 张本乐

开封市工代会 周树凡

洛阳市十一战团 童水盛

新乡师院革命造反指挥部 李玉坤

鹤壁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委员会 杨得恭

平顶山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王乃斌

河南偃师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 侯道宏

河南兰考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 杨恒德

焦作矿院文化革命联合委员会 曾恒初

郑州铁军 郭玉琨

省革命工人造反总部 李 通

郑州市革命工人造反总部 王 林 刘开太

郑州铁路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郑义双 施松岭

河南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张治安

郑州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芦钦荣 冯昌武

郑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刘广善

郑州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何立本

周恩来戚本禹与赴京汇报的河南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 1967.07.12

〖河南省军区、一军和河南驻军赴京汇报的领导同志出席〗

周总理：

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还不错，中央转发了！各方群众组织达成的协议，中央也转发了。这对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认识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有好处。

中央批示上写了，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书记

处书记赵文甫。文、赵这两个人挑拨关系，你们过去没有看清，经过揭发，现在你们就看清楚了。

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工作中虽然犯了某些严重错误，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当时在全国来说，都程度不同地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要看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调到北京工作，对自己错误作了认真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个革命的领导干部。

陶铸提议把刘建勋同志调到北京加强北京的工作，中央同意了。陶铸就利用刘调到北京的机会，把文敏生搞成代理第一书记了。

文敏生是新四军五师的。文在五师的时候，李先念同志就发现他是喜欢搞小名堂的，后来文调到中南，李先念同志也提醒过陶铸的。后来纠正河南吴芝圃的错误，把刘建勋同志和文敏生调到河南，两人的关系就搞不好。文在代理第一书记期间搞了很多花样。

赵文甫给你们的信，康生同志看了，是挑拨离间的。赵文甫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建勋同志表现是不错的，结论是肯定的。过去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就是当官做老爷，离群众太远。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刘建勋同志在第一书记中是好的，他在河南是敢字当头。到北京后，被揪来揪去，表现也是好的。刘建勋同志，还有吴德同志，把这个彭真、刘仁搞的旧摊子搞起是不容易的。彭、刘虽然不在幕前指挥了，但他们是后台，下边出来搞，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揪住不放。后来刘建勋同志调进来，也是揪来揪去，常常都是几天都回不来。

河南省要成立以刘建勋为代表的有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筹备小组，领导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看了你们的检查报告，这是很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本来主席和林副主席已经看了，批了还是叫你们先学习一下，把思想搞通。

现在洛阳问题很严重，要来五千人闹，不回去。洛阳闹得很紧张，他不同意二七公社是造反派组织，他把交通中断。这个问题，军分区是否认识得很清楚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否都认识清了。

开封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八·二四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一军、军分区、市人武部是否都认识清了？如果认为错了，要给群众做工作。

你们的检查报告虽然已经批了，先发给你们，你们讨论一下，看还有什么意见。张树芝、何运洪同志你们先看一下。你们要前进，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要和群众见面，可以给一点时间。

张树芝插话：我们现在正在召集分区、驻军领导同志开会，我们已经给同志们讲了。我们还搞了个向群众公开检讨的声明，已报请中央审批了。

戚本禹插话：中央已经批了你们的检查报告，不再批你们的声明了。

张树芝插话：我们和驻军同志研究了纠正错误的十条措施，很快就报请中央审批。

总理：你们搞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余嗣贵插话：我们建议刘建勋同志回河南工作。

戚本禹：中央已经决定刘回河南搞筹备小组。

余嗣贵：我们就在公开声明中写上一条支持刘建勋同志。

总理：可以增加上这一条。

你们在讨论过程中，你们和家里打电话、通信，对错误是个逐步认识过程，这是许可的。你们来了一个多月了，有个认识过程，这是允许的。既然认识到错误，就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改。但是人的认识过程总是参差不齐的，这就要把工作做好。你们在这里我们做工作，有的思想不大通，在电话上受到家里的一些影响，在情绪上有所流露，就影响很大。内蒙就是这个问题，前面谈的很好，背后又搞一套，来压中央。地方的群众劝说回去了，军队的又来了，结果又搞了第二次。四川也有类似情况。

河南一定要注意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谈多少，没有想通的就讲出来。我们告诉你们内蒙、四川的经验教训，就是免得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向地方讲多少，地方想不通的，就反映给我们，帮助你们解决。

元月份，主席给你们五大任务，就是“三支”“两军”任务。你们离群众太远，没有思想准备。你们在支农上有点经验，因为部队也搞了农业，军训上也有点经验，不过是属于灌注的。河南在支左上的错误较多。这是一、二、三月份的情况。四月份，发了十条命令，主要是讲爱民的。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了，八条是拥军的，十条是爱民的，这样就完整了。十条发表以后，群众有了根据，就又起来闹了。八条对你们有利，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发表了十条，对群众有利，冲你们（有的地方还有夺枪的），你们没有思想准备，又闹起来了，所以以后又发表了“六六”通令。这次来把思想搞通，好好做工作。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又是领导干部，犯了错误，就痛痛快快承认错误，好好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你们要好好讨论，不要有反复。

你们看还有什么？

张树芝：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

徐文礼同志汇报了释放八•二四领导人陈红兵的情况，并提出对现在支持的这一派怎么办？

总理：群众组织嘛，是不会叫他们解散的。过去受你们压制的那一派，现在是造反派

了，你们支持的那一派，因为军队支持他，必然要发展到跟军队一块压制对方，这样是左派的就比较少了。他们没有独立思考，你们把责任担起来就行了，他们比较接受教育，他们受了蒙蔽，转过来靠拢左派，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和左派联合起来。这要有个过程。这种反复今年就搞了几次了，去年还更多一些。经过这些反复，教育和锻炼了群众。在和平的日子里，经过这些阶级斗争，就教育了青年一代。

现在几派群众在一块签了字，大家都是平等相待。你们在部队中进行教育，不要说他们坏，主要是你们领导，错了就痛痛快快地认错，就改正。你们可不要动摇了，电话上给你们说几句就软了，这就麻烦了。

何运洪：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

总理：你们明天讨论一天，可以回去几个人，真正认真地做工作，要召开一系列会议，要有一个工作过程，要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主席说，把时间估计得长一点比估计得短了好，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比估计得少了好，把情况估计得坏一点比估计得好一点好。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还要实事求是。

你们也要估计到部分地区出问题，你们要把错误引向自己。内蒙就有这个问题，不仅两派在斗，一派出来打吴涛，而另一派很高兴，没人出来制止，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结果只好那样处理。

就谈到这里，你们明天讨论一天，晚上把情况反映上来。

戚本禹刘建勋接见河南各方代表谈话纪要 1967.07.14

〖时间：1967 年 7 月 14 日晚 10 点 10 分，地点：人大会堂南会议室。出席：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各五名代表，郑大战斗师一名代表，中央文革办事组同志，军区动员处参谋。〗

从西苑旅社上车时，河造总一代表强行上车，无理取闹，被文革办事组的同志赶下车来……，戚本禹同志未来之前，只有刘建勋同志在会议室，我二七代表与刘建勋同志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代表向刘建勋同志汇报河造总放火烧了二七公社 8•16 大楼。三厂、五厂省工总赶我工人出厂，工人被打，被抓；陈副司令员从北京回去被铁军扣住等严重情况时，建勋同志甚为关切。问："是否报给了中央，戚本禹同志知道吗？"……几十分钟后，戚本禹同志派人把刘建勋同志叫去。

戚本禹（以下简称戚）：你们三方协议达成了吗？谈得怎么样？（看名单）张宝怀你谈一下吧。

二七：两天来我们谈了两次。第一次会谈，铁军有意转移主题，谈郑州武斗；第二次河造总又是如此，而且，某些组织一再拖延时间，因此，正式协议没达成一条。

河造总（辩解）：不是那样，有几个方面达成了。二七冲我们批判文敏生的大会，今晚还调动几千人，围我省一技校红造联。

二七：刚才河造总提的问题，在今天协议会上已经提过了。会后我们挂长途电话进行了核实，两个事都纯属造谣，并无此事。挑起武斗，放火杀人并非别人，是河造总，省工总。我七中 8·16 大楼被河造总省一技校的红造联放火烧了，几十名红卫兵被迫跳楼，三厂、五厂的二七工人被打伤几十人。

戚：跳楼的红卫兵死了没有，伤了没有？

二七：伤了几十人，死的还正在调查，现在还不清楚。

戚：烧的七中“8·16”？

二七：是。

戚：是谁放的火？

二七：是围楼的人，是河造总的。

河造总：是他们自己放火烧的。

戚：楼上的人是谁？

二七：二七公社七中“8·16”的。

戚（对河造总）：他们自己烧自己？我就不相信！

河造总：是他们放的火。

戚：二七公社自己烧自己的人，这个事情（转对秘书）你快去查查，打长途电话，问我们的记者。

戚：你谈，是谁烧的楼。

二七：今天上午 11 点火才熄灭，他们浇了汽油，还加上木材，当时卫戍司令部、军区都去了人，开去了两部救火车，他们不让救，把车推跑了。

戚：谁推的？

二七：围楼的人。

戚：谁围的？

二七：河造总省一技校红造联。

河造总：是他们自己烧的。

戚：他们的楼，他们自己烧，我们的人民大会堂，自己烧。哪有这样的事！你这样说谎话不行啊！你们自己达成的协议，自己撕毁。

铁军：我们五天之内两个战士被杀，一少年铁军黄××被二七骗去，……另一个也是二七（铁军说二七杀了他们两个人）

二七：这个事情我们也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一个是铁军互相打架时打死的，一个是河造总打死的，与我二七无关。

戚：（问铁军）你说都是二七打的？

铁军：（吞吞吐吐）嗯，就是。

戚：你要调查清楚，你不要说这个问题，我问你，你听没听说你们把陈副司令员绑架了？

铁军：没听说。

戚：怎么没听说，光听说那一方面的（指他们造谣说二七打了他们的人），就没听说这方面的。这么大的事，你就不知道？

河造总：（又站起来说二七公社的坏话）

戚：（对河造总）你说的是陈副司令员的事情吗？你知道陈副司令员被关了吗？

河造总：不是，我们不知道。

戚：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

造总：……（无言）

戚：军区来人没有？

杨松峰（军区的）：来了。

戚：你听说没有？

杨：这个人确实是死了。

戚：你说什么？！怎么死了？！

杨：（目瞪口呆的摇头）嗯……

戚：我问你陈副司令员的事情，你说的是什么？

杨：（恍然大悟）啊，我说是刚才铁军说的那个事情。

戚：我问你陈副司令员的事，你听说没有？

杨：我来的时候还没听说，到这里才听说。

戚：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的司令员你就不关心，你自己的司令员被绑架了你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谁的秘书？

杨：我是参谋。

戚：谁的参谋。

杨：动员处的参谋。

戚：你是跟谁来的？跟何运洪吗？

杨：嗯，是工作人员。

戚：工作人员来几个？

杨：来六个。

戚：你回去跟何运洪讲一下，他要求让陈桂昌回郑州，我们同意，但他又不给他（指陈桂昌司令员）任何安全保证。

二七：不但陈副司令员，所有支持二七的军区首长，都没有安全保障。公安厅高大同也被绑架走了。

戚：陈桂昌是好同志，是军区中支左的好同志，陈桂昌你们说让回去，我们同意，回去了又不加保证，你们搞什么名堂？我很怀疑。

戚：（问铁军）你能代表铁军吗？

铁军：能，但这个事我不知道。

戚：你怎么只关心一方面的，怎么不关心另一方面的？

铁军：如果是我们干的，保证马上放出，并作检查。

戚：你们要保证陈副司令员的安全，要打电话回去。

二七：（送焦作电报）

戚：这是陈桂昌的吗？

二七：不是，是焦作来的电报。

造总：（造谣说二七围了他们省一技校红造联）

戚：（看二七代表送去的河造总的造谣传单）你们这里来的都是协商文件的吗？

十大总部：我们有的不是，来时是点名。

戚：点名，谁点名？

二七：我们全是。

戚：你们中间有参加达协议的吗？

十大总部、河造总回答：有。

（二七代表把军区副司令员刘大坤 7 月 10 日的讲话，河造总铅印的传单送给戚）

二七：军区动员河造总，7 月 10 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开了一个几万农民大会，还大搞经济主义，刘大坤代表河南军区发言，坚决支持河造总。

戚：军区的同志，有这个事呀？

军区：有。

戚：这是那个人的讲话？

二七：刘大坤。

戚：刘大坤是什么人？

二七：河南军区副司令员，跳得可高。

戚：（从头到尾很快地看了一遍刘大坤讲话的传单）这个讲话是错误的。嗯嗯，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你回去和何运洪讲一下。（对军区）这个是对抗中央指示的，这和你们军区的检讨精神完全相反。你们一方面在北京检讨，一方面副司令员在家作这个报

告，这个报告倾向性是很清楚的，我要求你们对这个东西要做出说明，你们认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另外，对怎么开的那个会，你们要写个说明。

二七：我上次接总理指示，7 月 4 日到郑州解决铁路停车问题，接触到钟政委，董参谋长，他们都说：我们现在、过去、将来都是坚决支持河造总的，从来没说过支持二七。

戚：（抬手，手中拿刘大坤讲话传单）这个文件和讲话（指政委）有关，你（指秘书）念一下中央文件，（这个文件和郑州农民开会有关，提到河南了。）

秘书：（念）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戚：你念一遍，我给各个组织一份，下去抄一下。

秘书：（念完文件）

二七：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坚决捍卫中央决定。

河造总：（发牢骚，仍想攻击二七公社）

戚：（对河造总）你看，二七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了嘛！你们呢？

河造总：（慌忙地改为）我……我们也坚决…… /

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嘛。文件上点了河南的名，河南的这个事情。

（他们纷纷表态）

戚：大家都要执行，农民还有生产任务嘛，让他们进城，还给他们工分，谁给呢？（给军区文件一份）文件要带回去。现在是不是集中起来协商问题？

铁总：（十总之一）我讲一点，铁路停车……

戚：这应当由谁来负责，谁搞的？

铁总：我们认为……

戚：这个事情和我们的看法差不多，不光是洛阳的，这里面有问题，我正在调查。

铁总：这是安阳的报告，和我们调查基本相符。

戚：这执行中央决定，不要拦车嘛。

河造总：二七在信阳、南阳地区搞了个九条，六条，说是中央文件。

戚：谁搞的？

河造总：二七公社。

戚：（那张传单）是不是根据传达搞的，是不是军区在中央的检讨搞的，河南“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也符合中央意思，不过不能公开地乱写传单。

省工总：（立即起来要说）二七……

戚：你坐下，你是工人总部的，你说人家，看看你们的。那天我和你们谈了一次，你们就发传单，你们说我承认你们是造反派。那天我批评你嘛，批评你们保军区的错误路线，没有谈及到你们组织问题。

省工总：我们没有搞。

戚：不是你们的？反正是那天来的嘛。你们这样做，正是硬逼着我们说你们是什么性质的嘛！叫我们对你们的组织表态嘛！你们想想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对你们工人总部是有希望的，你要说我们承认了你们是造反派，硬要逼着我们表态，你叫我们怎么办？对工人我还是不愿意说那样的话的。不太愿意说你们是老保希望你们改正错误的，对你们有希望但我们是有原则性的。

你们二七也不要把工人总部说成老保。工人嘛，只要起来造反，不分早晚，都可以嘛！我们要欢迎。十大总部是不一样的，公安总部是保守的，省直总部有问题很复杂。有坏人操纵的，对待工人嘛不要说人家保了军区的错误路线，就说人家老保。中央没有这样说嘛！你们这样很不利于团结。工人同志嘛大多数是好的，受些黑修养的影响，有的也是一时弄不清楚，有的有私心杂念，犯些错误，但不要看太严重了。不要叫人家老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么可以斗争；但要讲究方式。只要人家不再支持军区的错误路线愿意起来革命，我们应该欢迎，不应该叫人家老保。

省工总：我们有个初步检查想表一下态。

戚：好嘛。

省工总：（对刘建勋、何运洪、公安总部、二七公社等问题作了一些检查）

戚：你和家里商量了没有？

省工总：我们和家里说了，家里还作了修改。

戚：建勋同志，你听了没有，有些问题当然是他们认识问题。但总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你们对二七公社还要再提高一些。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嘛，有个别组织不纯，总是难免的，恐怕你们那个组织也不纯吧，你们就那么纯？我就不相信。康老说了嘛，二七公社造反派。总理也说了嘛，二七公社造反派。当时军区的错误路线谁在抵制？二七公社，还有八•二四嘛。但是现在肯定他们了，他们又骄傲了，内部又闹分裂闹风头。（这时服务员进来对戚

说：叶群同志给你来电话）你们等一下，我们出去一下。

（刘建勋和我代表谈话，一会戚本禹回来）

戚：你们谈好了吗？

省工总：最近我们有个希望，希望刘建勋同志去主持三结合。

戚：（对建勋）过去他们反你，现在要求你回去，这很好嘛！（对省工总）建勋有些缺点和错误，但能主动地迅速检查和改正这很好嘛！中央是信任的，你们呢？

省工总：坚决支持，坚决拥护。

战斗师：坚决支持。

戚：你们二七不要讲了，你们是很支持刘建勋的。

财贸：（谈协议）

戚：省工总还表个态，你们呢？

财贸：我们上次写了个东西，已经交给你了。

戚：联络员同志，把省工总和他们的那个东西印出来发给大家，二七公社都发表声明了嘛。

财贸：我们最近总部服务组提了几条意见。

戚：你们“二七”，我们刚才讲过了，你们过去是受压制的。但是现在肯定了你们，你们对待其他组织会不会象“赵太爷”那样，不许人家起来革命？你们的那三个缺点还是存在的。（秘书将长途电话调查七中“8．16”情况交给戚，戚看后）你（秘书）把这个给大家念一下。

秘书念：我们的记者来电，事情是这样的，铁军×××在图书馆里看书。七中另一学生×××去偷书。×××不让×××偷，×××就拿起火钳照×××背心刺去，×××受重伤，医疗无效死去。铁军造谣编说“二七”公社给打死的，但这两个人都不是“二七”公社的。这样就以“二七”公社七中“8．16”打死人为借口，河造总省一技校红造联等包围了七中“二七”公社“8．16”战士，并放火烧楼。楼上主要是“二七”公社的战士。另外粮食干校也发生了武斗，放火烧大楼了，也说是“二七”公社烧的。

戚：这回清楚了吗？放火的人你不要认为找不着他，等两个月后以后，我们腾出手来，总可以找到他。那要处理的，那一派也不行。

二七：我们回去马上调查清楚。

造总：（无奈，只好承认）我们回去立即查清。

戚：你们是不是尽快地搞个协议，不要搞的太繁琐了。你们“二七”不是搞了个声明，你们都可以搞一个嘛！十大总部今后不要叫十大总部八大总部，因为这里边有区别的嘛。公安公社很坏，省委总部有问题，我看有坏人操纵。是不是就几个大的问题，各摆一下观点，就其目的达成一个协议。个别问题回来再说。不要复杂，订上几条，比如军区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达成协议，你们怎么看？另一条对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文敏生，赵文甫，还是刘建勋？第三，对刘建勋支持还是反对？

二七：关于省委当权派问题，经过两次协商，第一次协商时，除河造总刘介廷对杨蔚屏态度暧昧外，所有其他代表的发言都坚决打倒赵、文、杨，本来可以达成协议，但是有的人保……

戚：（摆手）可以了，可以了，杨蔚屏达不成，可以写个文敏生，赵文甫等一小撮嘛！这一“等”就进去了。另外，是二七公社，（对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过去你们抓人家的人，中央认为他是革命造反派，你们不同意，达成协议，是革命造反派（对其他代表）你们怎么看？同意就达成，不同意就算。

河造总：我们同意，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

新乡李玉坤：我们同意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

戚：二七公社有几个缺点，我们已经和他们讲了，为什么要肯定，如果不肯定，抵制军区的错误路线怎么体现，怎么叫方向路线错误呢？“二七”抵制了军区的错误路线，军区镇压了群众，他们抓了“二七”那么多人。

新乡李××：耿其昌也抓了人。

戚：耿的事慢慢来，能达成就达成，有几条写几条，不行回来再说，搞个补充协定，第三次补充协定都可以么。

铁总：我们希望铁路总三派坐在一起，搞个协议。

戚：那好嘛！你们“二七”的也有人吗？

二七：有。

戚：你们铁路三方面有多少人？

铁总：我们一万一千人，河造总三千人，“二七”一千人。

河造总：不对，我们九千多人。

二七：我们成立了铁路工人公社，可能有一万人。（吵）

戚：（对“二七”）人家一说你们人少，你们就沉不住气了，说你们人多。你说你们的人多？我才不相信呢！人少才是实际，因为都反对你们嘛！谁敢参加！真理不在于人多。马、恩他们开始只有两个人，后来发展了，就我们中国有六、七亿。除地、富、反、坏、右外。不在乎人多，看你们方向对不对。你方向不对，就不能代表真理，人多也是庞然大物。

铁总：我们三派分歧不大，从未武斗过。首长给我们提供大联合方便。

戚：你们三派协商吧！我支持好不好？军区准备作了检讨，写个声明，这个声明支持造反派了，但也没说哪个人是保守的。出来之后我看见了。二七公社你们过去是受压制的。他们发出之后，你们要欢迎。军区有两面派，我现在当着军区的面这样说，你们革命派要进行斗争。但方法要注意。两面派是暂时的，广大的干部是要跟毛主席走的。如果有人，不管是军区的，还是省委的，还要搞些花样，你们要斗争。另外，不要以为结合你们，你们就认为当上官了，不要官官相护。如果有两面派就要不含糊地进行斗争，不能没有原则。两面派不怕刘建勋，也不怕中央文革，就怕群众造他的反，他一出来群众就揪他。也许没有，有待考查。相当复杂，斗争远远没有结束，现大才刚刚开始，要有个准备。不要太紧，一急事就不好办了。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下面我还有事。

八·二四：是不是一军（野战军。开封驻军）的我们也搞一下。

戚：“八·二四”与井冈山，你们是不是关于一军的问题，也协议一下。你们是否除几个协议外，也能关于一军的问题达成个协议。洛阳的来了没有？

洛阳：我是“十一”战团的，观点和河造总差不多。洛阳也有三派。

戚：现在搞罢工、拦车的就是你们吗？

洛阳：不是。

戚：那是哪一派？

洛阳十大总部：也不是我们。

戚：洛阳“八·一六”来了没有？（没有）

戚：怎么没有让他们来？（指办事组）

办事组：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只让通知那一派，没让通知“八·一六”。

戚：我写了个条总理批示，让三方面都来。总理不是在那上面批示了吗？要“八·一六”来同样的代表。你没看总理的批示吗？

办事组：看见了。总理值班室打电话说没通知“八·一六”。

戚：你按文字的东西，不要按电话嘛！要通知他们来。你看什么时候能来？

办事组：明天通知他们来。

戚：这里的代表，加上新来的，组成洛阳代表团。怎么组好，你们看。我们要见他们一面。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建勋同志还有什么问题？你再和他们扯一扯。

二七：（指中央文件）让我们带一份回去。

戚：可以。以后交给联络员。

开封“八·二四”：我们开封也搞个协议。

戚：好吧！试试看，搞不出来再说。

戚：（对工人，我们要求你，再给我们读一次）你们，我不谈过了吗？刘建勋同志，你也可以和他们接触接触。你们要尽快地达成协议，中央好批。你们来的时间不短了，你们要回去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前进了一步。现在中央就等着你们的协议。

二七：我们要求戚本禹同志单独接见“二七”代表。

戚：好！好！

铁总、财贸：我们也要求……

戚：让建勋同志接见你们嘛！

刘：好么？今后见面还很多。叫我回河南，我同意。我参加了两次会议。我看双方过分对立了。观点可以不同，连人数都对不到一块。大家要冷静下来，要坚持真理，错了就改嘛！就到这里散会好不好？

工总、财贸：再说几句吧！我们很愿意听。

刘：以后我还要分别和你们谈话嘛！好不好？

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1967.07.18

康生 戚本禹 刘建勋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凌晨一时至四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同志：康生、戚本禹、刘建勋。速记稿，未经本人审阅。〗

康生同志：同志们，现在开会了。今天由河南省军区党委向大家宣读检查。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送给了中央。中央看了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检查报告，批准了这个报告。中央对这个报告拟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是经过中央同志，经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看过的，都同意。为了很快的使同志们晓得省军区党委的这个检查报告，已经中央批示，告诉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主要是谈这个问题。现在先请河南省军区党委的同志把他们的检查报告原文向同志们宣读一下。然后，我把中央的批示逐字逐句告诉同志们，看同志们有什么意见，那个讲？张树芝同志讲。现在请张树芝同志把这个报告读一下。

（张树芝同志宣读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检查报告，略）

康生同志：同志们都听清楚了，这个检查报告是由在北京汇报的军区党委的同志和在郑州的军区党委的同志共同研究，交换意见，然后由河南省军区党委用电报发给中央的。这个检查报告是六月二十七日报来的，今天七月十七日，二十天了。为什么二十多天向同志们宣布呢？因为这个检查报告中央需要研究讨论，讨论以后还需要批示。另方面，我们也要和军区在这里的同志、野战军的同志议论，请他们研究讨论，同时，也在我们这个代表大会上听取各方面代表对这个报告的意见，当中也听取何运洪同志、徐文礼同志他们的个人检讨。我们研究这个文件本身，通过军区以及野战军的同志讨论，以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一些同志的检讨。然后作出这个批示，经过主席、林副主席同志，也就是根据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批示。这样，经过我们二十天的研究工作，听取各方面同志的意见以后，作了批示，今天由河南军区的同志向同志们宣读。河南军区党委检查报告的全文准备发给同志们讨论研究。

这个报告的第一段，有一句话说：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第二段说：自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方向就没有搞对。为什么？就是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既没有作全面系统的了解，也没有作阶级分析，就错误的把矛头对准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把他们看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军区把矛头指向他们，没有在上边真正对准刘、邓、陶，在中南真正对准王任重，在河南真正对准省委内坚决执行陶铸、王任重指示的文敏生、赵文甫。没有分析到。所以，他们把大的矛头对准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把次要的看成主要的，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这一点在同志们讲话中也有人讲过。同志们不管有什么意见都不能把群众组织说成是御用工具。这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这是不好的。群众组织里边这个或那个战斗队可能不大好，保守、不纯，但是，把整个群众组织说成御用工具，是对广大群众的污蔑，不符合毛主席讲的信任依靠广大群众的指示。因此，军区不但打击了二七公社、郑大联委，而且利用军区党委发表严正声明，甚至发表告全省人民书。这种做法是极恶劣的。如果这个人那个人认为这个组织不好，在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讲一些错误的话，影响不好，而他们用解放军，军区的名义发表一个告全省人民书，这是对群众组织，尤其是革命群众组织，采取的一个极错误的态度。现在河南五千一百多万人，向五千多万人宣布一个群众组织为非法，这种现象在全国可以说没有。这是这个检查报告的第二段。

第三段讲二、三、四月间的问题。他们讲有许多机会改正错误，可是他们坚持错误，对抗中央指示。同志们应该看到这是大方向。同志们不是说要掌握大方向吗？这个大方向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只有依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河南军区的大方向是什么？就是对

抗毛主席、党中央。这比什么都严重。这一点我希望河造总的同志、十大总部的同志掌握这个问题。如果不掌握这个问题，就不容易看清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军区所以犯错误，不是在这个那个问题上，而是在总的问题上。二、三、四月间继续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指示。这是最最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有的同志并不了解。我常听到有的同志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军区犯了许多错误，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但是他们的大方向还是对的。"这种话没有分析，没有了解军区的大方向是什么东西。这种话不符合实际，符合实际的是，从二月十七日一直到这一次开会，这样顽固地、系统地、长期地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这是他们最大最大的错误。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掌握住，这是最大的方向。因为无论从历史上看也好，无论从文化大革命看也好，都有个共同的规律：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取得成绩。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抗毛泽东思想一定犯错误，甚至犯最严重的错误。这个从党的历史上看是如此。从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也是如此。这是经过千百次考验证明了的。这是一个大方向问题。从这一点你们可以看到中央对省军区是耐心教育、耐心等待的。这是对他们的极大爱护和极大的帮助。所以，军区党委的同志在检查报告的第三段首先讲到二月十七日的问题。就是说，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事件发生以后，毛主席就立刻指示中央，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要河南省军区找双方代表到北京来汇报，来解决河南问题。同志们，主席的这个指示不仅是对河南问题，而且是对全国各省的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教育了河南省军区，而且也教育了我们中央的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主席再三指示，要双方代表一定来京汇报，就是说不是来一方，不是这一方那一方，而是双方，甚至保守组织也要来，也要听他们的意见。就是从这一次开始，我们遵照主席的这个指示，把它作为解决各省、各省军区广大群众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针。主席二月十七日指导解决河南问题的指示，给了我们启示，给了我们方针，我们按照主席的指示方针去解决各省、各军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在文件上写了。我希望军区的同志也好，一军的同志也好，各个野战军的同志也好，都要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也希望各群众组织的同志认识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最正确的路线，要遵照这个指示去解决问题。

毛主席的二月十七日的指示，本来是纠正河南军区错误的一个最高指示，这不仅给了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而且启示他们怎样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怎样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可以说是方向性路线性的指示。但是很可惜，这样重要的指示被省军区坚决拒绝了。我们对河南省军区和何运洪同志最大的不满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他们不仅不执行这个指示，而且做得相反，同主席思想相对抗，用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席本来要双方代表来京，可是省军区不来，要来只是要一个方面来，中央当然不愿意，为什么不来呢？他们说是有意识的把二七公社压垮、拖垮，然后造成既成事实，向中央说明他们这种办法是对的。这不仅是"实际上"，而且事实上就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毛主席对河南问题很关心，问我们为什么河南的人还不来？我们怎样回答？我们只有回答说他们不来，要来是同主席思想相反，一个方面来，那当然不能同意这个办法。这一点他们自己检查是严重错误。问题的严重性就是从二月十七日到现在长达五个月之久没有纠正错误。今天我们很高兴，省军区党委对这些问题作了检讨。对这个检查我们很高兴，很欢迎。但是，向同志们谈清楚，这个教训是深刻的。这是检查报告的第三段，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写的还不够尖锐。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他们犯错误的首先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要严肃看待。这对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教育意义。无数事实证明，上抗中央的时候，必然下压群众。因为毛主席是代表群众的，毛主席是同群众心连心的，上抗中央，必然下压群众。同志们可以看到刘、邓路线，他们上边反对主席思想，下边对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这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个检讨的第三段是讲的不够尖锐的。

第四段，他们讲所谓“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改正，而且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造成连锁反应，有些单位实际上把有些革命群众组织解散了。这里还讲了错抓、多抓一些人的问题。这句话是不对的。在河南抓人是个大问题，严重问题。直到现在在省军区的错误政策指导下到底抓了革命群众组织多少人，抓了多少革命小将，军区自己还不很清楚。他们讲抓了五千多，实际上，这五千只是按手续抓的。有的讲抓了一万多，有的讲靠近二万人。总之是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各个群众组织都要体谅被压制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小将的心情，他们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人被抓了多少，心情激动一些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问题何运洪应该负完全责任。再一方面，河南通过公、检、法作了许多罪恶，公安公社那个组织是错误的，他们应该好好检查，应该向群众检查自己的错误。同志们要注意，公安系统在运动中是保守的，当然也要一分为二，但是很多地方，很多组织，很大程度上保守，甚至于被执行错误路线的人所利用，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结果变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组织的工具。何运洪同志过去是个作保卫工作的，文敏生也作过保卫工作，丁石也是作保卫工作的，应该是守法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却利用公安系统这样的组织去镇压群众。在河南我们看到了这个公安组织，它自上而下有个系统，不管他们怎样说瞒不了我。它有个系统，抓了许多人，是错抓了。多抓这个说法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本不存在多抓少抓的问题，反革命是另外问题，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群众不存在多抓少抓的问题。把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把革命小将、青年学生捕起来，甚至挂黑牌游街、请罪、登记，这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同志们，你们应正视这样的问题，应该打破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的界限，严肃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他必然打击革命群众组织，把成千成万的逮捕起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有的叫逮捕，有的叫拘留，有的叫扭送，甚至在陕西发现，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而叫“军管你”，这是对军管的诬蔑。昨天晚上，陕西有一个中学生、一个大学生讲，他们被关了几个月，最后问为什么逮捕，他们竟然说不是逮捕而是“军管你”。如果这样“军管”，不但你们危险，我也危险，把我也“军管”“军管”，那不危险了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第五段讲四月份的问题。就是说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贯彻以后，又给了省军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实际上林副主席这个讲话不仅在四月份，第一次大军区会议是二月份开的，那时候就讲了，这是第二次。这一次是青海赵永夫开枪。在这以前还开了一个大军区会议。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副主席多次指示，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后来又发了安徽的五点指示。安徽军区开始保李葆华，背后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并且夺了权，中央没有承认，造成解放军同一部分群众尖锐的对立，甚至把老红军逮捕、关监狱，后来以致造成死人。中央鉴于这个问题作了五点指示。紧接着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这是又一次教育河南军区的同志。这不仅是对河南军区的教育，而且是对全军的教育。这本来应该引起河南军区的警惕，但是，军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但不认真，不贯彻执行，从根本上认识自己错误，而且在四月份又在群众大会上重申一次，说过去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根据的，是郑重的。并且把这个讲话登在报纸上，很明显这是对抗中央军委指示的。这个对抗不但是在下边，在会议上，而且登在报纸上。同志们想一想，怎么这样对待林副主席、对待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这五点指示不仅仅是对安徽的，不是一般的讲，省军区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但是他搞的相反。中央在那个指示中讲逮捕的人要释放，宣布解散的组织、宣布反动的组织要平反。可是河南省军区对过去宣布的非法组织又重申了一次，说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根据的，郑重的，并且登了报，这是执行主席、中央、林副主席的指示，还是对抗主席、中央、林副主席的指示？而且长期不认识错误，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群众思想更加混乱，群众组织更加分裂，群众组织之间分歧更加多

了，这个问题省军区特别是何运洪要负主要责任，这不是群众方面的问题，在军区这样的方针指导下，群众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都可以理解。不能把错误完全归到群众头上。这是一种错误路线、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高采烈，很快伸出手来。赵文甫给军区写的黑信是挑拨离间，很恶毒。他鼓励对抗中央的路线。可是军区何运洪讲没有理他，实际上自己看了很舒服。赵文甫说是有病了，什么事都不管，可是这样的事情他没有病了，立即破门而出，伸出手来，说有病只不过是一句托词。

军区的检查还有一段，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主要由军区党委书记何运洪同志负责。这一点就是这样。我们并不认为军区所有同志，所有干部都对抗主席、中央、林副主席的指示，军区很多同志不满意何运洪的做法，就是因为他是党委书记、又是政委，敢怒而不敢言。他自己则独断专行，不经过集体商量讨论，自行其事，并且长期不觉悟，不改正。

军区的检查最后说到根源在什么地方？他们写了五点：

（1）路线觉悟不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保守思想严重，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造反精神看不惯，有反感。对革命造反派没有阶级感情，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河南有很多野战军，为什么他们包括×师、××师等立场是对的，当然一军也犯有错误。但是那主要是河南军区指挥的。军区和地方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何运洪就是河南省委的常委，如果检查起来，吴芝圃犯错误你们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主席曾经特别告诫过省军区、军分区的同志，他说：你们同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有联系，有些家属就在地方工作，千万不要听他们保守思想的话。不晓得你们对主席这个批示讨论没有讨论？对你们我没有调查。但是你们有些家属就在省委、省人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表现到底怎么样？我知道内蒙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的儿子、女儿绝大多数是联动的。同志们清楚了吗？浙江司令员张秀荣的儿子是有人命案子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很多。比如北京军区杨勇的儿子就是联动的头子。据我了解，何运洪同志的女儿在豫北医专，站在保守派那边。这些事情要引起军区同志警惕。所以你们讲对保守势力思想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实是这样。下边军分区、人武部就更严重了。同志们要警惕这一点。

（3）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怕群众，怕革命，怕丢面子，怕丢官，一句话，怕革命。实际上这是最主要的，由于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就不会有正确路线，不会走群众路线，必然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群众，怕革命，就必然走到保守一方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4）党委领导不力没有介入前很不关心，参加了省委文革是有名无实，没有主动了解情况。军区党委同志一般可以这样讲，何运洪同志不是这样。我看到军区有个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文革小组，而且是副组长，他了解情况很多，并不少，那个组织怎么样他都是知道的，只是他的思想观点立场错了。

（5）归根结底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这样说也可以，实际上不是举得不高的问题，举得不高那还是举了嘛，我看根本没有举，问题就在这方面。

检查报告最后表示，下决心改正错误，这是好的。这是我们解放军的特点，坚决站到

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犯了错误就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学习山东经验，做到三条。一是犯了错误改正彻底好还是不彻底好？彻底好。二是早改好还是晚改好？早改好。三是检讨是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高姿态好。河南省军区的同志以山东军区为榜样，给“郑大联委”平反，给二七公社平反，支持革命群众组织这个态度是好的。张树芝同志宣读了军区的检查报告，我又对同志们就军区党委的检查报告讲了这些话，这有助于说明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示。

中央批示讲了这样几条：

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

中发〖67〗216 号

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左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

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

有的同志会这样问，为什么中央批示这样短？为什么这样原则？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路线搞的。河南问题，根据毛主席的路线，主要还是相信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组织，相信和依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绝大多数干部，中央不能包办代替，要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具体执行中央的路线、原则。因为事情主要是你们作的。当然这是在主席思想、路线指导下做的。

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达成协议是好的。但是，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现在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省军区的检查报告宣布了，他们决心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来。我们一方面要看，一方面要帮，特别是军区的同志，自己需要做很多工作。一个是群众组织达成的协议要认真贯彻执行。现在是不是已经执行了呢？有的执行了，有的没有执行。最近河南武斗还是相当发展的。这里面有个矛盾，我们代表达成的协议，在实际方面，还有些没有执行。在河南武斗还相当严重，我们听说郑州纺织机械厂几方面武斗，伤了许多人，而且还可能有死的。实行协议并不那么容易。纸上写的变成实际需有各方面作工作，需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真正首先检查自己的错误，自我批评，

进行教育群众，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对准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对准群众。有了这次会议精神，我们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当然不会一下都好起来。不要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应该向前看。特别是代表们，你们的群众要看你们的行动，他们向那里去和你们向那里领有关系。要真正注意掌握大方向，打破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保证决议的贯彻执行。

康生同志：我们不完全否定军区在支农、支工方面取得的成绩。对军区要分析。但是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批准这个报告。

由于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主席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军区的错误主要由何运洪同志负责。这个意思是说，决不是军区所有同志都不执行主席的路线。而主要由何运洪同志搞的，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

这一次河南军区党委所作的检查比较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批准它。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讨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的，会欢迎并且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过去群众不满意，不是对整个解放军不满意，而是对执行错误路线的几个同志不满意，当他们改正错误以后，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的，是会欢迎和支持他们改正错误的。

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赵文甫（二七战士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打倒杨蔚屏！）

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是革命领导干部。他过去犯有错误，但很快向中央作了检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中央决定以刘建勋同志为首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个小组不是革命委员会，是作筹备工作的。所谓筹备，就是各方面的群众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实行大联合，组织“三结合”，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先成立这样的筹备小组，一边筹备革命委员会，一边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戚本禹同志：军区的检查，现在先不要往回打电话，因为没有文件，不知道怎样传达，同时军区检查还要发表，是不是由刘建勋同志给各方面协商以后再说。

过去二七公社受压制，现在军区作了检讨，要欢迎和支持他们改正错误。要执行中央的指示。

明天让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同志作检讨。他们有错误，但是犯的错误不一样，犯错误的时间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康老讲要给群众作检讨。他们的检查已写好，这个时间安排一下。）

康生同志：明天晚上。

张树芝：我代表河南军区坚决拥护中央对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检查报告的批示。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坚决拥护刘建勋同志回河南领导我们河南五千万人民进行文化大革命。

二七公社：我们二七公社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河南军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检查报告的批示，坚决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康老、戚本禹同志的指示，坚决拥护和支持犯错误的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大力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坚决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把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保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和七・五协议，和武斗歪风作坚决的斗争。

坚决拥护刘建勋同志回河南主持筹备小组工作。

坚决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

八大总部：坚决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执行。坚决拥护和欢迎、支持刘建勋同志回河南主持三结合。

河造总：坚决拥护中央的批文……。

郑大战斗师：坚决拥护中央批示……。

各地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批示……。

八・二四（陈红兵）：我们八・二四派坚决拥护中央对河南军区检查报告的批示。另外，我说一下开封白色恐怖的情况。七月十四日：前哨广播站被砸，18 人中三人被从楼上扔下。七月十五日：老保调动大批农民、工人血洗八・二四，死一百多人。十大总部、铁军、四川产业军都参加了。（老保们起哄，大喊大叫：造谣）。

康生同志：那一天？

八・二四（陈红兵）：七月十五日。

康生同志：好，叫一军调查一下。你坐下，我讲一讲。

我赞成同志们拥护中央指示。同志们这个态度是好的。我希望你们一条，希望你们成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真正成为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成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成为真正的毛主席的革命战士，必须实行言行一致。说话，做事，一定要言行一致。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革命者的一条重要标志。我欢迎同志们支持中央的批示，支持军区检讨。赞成你们欢迎和支持军区同志改正错误。同志们今天表示的这个态度，我是很赞成的，很满意，要求同志们言行一致，因为向中央作了保证，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我们是相信你们的，相信你们的真诚，同志们必须实行向中央保证的诺言。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

希望同志们客观的冷静的去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虽然同志们在这里就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达成了几条协议，但是，武斗现象现在没有停止，你们要客观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总觉得同志们应该按照毛泽东思想很客观的注意掌握大方向，对河南五千万人民

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不管谁有错误都应该承认。河南武斗现在没有停止，还是严重的，还有发展。承认这个东西，就必须想到如何实行中央的指示，如何消灭这种现象。这是主要的，不是两下吵嘴、骂架所能解决问题的。我骂你，你骂我，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更促进武斗，促进分歧，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所以，要承认这个东西的严重性，正确对待，深思熟虑地想办法消灭这种现象。听到人家说一个消息，不等人家说完，就马上说人家造谣，你又没有调查，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然说消息的人也要经过调查，要实事求是。

一听到消息就说是造谣，不是毛主席的办法。没有调查研究就马上来一个造谣，那怎么能够解决问题？要听一听对方的意见，不对，不符合事实，你也可以讲嘛！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要调查研究！向团结方面走嘛！

我总觉得同志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志们脑子里毛泽东思想不多，很少，勇于内战，勇于骂架，对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指示，口头上、表面上拥护，实际上不那么执行，不要象刚才那样子。

请河南各方面的同志注意，的确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有些联动分子也到了河南。不要否认这个事实。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的。产业军不仅到了你们河南，而且到了北京，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李井泉等反动分子，他们千方百计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同志们脑子里要有敌人，要有敌人！要有敌人！不要把我们的同志当作敌人，脑子里不要只有内战，而让真正的敌人在背后笑我们，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在背后笑我们。我们脑子里要有敌人，要有敌情观念，要提高警惕性。四川产业军是到你们河南去了，你们应该警惕。我觉得应该紧迫地共同联合起来，反对反动路线，不要被他们利用，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至于制止武斗各方面都有责任，不要单纯讲那一方面。同志们，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了，同志们的毛泽东思想总是要多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私字，小团体主义总是要少一点，要彻底革命，在头脑里彻底造它们的反。在这次汇报会议中，代表同志们的表现基本上是好的。为什么达成了六条协议？现在又达成了三条协议？这是好的。你们认识了文敏生、赵文甫是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坚决斗争。你们支持刘建勋同志去领导，你们认识了河南军区所犯的路线错误，还二次回去做工作，使铁路通了车，这些都是好的，并且是很宝贵的。因为这对国计民生都有好处。但是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把已经达成的协议保证执行。现在要搞共同的东西，搞大联合。武斗现象要制止，一军，野战军已经派人回去传达中央指示，现在的武斗一军的同志要打电话回去。但是，同志们要知道，这里的干部通了，下边的干部不一定通，要有个做工作的过程。一军的同志打电话回去，调查情况，重申中央的指示，也不要完全听军队自己的干部的话。另外，各方面打电话回去，重申六条协议，重申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在各方面采取坚决制止的办法。这一点工人总部的同志要特别注意。据我们的消息讲，这方面的工作你们还没有完全做好。要特别注意。据说四川产业军首先找到了你们，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铁军也要特别注意，联动的人也找到了你们。只有各方面去检查自己，不是各方面去责备对方，各方面检查各方面的，各方面教育各方面的，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这样一个危险：武斗越来越发展。你们通过的六条，有的相反，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东西。总的是向好的方面走，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你们大家赞成刘建勋同志回去，可是如果你们还是继续挑起意见，挑起分歧，不向团结方面努力，工作谁去做？所谓勇于内战就是大方向没有掌握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松，把敌人观念淡薄了。河南有许多军事生产，你们看看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实需要备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备战，但是如果生产不上去怎样备战？所以要注意大家动手。

关于军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今天晚上同志们才刚刚系统的听到，对错误的严重性还要继续认识。在军区的问题上，今天晚上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好现象。现在看，在许多问题上同志们的认识是一致的。今天晚上大家对军区的检讨，对中央的批示坚决拥护，是一致的。六条协议虽然没有完全实行，也是好的，铁路通车也是好的。大家要多看到一致的方面，把这当作主流，当作主导思想，有分歧的时候，要把它具体解决，逐渐消除分歧，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这是一个大变化嘛！比如军区的检查，他们认为他们过去是对的，人家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是何运洪自己。你们过去认为大方向是对的，现在认为大方向错了，这就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看到这些，要看到积极因素，不要看消极因素。不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在旁边幸灾乐祸。刚才张树芝同志谈到的赵文甫的两封信很值得同志们注意。如果你们不注意，今后还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他高兴，然后就伸手了，“破门而出”。同志们脑子里要想些问题，所以我建议：

（1）对宣布的这个东西同志们先不要打电话，等他们安排一下，发了文件再传达，不然容易搞错。

（2）你们已经达成了三条协议，希望继续找到共同一致的东西，积极找到大联合的因素，完成你们的协议。

（3）希望同志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继续作工作，继续调查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制止武斗。

（4）希望同志们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再好好反复学习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三种人、三种态度，还有安徽决定中的五条都好好反复学习学习。作为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如果不掌握毛泽东思想，还能成为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大家在这方面要多想一想，这是真正的大方向。

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继续发扬我们的积极因素，巩固积极因素，促进大联合方向走，也就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革命的大联合。把方向搞正确，把矛头对准。我们相信，经过研究，经过辩论，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实际斗争，是能够完成中央对军区检查报告的批示所希望的任务，希望同志们向这个方向努力。现在快四点了，回去大家好好把中央批示研究一下，这个批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河造总工人代表：我是工人代表，我们工人完全按照中央批示和康老讲的办事，但是有些组织挑起武斗，把我们去制止武斗的工人打伤了35个。

康生同志：我基本赞成。我有一点建议，就是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好，第一坚决拥护你，第二来个“但是”，一个“但是”转过去了。刚才这个同志前段讲的很好，我老是担心他说那个“但是”，可是最后他还是说出来了。好了，不说那个“但是”了，散会。

最后二七公社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

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打倒杨蔚屏！

河造总、八大总部、各地区代表也都高呼口号。

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1967.07.21

康生 江青 陈伯达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晚八点四十五分——二十二日凌晨四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刘建勋等。〗

康生同志：咱们好几天没有见面了，同志们看，现在北京热闹不热闹？全国都很热闹，上海、四川各地都很热闹。你们看，百万雄师这一套，对不对？（众答：不对！）你们这个态度很好，有点路线的觉悟。全国革命人民、全国革命组织、革命造反派，应该有所表示，当然，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请你们估计一下，在河南有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二七方面：有！已经到河南了。）百万雄师已经到河南了，产业军也到河南了，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铁军、十大总部，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仔细考虑，你们组织里，有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这一点要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百万雄师是反对二七公社的，是反对中央给二七公社平反的，这在武汉有标语。不但百万雄师，武汉军区也有人这样反对。因为河南军区何运洪与武汉军区有关系。何运洪为什么敢这样大胆呢？同志们，河造总的同志们，十大总部的同志们，你们应该很清醒的考虑。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直接领导的，一军也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我不说武汉军区整个不好。但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准备自己检查。他们里面有些组织，特别是独立师的一些干部，煽动“百万雄师”反对中央，因此，全国革命人民坚决反对他们，北京的革命群众，还有部队，反对他们不是偶然的。这是件好事，把他们的面貌一下暴露出来，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请河南革命组织、群众组织考虑一下，河南有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的危险，有没有按照这样的方法再来第二个武汉，每一个革命群众，每个组织，每一个真正要革命的人，都应该在他的头脑里考虑考虑。当然，他们一意孤行，有他们的自由，他们可以走上反动道路。但是，我希望革命群众要禁止这种现象，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假借革命运动走上反动道路。现在，王任重的百万雄师，李井泉的产业军，都向你们河南走，可见河南有点油水。不然，为什么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有同情他们的，有支持他们的，和他们结合和他们有点共同的东西，所以，他们才去。是同他们搞在一起，还是反对他们？这个问题摆在群众组织面前，这两条路要自己选择选择，这不能和稀泥，这不能宗派主义、有小团体主义，这是国家大事，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希望革命的组织，千万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我觉得，群众总是好的，我们坚决相信群众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一个时候不明真相，会受蒙蔽。现在武汉街上贴满了标语，有些军区的宣传车，也大肆宣传说：“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这完全是造谣。还造谣说，中央说，百万雄师是革命左派。军区的宣传车假造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林副主席的谣言，欺骗群众。他们总是想采取内蒙古反革命分子的手段，造成既成事实压中央，他们完全想错了。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不会被这些坏分子压倒的，他们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让他们表演表演，谁愿表演就再表演一番。这样的阶级斗争，才能把文化革命搞到底。这看起来是坏事，

实际上是好事。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彻底的。同志们，今天从北京会上一大课，他代表全国的革命组织。这一点，我为什么讲呢？因为河南武斗不是停止了，而是一天天的在发展，有军区的某些人在我们面前玩弄两面派手腕，还在煽动群众。同志们从这个地方，可以懂得什么叫陶铸，什么叫王任重，那些坚持执行，坚决拥护陶、王的人，象文敏生、赵文甫等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你们拥护的是什么样的首长，他是什么结果。从这个问题，也可以叫何运洪、李善亭等人看一看，他们实行这种路线，如果不改变，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们能代表解放军吗？（众答：不能）现在全军陆海空都在游行反对他们。同志们从今天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得到一个经验，我看对解决河南问题很有好处。当然，也可能有人错误地估计形势，比如你们的公安公社吧，他们看看形势满好，又蹦了出来，我们准备他们蹦，刘大坤，还有一个钟什么东西，他们已经蹦了出来，谁跳出来都行！他们认为是一个大好时机嘛！我看大暴露一下，他们高兴一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现在河南的武斗，不是停止，是发展了，是在酝酿一个武汉百万雄师这样的反动行为，有这样一个危险。因此，我希望你们看到街上革命群众游行的声势，得到一个教训。军区某些人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支持对抗中央指示的反革命的百万雄师不会有好结果。当然有些同志，比如何运洪同志，检讨承认错误，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我上次讲了，是真革命假革命，有一条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真正的革命者，是全心全意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会两面三刀耍两面派手段同志们犯错误不要紧，哪个组织有错误也不要紧，犯错误坚决改正自觉检查就好了。现在有些群众组织，一面打人，一面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说这种话实在可耻。"从这件事件是可以得到教训的。当然百万雄师内，积极参加的还有"三字兵"，这一点你们铁军要很好注意。"三字兵"就是"黑字兵"，还有公检法，你们十大总部要注意，要警惕，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彼此有同情的基础。我们同意同志们刚才讲的，我一接触河南问题就看出武汉了，不解决武汉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政策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大暴露，对解决河南问题有好处，同志们从这里可得到积极的教训，也可以得到另外的教训，无非是再表演一次，因为事情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今天我希望同志们，希望每个组织，都平心静气地向团结方面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团结方面走。求同存异嘛，不要向分裂方面走。有些组织说起来是统统拥护中央的决定，一个"但是"就转过去了。从总的方面讲，我们代表团的工作是逐渐逐渐向较好的方面发展，我希望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军区的检讨已经印好了，可以发给你们，希望军区把这个检讨发到军分区，如果你们军区真正拥护中央的革命路线，要准备有人冲军区，有人压你们，考虑制造困难，说明他们有办法不让你们改正错误。我们希望大家向团结方面走，向前看，不去算旧帐。

武汉军区的问题，希望你们作为一面镜子，引以为鉴，不要向这方面走，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现在看，事情的发展不完全是这样。当然，河南也还是逐渐向好方面走的，同志们要注意国家大事，脑子里有敌人，有阶级，有敌人。陶铸、王任重不是死老虎，陶铸、王任重把手还伸向河南。他们的黑爪牙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敏生、赵文甫等。我们今天也可以讲，对于何运洪的问题也可以讲到底，是改正错误还是坚持错误，我们相信你改正错误，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底是不是确实如此，因为在军区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还受压制，代表何运洪路线还在兴风作浪。如果他们这样干，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我们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甚至犯了错误的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希望他们真正改正错误，不是玩两面派，真正按照毛主席、按照中央的路线干。河南的问题会完了吗？不会，还会有一场严重斗争，这一场严重斗争对于你们革命群众组织是个严峻的考验。究竟站在那一边，摆在你们面前，由你们去选择，愿意站在那一方面就站在那一方面。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了就好啦，对中央同志，对文革小组，对毛主席，采取那样的态度，是什么行为？

是叛变行为。是愿意跟叛变的人在一起，还是愿意跟革命的人在一起，要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跟着叛变的人阴谋诡计总会暴露出来，两面手法会暴露出来，两面三刀总会被揭发出来,希望代表了解这回事,也希望你们对不明真象的群众进行工作,你们不是说要革命吗？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反对毛主席路线，还叫什么革命？你们每次都喊毛主席万岁，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但是你们实际行动并不象喊口号那样容易，互相读语录那样容易。我告诉你们，北京和全国革命派都在游行，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是真正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

对你们，也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对于河南特别重要，因为河南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过去是中南局陶铸、王任重领导的。过去军区是反对二七公社的，现在“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同样反对给二七平反，这里面你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难道我们的同志愿意同他们那样的反动行为搞在一道吗？难道还同他们划不清界限吗？我相信大家不会这样的，现在形势大好，但是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艰苦的。我希望两方面、几方面达成协议，有些意见可以彼此协商，但是，是有共同点的，共同点，就是反对百万雄师，你们能不能就反对百万雄师达成协议？（众答：能）十大总部同铁军你们能不能？（他们答：能）这就有共同基础了，有这个共同基础，达成协议就不难，你们一方面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各组织在这件事情上，对“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和一部分独立师，应该发表文件表示态度，象北京的革命群众一样，一起上街反对他们，北京也有两派，但是他们遇到这个东西，大家就一起上街反对他们。大敌当前，就应该团结一致，这一点对于河南的革命群众特别重要，因为百万雄师到你们那里去了，就是给你们搞联合，联合十大总部、铁军、河造总（十大总部、铁军、河造总皆表示坚决同百万雄师、三字兵划清界限）你们不但打电话，还要发表文件。

张保怀：我们二七公社发表声明……

戚本禹同志：你们没有问题。

二七：（读声明的全文，当读到武汉局势极其严重时）

康生同志：你们把形势看得太严重了，事实上，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部分小丑。

（当二七公社读到百万雄师迫害王力、谢富治同志，感到万分沉痛时）

康生同志：这句话不好，为什么要悲痛呢？受坏人的打，就光荣，受了好人的打，就打成朋友嘛！

（当二七公社念到百万雄师迫害王力同志时）

康生同志：不但迫害文革小组的同志，而且迫害他们带去的北京红代会北航红旗井冈山等四个人）

（当二七念到杀退这股反革命逆流时）

康生同志：向中央施加压力不一定是反革命。是非常错误的。

（最后二七公社把“河南二七公社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最紧急声明”全文念完。）

河南造总：（表示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坚决和百万雄师进行斗争）

八大总部（反二七那一派的）（表示和百万雄师开展斗争）

康生同志：同志们这种表示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何运洪今天还是要改正错误的问题，还要看，一看，二帮嘛！最好不定他的反革命性质，这一点是我们的建议，当然，你们群众组织自己有你们自己的看法，出于义愤，也可以。但是何运洪今天还是检讨错误的问题，一看二帮嘛，不一定完全是那么一个性质，他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的确我们还要一看二帮。

（郑大战斗师表态）

康生同志：（打着手势制止他）你们可以印发文件，一方面发给我们，一方面向家里讲，在家里散发，这个办法好。

（战斗师继续抢着说：我们讲了以后，我们散发）

康生同志：（又打手势制止）大家的意思我知道，大家要反对百万雄师，把他印出来好。今天晚上，大家一方面赞成刘建勋同志回河南领导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有的同志说：刘建勋有错误。刘建勋同志的错误，已经检查了。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检讨过多次。今天晚上又在我们的代表会上作一次检查，现在请他来讲一讲，同时，他自己也知道省委一些问题要揭露一下，除此以外，纪登奎同志、戴苏理同志，他们也要求作检查，有时间也请他们检查一下，现在请刘建勋同志讲。

刘建勋：（开始讲，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没有提林付主席）

康生同志：他没有提林副主席，可能有人要抓小辫子，我同你们说清楚，这是林付主席提议的，他有最大的谦虚，他首先禁止我们的干部祝林付主席身体健康，特别禁止我们中央讲这个话。

（当刘建勋同志谈到文敏生五年连升三级时）

康生同志：这一点我查了一下，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发现有一股单干风，这时候刘建勋同志对河南的灾情估计得过于严重，犯有一些错误，主要是借地问题。这个问题是陶铸提出的，真正坚决执行的是文敏生，但是在北戴河会议上，听到主席批评以后，这两个同志有两种态度，那时候，我们知道很清楚，刘建勋同志很沉痛的检讨自己的错误，而应该受到批评的文敏生，根本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他仍然依靠陶铸，其实这个问题，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但是，他并没有沉痛的进行检讨，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同志的本质了。

（当刘建勋同志谈到，提拔文当省长，陶铸要调文到黑龙江当第一书记时）

康生同志：陶铸想叫文到黑龙江代替欧阳钦。

（当刘建勋谈到，文敏生决定对郑大联委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方针时）

康生同志：明支持、暗瓦解给中央反映以后，有人提出怎样评价文敏生，给他归纳了两句话，说文敏生这个人貌似忠厚，内藏奸诈，李先念最了解文敏生，先念同志说：这个评价最恰当不过了。

康生同志：现在请纪登奎同志讲话。

（纪登奎同志发言，当谈到何运洪的罪恶时）

康生同志：何运洪同志来了没有？

张树芝：没有来。

康生同志：怎么没有来？

张树芝：有病了，是心绞痛。

康生同志：有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说？

张答：给联络员讲了。

（当纪登奎同志讲到文敏生等人布置收集南下北京同学的材料时）

康生同志：希望同志们注意一下，中南地区在陶铸、王任重的指领下，有一个特点，坚决反对北京南下的学生。无论是广西、广东、湖北，无论是湖南、河南，他们都要搜集所谓南下一小撮学生的材料，这是王任重的口号，这一点，当时河南刘建勋同志没有这样做。他欢迎南下的学生，赞成他们，这在中南地区可以说是很少有的现象。有一件事我没有查清楚，河南军区的同志们和一些群众组织，对北京红代会支持青海八一八同志进行迫害，当时青海赵永夫镇压八一八，北京的学生有牺牲有流血的。赵永夫被揭露后，北京的学生要求支持青海八一八，中央同意他们去，当他们坐车路过郑州时，遭到迫害，有没有这回事？

二七：有！是铁路公安处搞的，属于公安公社。

（当纪登奎同志揭发杨蔚屏吹捧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时）

康生同志：杨蔚屏在不在？

杨蔚屏：在（站起来，又低下头）。

康生同志：你是杨献珍的学生，对杨献珍有没有揭露？写没有写揭发杨献珍的文章？

杨蔚屏：没有，没有写。

康生同志：你看对不对？我知道杨献珍对你比较重视，这一点在党校的时候我知道，杨蔚屏是支部书记。

杨蔚屏：学习的东西多一点，别的东西不知道。

康生同志：不是知道不多，观点一致就看不到。省委书记对这样的事情不关心，不同他划清界限，对反党叛徒不揭发一点东西，并且表示不知道，这就不对了。杨献珍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时候你正在党校嘛。

戚本禹同志：河南大批印杨献珍的著作，是谁搞的？要查一查。

康生同志：杨献珍 1957 年还在党校，那时候杨献珍就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过去不认识杨蔚屏，我认识杨蔚屏是杨献珍给我介绍的。杨蔚屏知道杨献珍的问题不揭发，是不对的。路线上不要和稀泥，怎样能够这样对待杨献珍的问题呢？这说明你的思想有问题。1954，55，56，这在党内批判杨献珍，你一句话不讲是错误的。

杨蔚屏：我回去揭发。

（戴苏理检讨略）

（当戴讲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动摇不定时）。

康生同志：你这个同志就是政治上软弱，你不能坚定地支持谁反对谁，就是摇来摇去。

（当戴检讨他政治上很动摇时）

康生同志：你这个同志就是政治上软弱，说这一点我赞成你这句话，你是年轻力壮的同志，工作是有能力的，是了解你的同志对我讲的，不是河南的同志给我讲的，你这个人不那么坚定，看风势，那里势大向那里歪，这一点自己应该注意，作为共产党员，要引以为鉴，如果坚持正确路线，就不怕孤立，不怕受打击，这一点嘛你自己讲得对了。因为我过去不认识你，是小组的同志给我讲的，你工作很有能力，但有这样一个毛病，这一点我们革命的同志要帮助他，不仅看到他好的方面，而且应当看到他的缺点方面。

（当戴讲到他对河造总的评价时）

康生同志：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是不是还想依靠河造总？

戴：那不能单依。

康生同志：这一点你说的不那么明确，必须要联合起来，和支持自己的团结起来，但也要帮助他们，改变缺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戴讲下去）

康生同志：例如说河造总冲了军区，大家不是反对打、砸、抢吗？反对打、砸、抢为什么还冲击军区？军区何运洪犯了错误，整个军区不是这样嘛，要改正错误，表示态度，不要采取这样的办法。

（当戴谈到文敏生、赵文甫的问题，他说过去做过揭发，今天不在这里讲了的时候）。

康生同志：你可以讲讲嘛，我们没有听到你揭发。

（当戴讲到文敏生看到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刮胡子就发脾气时。戴狡辩，我谈过）。

康生同志：我还记得 1950 年我有病来到北京，听到刘少奇大讲国际关系，说和苏联的关系要搞好，搞不好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说见了苏联人一定要刮胡子，大讲一套他的刮胡子的理论，现在又听到一个刮胡子的故事。

二七发言：刚才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对错误的向群众组织作了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从今天的检查来看，刘建勋、纪登奎的检查是认真的，诚恳的，深刻的，我们坚信刘建勋、纪登奎同志一定能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河南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戴苏理的检讨，尽管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但我们表示欢迎，欢迎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略）

中学红卫兵总部：刚才我们听了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的检查和对文敏生、赵文甫问题的揭发，表示热烈欢迎……（略）

（11 点 50 分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同志走进会场，我二七战士激动地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

江青同志：革命的同志们万岁！向革命的同志们致敬！

姚文元同志：（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你（中学红卫兵总部代表）表示反对百万雄师，这是好的，我们欢迎，现在你不是赞成我的话吗？我有个建议，你那个红卫兵为什么用黑字？

中学红卫兵：因为开始是黑字。

康生同志：现在全国有个说法，叫黑字兵，这个说法代表一个观点，你们不一定同那些人一样，你们属于不了解情况，黑字兵是山东的，实际上是武汉的三字兵也是黑字兵，你们换一下可以不可以？

中学红卫兵总部：马上换。（并当场摘掉了黑字袖章）

康生同志：你们可以讨论，我不是说你们和那些黑字兵完全一致，你们赞成就换，不

赞成就不换。

中学红卫兵总部：河南的武斗不但没有停止，而是大规模的爆发，很严重，很多老工人都哭了。全国第二砂轮厂也停产了。

康生同志：在郑州吗？

中学红卫兵总部：二砂造联很坏，把铁皮搞成盔甲。

康生同志：你们关心制止武斗，不搞武器，这一点是好的。我希望你们两方面调查，如果二七有，不对，十大总部有，也不对，河造总有，也不对。你们关心这个东西，要几方面调查，我们得到的材料，不仅是一个方面的东西，甚至工人拿起武器，拿起了枪，所以，希望全面注意这个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中学红卫兵：我们呼吁抓革命促生产，“百万雄师”为什么到河南去，有一定原因。

康生同志：对。

中学红卫兵：工厂停工，扒铁路，把贵重法码当弹弓子打，这都是二七公社黄委会东方红干的。

康生同志：你们学校是不是在铁路西边？

中学红卫兵：在铁路西边。

康生同志：听说新乡斗的很厉害。

中学红卫兵：大家要按照《“六·六”通令》、《七五协议》书办事。

康生同志：你们都签字了吗？

中学红卫兵：康老说不签字不行，我们签字，不执行，辜负了中央首长的期望。

康生同志：在北京达成协议，在家里搞武斗，你们代表中，有没有想打倒戚本禹同志的？

河造总、十大总部：没有。

康生同志：有的说打，打打试试嘛！

中学红卫兵：河南出过打倒谢富治的标语。

康生同志：你们打倒谢富治，有一个谣传，是从打倒刘建勋同志发生的，他们说刘建勋为什么没有打倒呢？就是他有后台，这个后台就是谢富治。所以谢富治要打倒。

中学红卫兵：主要是何运洪有问题。因为打倒谢富治是 155 部队提出的。

康生同志：对！军区个别人，首先是何运洪，要打倒刘建勋是错误的，影响到群众，主要是何运洪的错误。

铁军：我是铁军的，我要发言。

康生同志：我问你一个问题，铁军到底和联动有没有关系？

铁军：没有关系，是他们造谣的。

康生同志：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代表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

应该是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刚才有一位同志讲，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这个意见很好，要大力宣传。挑动武斗的人总是一小撮，如果广大的群众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出了他们，他们就会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发动群众，要向群众做深入的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热烈鼓掌）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的群众识破一小撮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枝、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现在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手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的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我们能允许吗！（群众高呼口号）

河南的情况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我希望各方面都不要撕毁协议，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号跟我们订了停战协议，他马上就撕毁了。

我今天看看同志们，就把这个道理讲一下，我们有理，真理在我们这边。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这边，不在他们一小撮那边。我们必胜，他们必败。如果他们挑起武斗，不肯放下武器，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

这一点。

我就讲这么一点。（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康生同志：军区张树芝同志报告一个情况，就是说这几天还有人冲击军区。同志们不是反对打、砸、抢吗？不是达成的有协议嘛！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情况？刚才工人总部写了个条子给我，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为什么不讲讲这几天的事情，冲军区是一个大事，问题是过去也有人冲过，那时候没有协议嘛？我们达成了协议，大家签了字，就应该注意。

张树芝：（略）

（当张树芝讲到有的地方开着吊车搞武斗时）

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工人总部要特别注意，你们要负主要的责任，别人没有吊车嘛，把生产工具变成了破坏工具。

张树芝：吊车一开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康生同志：新乡就开了吊车。

二七：他们提出三天内全部消灭二七派，用吊车围攻二七派，在家内的人，家都被抄了。……

康生同志：用吊车毁坏大楼是反革命行动，要查一查。

二七：现在新乡的二七派逃荒的很多，新乡军分区搞全市停工、停产、停电。

康生同志：新乡军分区要负很大的责任，立即打电话（对张树芝）告诉他们再这样搞要受到严厉惩处。

戚本禹同志：军法处置。

二七:听说李国秀把炸药交给老保,新乡地委的老保已经散了,李国秀又给他们打气，让他们跳出来。

康生同志：他们看到百万雄师去了嘛。

二七：李国秀对地委老保说：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支持到底。四川产业军血洗开封以后，又流窜到新乡，行动口号是把腿打断。……

康生同志：当前新乡、开封市的工人同志要特别注意。

二七：十大总部、铁军运到新乡几百人，挑运农民进城……

康生同志：同志们要注意，这几天恰恰都同“百万雄师”的行动一致是不是统一布置的？

二七：他们和十大总部有联系，还翻印他们的传单，说中央文革说“百万雄师是革命造反派。”

戚本禹同志：康老刚才说了，那些全部是造谣。

康生同志：军区是谁讲的？全部是造谣，而且是相反的。

二七：河造总说中央派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到武汉（这时伯达、康生、本禹、姚文元等同志都笑了），8201 和武汉陆海空军游行支持“百万雄师”。

康生同志：8201 就是独立师。

二七：“百万雄师”在郑州有一千多人和十大总部，河造总联系在一起。

河造总、十大总部：二七公社善于造谣，完全是造谣。

康生同志：你们等人家把话讲完嘛！这是讲“百万雄师”问题，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注意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百万雄师！

二七：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成立了河南省革命派联合总部，明天开大会，规定农民四点钟进城。……

戚本禹同志：（对河造总）有没有这个事情？

河造总：没有！是造谣，我下午三点钟才挂过电话，是造谣！

戚本禹同志：现在就马上往家打电话。

河造总：有没有中央派人调查？

康生同志：我们可以派联络员给你们一块打电话。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他们讲完，你们再讲嘛！

二七：统一行动指挥部在省工会，我们认为这一系列武斗行动不是偶然的，最近所以发生大规模武斗是河南军区和河南省委内一小撮搞反革命两面派的结果。

康生同志：这一点你们刘大坤，还有钟什么东西（指钟生溢）实在作了反革命两面派。你们在这里搞的决议，他们在家里反对，说决议是假的，现在你们两方面都不要讲了（二七和河造总都要求发言）我提议由河造总起草达成一个协议，共同反对百万雄师，反对四川产业军，反对产业军你们赞成不赞成？你不是今天起草吗？你就起草嘛！

（河造总站起来解释并攻击二七公社。）

财贸总部：河造总不起草，我们起草。

康生同志：好！

新乡李玉坤（老保）（当李玉坤谈到用吊车参加武斗时）

康生同志：不管怎样，用吊车吊房子，任何人也不能解释这样行动。（当李玉坤讲到和二七公社联合有些保守派的工作不好作时）这是困难的。（当李玉坤攻击二七公社夺枪时）不要说这个事了，你还是谈谈如何制止武斗吧！

李玉坤：我一定下决心。

康生同志：下什么决心。

李玉坤：我可以马上回去，作大联合的工作。

康生同志：你坚决支持军分区，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军分区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

李玉坤：请你相信，我保证完成。（李给康老念语录：相信群众相信党……）

康生同志：我相信群众，我相信解放军，也相信干部，但我不相信对抗毛主席路线的人。

李玉坤：完不成任务不是革命派。

康生同志：你的话很多，实际表现是最少，你解释的多，理由也很多，但实际却相反。

张树芝：今天，新乡八一八的大楼和河医的大楼，新乡八一八楼里面还有放射性元素，河医的大楼实验室里还有细菌，非常危险，我们责成新乡军分区负责让围新乡八一八的人撤退，郑州由军区负责让他们撤退，现在撤退没撤退还不知道。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意见你们可以提，但是冲到我们办公楼我们不能办公，我们不能同意，昨天有三股人冲过军区，并且上去就喊。

康生同志：还要揪出刘建勋？！

张树芝：刘建勋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我们信得过的，他回河南我们坚决支持，坚决拥护。我们军区全体指战员是表过态的。为什么昨天晚上还出现过这个情况。

康生同志：你们的目的是给军区施加压力，使军区不承认错误。

张树芝：我们由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家可以批评，使我们的工作

做得更好。

康生同志：（对张树芝）你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你们承认错误，你们部队中间一部分人，群众组织中的一部分人，一定要大大向你们施加压力，你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昨天晚上十二点钟冲进军区，围攻陈桂昌副司令，使他无法工作，完全没有保证。

康生同志：我们认为陈桂昌是对的，李善亭、钟生溢是错的。

戚本禹同志：这个是真的，他亲自给我打电话，陈桂昌是好同志。

康生同志：我们坚决支持他。现在陈桂昌同志受压迫，受围攻，我们就看出动向了，张树芝同志要时刻注意，这个文件发出来，大问题还在后头。

康生同志：张树芝同志的讲话，希望同志们注意。中央关于河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发下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相信不相信群众？我们相信群众的，我们相信军区认真检查以后，广大群众会拥护解放军的，会欢迎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我们坚决相信，不管那一派，绝大多数都是要革命的，但是我们不相信欢迎何运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如果有的同志还要军区继续执行何运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不支持。

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同志：

同志们，你们的会我们参加很少，这是第三次，所以知道的情况很少。我今天来主要是看一下。

现在有一点很值得在座的代表注意，河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各省的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利用何运洪在支左工作中所造成的罪恶和留下的空隙，进行活动。我看到一个材料，武汉“百万雄师”，一百条纸老虎（康生同志：就是行尸走肉，我看“百万雄师”就是行尸走肉），都走到河南来了。（康生同志：我还叫他是“白完行尸”，就是白色恐怖完蛋的行尸走肉）。“百万雄师”是个狗屁！他起这个名字是吓人的，没有三天功夫，到现在还不到三天，政治上全部破产，臭名远扬，组织上土崩瓦解。你听到这个名字好象很凶，其实很松，纸老虎。四川“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康生同志：实际上就是李井泉、王任重到了河南。“产业军”是李井泉的，“百万雄师”是王任重的，两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往河南去了）。北京的“联动”，东北的“荣复军”到了你们河南去了，到你们中州去了，利用过去河南军区何运洪所造成许多错误和所作的罪恶，开辟战场，他们为什么窜到河南去了？为什么不到北京来？这些保字派组织或反动组织都窜到河南这个目标，就是想把河南作为战场，我的话大家听懂听不懂？（众：懂）懂，那我的中国话说得差不多，其实，我的祖先也是河南人，不晓得是那一代。这一点很值得大家警惕，不但看到河南的消息，并且有行动。所谓行尸走肉的“百万雄师”，就是在河南造谣，有的同志把四川“产业军”叫残匪，残是残无人道的残，匪是罪恶深重的匪。他到你们河南杀人去了，有这么一个材料说，一个残匪

杀了七个人，群众逮他时，他说:“你打死我还赚六个”，要不要河南成为保字派的河南？（众：不要）说了不要行动上呢？我要看行动，要看你们这边（指十大总部，河造总）十大总部，河造总你们行动要特别注意，听其言观其行，你们在这里信心很大，说得怪漂亮的不行，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你们在这里订协议，刚才张树芝同志说了，没有实行，把协议斯毁了。江青同志刚才讲，什么人破坏协定？中国的蒋介石。这是值得深思的，走错了路，可以走回来，“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对河造总、十大总部）我讲话有点进步，你们也要有进步，不要口是心非，我们相信张树芝同志的话，坚决不作两面派。你们年纪青青的，在这里达成协议，回去另搞一套，和各省反动派勾结起来，你们成为窝藏的地方，为什么这些“产业军”、“百万雄师”、“荣复军”、“联动”都窜到河南呢？就是有人搞反革命两面派。给他们抬轿子，利用河南的保守派给他帮忙。现在他们在河南都有活动，刚才康生同志说，军区要有这种准备，就是准备有人向军区施加压力。军区公开承认错误后，有人向张树芝施加压力（戚本禹同志：那是一定的；康生同志：在座的人尽管否认，但一定会有，实际也是这样，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和一部分独立师的干部也是乘武汉军区改正错误的机会，向军区施加压力，要它不要承认错误，这个问题武汉有，河南也发生了。）这是一种罪恶活动。这种活动一定要失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是毛主席缔造的。这个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支柱，是不可动摇的，它犯有错误完全可以改正，有人有一种反动企图，有这种反动企图的人必定又会重新犯错误，必定会失败，这一点军区要提高警惕。

河南问题，在声明发表以后，它就树立了权威，有了威信，得到群众拥护，河南的局面是可以稳定下来的。谁要破坏这种可能稳定局势，必定要碰到头破血流，失败的不是革命战士，而是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康生同志：不管他有多少人，“百万雄师”不是号称一百万人吗？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他们的头头是武汉市委组织部长、原大叛徒王明的勤务员。）有一个问题，十大总部、河造总在座的代表都要想一想，你们究竟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走这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还是跟那行尸走肉在一起？（康生同志：可以叫做“白完行尸”）你改得好。你们十大总部、河造总首先制造杀人武器，有没有这个事？（答：没有）“百万雄师”、“产业军”总是有人帮忙。（二七：在郑州、洛阳、许昌、开封、新乡都有“百万雄师”、“产业军”，并且制造武器，郑工实习工厂因制造武器，车刀飞了打死一工人，纺织机械厂制造弹簧枪等）（河造总：二七公社造谣，他们最近开了政工会议……）你们哪，我讲一讲，你们不要忙于辟谣，先检查一下。（戚本禹同志：可以看一看谁在搞武斗？）你们听他讲完嘛！用国家的财产、物资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这是什么？该当何罪？国家财产、物资都不能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叫做破坏国家财产。现在十大总部、河造总有些工厂把国家财产、物资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是有这个事情。（河造总：是二七公社制造武器、挑起武斗）（戚本禹同志：他们是少数，不会这样做。）康生同志：（今天晚上正在军区围攻陈副司令员的是不是河造总、十大总部？）（戚本禹同志：陈桂昌给我打电话，确实是这样，安全没有保证，张树芝同志你们要保障陈桂昌同志的安全。）（康生同志：我有一个材料念一下，根据军区反映，昨天晚上，河造总的一些成员，军区士兵和干部造了陈副司令员的反，昨天河造总的一百多人，夜十二点围攻陈桂昌、赵复兴。刘大坤、钟生溢溜走，后来又把赵复兴放出，一致围攻陈副司令员。他们说：为什么把军区声明支持河造总一句话拉掉，要是刘建勋搞鬼，就坚决打倒他。这个问题何运洪、张树芝他们回答，这是他们觉得为了促进各派大联合，提出二七公社、河造总都不写，开始还向中央作了报告，然后到总理开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河南军区那个稿子的事，这个问题和刘建勋没有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如果河造总继续围攻陈副司令员，那我可不愿意你们。今天晚上十点钟已经有五百人冲进了军区，现在正在调人。他们造军区反的原因是军区内一部分人说：刘建勋同志到了军区，刘建勋不承认河造总是造反派，十大总部也说刘建勋歪曲中

央精神，只支持二七公社。明天开大会要揪刘建勋。今天造军区的反，是内外配合。他们准备明天开大会。据省委机关造总东风兵团翻印了武汉“白完行尸”十八号公布的一个材料。为什么“白完行尸”要到那里去？就是有人欢迎他们和翻印他们的材料嘛！这个传单捏造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产业军”的批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支持“产业军”，这完全是造谣。这样的东西竟有人翻印！省委机关造总丁石、张治安你们听着，我预先请你们注意。）

关于破坏国家财产，制造杀人武器问题，我特别讲一下。不能用国家财产、物资制造小集团杀人武器。特别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一方面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他们占有工厂，搞这些东西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工人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被人利用，不要被保守派利用，特别是工人同志要注意，在座的有没有工人同志？（众：有）工人同志要特别注意，不要被人利用。在工厂，工人被利用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文化革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文化革命，所以过去有些走错路的工人，应该赶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应当再被人利用。不然，将来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还有挑动农民进城的问题。谁挑动农民进城？（康生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不仅仅看看人家，首先要看到自己，看自己利用农民没有。）（河造总：我们保证没有。）（康生同志：不是保证不保证的问题，你执行何运洪的路线，一定动员农民给军区施加压力。）你们有些保守派按照自己的目的。让农民犯错误（戚本禹同志：制造谣言）。在农村制造谣言，用农村包围城市，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过去没有解放以前，毛主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现在情况改变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这时候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是反动的。（河造总、十大总部：这个口号是二七公社提的）你们不要嫁祸于人。（康生同志：你们不能这样歪曲，发明这个口号的是李井泉、产业军，讲事实嘛！）（戚本禹同志：产业军最早喊出这个口号）（康生同志：你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宗派主义？你们是反对李井泉，还是保护李井泉？）用诽谤、造谣、中伤，总是要失败的，你们以为得计吗？李井泉就是在城市混不住了，违背毛主席的路线，背叛了毛主席。（康生同志：如果把这个事情嫁祸于二七公社，那就是客观上帮助了李井泉、产业军。）李井泉想要农民进城，保卫他们政权。他还不是失败了。

康生同志：我告诉同志们一个秘密，农民不会无缘无故的进城，各地的规律就是军分区、人武部的动员。凡是动员农民进城，大体都是军分区、人武部搞的，大家对这一点不要怀疑。

伯达同志：给农民记工分，记多少钱，给多少粮食，不然农民怎么会进城来呢！有些农民就是糊里糊涂进来的。不给粮食，不给工分，不给钱，农民就是不给他干，还有戚本禹同志说的，在农民中间造谣，总是说造反派怎么破坏国家财产，要求农民进城支援，宜宾农民进城破坏生产才厉害哩！（戚本禹同志：这是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办法，调动群众斗群众。）

康生同志：浙江保守派动员农民进城，就是军分区人武部搞的。

伯达同志：农民进城主要搞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结果农民把对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也喊打倒。他们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康生同志：动员农民进城，不是当权派不行，因为要给农民工分、钱、粮食，谁有这个力量？

伯达同志：你们要特别注意人武部。

康生同志：新乡、开封如果没有军分区共指挥，农民不会进新乡、开封。

伯达同志：张树芝同志，你们的工作要认真。

张树芝：我们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在郑州不成，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准备把中央首长指示、中央批示传达一下，经过教育，那些不赞成中央指示，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最有纪律的，对他们是要执行纪律的。

康生同志：张树芝同志，你们现在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开不成不错，我支持三级干部会议不开。开这样的会议，看什么人领导、什么路线领导，有的省军区也是这样。用第一个办法开三级干部会议，名义上是传达中央指示，实际上是动员他们反对中央批示，动员他们让农民进城。很多这样的经验，你们要注意，有的军分区，人武部常常以各种借口召开会议，什么好听起什么名字。比如有的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人物介绍经验会的名义开会，实际上是动员农民进城。有的以整顿过去支左工作为名，实际上动员部队反中央，动员他们同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相结合。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经验，你们也要注意。现在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到底开好还是不开好，你们考虑。有没有人在三级干部会公开的或秘密搞何运洪以前那一套。

伯达同志：何运洪同志要做人武部的工作，不要让他们动员农民进城。

康生同志：他们有很多理由总是借口下边不通来对抗中央，说什么“都能够拥护军区”，“很多人向我们讲思想不通”等等。过去你们河南军区何运洪就作过嘛！说“给二七公社平反，召集干部会议通不过，还要看看。”

戚本禹同志：有电报。

伯达同志：一个是刘建勋同志回河南帮助做人武部工作，能够一分为二就一分为二。

康生同志：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拥护，一个是打倒。

伯达同志：都是利用人武部。

康生同志：现在就有人揪刘建勋，陈桂昌就揪走了嘛！

伯达同志：人武部有好的，能够改正错误还应该欢迎；不想改正错误的要有适当措施。我把这个秘密全给你们说了，你们要采取这个办法对付我，会不会？（造总，十大总部：不会）你们在这里保证，回去也应当保证。动员农民进城就是犯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了罪，对人民犯了罪，对农民说来也是犯了罪。

康生同志：农民明白了之后会找他们算帐的。

伯达同志：在座的代表同志们，如果你们对农民犯了罪，农民会找你们算帐的，农民受蒙蔽是一时的，我们相信群众，信任群众。毛主席的路线就是信任群众的力量，希望他们能过来。群众可以犯错误，但是他们会改正，你们不要以为可以随便利用农民。那样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今天我主要是讲两点。一个是现在全国各地的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大量流进河南，并且进行了活动。你们要注意，特别不要供给他们武器，不要拿国家的财产制造杀人武器。一个是不能动员农民进城。你们纵容各地保守派组织，动员农民进城，这是犯罪。你们要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要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我相信作大总部中大部分群众，特别是工人同志会提高觉悟的。要想利用他们的一小撮人最后一定会被戳穿的。所以，对“白完行尸”、对“产业军”、“荣复军”、“联动”的态度是考验你们的试金石；动员不动员农民进城来反对造反派，也是一个试金石。

康生同志：

我有个建议，请同志们注意。河南总的形势是大好。为什么呢？因为军区表示了它的态度，向中央表示，坚决改正错误，而且中央对他们的检查也有了批示。所以，比过去的形势更好了。只要军区坚决改正错误，只要同志们和各个群众组织坚决实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坚决执行中央对军区检讨的批示，执行你们自己达成的协议，那么河南的形势一定会更好，这一点我们有信心，但是，当前河南是存在危险的，这也要估计到。

一、刚才大家讲“白完行尸”、“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了你们那里，而且产业军在那里杀人，据开封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杀了八•二四的同志。这些反动组织都到河南去，他们去干什么？破坏文化大革命。

二、河南现在武斗向前发展了，张树芝同志都承认，不管什么理由，什么解释，事实是存在的，而且这个武斗还有大发展的危险，也许就在这几天。

三、请同志们注意，正当我们这一种好形势，军区同志改正错误，你们有一部分组织向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们不改正错误，要他们继续坚持过去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这种压力已经开始，我们估计，不但是想压军区不改正错误，而且还会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向中央施加压力。不管怎样保证，事实总会有的。（伯达同志：现在就有向中央施加压力的。）

据说洛阳已经到了。希望施加压力者明白，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痴心妄想。来两千也好，二十万也好，我们再三同同志们讲话，毛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它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拥护何运洪路线的人，想向中央施加压力，不能动我们一根毫毛，这种人一定碰得头破血流。

四、防止天灾。从天气预报看，黄河水汛有大大增长的危险，黄河水可不管那一派，不管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都不能分离。我们不是说一切为人民服务吗？我们就是要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时，抓革命、促生产。

因此，我有五条建议，都要从积极方面向前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要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方面走。

一、希望双方面达成协议，坚决向刚才表示的那样，坚决反对百万雄师，我想同志们可以达成协议（伯达同志：还有产业军、联动），坚决谴责百万雄师在武汉绑架谢富治、王力同志和对他们的迫害。你们必须充分准备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谴责这种叛逆行为。

二、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你们应当坚决抵制这一点，同北京的革命群众一起与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作坚决的斗争。今天，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坐火车到北京来，北京所有革命群众都上街游行抗议，并且不准火车进站，不准他们下车，而有些比较激烈的人准备武斗，我们想办法说服了。因为北京不同于武汉，北京是毛主席的所在地，应当让他们下车，因为另外还有老百姓嘛！下车还要安置他们吃饭、住宿。可以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嘛！不要搞武斗。这一点，二七公社要注意。就是说不要用他们的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他们现在已经把反动面貌暴露了，还不容易斗争，而且这里许多人是被蒙蔽的，对他们还是要更好地做工作，你到那里乒乓乒乓武斗一顿。当然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带着枪到北京来的，带着枪到北京是来干什么的？但是，我们是革命的，可以给他们辩论，不一定动手，应当采取这样的办法。现在，百万雄师、荣复军、产业军、联动都去了，“三字兵”也去了，很可能在你们那里会师。

（伯达同志：他们在河南会一败涂地）所以要坚决反对这些反动组织到河南破坏文化大革命，坚决反对一个任何组织同他们结合在一起，坚决反对任何组织利用他们的力量反对另外一派，不管那一派都坚持这一个协议。

三、要把已经达成的六条协议重申一下。目前河南武斗发展，重申一下这个东西有好处，坚决实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坚决制止武斗，这一条是当前最重要的一条。无论新乡，无论开封，无论洛阳、郑州都要注意。

四、保证黄河水汛安全，任何组织，都不得捣乱和破坏防汛工作。不准任何组织砸、抢防汛器材、物资。不是说关心五千万人民吗？这就是关心五千万人民的问题，坚持这个协议，有没有困难呢？是有困难的。但是，可以在各方努力下解决。因为这是关系到河南五千万人民的问题。

五、坚决拥护解放军，欢迎、支持军区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不承认错误。这是最后的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最关键的一条。有了这一条，就可以防止农民进城，制止武斗才可能有真正的保证。这不是你们一个人在这里就可以保证的，刚才有个人说：他（李玉坤）可以保证制止新乡的武斗，这可不可能。事实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你没有抓住关键，关键在军分区，而军分区的关键在政委李国秀，据我们知道不止他一个人，所以，不要那样天真了。因为有何运洪的路线问题，要从路线问题上考虑才能解决问题。拥护中央批示，拥护解放军，支持、欢迎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变错误路线而不是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路线，这一条可以达成协议。因为中央有批示。

我建议明天一天，核心组要搞出协议来，这个问题本来今天就明显了，刚才有个同志写了嘛，主要是达成协议和贯彻执行协议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

（一）双方达成协议，反对百万雄师在武汉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行动。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写出文件、传单在社会上散发。

（二）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分裂、挑动武斗。

（三）双方重申，保证实行已经达成协议的“七·五”协议书，特别制止日益发展的武斗。

（四）双方达成协议，黄河防汛协议要坚决贯彻执行，材料、物资、计划不允许破坏。

（五）坚决拥护军区的检查报告，拥护中央的批示，欢迎、支持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

这样五条建议，请你们商量，看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赞成，你们就回去平心静气搞协议，不要算剥皮帐，达成文字的东西，这样你们回去就好做工作了。赞成就散会。达成协议，再开一次会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二七公社的代表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打倒刘、邓、陶！

打倒王任重！

打倒陈再道！

打倒文！赵！杨！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

其它各方代表也高呼口号。

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 1967.07.25
周恩来 康生 谢富治

〖七月二十五日一点三十分到二点四十分，周总理、康老、谢副总理、戚本禹、吴法宪、刘建勋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作了重要指示，整理如下。〗

总理：

同志们，我们叫大家来商量问题，听说你们在郑州开三级干部会，我们想让你们领导同志到这里开，更好地了解中央的精神。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军区都来人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武汉，震动全国。林副主席说，武汉的问题，值得全国各个军区学习。大家来了，听到了呼声，不仅是北京、上海，而且是全国。实际情况你们看到了，明天报纸就出来了。只有毛主席的威信，林付主席的威信，才能动员广大群众。有些地方出现另一种情况，相反的情况，听说在河南某一个分区（我不点名）支持保守派，开上吊车把楼都砸了，简直不象解放军。毛主席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有崇高的威信，咱们能支持保守派下这样的毒手吗？保守派群众是受蒙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用吊车把房子都弄坏，打伤很多人，这样的事情比武汉更厉害。当然武汉是另一种形式，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康老：

我一接触河南的问题，就知道武汉的问题不解决，河南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河南是听武汉的，不听我们的。

总理：

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我提议武汉的问题正面的反面的都要学习，河南是直接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河南的部队又这么多，有陆军、有空军、有工程兵、有炮兵，还有几所军事院校，系统很多，省军区又有自己的系统，有两个独立师，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还有仓库，这次都把你们找来一道开会，支左半年了，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武汉的问题值得学一学。

河南省军区党委有个检查报告，在北京起草，在郑州修改的，意见是否一致，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听陈桂昌同志讲，郑州连印的地方都找不到，河造总、八大总部不让印，当然不是广大群众，只是群众组织中的几个头头，也不是所有的头头。在武汉有些传单、海报纯粹是造谣，说要王力同志留武汉是让斗争的，有些保守组织的头头就是靠造谣吃饭的，这能吃几天？靠造谣是不会长的！我们解放军怎么能造谣呢？希特勒是靠造谣吃饭的，国民党是靠造谣吃饭的，要把歪风邪气造谣生事肃清，共产党员、劳动人民绝不能这样做。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作风，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国家树立榜样，传给后代。你们把武汉的问题学一下，把中央批示河南的问题学一下，有不同观点可以说，我们不强求一致。军队也允许争论，军队四大民主也给群众，过去打仗一年还讨论嘛，要摆事实讲道理，要独立思考，这样真理才能越讲越明。武汉的问题主要靠你们讨论，我们有联络员、记者参加，讨论三天，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保留，但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二十一号武汉的问题就揭露了，下午就游行了，晚上就向河南的代表讲了，第二天达成了五条协议，但是有的就不签字，河

造总、十大总部有的就不签字。

文化大革命就是考验人，首先考验党的领导，现在考验军队了，也考验群众组织。部队过去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胜利十几年了，打仗不多了，朝鲜战争有××万人打仗，加上福建、西藏也有××万人打过仗。部队最大的任务就是政治思想革命，××万人民解放军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验。

我就说这些，开个场，下面请康老讲一讲。

康老：

河南的问题解决得比较久了，有的同志回去现在又来了，有的同志刚来。总理讲了，你们在郑州开三级干部会，与其这样，不如把领导叫来北京开，了解中央的方针更好，所以把大家请来。

开这个会天数不少了，有两个多月了，所以开这么长，就是让同志们认识河南的问题，了解中央的方针，领会主席的思想，犯错误的同志也等待他们的觉悟，等待他们的认识。

情况是这样，在北京开会是逐渐向好的方面发展，在河南总的形势是好的，因为矛盾揭露出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发展与北京的会议是相反的，这就是说在会议上和河南运动的实践是不相符合的，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

好的方面，六月十七日我们看到省军区党委给中央报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对错误有所认识，基本上是好的，因此我们很高兴啦，中央对这个决议有个批示，这是好的一方面。但事实的结果怎样呢？虽然这个决议报给中央了，但在军区内部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解释，刚才总理讲了，这个决议在郑州就找不到一个印刷厂印，这不是群众的问题，这反映了军区内部有的人不同意印，你们不同意印可以另外搞个决议嘛。

从群众方面讲，军区党委对二七公社一次再次宣布它是非法组织。河南省军区发告全省五千万人民书，搞一个群众组织是不好的，没有一个省这样搞过，即使在武汉军区也没有搞，但是河南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竟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迟迟不平反，最近虽然平反了，但二七公社在各方还受到严重摧残。河造总过去是不赞成十大总部的，现在联合起来搞二七公社。总理插话：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开封八·二四这些左派，你们每一个部队首长同志有权利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我们一定支持你，这是正义的革命的行动，即使省军区不赞成，你们也要坚决干，这是革命的行动。

现在的武斗比开始时还严重，一直发展到象新乡那样情况。新乡军分区请你们注意一下，李国秀同志到底怎么样？李国秀同志说他们支左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考虑究竟怎么样？

河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过去军区支持它，现在如果不注意，就会走到它的反面。

应当看到河南目前的情况，武汉王任重的百万雄师，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都到你们那里去了，并且在开封已经杀人，东北的荣复军，北京的联动（黑帮子弟），也到你们河南去了。为什么这些反动组织都到你们那里去，在中州会师？大概你们那里有油水，有人同情

它，它们在河南找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二十一号我们向几个组织提出这个问题，武汉的问题有没有在河南重演的危险？

谢富治插话：百万雄师到河南是个阴谋。

康生：你们要制止类似武汉这样事件在你们河南的重演。可能重演，也可能不重演，我们要尽力消灭这个危险，制止这个危险。我希望同志注意，所以在二十一号的会议上，我们向军区的同志、河造总、十大总部、二七公社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问他们能不能达成协议。大家表示赞成，后来达成了五条协议。这五条协议我记得是这样：

（1）反对百万雄师的叛乱罪行；

（2）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河南破坏文化大革命；

（3）制止河南武斗。有的是一种罪行，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工具，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和财产，这是反革命的行动；

（4）黄河水汛上涨，大家要齐心协力防汛，凡防汛材料物资，那一派都不准抢；

（5）按中央批示要拥护解放军，支持和欢迎军区改正错误。

不要给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们不改正错误，要他们继续执行过去的方向路线错误。不要干扰他们去改正错误。同时，军区的同志不要以为人家讲几句好话就不承认错误，不要因为有些群众支持你，就兴高采烈，实际上这种支持是帮倒忙，我们看到十大总部、河造总有这种倾向。那天晚上武汉事件发生，毛主席、林副主席讲，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解放军有很大教育意义。我们本来很希望省军区表示态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但没有得到省军区的反映。那一天晚上何运洪同志装病没有去。那么紧急的事情，何运洪不到会，我很不满意。我事后检查，何运洪没有病。对武汉的问题，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你们的正式决定和声明。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四天了，没有见到你们表态，到底为什么？不表态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表一表。你们军区直属武汉军区，你们过去的支左工作，支左方针，实际上是执行武汉军区那一套。

过去省军区有些什么错误，省军区的报告大致都讲了，当然还有些不够，那天晚上我作了解释，我想把主要的讲一下。河南军区的错误最严重的是对中央指示长期地、顽固地对抗，二月十七日主席对河南有个批示，对我们中央文革教育很深。主席对各省的批示很多了，但对河南问题的批示是第一个，就是要你们组织各派代表来中央汇报，而河南军区拒绝主席、中央的指示，到今天已经五个多月，将近半年。你们为什么不来？就是想把二七公社拖垮，造成既成事实。事情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没有压垮拖垮。当然河南问题的性质和武汉的问题不一样，百万雄师是搞叛乱的。同志们要从武汉问题得到什么教训？

武汉问题的关键：

一个是部队的少数人拿他们的错误路线去煽动欺骗干部战士，八二零一部队的少数人表现很不好。这能怪战士吗？战士是好的。这一点河南军区要检查一下你们作得怎么样。最

近十大总部、河造总开会有军队参加。四、五十人穿便衣，郑州市人武部的干部穿便衣指挥，这是玩火，玩火要烧到自己的。

第二个是利用公检法。从全国各省看，有的利用公检法干了许多坏事。武汉利用公检法镇压造反派，河南这一条从省里一直贯彻到下边，我们不能不研究这个教训。这次会议上，我们批评了公检法，他的代表就回去了。武汉问题发生后，公检法又翻了，可能要打倒我和戚本禹同志。何运洪同志恰恰在这个时候不参加会议，公检法恰恰在这个时候翻这个案。何运洪利用公检法，丁石、赵文甫是搞公检法的。你们捉多少人，你们没有实际数字，连党言川也捉了。

第三个教训是利用人武部。省军区支持军分区犯错误，分区有没有支持县人武部？人武部有没有动员农民进城的？武汉少数犯错误的同志利用百万雄师把三新、三司、二司、三钢、工总等造反派压垮，河南利用十大总部、河造总把二七公社全部压垮。

第四个教训是利用地方机关的保守派。河南非常突出。河南省委省直总部实际上是保守组织。刘建勋、纪登奎有错误，但还是好同志，你们去搞。最坏的是赵文甫，你们支持他，他支持军区。利用这个组织去打垮那个组织，河南和武汉是一样的。

因此，河南有武汉事件重演的可能。同志们要认识清楚，从武汉事件吸取教训。这个会议上，大家要好好把观点摆一下，把思想统一起来，不要讲的一套实际行动相反，言行不一致。有了错误改了就好，如果坚持错误，长期不改，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你们要好好讨论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提高思想认识。在这里两个月，河南问题实际没有解决，所以经过这次会议望能得到很好解决。

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 1967.07.28

〖七月二十八日十七点三十分至二十九日凌晨四点，河南、湖北两省军区和两省驻军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批判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的大会。会上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愤怒声讨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滔天罪行，大会由康生同志主持，中央负责同志陈伯达以及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刘建勋、曹轶欧同志出席了大会，康老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康：现在开会了，河南军区、一军和驻军领导干部来开会，揭发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同志们要求陈再道、钟汉华彻底交待问题，同时揭发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罪恶。河南军区是武汉军区领导的，我一接触到河南问题，就觉得与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有关系，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就解决不了。河南有的人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而是听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的话。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经常打电报、打电话同河南军区某些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样一军方面也是这样，徐文礼同志知道得很清楚，那天揭露了一些，今天这个会要开好，大家要进行揭露，刚才报名发言的名单，武汉的，两省的，驻军的同志都有，叉开好了，徐文礼同志先讲。

何运洪发言后，吴法宪司令员讲：你到现在还不老实，你同陈再道、钟汉华搞的什么勾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们电报电话来往多的是，你一手遮天，不听毛主席的话，听陈再道的话。你们的总后台是刘、邓、陶、王。你反对毛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同志，把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捧上了天，听他们的，不听毛主席的，陈再道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策划叛乱第二天晚上，你兴高彩烈，不去参加会。

当陈端、彭辉等同志揭发何运洪的问题后，吴法宪司令员讲：本来将给何运洪一个机会叫他揭发，他不揭发河南的错误。同武汉一样，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是一样的！造谣诬蔑中央文革是一样的！搞武斗镇压造反派是一样的！在办公大楼筑工事堵门窗是一样的！顽固坚持错误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没有搞“七·二零”事件，因为他到中央来了，如果中央首长到河南同样要被围攻、绑架。

当李国秀同志发言时，康老讲：李国秀同志请你检查一下，你是执行何运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支持了造反派，还是支持了保守派？新乡武斗这么严重，你们分区有没有责任？（李答：我们有错误，我们要向毛主席请罪。）你反对不反对百万雄师？（李答：反对。）你发表声明了没有？（李答：没有。）你看你们把新乡八•一八搞成啥样子，武斗搞成啥样子，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工具破坏楼房，这是什么行为，我讲过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你既不检查自己，又不揭发别人。）你揭发自己嘛，不要讲空话，要讲具体的，你们新乡还动枪了。（李答：没有）在河南会议上你彻底检查好了。你们这个地区可以看到何运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但你们省军区的同志总是不愿讲这个，不愿交待这个。武汉还没有动吊车拆房子，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你的问题作为河南一个题目，专门在河南会议上去讲。

当余嗣贵同志发言时，康老讲：在我们着手了解和解决河南问题时，就感到有一只黑手从武汉军区伸到了河南。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何运洪等人一面对抗主席、中央的指示，一面接受陈再道、钟汉华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现在情况大家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样，我们同意，总理也同意，把武汉军区杨秀山同志带到北京来，叫他来干什么，不是叫他来主持河南会议的。是要他来看武汉错误在河南造成什么结果，不是要他代表武汉军区来领导河南军区、一军的文化大革命和工作的，杨秀山同志，我今天向你说明这点。我刚才接到一封信，对杨秀山同志发言反映很不好，认为态度很不正确，同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没有划清界限，对杨秀山有很大的怀疑，并揭发了如下事实，说杨秀山十九号到北京以后，同河南驻军一些领导人谈话时，极力美化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说是总理到武汉提出武汉军区的错误后，陈再道、钟汉华检讨得很好。给人一个印象，武汉军区转变得很快。因时间关系，我不多说，这封信的下面有这个建议：杨秀山不能再继续主持河南的会议，我们接受同志们的这个建议。现在武汉军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杨秀山不需要再参加河南的会议了，更不需要他来主持河南的会议，自己回武汉去检查去，仔细检查自己，检查划清界限，检举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在党委会上，有的人反对中央文革你表态了没有？（杨答：我说了，我不同意，但没有坚决反对。）有错误检查好了。还有的同志说，一军的错误，杨秀山是有影响的。

余嗣贵发言当中，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你也是何运洪的帮凶。当余嗣贵讲到在北京汇报期间何运洪同陈再道经常有电话联系时，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他联系的什么，给你讲了没有？（余答：他没有给我讲。）你和他关系那么密切，他不给你讲？余嗣贵同志发言结束时，康老讲：你对自己的错误一句不讲好不好？（余答：我现在检查一下。）你到河南会议上去

检查好了。

当魏家祯同志发言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时，康老讲：这个语录对你最合适，你实际干些什么，你怎样支持保守派打二七公社造反派的。不要说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了，你检查你自己。（魏：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检查可以，检查不系统。）你自己对检查错误还没有准备好，你来北京开会干什么？你在背后指挥武斗没有？（魏答：没有。）将来叫群众问你好了。当魏家祯揭发郑州武斗的严重情况时，康老讲：我问你一句，你在郑州饭店召开过铁军负责人会议没有？（魏答：没有。）你讲过二七公社是反动组织没有？（魏答：没有。）你讲二七公社、河造总是造反派，铁军是保守派，我想不通，想过没有？（魏答：没有。）你换上便衣同十大总部一起指挥武斗没有？（魏答：没有。）军区承认错误，你的态度怎样？你支持过铁军没有？（魏答：没有。）你支持过工人总部没有？（魏答：我讲过国棉三厂东方红是造反派。）你的回答说明了一条，就是语录讲得满好，实际行动恰恰相反，你在河南会议上要彻底检查交待。

会议结束时，康老作了指示：今天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反对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的滔天罪行，表示极大的无产阶级的义愤，这表现了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最可信赖、最可依靠的，暴露了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愚弄欺骗人民解放军，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在这里，今天的会议以及前天的会议，同志们可以进一步领会毛主席所讲的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叛乱事件，可以使全党全军从中得到教育。得到些什么教育呢？

首先，从我们会场上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军内来。有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曾经说过，军队没有阶级斗争。同志们，从今天的会议上清楚地看到了，阶级斗争在军内尖锐地存在，以致发展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举行暴乱。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一切问题要从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来看，离开了阶级斗争和阶级观点，就看不清任何问题。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绑架、殴打谢富治、王力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报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极端的仇恨的。同志们高喊打倒刘、邓、陶、王，打倒彭、罗、陆、杨，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是完全对的。这反映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愤怒的回击，这代表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声音。

二、少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公开诬蔑中央文革要搞垮人民解放军，他们狂妄地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解放军，我们就回家去。同志们，你们看到底是谁要搞垮解放军，是谁不要解放军。真正爱护解放军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同志。象刘、邓、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人要瓦解人民解放军的，不要人民解放军的。

三、一小撮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造谣诬蔑说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同志们清楚，这完全是诬蔑。谁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发动的，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能有这样震动世界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吗？他们讲这话的意思，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要的刘、邓那个党的领导。难道要刘、邓那个黑党的领导吗？陈再道是党委第一书记，钟汉华是第二书记，我们是否要他们领导的这种党呢？反革命分子是要刘、邓的党，陈再道的党，我们能允许吗？！（众答：不能。）

四、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恶毒反对文化大革命，恶毒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造谣说文化大革命尽是整几个老干部，他们好象代表我们老干部，质问说你们到底还要不要老干部？他们妄图在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对党有怨气的老干部中间进行煽动。我们要问要什么样的老干部，离开阶级分析，离开毛泽东思想，抽象讲老干部，这是马列主义呢？这样讲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用“老革命”三个字招降纳叛，招摇撞骗。陈再道讲他革命四十年了，同志们看看，我们要不要这样的老干部？（众答：不要。）他们能不能代表我们的老干部？（众答：不能，他们是解放军的败类。）是的，他们不能代表老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用各种谣言诬蔑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一切事情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

五、武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乱中间，有一种手段，到处讲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代表中央，直到今天百万雄师一小撮头头还造谣说毛主席受蒙蔽了……。同志们要警惕，不仅在武汉，而且在很多省内，这是反革命分子一个共同手法，他们打着拥护毛主席的红旗反对毛主席，他们想把毛主席同中央文革分开，把中央同中央文革分开。同志们，他们能不能达到目的？（众答：不能。）他们痴心妄想，到头来众叛亲离。反革命分子不甘心灭亡，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决战阶段，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斗争没有了。刘、邓、陶、王、彭、罗、杨被打倒了，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被揪出来了，但同志们不能太天真，刘、邓、陶、王、彭、罗、陆、杨的阴魂并没有死，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阴魂并没有死，需要我们去彻底肃清。武汉百万雄师最近还活动，他们计划分散到农村去。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斗争还没有完，还要更加努力，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某些军区的同志犯了错误，毛主席讲：“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只要认真改正，还能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最后，还要关照你们这五个坏蛋，必须低头认罪，彻底向党交待，想顽固抵赖，人民是不答应的，是逃不过去的。想玩弄各种手段能行吗？陈再道讲不识字，是老粗，表示他是劳动人民出身。同志们，他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众答：不能，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对！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背叛了劳动人民的阶级立场。

同志们，中央的复电你们看到了吗？（众答：看到了。）主席讲：“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同志们，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从两次会议来看，陈再道还是坚持错误。你们看他现在有没改正的样？（众答：没有。）他现在能取得群众的谅解吗？（众答：不能。）在坐的同志们就不谅解他。他要取得上面三个条件很不容易。同志们，那三条他可不可以作到？（众答：现在看来作不到。）对啦！现在看来作不到，将来能不能作到很怀疑。如果能作到，三天内把叛乱阴谋计划写出来，说出来，看你们的行动。

最后同志们高呼口号：

打倒刘、邓、陶、王！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严惩绑架王力同志的凶手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河南二七公社省革联翻印八月五日

河南二七公社省银行太阳升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 1967.07.28

中共兰考县委常委、副县长　　蔺永沛

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　　卓兴隆

中共兰考县委委员、县委工交政治部主任　　赵　翔

县委候补委员县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　　樊哲民

中共兰考县委委员、裕禄中学党支部书记　　和新民

县委候补委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先志　等十人

兰考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蜕。保卫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和砍倒这面红旗，是这埸斗伊的焦点。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贫下中农，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秦一飞、周化民、刘呈明等一小撮走资派，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倾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怕得要死，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恨得要命。运动一开始，他们就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四清工作队变为文化革命工作组，派往各机关、学校镇压群众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组织围剿革命干部、革命职工、学生，在县委机关集中攻击张钦礼同志。他们在县委机关全体干部会上说："不贴地主分子的大字报，贴黑帮分子的大字报，县委的目标巳经很明确啦，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是老上级不敢提，实际上县委目标是很明确的，至多是个县委副书记。"会后，张钦礼的大字报陡然增加，谁不写张钦礼的大字报就是"保皇派"。但是张钦礼同志并没有被他们所压倒，他进行了坚

决的反击．七月二十日，张钦礼同志贴出了《秦一飞反对焦裕禄同志十大问题》的大字报。这一下打中了秦一飞的要害，他恼羞成怒，立即指示把县直下乡搞抗旱的科局长统统调回县里，周化民亲自动员，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然后，放三天时间叫大家写张钦礼的大字报。三天过后，没有写出多少东西，宣布延长三天，又延长三天，置抗旱于不顾，造成了秋季红薯严重减产。

以后，秦一飞、周化民召开各种会议，大整张钦礼同志的材料，疯狂地对张钦礼同志进行围攻。

兰考二中"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在学校受围攻时，到县委文革反映情况，文革办公室不承认他们。而张钦礼同志却坚决支持他们建立组织，造学校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反。

九月十六日，北京《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红卫兵在周化民、刘呈明的欺骗下，发出了一个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矛头指向张钦礼同志及焦裕了同志生前好友。县委机关连夜炮制了《热烈响应》的传单，巳经排好了版。周化民感到不妙，又打电恬通知不让印发了。"北焦展"最最紧急的呼吁发出以后，革命群众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纷纷要求进行辩论。九月二十五日，兰考六中全体红卫兵"焦裕禄战斗队"革命师生和［土固］阳公社干部，在张钦礼同志的支持下，发出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反对、诬蔑、贬低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传单，严厉批驳了北京《焦展》"最最紧急呼吁"中的错误观点。

张钦礼同志下乡工作，周化民就派人在后边专门搜集张钦礼的材料。去年十月间，张钦礼同志到湖北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徐俊雅（焦裕禄同志的爱人）也去了。周化民就派人监视张钦礼，监视徐俊雅，做徐俊雅的"工作"。

我县于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布恢复开展文化革命，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印好了所谓揭发张钦礼的传单。广大贫下中农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热情支持革命

干部，纷纷到县找他们辩论。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红旗——四个生产队，联合倡议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

十二月上旬，周化民操纵保守组织到省委要求罢张钦礼的官，省委没有批准。周化民又急急忙忙勾结兵痞、下台干部组织了所谓贫下中农“卫东林焦”、贫下中农“卫东焦”司令部。对于保他们的组织，要啥给啥，他们做好袖章往社员家里送，里边还裹着一角钱，是让买别针用的。土山砦大队五个贫农社员到县，碰见了ＸＸＸ，Ｘ给了五位社员一百五十元钱，说是到省里罢周化民的官哩。但到了省委后他们又说不罢周化民的官了，叫罢张钦礼的官。五个贫下中农一听不对头，他们说：“金钱买不住俺贫下中农的心”，于是就回去了。

他们还在兰考实行大逮捕，大镇压。凡是支持张钦礼反对周化民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都抓起来。谁说张钦礼好，就抓谁。捕的人，兰考监狱盛不下，又把税务所一个院腾出来押人。兰考放不下，还往杞县监狱里送了八汽车。在开封、民权东明的监狱都押着兰考的人。送人，怕贫下中农拦截，就用绳子捆住，嘴里塞上棉套，用麻袋装着向外运。先后逮捕拘留了 1200 余人。二月二十七日他们把张钦礼同志逮捕入狱，二十八名县委委员就有十三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的。他们说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政治大扒手”，是反对焦裕禄的急先锋。对他进行了无数次残酷斗争，押在监狱里一直不放出来。

元月份，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高潮。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力，杀了出来，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了以周化民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

兰考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了，他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向刘邓黑司令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必将在兰考大地取得彻底胜利。

（《河南二七报　新北大》1967 年 7 月 28 日合刊）

控诉河南走资派对我一家的迫害 1967.07.28

焦守凤

我是坚决支持二七公社的，我同他们一起绝食，一同战斗，他们是从两个阶级大搏斗的风浪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左派组织。

最近，在河南和全同各地，贴满了署有我的名字反对二七公社的传单。这全是河南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开封、兰考的爪牙，为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所进行的造谣污蔑和垂死挣扎。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根本没有写过任何反对、攻击二七公社的文章。

自从河南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阶级敌人就利用我们对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和我爸爸在人民中的威信，欺骗、拉拢我们全家。他们对我妈妈和妹妹以“保护”为

名，长期软禁。使她们听不到毛主席和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还利用我妈妈和妹妹的名字，大写造谣传单，为他们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些传单大部分都是出自兰考县委办公室主任刘ＸＸ之手。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参加了保守组织。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识到站错了立场，就起来造了开封地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站到了以二七公社、八二四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一边。河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爪牙对此恨得要命，他们想尽办法，想把我重新拉到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上去。

五月十三日，我回兰考参加爸爸逝世三周年追悼会。刚到家，他们就派了很多人，以找我辩论为名，围攻谩骂我长达数小时之久。十四日，开封地委东方红兵团一小撮头头找我谈话，他们借口“保护”我，说外边很乱，剥夺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去参加追悼会，不让我外出，把我软禁达二十几天之久。在我一再要求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下，他们才被迫专门派两个人送我回开封。回去后仍然要我住集体宿舍，派人暗中监视我。更卑鄙的是他们竟然对我进行逼供，让我“揭发”二七公社的“罪行”。开封公安公社的一个人对我说：“你现在应该为你的前途想想，跟着二七公社一伙人跑，你将来入党是有很大困难的，现在应该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好好创造条件，争取入党。”ＸＸ军分区李ＸＸ也说：“现在我们没错，就是真错了，你跟着我们错了，也没有什么。”一中联总一些人，还在兰考县委大街上到处张贴大字报，说我站错了立场，支持和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违背了我爸爸的教导，必须迅速回头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违反国法，私自扣留、拆阅我的私人信件和外寄信件，封锁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和消息，还常常拿大本大本的诬蔑八二四、二七公社和刘建勋同志的所谓“罪行录”叫我看，逼我写检查，说八二四、二七公社是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御用工具，让我承认五四惨案是二七公社挑起的，打死了十大总部多少人，绝食是错 的，叫我污蔑绝食战友轮流吃饭，还说亲眼看到偷吃鸡蛋饼干等。总之，对我施行了高压政策，让我写“控诉材料”，我坚决不写。为了回击，我写了“我是怎样由不支持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到支持他们”的文章。写好后他们竟让一个什么秘书加以“修改”、“补充”。“修改”后，用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大量张贴、印发。其实这些都歪曲了我的原意。

六月二十四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离开了白色恐怖的河南和兰考，来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心里感到无比兴奋、激动。我下决心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向首都革命造反派和二七公社、八二四等革命战友学习，我坚信胜利一定属于以二七公社、八二四为代表的真正革命造反派！未来的河南必将是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红彤彤的新河南！

（《河南二七报　新北大》1967 年 7 月 28 日合刊）

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1967.07.30

周恩来 康生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十时二十一分至三十一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杨成武、戚本禹、曹轶欧、吴法宪、刘建勋。〗

康老：

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空降军政委王新同志，中央决定调他到河南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的工作。王新同志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发动叛乱的时候，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了谢富治和王力同志，很有功劳。

张树芝、陈桂昌同志来了没有？来了，请到这里来坐。

同志们，解决问题的会议已经开了多次，今天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完了以后，你们回到河南去，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个时候中，由于各方面同志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会议开得很好。首先是由于自己主观的努力，其次也有客观上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发展，对我们的会议有帮助。在主观上，你们各个群众组织还是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方向走的，如果包括今天提出签字的协议书在内，就达成了三个协议，这些协议都是你们自己写的。一个是七·五协议，制止武斗；一个七·二三协议，反对武汉百万雄师，反对陶铸、陈再道、王任重、钟汉华；一个是现在签字的关于解决河南问题的协议书。这个协议表示，大家赞成和拥护中央关于河南军区检查报告的批示。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同志们作了很大努力。当然，也经过一些反复，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但是，总的是向前看的。所以我们讲今天你们在这个协议书上签了字就可以回去了。这个协议书我们看了，很好，现在交给你们签字去。（康老将协议书递给二七代表，首先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最近召开的河南军队干部会议，还要开几天。

同志们，你们的主观努力刚才已经讲了，还有客观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特别是武汉军区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的形势，促使了我们河南造反派、群众组织和军区、部队干部战士的觉悟，这一点也帮助了我们解决河南问题。因为在河南问题上，我们开始一着手就感觉到当中有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分子的黑手伸在河南，如果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是比较难于解决的。当然，从另一方面说，河南问题解决了，也可以促使武汉问题的解决。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谢副总理那天在这里讲，在座的同志们都听到了，中央批评河南（省）军区特别是何运洪同志犯有方向路线错误，主张给二七公社平反，认为二七公社是革命的造反派。中央的这个态度明确表示以后，反转来震动了武汉，也就是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感觉他们的问题严重，特别是“百万雄师”，他们感到严重了。因为他们过去是反对二七公社的。谢副总理亲自去调查，感觉中央解决河南问题触动了武汉军区的问题，触动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一来，武汉军区的盖子就揭开了。百万雄师一小撮头头的反革命面貌暴露以后，也就促进了同志们的了解和觉悟。在搞七·二三协议的时候，我问过同志们：你们河南方面有没有群众组织受蒙蔽？有没有一些群众组织支持百万雄师？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是有的，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纷纷到河南去不是偶然的，他觉得到那里可以捞到稻草。这个问题现在看的很清楚了，独立师背叛的人也有所觉悟，这可以帮助同志们认识这个问题。据武汉反映也好，我们知道的也好，你们河南十大总部有几个总部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这一点我们指出来了，希望你们做工作。你们在这里同大家一起反对百万雄师。但是，你们在家里有的还是支持百万雄师。河造总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确实你们有的组织支持百万雄师，你们河造总还派了专案调查团到武汉，六月十七日公开发表声明，这个声明被百万雄师到处翻印。（河造总：我们经过多次调查，根本没有派什么专案调查团）你们没有调查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千万要严肃对待，自己千万不要光听自己人的解释，你们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不然你们还会犯这个错误。当然，犯了这个错误也不要紧，还会改正嘛！（总理：是你们的专案调查团嘛！）没有，百万雄师不会到处翻印的，这个很清楚。（河造总：我

们发表了声明。）这个对的，是六月十七日发表的。（总理：是六月十七日。）百万雄师到处翻印，你们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你们能保证百分之百不犯错误吗？能保证百分之百同百万雄师没有关系？这一点不要去掩盖，而应当相反，有了缺点错误要揭开它，因为这个东西到处张贴，六月十七日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这一点你们要注意。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你们河造总支持何运洪，而何运洪就是陈再道、钟汉华在河南执行反动路线的代表，你们在思想上不可能不接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清楚，希望同志们很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很严肃的对待武汉反革命叛乱事件。正是这样，不管你们那一派都应当从武汉问题上得到教训。毛主席告诉我们：武汉一小撮人的叛乱行为可以使全国的解放军、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从中得到教育。现在武汉军区常委的一部分同志发表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在武汉都知道了，河南也传了去，我现在把这个公告和中央的批示告诉大家，（二七公社拿出河造总支持百万雄师的传单，说这是他们支持百万雄师传单）这个很多，支持百万雄师的传单到处张贴。

武汉军区党委的这个公告是前几天搞的，对问题说的还不是那样全面，但是基本方面说了，这个公告一共写了四条：（已发传单，略）中共中央对他们这个公告有一个批语，这个批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批语说：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十二时十分的来电并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第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第二，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组织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并且是要认真的改正错误，还要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康：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一方面给他们一条出路，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改正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同志们要看到，说他们做到三条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这就是说他们现在不是在革命行列，而是在反革命行列。对主席这个批示的精神要认真领会。只有不坚持错误，为广大群众所谅解，那个时候才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现在不是革命行列的人。）第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的人员，思想还不通的人，这些部队的人员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第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应该帮助他觉悟，不应该报复，不然为什么算革命左派？第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这是中央的批语，这个批语以及公告已经发到部队群众里边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现在独立师很多战士检讨了错误，同百万雄师划清了界限，广大群众纷纷退出百万雄师。当然，还有一小撮头头在那里挣扎，这是没有好结果的。恐怕这里边也会有人觉悟起来的。这种情况促使了我们河南问题的解决。同志们从报上可以看出，全国广大革命群众、解放军干部、战士一致声讨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叛乱行为。这一点，在七月二十三日，我向你们介绍情况以后，得到你们各派同志的赞成，一致反对这种叛乱行为，反对百万雄师，反对陈再道、钟汉华，并且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晓得，现在河南的问题还要同志们去努力解决。上次我讲过了，有些百万雄师从武汉派人到河南去，甚至退到河南去，四川产业军也到你们那里去了，荣复军、联动也到河南去。更重要的是河南的武斗还没有制止。象上次我讲过的新乡、开封、郑州、洛阳、平顶山，这方面你们还要努力，你们今天又签字达成了一个协议，这很好。我讲这一点你们应当想一想，七月二十三日为什么达成了协议，而河南军区没有表示态度？本来，那天晚上一方面你们群众方面对武汉事件政治上表示态度，另一方面，我想省军区也应该立刻表示态度。因为河南军区属于武

汉大军区直接管。可是那天晚上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那天晚上何运洪不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当然，他说他有病，也许有病，但是最近我们在军队干部会议上对他作了严厉的批评。在那样的关键时刻，在会上讨论那样的问题，他不参加我们的会议完全是错误的，打了陈再道他心里有点痛。（二七：他同陈再道勾结特别密切，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介绍百万雄师的人到河南活动，河南军区支左办公室给他们积极介绍很多地方，很多单位，一个介绍信上盖了十几个章子，这次我们在烟厂抓住百万雄师三百多人）郑州烟厂吗？（答：郑州烟厂，还搜出五十三枝枪，一百发子弹，还有省工人总部印发支持百万雄师的传单）（中学红卫兵总部：河南军区的确和武汉军区有联系）（河造总：我们要求作检讨）你们交上来好了。（河造总：我们五分钟就说完了，检讨全文略）我们欢迎你们这种自我批评精神，同意你们的检查，我相信二七公社的同志也会欢迎他们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好的，要求团结也是好的。二七公社的同志自己也检讨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大家要彼此互相努力，都作些自我批评。

总理：你们的检讨交联络员印一下。

河造总：向二七公社学习，向二七公社致敬！（二七公社鼓掌）。

省工总：我们要求作第二次检查。

康老：靠你们做工作。

河造总：我们揭发河南军区的问题：镇压二七公社、郑大联委，然后压河造总，支持十大总部，还造谣说刘建勋把军区声明支持河造总的话抹掉了。

康老：根本不是刘建勋同志的事，是何运洪开会时告诉我们要去掉的。

张树芝：你们不要相信这些造谣的话。

陈桂昌：不是军区说支持二七公社，而是中央支持二七公社。

河造总：我们五十多人是刚从家里新来的，我们揭发何运洪的问题。河造总代表团是何运洪精心挑选的，条件是反对二七公社铁杆，打倒刘建勋铁杆，刚才念那分检讨很早就送来了，他们代表团不上来。

康老：你是那个学校来的？

河造总：我是省直联合总部的。

康老：叫什么名字？

河造总：叫于文华。代表团一直欺骗我们，给我们传达说，中央说河造总和二七公社是造反派，没问题，他们对上对抗中央，对下欺骗群众。

省工总：（李通）我们现在再次作检查，略……。

康老：李通同志，你们工人总部责任很大，你们代表的责任是回去作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我们希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在这里达成的协议，履行在会上表态时所说的诺言。我们对你们这个态度是支持的，但是要知道，你们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回事，刘建勋同志亲自看到陈再道手里有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列了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下面还列了一些组织，他们总的是这样讲的，第一，十大总部是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第二，河造总是中间状态的组织；第三，二七公社是反动组织。这是陈再道、也是何运洪反映的，是他们定的，你们想想好了，这个事情刘建勋同志说一说。

刘建勋：四月二十三日主席批示请河南两派来北京汇报，并叫陈再道、钟汉华和我商量谈判问题。批示下来以后，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找陈再道、钟汉华。我到京西以后，陈再道说河南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河南军区直接向中央反映的，他当时提出让文敏生代表我。我说我自己代表我自己。他当时戴着眼镜看一个很长的东西，就是刚才康老讲的那个左中右组织名单。他不想叫我看，我这么一拿就从他手里拿过来了。他那个名单上写的左派是十大总部，中间派是郑工，因为那时我不知道有河造总，右派是二七公社。二七公社下边列了一百二十多个组织，包括郑大革联、开封八・二四，后来我问过军区许多同志，他们都说不知道，张树芝同志、陈桂昌同志也不知道，完全是何运洪少数人报告的。

康老：这一件事情要引起十大总部特别是工人总部的警惕，陈再道、钟汉华，在河南是军区里边何运洪、李善亭等人，他们主要是依靠十大总部。这一点，十大总部的人，特别是省工人总部的人，要告诉他们提高警惕，这是第一。

第二，你们十大总部、工人总部同百万雄师有关系，不是所有人，但是也不要否认有些人有联系，这一点也要使下边的人引起警惕。现在有些人已经警惕了，政治上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百万雄师坚决反对二七公社，你们过去也坚决反对二七公社，在思想上有共同基础，在某些问题上有联系。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同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划清界线，坚决反对他们，在这方面你们要注意做工作。

第三，我知道在郑州有些工人总部的人向农村撤退，这个方向不大妙，现在已经有些厂子停产了，这一点应该向他们解释，他们没有责任，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要给他们开脱，不是他们的责任，希望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一散布到农村，就可能走错了路，同时，长期在外边，对生产不利，对自己的家庭也不利，很多家庭也劝他们回来。这一点二七公社要保证不报复。他们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李通同志代表省工人总部，你们的责任很重大。 我们相信你完成这个工作。在你检讨以后，我特别提醒你注意。产业军、百万雄师在向你们方面伸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李通：我们一定要遵循你的教导，认真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你上次指示以后，我给总部打了电话，可是在省直机关造总普通一兵二十二日的造谣传单的影响下贴了支持百万雄师的大字标语，上了他们的当。晚行动一天。二十三日我们发了反对百万雄师的声明。）在这方面二七公社的同志不要歧视他们，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二七：坚决按照康老的指示办事。我们有些基层组织可能出现一些偏差，我们一天给家里打三次电话，要他们注意。）一些过激是有的。中央会议完了以后，二七公社可能犯错误，骄傲了，翘尾巴了，觉得自己完全对，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二七：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现在有些坏人假借我们的名义办坏事，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定要把他查出来。）嗯，对。有的人说你们抢了公共汽车。（二七：有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被围，没有交通工具支援，搞了几辆公共汽车，现在已经全部退回去了。）不仅二七公社，也有其他坏人假借十大总部工人的名义，

河造总的名义办坏事，加在他们的身上。

河造总：我们没有派专案调查团去武汉。

康老：这一点你回去调查调查，不要下结论这样早。市工人总部那一位是代表？（市工总：是王林，他回去了）他的思想通了没有？我有点担心。他的思想没有通，对百万雄师他不表态，我注意到了，你们工总要注意，要做工作。

李通：我们有个请求，我们的代表沙发来回去做工作，被二七公社抓了。

二七：他参加武斗，在粮院被抓。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应当抓他，我们发现以后就把他放了。

康老：再复查一下，看放了没有？所有代表都不能随便抓。陈桂昌同志回去后，十大总部、河造总围攻他，他是军区副司令员，是左派，你们的人围攻他，搞了几天。

陈桂昌：围了二个晚上。

康老：今天还来了一个同焦裕禄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叫张钦礼。哪个是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张钦礼同志站起来）

康生（亲切地）问：张钦礼同志，你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张钦礼：七月二十八日。

康老：又在什么地方？谁抓的？

总理：是人武部还是军分区？

张钦礼：兰考，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副司令员李地山带部队抓我的。

康生（气愤地)：陈久安、李地山来了没有？站起来叫大家看看你们是什么样子。

（陈久安狼狈地站起来。李地山未来京。）

张钦礼（责问陈久安)：你不是说逮捕我是中央批准的吗？

陈久安（吞吞吐吐的)：是，是，是省军区批的。

康生（严厉地)：何运洪站起来！

（何运洪惊恐万状地站起来）

康生（严厉地)：是你们批过的吗？

何运洪（吞吞吐吐地）：是，是武汉军区陈再道批的。

（二七公社代表愤怒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打倒王任重！打倒钟汉华！打倒何运洪！打倒李善亭！打倒陈久安！打倒李地山！

张钦礼（控诉）：你们上欺中央，下压群众……陈久安：张赖兴、张孔照等同志死因不明，你必须交待清楚。

（陈久安吞吞吐吐，哼哼唧唧，张口结舌，无言对答。二七公社代表愤怒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张钦礼：现在兰考监狱还有凤鸣同志没有放，陈久安，你说怎么办？

陈久安：今晚我打电话就放她。

康生：根据张钦礼同志说的情况，陈久安在兰考搞的白色恐怖，这不是孤立的，各军分区要很好检查，文化革命中逮捕的人应该统统放出来！

（总理站起来重复了康生同志的话。）

康老：你们开封要特别注意，抓了很多八·二四的学生。

二七：直到现在还关有三十多个二七战士。

总理：在什么监狱？（二七：郑州法院街监狱）

康老：魏家祯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卫戍区司令部的负责人。

魏家祯：不知道。

康老：你们要好好检查一下，马上打电话回去，确实有要放出来。

刘建勋：属谁管？（魏家祯：属军区，人武部只十几个人）

总理：康老已经说了，今天晚上请张树芝、陈桂昌同志负责召集会议，今天一定查清楚，抓人没有放的，一定在明天十二点前放了，并且把名字报来！

康老：徐文礼你要把开封检查一下，打电话回去问一下，看八·二四还有没有人被押，有，要放了。

总理：军区、军分区都要查一下。你们传达了几次协议，你们响应康老、伯达、江青同志的号召，这是好的，但是必须监督执行。你们还要监督军区、军分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首先要求河南军区经过加强以后，要负起责来，在今天晚上开始表现出来改正错误。改

正错误有的真正改，有的表面改，实际不改。他们要表现的。军区同志多次开会，光说不行，要行动，经过群众揭发，改正错误。监狱有人的，不管公开还是秘密，二七也好，其他也好，群众也好，都要放了，因为文化革命而被逮捕的应该放出来，有错误可以教育，有的是被冤枉了。这是一件事，要表现，通过群众组织，看是不是这样作了，包括野战军、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包括在内，都要表现，都要查一查。

其次，过去曾经发了一些枪，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保守组织，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应该由军区、军分区、野战军负责收回来，封存起来，这也是一个考验。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

第三，刚才十大总部的部分组织省、市工人总部、河造总的代表团作了检查，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这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行动上，不仅犯严重错误，就是一般群众犯错误，也要在行动上改正，我们要教育他，帮助他，比如不离开工作岗位，不停产，不停业，不停交通，现在要回到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上去。从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上表现。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组织要欢迎他们回来。他们愿回来生产，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停产、停业、停交通不行，要有实际表现。你们的宣言是口头的，毛主席说我们要作实际革命家，要从行动上表现。现在凡是回到工厂，不进行武斗，埋头生产，表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造反派应该欢迎，允许他们从行动上改正错误，不要对立，弄得大家不敢回来。现在有些坏组织中极少数人甚至一些军事方面的人，煽动工人离开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到农村中去到处流浪，制造事件，这是错上加错。我们发现在百万雄师中就有这种情形，把工人搞散，十大总部也有这种现象。这需要双方作工作，犯有错误的回到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方面来表现，造反派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把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商店搞好，才能共同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考验，左派更坚强，犯了错误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他们的坏头头还是依靠他们来揭。比如河造总、十大总部也有这样的坏头头，也要他们组织中的群众起来揭发，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来，那样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通过群众来证明。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要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那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一点，陈再道那样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最彻底。百万雄师好象了不起，实际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曾经犯了错误，不要去辩护，你们河造总不但有声明，而且还有报纸，要坚决承认，认真改正，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错误是这样，头头的错误就要看，从实践中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改正错误。

你们达成的协议，要认真贯彻执行，不管谁，群众都看得很清楚。

军区要有集体领导。对他们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交给他们，不要满地贴大字报。

中学红卫兵总部：现在郑州打伤人很多，没有医生医疗。

总理：军区有几个医院？

二七：现在医生参加保守组织的比较多，都不工作了，二七受伤的人很多，他们反映的情况有，但问题究竟在那里？

总理：就是我刚才讲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散掉。军队检查一下，如果医生散了，我给军队同志商量一下。

郑大战斗师：省直机关造总和军区、郑州卫戍区司令部策划建立一个河南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

康老：对，有这回事。

战斗师：联合起来反对二七公社。

康老：是这样，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目的是在中央会议没有开完以前，把二七公社打垮。另外压迫军区，不让他改正错误，这个联合司令部有十大总部参加，也有河造总一部分组织参加。

河造总：我们没有组织参加。

康老：丁石在不在？有人告诉我与你有关系。

丁石：与我没有关系。

战斗师：省直机关造总在北京表现不好，公开对抗中央。戚本禹同志六月二十八日接见三方代表以后，表现更坏。

康老：有没有那个张治安？

战斗师：有。

康老：那个人我一看就象个地主。

战斗师：张治安把几个总部召集在一起，研究对策，他说中央分别接见是设下的圈套。

康老：这个人我注意到了，他在会上还出主意。

战斗师：三月太康、密县公安部门拿着逮捕证到郑大逮捕郑大革联的学生，公安厅登记站、军区都不表示态度，推给我们郑大战斗师。问我们同意不同意？说我们同意就抓。

康老：信阳炮校讲，红色造反团战士朱振华、李志军，还有红色造反团观点的张义民、陈金辉、袁延年等五个人直到现在还在信阳市监狱里押着，这都是解放军，信阳军分区张波：

有没有这个事情？

张波：我们给武汉军区打了电话，他们没有答复。

总理：人在什么地方押着？

张波：在信阳。

总理：归你管嘛！要马上放，不要再问武汉军区了。

（张钦礼几次发言被郑大战斗师、中学红卫兵总部打断，总理离座单独同张钦礼到外边会客室谈话。谈完话张回到会议室。）

铁军：省直机关造总策划搞河南百万雄师不是一天了，他们的头头是总工会的杨全智。

康老：李通同志你认识不认识？

李通：认识，我对他有抵制。

张钦礼：我二月二十六日被捕，七月二十八日释放，在监狱过了五个多月。在监狱中，陈久安、李地山对我进行了残无人道的迫害。

康老：陈久安来了没有？站起来让大家看看。

（二七：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打倒王任重，打倒钟汉华，打倒何运洪，打倒李善亭，打倒陈久安，打倒李地山。）

张钦礼：陈久安、李地山说逮捕林场一百人是经过谢副总理批准的。

刘建勋：陈久安，到底是什么人批准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搞的，为什么不说实话？

陈久安：他们说是经过批准的。

康老：是不是造谣说经过中央批准的。

陈久安：我不在那里。是公安局搞的。

刘建勋：什么公安局搞的，公安局是受你操纵的。

康老：同志们，各军分区的问题很多，开封八•二四、新乡八•一八，以及洛阳八•一六等，有很多同志，有很多意见，对那里军分区的支左有很多意见，认为他们有很多错误。这些问题我已经在军队干部会议上都讲过了。比如象新乡军分区的李国秀，在支左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开封、洛阳军分区也存在很多问题，同志们有很多意见。我讲两点建议，第一，各分区、各县的问题，中央批准刘建勋同志回去，由刘建勋同志一个分区一个分区、一个问

题一个问题的解决。第二，军队干部正在开会，军分区的负责人都在，我建议各个分区由各地造反派留下一、二个同志，作为代表，参加军队干部会议，开封、新乡、洛阳、兰考的问题，在会议上可以尽量的实事求是讲出来，尽量揭发，帮助各个分区的同志们检讨错误。其他代表同志没有意见就可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有意见可以留下，这样可以使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大家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因此，开封、新乡、洛阳的问题今天就不讲了。

现在我讲几个问题。

一、有这样一个问题要戴苏理回答。有个报告说，戴苏理打电话到河南，告诉河造总，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慌，要表面上承认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组织，但是在基层要否定它是造反派，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目前要稳住阵脚，要表面上贴出大字报和二七公社联合。你不是这样向河造总指示过？（戴苏理：我根本没有打过电话）你打过什么电话吧！？（戴苏理：我打过二、三次电话，但没有讲过这个话。）你声明没有可以调查。不过戴苏理你要注意，在中央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代表河造总，你怎么打电话？你以为河造总就是你的？（戴苏理：不是，我是帮助。）你就是两面摇，我在上次批评过你，我也提醒过你，你这个毛病要经常改正，不要玩两面手段。当然，我们是这样看，戴苏理同文敏生、赵文甫的问题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就不讲了，我说你可以讲讲嘛！你要采取老实态度。请注意这个问题。对待群众组织要积极帮助他们，如果你支持他们，就更要注意他的缺点，帮助他改正错误，带他向好的方向走，必须是这样。

二、本来张树芝、徐文礼也要检查，因为时间关系，他们都写了检讨不讲了，将来把检查印出来，交给大家看。八·二四讲到一军有许多错误，特别是赵静生，有很多错误，这个问题要在军队干部会议上好好加以检讨。

三、中央对河南问题已经有个批示，同志们已经看到了，新来没有看到的同志，可以发给他们看一看，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中央在批示中讲，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河南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因此，中央除了派刘建勋同志回去以外，军区干部要加以改组，这一点同志们放心好了（二七战士高呼口号），中央已经决定调王新同志去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工作。有的同志问何运洪怎么样？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何运洪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你们通过后报告中央。对刘建勋同志，中央批示中也讲到了，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这个批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现在河南军区党委发了检查报告，一军也有一个检讨报告，这方面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的确象总理讲的，群众还要监督，看他犯的错误是不是真正改正了。

要帮助军区以及一军改正错误。上次我讲过了，他们认真改正错误，我们要相信他能够改正错误。只要改正了错误，广大群众一定会热烈拥护解放军的。何运洪等人不能真正代

表解放军，我们相信群众能够支持和欢迎军区改正错误。这一点我再三讲，同志们不要给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不改正错误。有这种苗头。有些人还要硬说他过去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这样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利的，尤其是在武汉地区，陈再道问题被揭出来以后，同志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过去何运洪等人长期的顽固的拒绝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现在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希望军区坚决改正错误，群众要帮助他改正错误，坚决反对口头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坚持错误，坚决反对不支持他改正错误，给他施加压力使他不改正错误。

在我们这次会议上，几个组织达成了三个协议，这很好了，但是这还要在实践中实践，从文字上达成协议，到实践贯彻执行，这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同志们要言行一致。二七公社平反了，中央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了。他们反对何运洪、反对军区的错误路线是对的，这是好的。但是，正象在会议期间二七公社同志讲的，不要在中央会议以后就骄傲了，翘起尾巴了，刚才二七公社的同志也讲了，的确有些组织有些不纯，特别是要注意掌握政策，决不搞报复，还要做工作，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这一点你们代表要紧紧掌握。有的组织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同他们团结在一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不要讽刺歧视，要好好实行团结。当然中间也要经过一些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就是毛主席讲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一点二七公社的同志要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不要在这方面犯错误，不要背包袱。要帮助“百万雄师”，帮助何运洪，帮助支持何运洪的人，这方面千万警惕，而党言川同志尤其需要注意。你这个人躁得很厉害。你有革命热情，但是不注意政策，要学习林副主席讲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你科学性很不够，要反复考虑问题，不要冲动。我今天还和刘建勋同志讲，要他好好同你谈一谈。要善于掌握政策。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很担心下一次再犯错误。二七公社可能要犯错误，因为各个地方常常是这样，中央支持一下，自己骄傲起来了，不讲政策，打击报复，结果自己犯了错误。我看了你们各个组织，虽然观点不同，但是你们的思想方法有共同点，二七也好，河造总也好，十大总部也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辩证法太少，不会反复考虑问题，我向你们介绍过浙江红暴会翁仙鹤同志。省联总把红暴会打了，翁仙鹤同志也挨了打，但他坚持大方向，坚持团结，批评红暴会的缺点。他是红暴会的赴京代表，因为这样一个观点，红暴会认为他右倾，把他从代表团开除了。开除后他还是坚持大方向。我同红暴会的同志讲，不应该开除他。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遭到打击还坚持大方向，得到平反更要掌握政策。在这方面，二七公社要兢兢业业，才能把革命的大联合搞起来，才能团结好。

还有一条要注意，就是当着他受压迫的时候，自己团结在一起，当着平反，不受压迫的时候，就打“内战”。你们一定要注意。我现在告诉你们，武汉三新、三钢也发生了这个问题，因为百万雄师打下去了。我们找他们双方谈了，双方都作了自我批评，作了检讨。这方面你们也要注意。

河造总犯了一些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得到了教训，并不因为犯错误就把整个工作都否定了，我们也不是这样。不过的确你们需要有自我批评，有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团结。我讲这个问题请你们注意。你们是青年，是革命小将，决不能玩这样的手段，表面上承认二七公社，是为了巩固阵脚，巩固组织，把阵脚、组织巩固起来，又会发生变化，那就不好了。（河造总：我们决不能这样想，支持二七公社也等于支持我们。）你们今天晚上的检讨是好的，但我还要说一下，你们不但在这里检讨，在家里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缺点，也要检讨。今天河造总作自我批评，我很高兴，在整个会议中，我感觉你们自我批评不够，你们常常解释问题多，自我批评不够。上次新乡有个李玉坤，他的自我批评太少，解释太多，说的太多，

做的太少，这是你严重的缺点，你自己要好好检讨。你不敢对自己的错误势如破竹，这是你的很大的错误，我希望你不要再解释了，你要拿行动来证明。总而言之，我觉得自我批评这是最重要的，这对你们有很大好处，是很大教训。

十大总部李通同志的讲话我是赞成的，但是你们自我批评不够，你们是工人总部，在这方面应该作的更好一些。这一点请你们注意，我已经听到你讲的那个话里面还有话，你们对二七公社还有一些小嘀咕，这一点更要注意。革命群众组织有错误改正了就好了，尤其是革命组织。我入党以后长期在上海做工人工运工作，我懂得工人的品质，他们无产阶级本质是好的。从武汉事件可以得到一个教训，你们千万不要轻信许多谣言，首先从陈再道反革命叛乱中得到教训。他们有一个口号说是中央文革只是要知识分子、要学生，不要工人、不要农民，这次在京西宾馆批判他的时候，他自己还讲："我是个老粗，我也不大认识字。"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他是劳动人民出身。"百万雄师"也是这样，说中央文革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工人。四川产业军也是这样讲。他们想利用这个来离间工人阶级同我们党的关系，工人阶级同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阴谋。实际上真正不要工人，不要农民的不是党中央，不是毛主席，不是中央文革，而恰恰是这些反革命分子。他们欺骗工人、农民，引导他们犯错误，煽动他们参加反革命暴乱。因此，我前天晚上问陈再道，陈再道假装他是不认识字的老粗，想说明他是劳动人民。我问大家陈再道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众答：不能。）不能。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工人、农民的叛徒，不能代表劳动人民，这一点希望河南省，市工人总部的同志，千万要注意，不要上这个当。不然，工人、农民就会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这是一个教训。

反对文化革命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党中央，诬蔑毛主席，诬蔑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解放军，他们甚至于很狂妄地问我们，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就回家种地去。同志们，千万不要受这样的挑拨，这样的欺骗。谁不要解放军呢？真正爱护、信任、依靠解放军的恰恰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象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牛怀龙、蔡炳臣才是真正不要解放军，他们把独立师的有些干部煽动起来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们是要破坏解放军的声誉，瓦解解放军的组织。同志们想一想，象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他们能不能代表解放军？（众答：不能）不能。他们是解放军的败类。这一点同志们要注意，要警惕。凡是煽动部队对抗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才是真正破坏我们的解放军。这一点是一个很大教训。刚才讲的何运洪、开封军区的陈久安实行的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是真正支持解放军，还是破坏解放军？是破坏解放军。新乡李国秀，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还枪毙一个工人，他能代表解放军吗？不能。按照他们的路线，是破坏解放军的威信。

有些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说，文化革命不要党了。同志们，要想一想，千万不要轻信这样的污蔑，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亲自领导的，怎么会不要党的领导呢？我们不要刘、邓黑党的领导，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想象以前那样要刘、邓黑党的领导。那个党不能领导。（二七：高呼口号）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人污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恰恰是要复辟刘、邓路线，想让刘、邓的党来领导。同志们想一想，武汉军区的政委是王任重，被打倒了，以后陈再道是第二书记，实际是第一书记，钟汉华是第三书记，实际是第二书记。我们要不要陈再道、钟汉华的党领导？（众答：不要！）我们应当得到一个教训。

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小组专门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实际上恰恰是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最关心老干部。老干部是宝贵的财富，要保护他们，但是，离开马列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阶级路线，笼笼统统地讲要不要老干部，那不行。刘少奇算不算老干部？邓小平算不算老干部？陈再道算不算老干部？钟汉华算不算老干部？（众答：是老反革命）他们不能代表我们的老干部，是老反革命。说那样话的人，就是要那些人在我们党内当权，这样恰恰是他们不要老干部，是对老干部的污蔑。老干部应该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如果象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是相反的。这一点同志们应该注意，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所以我们说武汉问题使我们取得了教训。从这些重大问题上看，取得了教训，就对我们解决河南的问题有好处，因为，河南还没有发生象武汉那样绑架王力同志、毒打谢富治同志，还没有发生那样的反革命叛乱，但是有些问题是相同的，陈再道、钟汉华他靠什么呢？第一，煽动独立师；第二，利用公检法；第三，利用分区武装部；第四，利用省直机关保守组织。这样去煽动蒙蔽一些群众、工人、干部的。同志们，仅仅是百万雄师搞不起来那样的叛乱的。河南何运洪一直在军区煽动镇压革命造反派组织，利用公、检、法大量逮捕人，到底逮捕多少，何运洪说一千多人，实际上在一万人以上，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忠实的交待，何运洪就是利用这些东西。何运洪自己就是搞公安工作的，在彭德怀保卫部作特派员，文敏生也是作公安工作的，赵文甫是领导公安工作的，省委机关的丁石也是作公安工作的，他们利用公安总部在郑州大量捕人，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使用法西斯手段，刚才张钦礼讲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而是很多，他们利用这个东西，同样在河南支持某些犯错误的军分区、人武部，这一点应当说河南比湖北还厉害。湖北只是在武汉三镇搞的比较厉害，其他军分区才开始搞，河南的军分区存在严重问题，开封、新乡、洛阳、信阳都有问题，刚才张钦礼讲的是一个例子，在这方面有些人犯的罪恶是很大的，上次我不是讲过吗？百万雄师用吊车推房子，河南新乡、洛阳、郑州、平顶山也都有嘛，这就是白色恐怖。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军分区都不好，犯错误的军分区也不是所有的同志都不好，但是，必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就是利用军分区、人武部作坏事，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直到现在有些军分区的同志还不愿意真正检讨，不愿意把他们的错误彻底揭露出来，我希望他们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有了错误，坚决改正，这是我们解放军最好的一种品质。犯错误有时候是难免的，但是要认真改正，我相信多数同志能够作到这些。他们今天应该脱裤子，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解决河南的问题。

武汉军区利用省、市委机关保守组织，河南怎么样呢？很清楚，何运洪就是和省直机关有些人勾结，供给他消息，供给他观点。所以赵文甫、杨蔚屏写信给何运洪，何很高兴。煽动军区，利用公、检、法，支持军分区、人武部，利用省直很多保守组织等，武汉军区的一套，何运洪都拿到河南来了，所不同的，是没有绑架谢富治、王力同志，但是，如果前几天我和戚本禹同志到郑州去，到底会怎么样呢？我看也逃不脱。所以要从这些地方得一些有益的教训。

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好。有的同志提议，是不是给每个代表发一个毛主席像章，这个意见是很好的，但是，你们明天走来不及了，我想了一个办法按人数配备，交给刘建勋同志，由他发给大家。（刘建勋：好，由我发。）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如果代表在这里讲的很好，回去不执行，那就不发。

河造总：戚本禹同志说，我们河造总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现在还可不可以这样讲？

二七：戚本禹同志根本没有这样讲过。

康老：你不要听人家说，你自己表现嘛。单独接见的问题，请同志原谅一下，我们没有时间。事实上你们的问题我在会上都讲了，如果你们有特殊问题，可以把材料交给我们。

十大总部：二七公社要保证我们代表的安全，不要抓我们的人。

康老：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比较清楚了，我再三交待不能打击报复嘛，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批示中也讲了，当然，个别地方发生这样的问题，要彼此做工作，不要发生一件事情，就互相攻击起来了。你们要彼此相信，做工作，有些要作相当艰苦的工作。有些问题不是开一个会议就能完全解决的，你们已经签了二次协议了，今天晚上又签一个，你们签好以后交给我们的联络员。二七公社和你们共同签字，如果是反动组织怎么会共同签订协议呢？白纸黑字都在嘛，如果是反动组织，叫我签字我是不签的。今天晚上，把抓的人统统放掉，彼此都放，当然，也可能明天你那个组织被抓一个，他那个组织被抓一个，但是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破坏协议。现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更重要的事情还是你们根据中央的路线去执行。中央已经有了指示嘛，如果你们相信中央的指示，就坚决执行，违背就不对嘛。

铁军：我们保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造军区的反，打倒陈再道，永远忠于毛主席。

二七公社、八·二四：中央批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对河南革命造反派的最大关怀，将把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坚决按照中央批示办事，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决不搞打击报复。

康老：再见吧！同志们，将来我到河南去，不要把我抓起来。

二七公社代表高呼口号，河造总、十大总部也高呼口号。（略）

周恩来接见河南省兰考县张钦礼焦守凤谈话纪要 1967.07.30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夜；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外边会议室。〗

（中央首长处理河南问题的第八次汇报会议开始，刘建勋同志热情地向张钦礼同志招手，张钦礼走到刘建勋同志跟前，刘建勋同志让张钦礼同志坐在杨成武同志的席位上。当时杨成武同志不在首长席 ）

刘建勋（关心地）：听说你的手指被打断了。

张钦礼：是的。

刘建勋（对总理和张钦礼），控诉他！

（总理点了点头，张钦礼同志回到原席位上）

（会议中张钦礼同志讲话时，未讲完就被郑大战斗师、中学红卫兵总部插话打断。张坐下。停了一会，总理走到张钦礼同志面前和张亲切握手，随即拉着张的手走到休息室，同坐在一张沙发上。室内有戚本禹，杨成武等同志。这时，刘建勋同志带焦守凤同志进来。）

刘建勋（给首长介绍）：这是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凤。

（总理站起来和焦守凤同志握手，并让她在张钦礼同志旁边坐下。）

周总理（关切地问张）：你什么时间到北京？

（张因耳朵被打坏，未听见。）

焦守凤：他的耳朵被打坏了。

周总理：你给他当翻译。

周总理（问张）：你什么时候被抓起来的？

张钦礼：2 月 26 日夜 4 点被抓。

周总理：他们什么时候将你放出来的。

张钦礼：七月二十八日晨三点。七点由解放军同志送我到北京毛主席身边的。

周总理（关切地）：兰考逮捕了多少人？都是什么人？你在那个监狱押着？

张钦礼：我在兰考监狱押着，兰考监狱押了二百多人；听说杞县、开封、东明等地也押有兰考的人；兰考大概逮捕一千多人，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被捕和外界隔绝了。

周总理：他们抓的都是什么人？

张钦礼：有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

周总理（生气地）：在监狱里他们怎样对待你？

张钦礼：脚上带脚镣，手上带手铐，胳膊上绑绳子，绳子捆得很紧，捆得胳膊都出血了。最毒辣的是制造内伤，用折骨残刑。（张钦礼同志一面说着，一面伸出两个被折的指头。周总理无限关怀地抚摸了它。）

周总理（对旁边一个工作人员）：你对联络员说，找个医生给他（用手指张）检查治疗。

（总理联络员谢××上前问张的住处，并记下来了。）

周总理（气愤地）是谁抓你的？你在监狱里押了多少时间？

张钦礼：在监狱押了一百五十六天。逮捕我时是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副司令员李地山带部队抓的。（周总理记下李地山的姓名）

周总理：开封军分区有人支持你们吗？

张钦礼：在提审我时看来，开封军（分）区的杨司令员和徐副司令员是同情我们的，兰考中队中一部分战士是同情我们的。

周总理：对他们，你们要区别对待。（并嘱咐张钦礼和焦守凤两同志）回去，你们要艰苦奋战。

戚本禹：（问焦守凤）你妈妈来了没有？你还和她吵架吗？

焦守凤：她回去了，我没跟她吵架。

总理：好好作你妈妈和妹妹的工作，她们会明白过来的。

焦守凤：我一定照总理指示去做。（接见到此结束）

总理和张、焦二同志握手告别，张、焦二同志又走进双方汇报会议室。

何运洪是残酷迫害兰考革命派的罪魁祸首 1967.08.03

--张钦礼同志在首都革命派欢送河南造反派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的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怯儒！"

我代表焦裕禄同志的一家，代表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和革命造反派，向首都革命造反派表示感谢！

兰考县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兰考县人民最大的关怀和鼓励。我们兰考县人民要保卫焦裕禄同志这面旗帜。

开封地委、兰考县委、河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联合起来，

却压迫革命造反派。自去年七月开始，八、九、十月这一段时间，他们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大量工作队到兰考县，把造反派压下去，围攻革命的领导干部。兰考的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斗争，于十一、十二月又把保守派压下去，由少数变成了多数，到元月，形势很好，我们就研究夺权。

一月二十三日夺权，进行得很顺利，把大印夺过来了，但是党、政、财权没拿到，只拿到一个木疙瘩，并没有实权。那时我们经济很困难，我们一年多只花了七毛二分钱。写标语没有墨就到煤场去找煤面来刷标语。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就这样干了一段。武装部反说我们是“反革命暴动”，是“修正主义”，是“打、砸、抢”等。

一月二十五日宣布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武装部与军区是一个态度。我们造反派开了会，商议了，都认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天不怕，地不怕。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我们分为三线，一线在县城里，跟他们干，他们可能抓我们，拷我们，第二线在城外，第三线在农村。这样就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不然被他们一网打尽就不好办了。我们统一了思想，宜早不宜迟，马上行动，按计划办。二十七日夜散开的，二十八日晚陈再道、何运洪从开封派部队把县城包围了，来了三连人，老保带头逮捕革命派。二十九日把第一线全部逮捕了。我们又开会商议，派代表去向他们讲明情况，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育权，你们还没有停住脚就这样抓人是不对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依法逮捕，其余不逮捕。毛主席说部队要支左，要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我们派代表去交涉：一、放人；二、打伤的给予治疗；三、赔礼道歉。他们派人来，说“你们是反革命暴动，我们是镇压反革命”。不理，怎么办?就干吧!我们一万多人把他们三连人包围了两天，没吃没睡，还把他们的司令抓起来，游街示众，他们开卡车向外冲，我们人多，把车推得向后退，吉普车被抬起来，走不了。我们问司令员：“你来干什么?”他说：“支左的”。问：“谁是左派？”他说“不知道”。又问他“为什么要抓人?”他说是“执行任务”。再问他为什么要抓人，他说：“我们是军人，来执行任务的”。我想，如果战士不知道，还没什么，司令部不知道，问题就严重了，一直干了两天两夜。我们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给他们送饭来，向他们说：“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子弟，你们当了兵，枪口不应对着阶级兄弟，对着贫下中农！”有的士兵都落了泪，把武器放下了，就这样对峙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增了兵，就又捕人，我们又斗争，他们又失败了。有些人害怕了，不干了，说这是解放军，不同于保守派呀！人慢慢不如以前多了。我同革命派同志商量，我问他们“前途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前途很光明，但要走一段曲折的道路，坚持就是胜利！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这是一条坚持的道路，有的人说投降吧!还有人说，上北京告状，就这么三条办法，我决定坚持。保守派和部队对全县大包围，我们就反包围，搞游击战术，他们缩小包围圈寓我们就跳到外面去，这样周旋了二十六天。他们说，张钦礼过去打过游击，主意多，他们造谣言，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要通辑，说见了张钦礼，开枪打死，要死的不要活的。二月二十日来了一次大逮捕，这次没有抗住，前后捕了一千二百人，把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小服务员都逮捕了，就剩我们几个没捕着。我们想跳出包围圈，跑到北京去告状，但车站上就有通辑令，还有象片，有几百里的封锁线，我在兰考二十年，好多人认识我，不敢去车站。后来留了少数人坚持斗争，其它几个骑自行车到杞县，才到不久就被包围了。当地的同志说，包围了，不象你们的人，我们研究后，有几个人假装向东北方向的大沟冲，大喊大叫，把他们吸引过去，这几个人都被捕了，我们往西南冲，冲击了第一圈。冲出后，麻痹了，走不动了，喘气了，我说话了，第二包围圈没能出去，被公、检、法的头头，一个副县长听到了，他说好象是张钦礼在说话，又把我们包围了。我说不要开枪，于是被捕了，捆起来，出来还看到第三道包围圈，有三卡车全付武装的

解放军，一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为了我们几个人，出动这样大的队伍，如临大敌。他们胆小如鼠，不敢走兰考县境，怕群众抢。绕道转了一夜，直到天明才进了县城，把我们关进监狱，和抓反革命一样，把手指扭断了，手臂扭坏，嘴被磕破、牙也磕掉一块，监狱里挤得不得了，只看到都是人的脸。我们二月二十六日被捕，二十七日进监狱，二十八日上午开始审讯。政委象旧县官审案一样，摆了一张桌子，后而放了个椅子坐在那里，两侧是手持冲锋枪的战士，还上了刺刀，他大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钦礼跪下！"我说："不能跪，文化大革命扫四旧，跪是四旧，我不能跪下！"他又要我低头，我说："不能低头，低头说话不方便。毛主席说共产党员不能低下高贵的头。"他就拳打脚踢了一阵，要我交待，我说没有什么交待的，就是要造反。他要我交出后台老板，还说"你的后台老板是刘建勋。"我说刘建勋过去我见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根本没见过他。他问我还有没有比刘建勋更大的后台，我说："有！我的后台是毛主席"，他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满口出血。他说："不许你侮辱毛主席，不许你胡说。"我还是不交待，他就给我带刑具，给我砸上八斤半重的脚镣。他说："你交待！"我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刑具，你都拿来吧！"他又给带上手铐，别人的手铐在前面，我铐在后面，还说是"优待"，手朝后，这样不能吃饭。我说："饭是要吃的，不吃要饿死。"我还不交待，他们又用绳子把我身上缠紧，我说："越看你们越不象毛主席的军队，不象左派，你们不讲理。"一天没问出口供，又下了狱，这是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又开始审讯了。是公安局长亲自到监狱去的。他说："今天叫你游街示众。你答应了，和和善善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讲话。我说："我也有要求，三条：1．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任何人不准动，要衣冠整齐见群众；2．去掉刑具；3．自由演讲。"他说："第一、二条可以，第三条不能答应。"我说："既然不行，协议不成，那就各行其事吧!"他们还是有办法，有八个彪形大汉，两个人一班，把我拉出去，一路上把头按下去，拉上来，再按下去，再拉上来，弄得我昏过去了，没有说话的能力了。监狱里人很多，就象这个礼堂一样，一个挨一个。

3 月 2 日监狱放风了，房顶上架着机关枪，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在监狱门口，我见到了对面 8 号牢房的一个老同志，他是一个志愿军的炮兵师长，52 岁了，他们说他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刘师长带了手铐，说他们是报复，大喊大叫大骂:"你们是法西斯！狗官站出来！老子要抽烟，老子要喝水！"我喊着向刘师长敬礼。他用铐着的双手给我鼓掌欢迎。看监房的人不愿意了，从七号牢房出来了几个人，他们就拧我胳膊，按我的头，屁股都坐到脸上了，全身骨头发响。我的腿被打伤了，不能走，就爬在栏杆上向下看。狱中人有三种表现：老革命都大骂，工人不吭气、学生和青年叫喊。我就读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怯懦。"最后这一句，把他们弄恼了，上来两个拿刺刀的战士向我逼来。我往前凑了一下，他们往旁边让开了，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刺我?"他们说："不让你读语录。"我说："你们是不是毛主席的兵?"他们说："是。"我说："那为什么不让读毛主席语录?"他们说："叫你小声点你就小声点。"我说："声带是我的，我愿意念多高就多高。"刘师长说：”你们是法西斯！白色恐怖！狗官站出来！"他们走过去问刘师长："你凭什么不怕死?"刘师长说："我凭的是毛泽东思想！凭我这条老命！"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唉！唉！地叹气。

4 月 25 日用汽车拉着我们三个人去游乡，头上戴着纸帽，插着白旗，开 4000 余人的斗争会。他们喊口号，群众不举手，我对旁边的同志说""你看，我们还有群众呢！"有一个人包了六个纸包递给我说："要肃清你的'流毒'，这是你的'流毒'，给你！"打开一看，里面包着六个熟鸡蛋。都被他们打掉了，以后就再也不敢让我们游街了。在狱中审了我 53 次，

上刑 27 次。有的年轻人反抗得厉害，上刑更重，手铐、脚镣吊起来一夜不放下来。最厉害的是把人装在麻袋里，封上口，骨头都挤碎了，九个人装了麻袋，8 个人昏死过去了，到第二天才醒过来。这不是什么新发明，这是蒋介石 4.12 大屠杀时用的刑法。

我住的牢房里是两个人，其他房子里都是上百人。同住的人姓白，作了工作以后，他说是派他来监视我的，他们给他两个条件：1，不要同我讲话；2，不要让我死了。做了可以减轻或不判罪。

十六个解放军，分两个班看守我们，有的解放军端着枪，上了刺刀，脸色很难看，我们就不理他。有的问我们吃不吃得饱，受不受得了。我们就向他作工作，说这是小小的代价，我们国家要摸反修、防修的经验。全世界都看着中国，我们要扛起反修反帝大旗。你们都是贫人出身，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能忘本。这样就慢慢的熟起来了。经过 50 多天的工作，在 16 个解放军里，5 个人同意我们的观点，其中三个人可以让我们坐下，躺一躺，在牢房里走一走。两个班长白天收集造反派及军内的情况，讲给我们听。七月一日送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张毛主席象。我站在牢房的里侧，为的是不被他们发现。一个班长说："有希望了，听说二七公社与保守派在京谈判，中央表态了，中央支持你们。说军区支左支了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这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人背着我们说的，被我们听见了。"我们七一在监狱里对着毛主席象宣誓："前半辈子跟毛主席闹革命，后半辈子一定听毛主席的话。"

7 月 2 日狱中的炊事员老王送的馍里夹了一张条子，写道：据说中央决定放人。下面写着"新华"两字。这是我们新华书店一个组织的代号。我们关在牢里，造反派他们晚上在牢房外面敲鼓，是信号，怕有人害了我们。他们本来打算把我从狱中抢出来，因怕造成伤亡，没有干。

7 月 26 日又送来一个条子说，保守派打算把你搞出去，在三天内暗害。我与那几个解放军商议。他们说：如果发生事情时，让我从牢房小窗子爬上去，翻墙逃走，他们两个人掩护我，7 月 28 日夜三时，那两个解放军已经下岗了，忽然门锁响了，我马上拿了一个铁盒，好作武器。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原来是指导员进来了。我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来看一看你。为了你的安全要你出去。"我看他今天的脸稍好看一些，我说："你们不是要害我吗?等我穿好衣服穿好鞋。"我拿鞋为的用鞋作武器同他们干。我出了牢房，一个小车飞快开来，车门一开，两个人把我一架，塞进汽车就跑，把我架得紧紧的。车开得很快，到了县里我说："车子别开了。我知道你们要杀我，我死，要死在兰考，再开我就骂。"他们说："我们是有任务的，老同志，我们一怕老保害你，我们交不了差，二怕革命派不放你走，才这样做的。中央限令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护送你到北京。"他们又说："你可别跳车，你跳了车，我们就没有脑袋了。"

29 日我到了北京。

三十日下午七时，总理联络员通知我："下午十时二十分，周总理、康生、江青、杨成武、戚本禹、叶群等同志在人大会堂接见你。"我思想激动了，晚上没吃饭。

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康生同志亲自解决河南问题，解决的很彻底，河南造反派翻身了，归结起来，就是这几句话："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救了我们河南五千万人民，

救了我们革命造反派。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筋断骨开，河南造反派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全国，特别是首都造反派对我们支持的结果，也是我们河南造反派的同志坚真不屈，坚持斗争的结果，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红旗造反团、安阳地区五月风暴司令部《二七风暴》1967年8月3日）

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司令部 1967.08.05

河南"二七公社"

八月五日是个光辉的日子，是个具有伟大纪念意义的日子，是铭刻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心上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去年的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一把利剑，刺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脏；是一把铁锤，砸烂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身上的枷锁。这张大字报，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宣判书，是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进攻的总动员令。毛主席的这张划时代的大字报，给我们指明了斗争大方向，给了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勇猛冲锋的无穷力量。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年来，我们"二七"战士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揭发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河南的代理人的滔天罪行，戳穿了他们对革命派明支持、暗瓦解的阴谋诡计，打退了他们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一月革命"风暴后，我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起来，对我们"二七公社"进行了疯狂镇压。但是，我们没有被压垮，我们越战越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和关怀下，在全国革命派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英勇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

回顾一年来的战斗历程，更加体会到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何等英明，何等伟大！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得是何等深刻，而对广大革命群众又是何等信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我们"二七"战士一定要永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彻底批倒批臭。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破私立公，促进思想革命化，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克服小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组成千百万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人民日报

坚决打倒何运洪、李善亭！1967.08.12

河南省军区机关《秋收起义战团》全体战士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运洪老混蛋和他的狗头军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善亭，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系杭地、长期地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坚持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地扶植省直造总等保守势力，操纵其御用工具公安公社，打击革命的领导干部，压制革命小将，双手沾满了我二七战友的鲜血，其滔天罪恶，真是罄竹难书。我们先揭以下几个问题：

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破坏二月谈判

二月十七号下午五点三十分，周总理依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了解决河南日报社问题的四点指示，命令何运洪"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谈判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赴京谈判。"这是毛主席为解决河南问题发出的最高指示，是对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最高指示是要无条件执行的，可是何运洪这个老混蛋是怎样对待最高指示的呢？十八日上午，也就是周总理下达指示的第二天，他就当着同志们的面说："谈判我还不准备去哩。去不去由我哩！过去没犯过错误，这次霍上犯个错误。"看，何运洪这个家伙一开始就不打算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狡猾的何运洪，怕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怕群众看出他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于二月二十三日，还假惺惺地召集各方协商赴京汇报名单。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赴京汇报诚意，而是有意把二七公社压垮、拖垮，然后造成既成事实，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请看他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报告。报告中说："关于召集各方到北京谈判问题，我们拟采取限制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代表名额的办法，把谈判的时间拖下去。……目前郑州形势正在急剧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谈判时间越向后拖，对郑大联委越不利。他们必将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体。"看，在何运洪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眼里，那有党中央，那有毛主席，那有一点群众观点。

由于郑大联委的代表在郑州没有安全保证，党言川同志提前到了北京，派史文华、王月亭两同学，作为郑大联养的全权代表，参加协商名单的谈判。这本来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可是何运洪、李善亭借口郑大联委主要负责人没到会，两次终断会议，使名单协商无法进行。事后还向中央报告说："郑大联委毫无赴京谈判诚意，党言川无视中央、总理指示，拒不参加谈判，甚至提出要单方面赴京汇报，并已非法派代表赴京，致使会议再次终断，建议中央文革敦促党言川立即返郑。"把罪名加在郑大联委身上。

郑大联委为了消除何、李的借口，早日达成赴京汇报协议，让党言川同学从北京返郑。可是当党言川同学亲自到军区参加协商时，何、李老混蛋又要了一个花招，说党言川延误与破坏谈判，毫无道理地向党言川提出两个条件，一条，要党言川承认错误，写出检查，印十万份，在郑州、北京散发；一条，要党言川开上广播车上街请罪三天。党言川同学当然不会

答应这些毫无道理的条件，于是三月三号第四次谈判时，何老混蛋便无理宣布："党言川不承认错误，无谈判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待承认错误接受条件后，再继续谈判。"就这样，使赴京汇报长期终断了下去。

难道何运洪、李善亭之流真的想继续同郑大联委商谈吗？根本不是。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早已在两个大坏蛋肚子里孕育成熟了，这就是在三月四号的一次大会上，(后来因故这次大会推至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既然是"非法组织"了，还有什么可谈呢？所以何运洪以后再不提赴京汇报的事了，彻底破坏了这次谈判。

三月六号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北京，说什么"关于河南日报社的谈判问题，报社已经军事接管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

同志们，康老讲：毛主席指示要河南省军区组织对立的双方组织到中央汇报，在解决全国各省问题上是第一个指示，也是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解决省军区问题的第一个指示，毛主席和党中央是想通过解决河南问题找出一些经验，指导全国。可是毛主席这个最高指示被何运洪、李善亭抗拒了，真是罪该万死！他们抗拒了中央指示，还把罪名加在郑大联委头上，真是混蛋透项！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历史事实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我们说，抗拒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破坏赴京汇报的，不是郑大联委、二七公社，而正是何运洪、李善亭两个大混蛋！

坚持错误，变本加厉。中央关于青海和安徽问题的决定公布以后，特别是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以后，一再强调，不准随便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再三指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业已违犯了中央指示的做法的，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这本来是何运洪、李善亭等人改正错误的好机会。可是何、李两个混蛋不但不执行中央这些指示，反而变本加厉地抗拒中央的指示，不但不给郑大联委平反，反而再次重申："我们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郑重的，是有充分根据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郑大联委的案是翻不了的。"在军区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根本不认真学习中央的指示，不去讨论军委十条命令，反而大学特学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他们根本不打算执行中央的指示。李善亭说："河南不是安徽，河南不是青海，青海有个赵永夫，我河南就没有赵永夫。"看，他们嚣张到何种程度，在他们眼里那有中央。他们就是把河南搞成了独立王国。

在北京汇报期间，封锁中央首长的指示

六月三日，中央领导同志就单独接见了何运洪、李善亭等，就对河南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指出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何、李两个混蛋，根本不向家里传达。到六月十日，才趁派人回来继续收集二七公社的材料之机，口头传达到军区在家的常委，对其它领导干部继续封锁。直到六月二十七号，中央首长已经三次单独接见了何运洪、李善亭和军区在京的其它领导同志，反复讲明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之后，才不得已传达到排以上干部。但向部队传达时，何运洪又电括通知，不让传达原文，叫归纳几条，传达精神，生怕部队了解了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中央首长几次接见，都明确指出责任主要由何运洪负责，要他认真作检查。何运洪一

直封锁中央首长这个指示，只向下传达让军区常委检查。直到六月底陈桂昌同志去北京，杨代总长要陈好好做何的工作，动员何好好检查时，才知道了这个情况。，这时陈桂昌间他个人检查考虑的怎样？他还推托税不知道。真是无赖之极。在京的领导干部气愤不过，造了他的反，追不得巳，他才把工作人员叫了去，商讨检查之事。商讨时，他一点不谈思想，一味地问大家：你们看怎么办哪？你们看怎么检查呀？后来才免强叫一个处长代他写了一份检查，在中央首长接见时照本作了宣读，根本没有触及灵魂，可以说没有他自己一句话。

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

部队传达中央首长指示后，在家━部分常委决定，七月一日公开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何运洪知道后，二十八日晚打来电话，说："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之前，不能公开支持二七公社，以免造成部队思想混乱。"七月三日保守派冲击军区，向中央施加压力时，钟生溢又辟谣说："我们没有研究过支持二七公社，我们也没有说支持二七公社。"结果一直拖至七月二十五号部队才游行，公开支持二七公社，造成了郑州地区的一段混乱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何运洪、李善亭在北京汇报期间一直和陈再道、钟汉华保持密切的联系，按照其主子意旨办事。

何运洪、陈再道狼狈为奸

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何运洪、李善亭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而对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却视若经典，奉若神明，百依百顺，仰承鼻息。对省委内部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当权派，极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千方百计地庇护文、赵、杨，疯狂地打击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

今年二月，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告全省人民书"，是两株大毒草，是破坏和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宣言书和动员令。这两株大毒草，恰恰就是陈再道、钟汉华亲自批准后才出笼的，并扬言要在武汉部队出版的"战斗报"上刊登(后未登)。奴才们看主子这样欣赏，加之这两篇毒草出笼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泛滥全省，使二七公社受到残酷的镇压，常常得意忘形地对人吹嘘："别看二七那么嚣张，我两篇文章就把它搞垮了！"

四月下旬，省军区召开四级干部会，钟汉华亲自出马来河南，对其奴才何运洪、李善亭作了一系列黑指示。在谈到省委干部问题时，钟说："纪登奎这个人不能挂帅，杨蔚屏这个人很有能力"等等。这些黑话正中奴才们的心怀，以后何、李更加千方百叶地庇护杨蔚屏，也更加坚决地要打倒纪登奎同志。毛主席过去曾说，杨蔚屏是个坏参谋。而何运洪却对"河造总"的负责人说："现在能替我们说话的就只有杨蔚屏了"。李善亭也多次向军区干部、战士作报告说："杨蔚屏问题不大，省委多数干部不同意打倒，将来可以站出来搞三结合"等等。对纪登奎同志百般丑化，一度曾送往卢氏县深山密林之中，用警犬看守，并多次交给保守组织进行斗争。他在一次接见新华社记者时，还颠倒黑白、别有用心地说："纪登奎过去反过潘复生，杨蔚屏反对过刘建勋搞借地和'三自一包'政策"。进一步打击纪登奎同志，抬高杨蔚屏的身价。

河南代表赴京汇报一开始，中央首长就指出河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何老混蛋却迟迟不让向下传达。现在查明，他是接受了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他们要何老混蛋"在中央没有正式作出决定之前，不要往下传"。后来，在北京，何、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面目巳经大暴露，省军区要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要坚决向何、李作斗争。

这时候，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个反革命家伙，为了保何老混蛋，指示省军区党委："在困难的时候，党委成员要特别加强团结"。这些黑话的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党委的其他成员，死跟死保何运洪，不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要和何运洪、李善亭作斗争。用心何其毒也！

何运洪和文、赵、杨是一丘之貉

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天革命后，三反分子赵文甫，杨蔚屏曾多次给何运洪写信，并多次进行密谈，他们肉麻地吹捧何在三月六日大会上的恶毒攻击革命造反派的讲话为"伟大的文献"。在此以后，赵、扬行动自由，长期未被群众斗争过一次，甚至在省委部以上干部所谓揭发问题的会上，他们气焰嚣张，充当了围攻、斗争纪登奎同志的急先锋。

有一次钟生溢受何老混蛋的指使，召集"省委造总"的头头研究干部问题的会议。当时大家在会上研究那个干部能站出来时，没有提到赵文甫。钟就迫不及待地问："赵文甫怎么样？"大家回答："赵已经罢官。"钟又露骨地说："罢官也不一定对，你们还要研究研究，看能不能站出来。"从此，"省委造总"更加死心塌地地保赵文甫。

何运洪、李善亭疯狂地反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刘建勋同志，这是大家很清楚的。部队一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引诱群众组织把斗争锋芒指向刘建勋同志，即是刘建勋同志参加了北京的"三结合"以后，也仍然是这样，甚至变本加厉。刘建勋同志参加北京的"三结合"，以及谢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中对刘建勋同志的评价，何、李都明明知道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了的，但何老混蛋还让军区接待站对外答复问题时说："刘建勋虽然参加了北京的'三结合'，今后还喊不喊打倒仍由群众组织自己确定。"李善亭不亏为何运洪的狗头军师，他讲到这个问题时还作了"新的发挥"，他说："刘建勋在北京只是个常委，这说明中央对他是有保留的。"弦外之音就是说只要群众坚持"揭发"刘建勋同志的所谓问题，就能把他打倒。四月份以后，在郑州地区所出现的要打倒刘建勋同志的更大妖风，就是由何、李一手挑动起来的。

何运洪、李善亭是血腥屠杀二七战士的刽子手

大造反革命舆论。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何、李之流在河南镇压革命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也是先造舆论的。今年二月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宣言书，镇压革命群众的动员令。"严正声明"排好大样以后，何运洪就洋洋得意地说："这个声明要印几十万份，要派飞机散发。"还说："要再搞几个团来，搞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下一步就是镞压反革命了"。可见这个"严正声明"是镇压革命的舆论准备。果然不错，这株大毒草抛出的当天晚上，河南日报就实行了大逮捕。为了大造舆论，何、李一手策划了报社、电台的假夺权。当把报社、电台拿到手后，李善亭亲自控制，凡属重要文章、社论都由他审阅(后来换成陈盛林)。这样一来，报纸、电台便成了何、李之流打击革命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工具。

赤膊上阵，动用专政工具，利用公安公社，血腥镇压革命派。河南日报社的两次大逮捕，都是何运洪、李善亭亲自报挥的，连十五岁的小孩也未幸免。二月二十号在印染厂的一次大逮捕，何运洪、李善亭亲临现场指挥，一次就捕二百多人。在何、李的指使下，全省都

展开了大逮捕，有多少革命小将含冤坐狱呀！革命无罪，在何混蛋统治下，变成了革命有罪。据我们所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豫农红总、黄委会东方红、印染厂八一、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革命组织，何、李都指使人整理了这些组织的黑材料，并在批语上冠以“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罪名，准备借机进行大逮捕。

操纵保守势力，连续挑起武斗，企图借保守势力之刀，把革命造反派压下去。别的不讲，就说五四事件吧！十大总部要冲击我二七战友绝食现场，何、李之流早就知道。五月三日钟生溢去武汉开会坐在火车上给一些同志说：“明天郑州有好看的。”这可以清楚地看出，十大总部冲击绝食现场是他们早已预谋好的。陈再道、钟汉华对制止武斗曾给何、李有指示，大意是，武斗开始不要去部队，只去一些人或宣传车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队。何、李是这样作的。看看这些人的狼子野心是何等的恶毒。

在军内，何、李也拼命地镇压革命派，把一五三医院的真正造反派“红总”打成反动组织，把许多敢于起来造反的人打成反革命，并准备逮捕监禁。就是十条命令下达后，还不死心，还要抓，说：“还要抓他三四个”。在军队内部，凡是有同情二七观点的，都视为政治动摇分子，停止其工作，限制其活动。

从以上事实看，充分证明何运洪、李善亭是不折不扣的、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千钧棒，把他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豫战团、河南二七公社联合创办《直捣中原》1967 年 8 月 12 日，第二十七期）

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及驻军负责人的讲话 1967.08.14

康生 吴法宪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十五时四十分，地点：京西宾馆礼堂第一会议室。接见首长：康生、曹轶欧、吴法宪。被接见者：省军区、一军、军分区、驻军各师、学校负责人。另外，还有省军区机关干部代表。一五三医院“红总”、“职工队”代表。〗

吴法宪同志：康老在百忙中，今天来给我们指示。康老很关心河南问题，今天听了汇报后来给我们指示。

康生同志：同志们，河南问题结束后，军队同志又留下开会。会议开了半个月了，会议开得很好。很多同志根据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彻底检查了河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军分区、人武部也检查了关于支左方面的问题，我们相信经过中央、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同志的讨论，将会使河南的“三支”、“两军”的工作得到很大成绩。同时，另一方面，在会议中间，犯错误的同志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错误，总的讲，应该欢迎那怕是微小的进步，虽然检查有深有浅，但这个开端是好的，我希望在实际中去改正错误。会议告一段落，应该总结一下会议的工作和经验，将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主席、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开辟下一阶段河南的文化大革命，使同志继续学习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精神实质，对贯彻中央指示将会有更大好处。

会议期间揭发了何运洪、李善亭和其他同志的错误，这些揭发无论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和今后“三支”、“两军”，无论对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有很大益处。会议开得是好的，会议中也可以看到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干部的革命本质，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各种原因，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大多数同志了解了错误后，能够改正错误，这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的革命的本质。不管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象何运洪、李善亭的错误，一军某些同志的错误，甚至由于何运洪的错误给河南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整个运动中会议中可以看到我们解放军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通过河南问题的讨论、解决，可以看出主席讲的三相信、三依靠。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们通过这次会议更加看清了这一点。我相信当我们省军区和一军坚决改正错误后，必然受到广大群众对解放军更加爱戴和支持，广大群众必然欢迎解放军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应当坚信，不能动摇毛主席讲的相信依靠解放军这个真理。毛主席说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支柱。没有解放军的支持，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也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胜利。所以，相信、依靠解放军，是“三相信、三依靠”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河南的问题，是长期地受到毛主席、中央的关怀。大家清楚地知道，二月十七日主席对河南就发了重要指示，也可以说在各军区，主席指示要召集解放军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到京开会，这是各地解决军队支左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解决解放军与造反派、保守派的问题，端正解放军某些同志的错误，这是首先的一次。问题是何运洪不但没有执行主席的这一指示，相反是抗拒主席指示，这是对河南全体指战员最大最大的教训。因为历史证明，凡是执行主席指示的，不论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凡是抗拒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指示，不管什么干部，不管历史上多大贡献，必然会使事情搞坏，使革命遭到损失，必然会使自己陷到错误的、和主席路线相反的道路。

林副主席曾总结过解放军四十年来的经验，就是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所以，这一点我们河南部队指战员，要你们亲身参加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教训，就是必须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但是河南省军区，以何运洪为首的一小撮人走到了相反的方面，不是坚决执行主席路线，而是抗拒主席路线，不是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进行“三支”“两军”，而是执行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指示，反对主席革命路线，抗拒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如果说一时不了解中央指示精神犯了错误还是允许改正的，但从二月十七、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五、六个月，长期不改正错误。 这里同志们又可以得到一个教训，主席说，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改正错误那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长期不改正错误，就变了性质，就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们在工作中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不坚持错误，是改正错误。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略，未记上）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介绍山东济南经验，因为他们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即有了错误是早改好还是晚改好？早改好；是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高姿态好；彻底改好不彻底改好？彻底改正好。人们把它总结为“早、高、底。”这就说犯了错误必须按主席教导办事，从这里边经过河南问题的斗争、批判、改正，这就教导我们怎样观察问题。林副主席讲过，我们观察一切问题都应从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离开阶级斗争就常常看不到问题实质、主流、对与错、是与非。从河南问题，从何运洪、李善亭等人错误，也可以认识到，离开阶级斗争基本立场，那一定会把是非颠倒了，离开了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必然对事物本质看不清。

从河南也可以看到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在河南也好，在其他地区也好，有各种看法，主要的有两方面：究竟是大好呢还是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河南是一个，开封是一个，其他地区也有。到底是收获大还是损失大？林副主席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大革命，思想的大革命，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对解放军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林副主席说："我们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毛主席对林副主席这样的估价完全赞成。林副主席这个估价也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估价。

从我接触到各省的问题，开始是内蒙，以后是青海、南京、安徽、山西、甘肃、河南，国外一些马列主义左派也接触不少，人们常常问，文化大革命收获是什么？问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我回答：通过文化大革命，使千百万工农兵劳动人民直接经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是林副主席所讲最大最大最大收获。我们翻一翻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什么时候有过亿万人民直接掌握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用毛泽东思想直接教育群众，毛泽东思想为群众所掌握所实行，这才能真正保证我们党、政府、军队不被修正主义所篡夺，保证我国不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说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这和我们损失比较的确是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这个真理广大群众懂得了。我们解决山西问题时，太原五中有个十七岁的女学生，叫郭××，受军区犯错误的干部所迫害，被关了一个多月，但他懂得两点，一是坚决拥护解放军，少数犯错误的人不能代表解放军；二是解放军介入大有好处，把解放军内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使解放军得到教育，问题得到解决，使解放军更加提高，更加前进，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支柱。同志们你们想想，每家都有子女，十七岁的孩子，懂得这个道理，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吗？不是文化大革命，能有如此收获吗？他没有听我们的报告，这是从受迫害中得到了教育。这就说明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教导下，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大大提高了，因为他们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受到了毛泽东思想教育，使亿万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就保证了我国党、政、军领导不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篡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就拿省军区干部、战士、独立一师、二师、驻军中空军、炮兵、工程兵等广大指战员来说，你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不管程度如何，是大大提高了，况且广大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立过新的功劳。有的同志犯过这样那样错误，也从中得到了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思想教育，这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使死几个人，出一些乱子，比起收获，还是微不足道的。林副主席所讲的真理，通过河南文化大革命，过去现在将来都会证实这是马列主义真理，就会更进一步了解林副主席这一指示，即：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但这要有一个条件，决不能拿刘邓路线观点来看，而一定要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来看，用无产阶级立场去看，这样是非才能看清楚。同志们，从你们亲身体会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历来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个阶级看"好得很"，另外一个阶级看"糟得很"，这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早就说过的。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也是如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当前是大好形势。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认为形势很糟。武斗很严重，甚至开了枪，有的地方很乱，河南也算乱的一个省，而且是和武汉反革命暴乱联系着的，甚至于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后，还发生了开封"七·三一"事件。我们怎样去看这种形势。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那个地方出现了这种乱的时候，就是矛盾彻底暴露的时候，矛盾的彻底暴露有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那个地方经过乱，那个地方形势就会更好。事实证

明，从这两天人民日报报导看，青海形势不是很好吗？青海过去不是大乱一阵吗？青海出了解放军里最少最少见的败类赵永夫，很多人丢了性命，刘贤权被斗争并免了职，这不是很乱吗？从资产阶级观点看，青海形势很坏，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从这两天报导看，青海形势就好得很嘛，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都受到很大鼓舞，报上报导武汉受到很大鼓舞，青海这样，其它各地必然会跟着出现更好的形势，内蒙古据说形势也很好，滕海清来了，我也还没有见他。对武汉事件，林副主席有重要的分析，林副主席在分析形势中，对解放军有最重要的指示。这指示是从形势分析出发的。武汉事件本身是坏事，但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这对全国全军教育是很大的。我扼要传达一下林副主席的指示。八月九日林副主席接见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政委曾思玉、刘丰同志，在北京的几个大军区同志也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也参加了，吴法宪同志也参加了。林副主席首先从文化革命形势讲起。他说：武汉事件本身是一件坏事，但它可以变为好事，对全国工农兵革命群众，对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武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大意是那个地方乱得越彻底，就会出现大好形势，中国现在看武斗严重，问题暴露得越发清楚，全国文化革命形势是很好的。林副主席是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讲的。林副主席说：不是一切坏事都可以变为好事，坏事变好事，是毛主席经常教导的，但是是在一定条件下坏事才变为好事，首先，一个决定的条件，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坏事才能变为好事。二是有毛主席缔造的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通过四十几年阶级斗争，在毛主席思想长期培育下（康老：我插一句，也是在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有四十几年的斗争历史，和全国人民一道解放了全中国，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它是有着伟大功绩，受到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军队。有毛主席、有党的领导，有解放军也就是武装了的工农，长期和人民血肉相联。有了这些条件，文化革命中一切看来是坏事的，都可以转变为好事。林副主席说，有几件不好的事情，不要使它掩盖起来，而应当使它暴露出来，矛盾的暴露必然接近矛盾的解决。矛盾暴露看来有些乱，但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乱可以变为治，这是辩证的关系，有很多实际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河南问题也看得清楚。坏事不能隐藏。乱是矛盾的暴露，矛盾的暴露接近于矛盾的解决，在文化革命中，通过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林副主席再三地讲，要掌握辩证法，不要悲观失望、惊惶失措，乱肯定会治。河南问题已经出现好形势。（康老：河南问题还会有曲折，如开封形势还很复杂，一军×××团从郑州调往化肥厂，保守势力阻止进厂，一些农民被骗进城，还有很多问题。这些可以理解，不管如何，改变不了将要和已经出现的大好形势。）不要怕乱，不要看到一时现象就束手无策。林副主席接着对所谓乱做了具体分析，林副主席说，乱有四种：第一种，好人斗坏人。这是好事，是必然的；第二种，坏人斗坏人。这是在斗争中彼此暴露自己的面貌，可以削弱他们的力量，这种乱对我们的斗争有利；第三种，坏人斗好人。这种情况也有，河南的“保守组织镇压真正革命造反派二七公社，打击革命同志”、“百万雄师斗争三新、三钢”，这种形势出现，当然不是说“百万雄师”中所有人都是坏人，主要是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坏人斗争好人谢富总理和王力，王力同志脚被打坏，现在还挂有拐杖。这很好，暴露了陈、钟的反革命面貌。广大群众立刻觉醒起来了，你们在北京看得很清楚，×××万人开会示威游行，这就是陈、钟斗谢、王出现了大好形势；第四种，好人斗好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是容易解决的，如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比较好解决。最近武汉一些学生和清华井冈山学生，听说还有河南二七公社的人，到武汉，由于思想不对头，贴了武汉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的大字报，这是不对的，但把道理讲清楚问题就解决了。你们那样去反曾、刘不是帮了陈、钟的忙吗？林副主席讲：这四种乱的形式，前三种，对我们有利，后一种也容易解决。文化大革命整个形势大好，这是百年大计，万年大计，看到一个时期的乱，同志

们要沉着冷静地分析，经过乱才能达到治。这是毛主席的辩证法。

林副主席还讲，部队支左工作中有些地方有些同志犯了一些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犯有错误中绝大多数人希望他们能迅速改正错误，不是希望一下垮掉，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政策是挽救犯错误的同志，不让他垮，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要帮助他，教育他、挽救他，这一点要理解。（康老插话，这个政策河南来得早的同志从解决过程中可以看到，对何运洪的错误是采取这种方针，这一点张树芝同志了解，我们苦口婆心地教育他，有时半夜想起来还要去给你们谈一谈。）这个政策今天是这样今后也是这样。从毛主席对武汉问题指示中可看得很清楚，毛主席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挽救是仁至义尽的。这是最后给他们的出路，从这个批示，可以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对犯错误干部的爱护和挽救，当然陈、钟能不能得到谅解看他们的了。同样，何运洪不要失掉时机，不要坚持不改，不要改而不彻底，不要同群众对抗，改得好还是同志，中央帮助你，还要看内因。河南得到什么教训？前一时期是坚决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后一个时期有的同志如何运洪、李善亭和一军个别同志，言行不一致，玩弄两面手法，这个教训很深刻。一个革命同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光荣的军队干部，决不能用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决不能这样。从开始到现在，总感到有这个问题，这一点省军区要注意，一军同志也要注意，"7·31"事件发生与这个问题有关，就是一方面承认错误，但另一方面有时因为姿态不高，态度不明朗，改正得不彻底，在客观上有这个因素，开封这个因素更多一些。抗拒、坚持必垮、玩弄两面手法同样要垮，改错不彻底会越陷越深，最终也要垮台，这不是中央的希望，中央的精神是不想让犯错误的同志垮下去的，要教育帮助他们，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要垮台。林副主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除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中央指示，紧紧掌握大方向：掌握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外，要不垮台还要做到三点：

（1）紧紧地掌握着底下的情况，左派的情况，右派的情况。要及时地请示报告，多请示，多报告，不要自以为是。河南的问题有很大的教训。何运洪犯错误，恰恰不是掌握运动的真实情况，他掌握的是反面情况，把左派当成右派，把保守派看成依靠力量，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完全站错了队，这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阶级立场，对左派抵触，厌恶，甚至仇恨。有两个问题：一是思想立场问题。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二是掌握情况问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现在有些情况往往不是很真实，要真正掌握情况，这是重要的一条，不是简单地反映一下。（何运洪偏听偏信，听李善亭的，另外，听军区机关一些同志的，听丁石的，听丁石秘书李伟的，听省委机关总部的，听赵文甫、杨蔚屏的，赵文甫、杨蔚屏都写信赞扬你。）林副主席说："多请示，多报告"。河南军区不请示，不报告，甚至有指示不执行，抗拒。比如刘建勋问题，有错误，改正了嘛。在北京参加了三结合，报纸上登了。头脑清醒的人，看了以后，可以改过来，相反的是更加要坚决打倒，这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何运洪还说河南问题要由河南五千万人民来解决，不是由中央决定。由五千万人民解决，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代表不代表五千万，你把自己封为五千万人民的代表就不妙了。五千万也离不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林副主席说要紧紧掌握下边情况，要多请示报告，不要自以为是，有电话，电话不行有电报，电报不行有飞机。

（2）现在，左派、右派、保守派，阵线比较分明。林副主席说：解放军的同志不要以冲军区不冲军区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标准，应该以路线为标准。要看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合乎

不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有事与群众商量，依靠群众办事。坚决支左，对保守派不是简单地镇压、打倒、取缔。应该是争取、教育、分化。如对十大总部要做争取工作，教育工作，对开封的化肥厂工人也要做耐心教育工作。我开始很注意省工人总部，他们的代表李通，是解放军转业下来的，是从青岛海军转业下来的，家庭背景不很好，有海外关系，我一看不象工人，是一个工会干事，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市工人总部的服务员也不是工人。他们的思想不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开封化肥厂许多是转业军人、退伍军人，这些人走错了路，搞起武斗来更厉害些。对待保守组织要进行教育，争取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孤立他们的坏头头。中央 7 月 13 日关于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的指示，很多地方没有向农民传达。林副主席说：对保守组织要进行政治工作，不是解散、取缔就能解决问题的，而要说服教育，分化，做争取工作。比如陈永贵同志和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解决山西晋中平遥县的问题的例子。很值得参考。平遥县（属晋中专区）人武部站在保守派一边，他们支持农民进城，四个县民兵六千人一下子拥进平遥县镇压造反派。陈永贵同志、六十九军军长、军分区副司令员一道去解决。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支持人武部。平遥县有六个城门。保守组织占了五个门，造反派只占一个门，人武部给民兵发了枪，还有机枪。陈永贵等同志到平遥后，教育他们，叫两方面派代表谈判，不要武斗。陈永贵同志一进去以后立即被保守组织包围了。保守派开了枪，打死造反派十一人。一个徒手连进去保护陈永贵也被包围了。我们耽心陈永贵等同志生命有危险，研究办法，有的同志主张开枪镇压，中央不同意，叫一个团全副武装开到城的附近，在外面声援，做群众工作政治工作，把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农民不要进城武斗”等指示，散发传单，陈永贵也内部作工作。农民纷纷觉悟了，把人武部的头头抓起来了，把枪缴了。这方面既要作保守派的工作，还要作造反派的工作。听说：二七公社的基层组织有报复情绪。借抓“百万雄师”、“产业军”为名抓了不少的人，只要有四川口音、湖北口音的，带湖北粮票的就抓起来。这样不好，要教育他们（这是听说的，没有调查证实）。要依靠左派，争取团结中间派，争取教育保守组织。

（3）不要太急躁。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作风，问题来了不要急，要调查研究。急了容易犯错误，慢了也有可能犯错误，但急比慢犯的错误多些，所以要冷静，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作风。要学习主席这个作风，可以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早改比晚改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彻底检查比不彻底检查好。

林副主席讲，解放军过去没有介入，一介入仓促上阵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问题是犯了错误就改。林付主席讲，为什么有些解放军犯错误？这有很多原因，过去解放军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三座大山。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我们的干部在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政策上，有准备有经验。所以能解放全中国，但是解放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面临新的情况，新的任务，新的阶段，面临一系列问题，社会主义仍然有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上有，那末解放军内部有没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呢？广大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对社会主义革命各种政策不熟悉，新的阶段在理论上思想上没有或很少准备。过去搞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现在是革资产阶级的命，革资本主义的命。过去旧的理论，旧的思想，旧的政策，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私字当头，没有肃清。在此情况下，难免不犯错误，有些同志犯错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犯错误的有两种人，一个愿意改；一个坚持错误不愿意改。过去我党有些干部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有些干部遇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思想的大革命，这场革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场革命，资产阶级思想会侵蚀我们，使我们左右分不清，是非分不清。犯了错误，要改，不想改正错误是很危险的，使自己回到资产阶级思想上去，因此，林副主席说，当前要抓紧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努力把毛主席思想搞好，搞不好会出现内

蒙问题。过去各级政治部，在反对谭政方面有进步，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很多政治机关思想落后于形势。你们河南省军区、军分区、一军看看你们的政治工作很多政治干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站在保守组织方面。因此，要大大加强政治工作，做好政治工作，才能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如果解放军不搞好政治工作，就不可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抓政治工作，必须认识清楚，一切问题都是政权问题。十八年来，我们政府机关有很多班子是旧的。因此，有些人拿民主革命的思想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影响到政权，要使政权不变颜色，就要搞好领导班子。旧班子犯错误的自己要下决心。希望垮得少，但自己坚持错误那就要垮下去。林副主席说：自己要垮那没有办法。地方垮了，军队要接。军队搞不好也会垮，所以我们要教育干部使他们认识这个问题。有的人旧思想很严重。中央还要帮助他转过来。总是使他不垮，不打倒总是好嘛，这样对大多数干部信任依靠，通过训练教育，少数犯错误的转过来，使国家政权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政权。我们的会议就是体现了主席、林付主席这个思想。明天有的同志要回去，有的同志还要留在这里斗、批、改。会议到第二个阶段，有些同志回去进行工作，有的同志继续教育训练。第三阶段，不但省军区、军分区，还有人武部要来的，不断地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一方面把干部更加提高，把犯错误的干部逐渐地转过来，少犯错误，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刘建勋对河南“二七公社”省直革联服务员的讲话 1967.08.20

8 月 20 日刘建勋同志接见了“二七公社”省直革联基层组织服务员，作了重要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今摘要如下：

（一）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对待保守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问题。

（二）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问题的。

（三）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问题，对于“文攻武卫”问题，这个口号是“二七公社”提出来的，江青同志把它肯定了。当时，何运洪勾结文敏生、赵文甫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保守组织，挑起武斗，围剿、镇压赤手空拳的革命造反派。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情况变了，“二七公社”占优势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应该强调开展政治攻势，耐心细致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派就是要搞文斗。当然，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我们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利用“武卫”这个口号，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恶阴谋。当敌人挑起武斗时，我们就要反击，要自卫。但我们决不首先打出去。决不把武斗扩大化。现在，我们要建立新的革命秩序。

（四）防止“二七公社”基层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篡夺的问题。省直革联的队伍正在日益扩大，这是大好的事情。这里，我也提醒同志们注意，一定要把领导权切实掌握在坚决的革命左派手中。反对离开阶级路线，片面强调“民主”、“多数”。现在，有的人就是想打着“民主”、“多数”的旗帜，要求“少数服从多数”；要求实行巴黎公社的选举，妄图篡夺“二七公社”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吃掉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夺了权之后，

由于缺乏经验，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错误，这是难免的。只要我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不能纠正的。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混水摸鱼，防止一小撮走资派钻进我们队伍。

（五）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胜利了，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防止骄傲情绪，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不要搞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在，有的单位出现“打内战”的苗头，一定要认真开展整风，领导骨干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作自我批评，狠斗“私”字，不要使“内战”扩大化。革命造反派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应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因为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只能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把“内战”的火苗扑灭下去。经过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中央首长接见刘建勋王辉时的指示 1967.09.05

周恩来 康生 吴法宪

〖时间：五日夜到六日晨三时。周恩来、康生、吴法宪、戚本禹等参加接见。九月七日下午，王辉同志在河南省体育馆“二七公社”基层服务员会议上传达。〗

一、周总理及其他首长要求二七公社及河南驻军很好地学习八・二五号召，九月一日中央首长讲话，九月四日主席亲自批发的命令，很好地执行，很好地贯彻，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在偏僻的地方，可以派飞机散发传单，使《8．25 号召》、《九・五》命令家喻户晓。

二、集中力量搞大方向，狠斗文敏生、赵文甫，把他们斗倒、斗臭。

三、总理讲：你们的仓库是一级战备仓库，听说仓库被抢，问题是严重的。抢了枪的要交出来，二七公社的情况我们很清楚，军队要按中央指示办事，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五日晨总理来电话，让开封老保放下武器，生命有保证，（因开封发生反革命暴乱，老保给一军及“八・二四”发了最后通牒，让退出东郊）同时希望郑州驻军及二七公社给予八・二四政治上的支持。

四、总理讲：听说你们那儿每天都有打死人的情况，这很不好，要立即制止，对打死人、打伤人的要处理。（首长问死伤情况时，回答有八人。总理说，不止吧，有 30 多人。）

五、二七公社、驻郑解放军对不同观点及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讲政策，现在在北京告二七公社的人很多，希望你们能按政策办事。

六、希望你们能很好地把“抓革命，抓生产”的任务搞起来，秋收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秋收搞得不好，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就有罪，工业要很好地抓上去。

七、军分区、县人武部不搞四大，要进行正面教育。

八、现在有些人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与党中央看法不同，请你们很好地看看九月一日的讲话，请你们与二七公社共同注意教育无政府主义的人，防止坏人混水摸鱼，现在有些行动破坏了社会治安，希望提高警惕。

九、枪和物资，告诉二七公社自动送回国库，协助他们坚决执行命令，你们的权力要认真执行。

十、军委吴法宪等首长指示：河南军区改组了，何运洪垮台了，二七公社胜利了，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二七公社要做送枪的模范。

康生同志、戚本禹等同志指示：

你们那里有乱打枪的现象，治安不好，人心惶惶，同志们要共同加以制止。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内部参考）

河南二七公社省直革联宣传部 1967.9.7

开封八·二四宣传级翻印 1967.9.23

康生吴法宪在武装干部会议河南组汇报会上的讲话 1967.09.12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十六时三十分到十八时三十分。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康老问：你们编几个大组？

答：十一个组。还来了几个造反派。

康老：听说河南二七公社分两派？

郑大×××答：郑州没有，下边有的专区乱一些。

康老：听说夺枪的？

郑大×××答：主要是中学生夺的。他们看到大学发枪了，他们就抢起来了。河医×××说：抢枪的主要是从河造总过来的中学生。

康老问：铁军现在怎么样？

郑大×××、河医×××答：他们一部分跑了。

康老：听说你们二七公社也出去啦？

×××答：主要是受北京影响。

康老：你们可以发表个声明，说我们现在不要保姆，也不要保男了，这一条要马上告诉家里。革命造反派受压抑的时候，组织比较纯洁，比较注意政策，所以在受压抑的情况下也能坚持。特别是中央支持以后，组织解除了压迫，能公开活动，地位变了，思想就容易骄傲了，政策就容易出偏向。组织庞大了就容易不纯，对政策也不注意了，认为我什么都对，唯我独尊，唯我革命，就容易犯错误。二七公社在开会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但事物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往往情况变化了，就产生报复情绪，政策就不那么讲究了，态度就不谦虚了。对保守组织、受蒙蔽的群众不是耐心教育、争取分化、团结，而是利用优越的地位想把其它群众组织搞掉，这样自己本身就容易脱离群众，千万注意这一点。

（这时进来了几个造反派的同志参加了会议）

康老说：刚才我讲的是在情况变了，环境变了、地位变了，就骄傲起来了，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了，对过去反对过自己受蒙蔽的群众想用优势压倒，不把头头和群众区别开，实际上是重复过去河造总、十大总部和何运洪的错误。最近我对河南情况不大了解，听说二七公社内部不是那么很一致，不很团结，特别是前一段抢枪，甚至攻击警备区司令部、筹备小组，这样就容易走向反面。要特别警惕这个问题。二七公社是跨行业的组织，过去是二七观点的人都参加了，组织很不严密。组织扩大了容易不纯，原来听你们（指二七公社）说要整风嘛！内部不纯。要好好争取、团结群众在大批判中搞大联合。河南搞了一年啦，到现在连个革委会还没成立，说明比北京、上海落后了，这是一方面要注意。

还有一方面，听外省讲二七公社跑到外省去的不少，主观上是支持外省革命，实际起相反的作用。你们说北京的学生帮你们的倒忙，你们去不也是帮人家的倒忙吗？这个你们给家里说一下，叫赶快回来搞自己的斗批改。

康老问：现在你们（指二七公社）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答：北京很少。

康老问：哪个地方多？

×答：黑龙江、长沙、广州。

康老说：是啊！南到广州，北到黑龙江。现在和过去不同啦，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学生是出去煽风点火，推动了各地文化大革命。现在群众都起来了，你们对情况不了解，不需要包办代替嘛！对那个地方不会起积极作用，会使那里复杂化，去可能会给人家搞分裂，有的还不自觉地将矛头指向中央承认的革委会，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有错误，他们可以通过整风自己解决嘛！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是错误的。打乱了中央的布署。听说三钢、三新还有河南的跑到了上海帮了倒忙，我希望二七公社把去的人叫回来，要向北京学。

康老问：八·二四出去了没有？

开封八·二四×××答：有到黑龙江去的；上海去了三个人，主要是了解一下情况。

康老说：上海所以比较稳定，是工人领导学生，不象北京学生领导工人，上海有这个传统，上海运动一开始工人就起来了。

康老接着说：你们河南也有客观条件，有很多产业工人，但主观做的怎么样？过去二七公社在工厂做了一些工作，但做的很不够，十大总部在工厂蒙蔽了很多群众，你们想想，一个工厂除了极少数坏人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人不都是阶级兄弟？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仇恨呢？他们都是自己的阶级兄弟。而自己的阶级兄弟打内战动武器，这里关键问题是几个头头和幕后人。学校也是这样，广大群众是革命的，是拥护毛主席的，少数是宗派主义，有的是受坏人利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康老说：二七公社现在不是出去跑的问题，而是要把自己的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进行整顿。另外要大量地作工人、工厂的工作，促进工人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河南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康老问：洛阳工厂的情况怎么样？如拖拉机、重型机械厂。

洛阳八一六×××答：现在是一半对一半，生产不好恢复，正在作恢复工作。

康老说：这个要做工作，无论如何不能压，要有正确的政策，河南工厂的问题，是一个大的问题，我相信河南新的领导一定能领导大家做好这个工作。

康老问：开封化肥厂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八·二四”×××答：我们来八、九天了，来时还没有解决。刘建勋同志说要做政治工作，我们“八·二四”造反派和解放军组织了宣传队，要开展工作。

康老说：“八·二四”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毛病是不少的，眼睛要看到这些。

康老接着问：郑州铁路、砂轮厂、纱厂的情况怎么样？

郑大×××答：铁路没问题，几个国棉纱厂跑得多，没回来。

康老说：别怨人家不回来，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叫人家知道回来安全、不挨打才会回来。要教育，不要报复，那有工人不关心生产的？

郑大×××说：我们学校没有报复，对战斗师的学生是热情的，工人可能有些报复情绪。

河医东方红×××说：我们连头头都没有抓。

康老说：让他们自己去揭发嘛！教育他们不要报复，天气冷了，叫他们都回来。

康老接着说：有个例子，合肥的情况比你们还厉害，用机枪打，两派势不两立。“九•五”命令下达后，解决得很好，炮轰派自己把头头抓了，炮轰派开了五万人的大会，好派放鞭炮欢迎，今天开二十万人大会，两队并排游行，解放军在前面。现在两派竞赛，交枪看准交得快，中央要向全国通报，要学这个样子。

康老说：今天主要不是谈这些，主要是谈武装干部训练班的问题。

吴法宪司令员说：康老的讲话很重要，你们（指二七公社）马上告诉给家里。

康老说：我是关心这个事，想叫二七公社做个好样子，做出模范来。我给二七公社谈过，不要象旧社会那样婆婆压媳妇，媳妇当了婆婆，又压媳妇。

康老说：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开始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认识不要紧，这是正常的。主要是让大家对这次会有个正确认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决定的重要措施，这是巩固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措施，这不光是河南，各省市都要轮流来，我们计划一年之内把各省军区、分区、县市人武部领导干部都学习一次，以便使我们人民解放军思想觉悟更加提高，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干部的政治水平，提高路线觉悟，加强团结，更好地工作，这不光是河南的问题，但不能一下都来，要分期分批。

康老说：武装干部训练，我们不能只从消极方面看，大家总觉着这个训练班有些倒霉，见不得人。将来填表要写某年某月某日……。应看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训练班，是林付主席讲的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训练班。

康老说：今天不多讲。各大组，小组要注意掌握这一点。另外还有一点，训练班不是来整这些同志的，相反的这是爱护我们解放军，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关心我们的干部。当然罗！它的结果是有错误改正错误，是了解、学习、运用主席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训练班。我们部队不是有讲用会吗？我们这是大讲用会就是了，用毛主席思想，讲用会就是要亮思想，用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照检查错误，克服缺点，增强党性，提高路线觉悟。二七公社也好，“八・二四”也好，一定要了解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河南要求把何运洪、李善亭揪回去斗，要求是合理的，但还不是时候，要给他时机检查，很快回去不行，看起来，听听你们的，实际是慢的。

康老接着说：准备开个全体会，今天先叫你们来，听听你们的。有些同志支左中没有犯错误也来了，革命小将也来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你们自己也是个学习嘛！这里没家里热闹，不要觉得冷冷清清，现在就是这样，要坐下来，叫屁股和凳子结合一下。现在不是用脚和腿跑，是要用脑子。我准备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一块和大家见面，使同志们很好了解一下毛主席的战略布署。

康老问：那位先讲？

赵复兴同志汇报。（略）

康老说，毛主席说：每省都要开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的会，小则二百左右，中则五百左右，大则千人左右，河南可能再来一些。

赵复兴同志汇报到参加会议人员时，康老问：一军谁来了？（答：来了五个……。）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参加人员有埋怨情绪时，康老问：埋怨什么？

聂济峰、赵复兴同志答：埋怨何运洪、李善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大家很气愤，来到当天下午就造了他们的反。

康老说：造反要摆事实讲道理。并问：武斗了没有？（答：没有。）不要武斗，不管是对谁都不要武斗，对俘虏也还是优待嘛。革命小将参加要注意，武斗就要犯错误。你们看报没有？（指《假四清真复辟》）王光美六三年在桃园搞吴臣，低头、弯腰、燕子式。原来武斗"坐飞机"是王光美发明的！革命小将怎么能向王光美学呢？何运洪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好，他给我写了个信说河南造反派要揪他回河南，我说不要慌，他表示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关怀，一定好好检查。如果你们在这里搞武斗，还不如叫他们回河南哩！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有的同志认为来学习的都是错误严重的时，康老说：我刚才没有讲吗？我们这个训练班是文化大革命的训练班。

吴法宪司令员说：是啊！是文化大革命的训练班。

康老问：江青那个录音放了没有？（指九月五日讲话）（答：放了。）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干部认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算完蛋了，康老说：完不了！完不了蛋！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的同志来时路过家乡感到格外亲切时，康老说：伤感了。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干部有换班思想时，康老说：调动一下地方是个正常现象。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人说这回把人得罪完啦，回去无法工作时，康老说：见不得人啦！你只要把错误改了，群众是讲道理的。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人没有他的名，也到这里来了的时候，康老说：那好嘛！说实话，我不敢叫何运洪回去，就是怕把他打死了，（众答：活不成。）康老说：那不一定，掌握好政策嘛！不过总有那个危险。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要满腔热情地一看二帮嘛！批评也是帮助，帮不上是另外一回事，还是希望他好嘛！不能忘了还有个办法，你们领导小组、组长和他们个别谈话，要劝导，要以身作则，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中有一段，那个意思是，不犯错误不是能干人，能干人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能很快改正，才是有才干的人。

当汇报到同志们都不愿和何、李在一块住宿、吃饭，怕说在一块开黑会、划不清界限

时，康老说：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吃饭也可以做工作嘛！部队干部怎么能和中学生一样，在一块做思想工作嘛！

当汇报到军区领导干部情况时，康老问：吴永光从湖北调回来了吗？（答：回来啦。）当说到吴对错误认识不够时，康老说：他到武汉后起到了作用没有？当汇报到周志坚不愿来学习时，康老问：有个消息说周志坚穿便衣参加武斗？（答：是周志坚穿便衣去了。）

当汇报到一军的情况时，康老说：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再来一两个干部，觉悟比较高的，从司、政，后来，帮一帮他们，工作忙不一定全在这里，空军四十三师也可以来人帮一帮。

开封“八・二四”×××说：刚才一军谈了，他们压力大，他们在开封镇压“八・二四”，罪恶也大，他们虽写了检查，一个深刻的也没有。

康老说：还要有个时间，一军认识比较迟缓。

吴法宪说：他们党委决定，还有师的干部，不能把党委都搬到这里解决。

康老说：今天下午安排得太紧了，下午安排三场会，明天上午十一点继续开？

康老最后说：这是文化大革命训练班，保护教育干部训练班，维护解放军声誉的训练班，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训练班，总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

最后吴法宪司令员说：回去各组织把康老的指示传达一下，不要开大会，要开展思想互助。

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组翻印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政教系分会宣传组再印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康生第二次接见武装干部训练班河南组代表时的指示 1967.09.13

〖时间：九时五十五分到十二时四十分，接见首长：康生、吴法宪。被接见者：武装干部训练班河南组领导小组大组长及造反派代表。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当康老看到各大组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送的决心书时说：送决心书很好，欢迎你们这个态度，要立新功很重要，大家入党很多年了，光吃老本不行，包括我在内。

咱们是学习嘛！学习文件，讨论问题，要允许讲不同意见，也允许人家讲错一、两句话，讲错一、两句话是常事，尤其是学习嘛！每次讨论讲错一、两句话是很自然的。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允许讲得不对，可以允许他们改正，上午讲错了，下午改正就好嘛！也是可以的，学习时也要象解放军那样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也要活泼一些，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大家可以随便讲，讲错了也不要紧，随便讲吧！

你们的学习计划，可以发给大家看一下，我看，基本上还好，方向还好，当然学习的文件还可以研究嘛！

当新乡××同志谈到江青同志谈话中关于对解放军的态度时，康老讲：这一条江青同志讲了，讲得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忠于毛主席的。党中央、中央文革都这样认为，国家一旦有事，一旦有敌人来了，就会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同敌人奋斗，还是很勇敢的，要相信解放军大多数。我们要教育青年们，青年们对老干部要一分为二，要热情帮助；当然，革命小将要揭发批判斗争是应该的，应该理解，但是革命小将要全面地看他们，他们的本质绝大多数是好的。为什么毛主席叫你们来学习？就是相信大家能够改正错误，能够立新功，所以在解决安徽问题会议上也讲了这件事。

当开封×××同志代表全体同志热烈希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康老点点头说：好！

当驻马店×××同志汇报到大家要求要来见康老时，康老说：上次讲了，先了解情况，将来开大会，先调查了解情况，向中央文革汇报后，总理、江青、伯达、我都去和大家见见面，这个要求是应该满足的。（同志们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郑大"联委"革命小将×××同志汇报时，康老向吴法宪同志说："军委文件汇编"，给一个人发一本，如果少了，一个组发几本，轮着看看！（吴法宪同志答道：可以！一个人发一本吧！）

革命小将讲到有的干部接近我们很拘束时，康老说：要多听造反派的意见，即是不对的，夸大的也要听，要向他们学习；当然，他们也要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同志高呼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造反派的同志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你们有错误，让他们揭发一下更好，检验一下我们对错误的态度，要主动地去见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改正错误不仅靠我们自己，也要靠群众帮助，把门关得紧紧的，新鲜空气就进不来，应当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革命小将谈到我们对何运洪很气愤，来到这里看到了他，就想狠狠斗他。康老说："这个也需要的，实际上是促进他的觉悟。"

革命小将谈到要为毛主席多争取一个干部，就多增加一分革命力量时，康老说："对！这个对！"

革命小将谈到河南军区几个当权派编到一个学习组有问题时，康老说：这个要研究，要分开，必要的时候他们再集合。

革命小将讲到个别干部态度不好时，康老说：可见人呀！阶级斗争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的立场观点思想是反映社会上的一个阶级的思想。

革命小将谈到一军的问题时，康老说：一军的同志，首先把你们自己的东西先清理先检查，不要都推给别人，现在首先检查自己，好一些，徐文礼有徐文礼的责任，希望一军的同志先责已，不要向军长、向别人身上推。毛主席教导我们：责人要宽一点，责已要严一点。这是一般情况，当然敌我矛盾是不一样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干部之间的问题。不是说，他不来就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意见可以考虑嘛！目前先检查自己，先责已。

革命小将谈到一军应来几个转得比较好的同志帮助他们时，康老说：这个需要，这个需要。

最后康老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现在回答同志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要求中央、中央文革的同志接见大家，我回去后把这个要求转达给他们，这一要求是可以实现的。（同志们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第二个问题，提出的时间问题，增加学员问题，我们要通盘来研究，同时也要考虑河南的情况，要和刘建勋、纪登奎、张树芝同志商量，既照顾这里又照顾家里。

第三个问题，同志们初步起草的计划，我们可以研究，我看，大的方向是对的，但具体问题、学习文件可以增加，补充一下，可以参考。

第四个问题，学习的同志犯过错误，错误性质不同，不管大的、中等的、小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多读毛主席的著作，多读林副主席的著作，多研究中央的政策，改正错误也好，立新功也好，都要掌握毛泽东思想武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运用这个武器，工作才能得到效果，要多学习。另一方面，多检查自己，同志们有这个经验吗？开始认识错误都是从不大关键的问题开始，触及灵魂的问题，关键的东西，总是认识慢些，痛苦些，越发怕痛，越发关键，所以，越是关键的东西越要向它进攻。深检查，多学习，同时，多听取群众意见，尤其是造反派的意见，其它同志的意见，无论是造反派的，本机关的，“八·二四”的，“二七公社”的，“八·一八”的，这些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多接近群众，多学习，深检查，多听意见，多接近群众，毛主席说，有事与群众商量。过一个时间，就会提高，绝大多数同志能够检查过去错误，能够立新功。但是不排除个别人，思想顽固，我想是极少数。

今天很好，各分区同志送了决心书，反映了情况，我们去研究一下，看一下，中央文革、中央的同志再接见全体同志。今天就讲这一些。

最后当造反派同志检讨自己错误时，吴司令员对造反派说：你们讲得很好，我们很感动，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的态度很好，主要是我们解放军干部犯了错误。

（河南组整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开封师院八·二四宣传组翻印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刘建勋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 1967.09.26

〖时间：下午 4 时，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革命派的战友们，同志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现在我传达一下毛主席接见我、王新、纪登奎同志的情况。

主席精神焕发、红光满面，满脸笑容，身体非常健康。在坐的有杨成武、张春桥同志。

主席见到纪登奎同志时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我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这时主席笑了，说："你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纪登奎同志说：大有好处。主席说："那是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他们搞的。"又说："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张大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么！"

当我们汇报到河南各级都站出来一些革命干部时，主席说："这是何运洪干的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

当汇报到调武装干部到北京集训时，主席说："集训也要去好人。"

当汇报到开封的情况时，主席说："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当汇报到少数人不大讲政策，随便开枪，有时还打死人时，主席说："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起来都反对，就收场了。"主席又说："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王新同志说：主要在理论上把他们的错误理论，思想批倒。主席说："对。"

现在把张春桥同志传达主席沿途讲话精神讲一下，我们归纳为四个问题。

一、形势大好，全国已解决了七个省，基本上解决了八个省（包括河南、湖北），争取今年再解决十个省，南方五个省，北方五个省，一共二十四，黑龙江是解决两次。中央是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委员会不能垮，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七、八、九三个月大进了一步，春节前全国要基本解决，要纳入轨道。形势和任务就是如此。

二、上下级关系为什么搞得那么残酷？打、罚跪、挂牌、戴高帽不好，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破坏了。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干部不要一棍子打死，最顽固的也要给一碗饭吃。北京开武装干部会，不仅是武的去，文的也要去、党、政、群干部也要去，左派也要去，红卫兵也要去。红卫兵权力很大又很凶，也要训练。对干部不能不教而诛，教也不能诛。要扩大教育面。主席在上海谈了几次，并在许多省都讲了，中央文革也认真讨论了的。

三、大联合的问题。那条语录（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是七月十八号主席在武汉第一次讲的，这个话没有被接受。武汉问题如果用这个思想去解决就更好。主席反复谈这个问题。七月谈过，八月也谈过，在上海把这条语录给工人讲了，很灵。上海大联合的高潮就是主席这几句话搞起来的。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全国一宣传，效果很好。

杨成武代总长插话：主席是这样讲的："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分别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我就想不通。这是有人操纵，无非是走资派的操纵，第二是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是小集团主义思潮影响。"

张春桥同志讲：反复宣传主席这个思想，主要是工人，对学生、机关干部也有效。工人阶级要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要工人来左右局势。上海最有发言权的是工人，不是学生说了算数。上海一乱，主席就问我："乱得起来吗？"我说，不要紧，工总司不动，就不会乱。要确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要被学生牵着鼻子跑。

四、主席讲："上海军、干、群三个方面的关系比较好。"主要是经常开门整风，三方面整风。这次以军队为主，下次以群众组织为主，依次轮流，请别的方面代表参加。这个制度比较好。工总司每天坚持半天学习毛著，半天工作，天塌下来也不管，军队不再召集。

干部问题是一个重要条件。上海部、局长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杨成武代总长插话：主席说："绝大多数是好的，要解放干部、教育干部，使用干部。干部中除了走资派，为什么斗那么凶？有些干部官做大了，坐汽车了，房子好了，工资高了，这都还可以。但是不要有架子，不讲民主，脱离群众，所以，一有机会就起来攻你。

我（刘建勋）问：北京五·一六是什么意思？

张春桥同志讲：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它有三条：一是反中央；二是反解放军；三是反革命委员会。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后一段，关于革命委员会，就是主席亲自加的。

毛主席这次来河南视察，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也是最大鞭策。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要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搞好革命大批判，大联合。

让我们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谈河南两派问题 1967.11.25

〖时间：1967．11．25，23：30－26 日 2：4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首长有：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及付主任扬兴陪同。〗

几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北京不也有 5.16 呀！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我们伟大领袖，不也把他破获了吗？河南就那么怕“河造总”？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就那么害怕，当然对 5.16 我们主张不要扩大，一个人要与整个组织分开，把坏人揪出来就算了。

（机务段二七代表汇报：机务段原来还没有河造总时）

总理说：原来并不是没有人了，只不过是不说话，是吗？是不说话的“河造总”，你们就是想把人家吞掉，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也吞不掉。过去他们不说话不好，说了话才好啊，说了我们才懂了。当然我不象刚才那个同志那样乐观，可也不象你那样悲观，你不是说他们只有五六十个人吗？五六十个人就把你们冲乱了？“河造总”有什么理由不同你们联合呢？他要想什么呢？你们有个恐惧，怕河造总同你们联合后，他们有些群众又回去了。

（“二七”插话：是这样，不但“河造总”，还是四大总部，他们成立的快，垮的也快，现在又要恢复，我们想不通。）总理说：你们这是派性，看来派性问题在铁路上没有解决呀！

总理休息一下，转对“河造总”代表讲，现在我对“河造总”同志讲一下，听听你们的意见。

第一你们承认跟何运洪走过一段路，你们承认错误吗？（答：承认）

第二，郑州铁路“河造总”本身组织缩小，这是事实吧！（此时二七代表想插话，总理生气地阻止说，你们派性就是相当强了，我在跟他们说话，你还要提河运洪是罪魁祸首，铁路上还有跟何运洪走的吗？有这种人的话，你们要与他们划清界线。（河造总答：对）我这不是搞群众，是搞与何运洪没有划清界线的干部。

第三，你们组织缩小了，原来 9 千退到现在 2、3 千，缩小就让他缩小，那就维持现在这个组织状态、地位吧。把脚跟站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斗私批修，开门整风，参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行不行？（答：行）不要再发展组织，这样你们就对了，否则人家就要讲你是老保翻天了，把社会搞得动来动去，他们也就不相信你们了。你们要把立场站稳，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要和跟何运洪的干部划清界线，队伍缩小一点，不要去争人的多少，而要看你们的立场稳不稳，这样人家就不会说你拉队伍啦。机务段有几十个人就几十个人吧（河造总插：二七做法人家不服）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他们有的做法不对，你们过去也有不对的，不要提那些了。矛头对准刘建勋的口号，就是错误的，你们就反对吗？这就表明

铁路的河造总不同嘛！你们要在抓革命促业务上做出成绩来，你们总部不要再扩大了，要取得人家信任，你们这二、三千人要确实承认错误与不悔改的领导干部划清界线，斗私批修。

（二七代表、河造代表表态）态度是好的，大家都表态了，你们要交换一下意见，我明天下半夜有空再同你们商量，关于干部问题，你们再想一想，有问题的干部，可以先调开来学习，干部问题要等到联合后再解决，我看河造总还是可以讲通的嘛！要用教育的态度，帮助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也还是可以听的啊，东北各省、沈阳、吉林、锦州局也要同地方分开，否则中央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

刘建勋对河南两派谈周总理的指示 1967.12.06

下面谈谈大联合的问题，我省在实现革命大联合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不容否认的。当然，也要看到，我们在大联合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对“河造总”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这是必须经过协商很好加以解决的。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次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解决了铁路“二七公社”和铁路“河造总”的大联合问题。总理在百忙中四次接见了双方代表，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总理讲，“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你们过去受压，中央是支持的，中央给你们平了反，但是有些骄傲。如果不克服骄傲情绪，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总理讲：“河造总”是犯错误的造反派。你们要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你们过去受何运洪的蒙蔽，要划清界线，不然别人不相信你们。“二七公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是坚决支持的。你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对待“河造总”的问题，是一个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造反派的问题。

怎样对待犯过错误的造反派呢？总理讲，要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我们应当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应该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帮助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促使他们改正错误，同时推动他们同其他革命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其他任何歧视、压制的政策都是错误的。

怎样联合？总理指示，大联合，要上联下也联，不要光联上不联下，也不要光联下不联上。总理又讲，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大联合是个原则，我们能马上实现是理想的。一个原则、方向，要逐步实现，要灵活掌握这个原则。总理又讲，一联合就倒旗帜，不一定符合群众的愿望。有个实践的过程，通过实践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打旗了，水到渠成了，就可以只树一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总理再三讲，双方在大联合期间不要再发展组织了。那些左右摇摆的人是不好的，一个革命者起码要有坚定性，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谁还相信你。总理又讲，工人阶级嘛，你们为谁打天下，为谁拉队伍，要为整体利益着想，根据总理的指示，为了稳定局势，在联合时，“河造总”不要再发展了，“二七公社”也不要再发展了。我相信，只要大家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经过充分协商，“二七公社”同“河造总”一定能够很快联合起来。

大联合必须是革命的，联合的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讲大联合，去掉了革命两个字，抽掉了阶级性，是不对的。中央对河南问题的批示公布以后，毛主席的指示一经同群众见面，我省“公安公社”、“省委造总”等保守组织很快分化瓦解。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他表明了这些组织中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已经回到和正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这些保守组织和河造总不同，这些已经垮了台的保守组织，现在有人又想把它拉起来，广大革命群众是不会欢迎的，我们也认为是不必要的，是不应当支持的。如果极少数人要重新打出这些保守组织的旗帜来，只能说明他们没有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要去压制和歧视他们，要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他们，使他们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再去联合他们。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1.25

中发 ［68］17 号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河南五千万人民表示热烈地祝贺。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九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南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新局面。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驻河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克服了省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加强了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河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五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仲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国劳、张宗海、吕书墨、文兰香（女）、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淑琴（女）、王传玉、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四十一名担任常委。

河南省有五千万人口，有许多现代化工业，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迅速改善铁路运输状况，提高煤炭生产进度，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希望河南省革命委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河南革命委员会常委中群众代表名录

部国荣，原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干部，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轩东森，原河南省建工局干部，省大联委副主任，“河造总”负责人

申茂功，28 岁，郑州国棉六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主任。中共党员

杨锡淼，国防科委十三所技术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唐歧山，39 岁，郑州铁路机务北段工程师、司机长，郑州铁路局大联委主任，“二七公社”负责人，中共党员

申红玉，开封电厂工人，开封“八二四”（八二四造反委员会）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郭守仁，开封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八二四”负责人

龙一兵，郑州第二砂轮厂工人，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李福山，郑州印染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唐振方，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

张过老，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

张宗海，省建工局二处工人，省大联委委员，“河造总”负责人

吕书墨，新乡七里营党支部书记，省劳动模范

文香兰，女，鲁山老庄公社副社长，省劳动模范

党言川，24 岁，郑州大学学生，“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学生，“八二四”负责人

杨国雄，河南医学院学生，“河医东方红”及“二七公社”负责人。

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粮院联委”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范念民，河南农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豫农红总”（河南省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负责人，

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新乡师院“八一八”负责人

丁素琴，女，河南中医学院学生，中医学院“八三一”及“河造总”（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王传玉，郑大附中学生，“二七公社”郑大附中红旗公社负责人，郑州中学联委负责人。

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01.30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

辽阔的中原大地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凯歌。在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热潮中，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丰硕成果。

我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向河南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南省五千万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南省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曾经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面对着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信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一定会照彻中原大地。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始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迅速传播毛主席的声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正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航向，鼓舞着他们顶黑风，战恶浪，和阶级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全省范围内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光辉的体现。中国

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在干部问题上，长期以来，就实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更是变本加厉地打击和迫害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的领导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深深地懂得：革命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保护革命领导干部，也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始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批判他们，夺他们的权，革他们的命；对真正好的革命领导干部，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坚决支持他们站出来革命。河南省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所以能够站出来，是和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分不开的。因此，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敢不敢革命，对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敢不敢支持，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有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感情和风格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毛主席指到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他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为推动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目前，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整个河南省，各条战线都呈现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我们希望河南省的革命委员会，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切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特别要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我们相信，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必将搞得更好、更好！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举得更高、更高！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社论）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 1968.01.30

毛主席的伟大关怀激励中原人民奋勇前进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 二十五万军民在郑州集会，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全省军民决心在新的一年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中心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新华社郑州二十九日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在全国亿万军

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声中，祖国中原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喜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东方红，太阳升。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战斗历程中，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多次来到河南，视察黄河和农村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两次郑州会议，指引革命的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河南五千万人民的革命斗争，亲临河南视察。毛主席的伟大关怀，是对河南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一月二十七日，具有“二·七”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红旗如海，锣鼓震天，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二十五万人，满怀革命豪情和胜利喜悦，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体育场，隆重庆祝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当大会庄严宣告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群情沸腾，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继承“二·七”光荣传统，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压制，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以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省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窃据的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在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他们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毛主席的英明预见，在河南已成为现实。喜看今日中州，风展红旗如画。当前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越来越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人们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全省人民夺得了一九六七年农业空前大丰收，正乘胜前进。工业战线捷报频传，一派热气腾腾。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建勋同志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是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回顾一年多来的战斗历程，我们的经验有千条万条，最深刻、最根本的一条是：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就是胜利！

刘建勋同志强调指出，在新的一年中，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中心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反复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做到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无政府主义，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认真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刘建勋同志说，夺权斗争胜利以后，依然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夺权靠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权也要靠毛泽东思想。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要抓紧自己的思想革命化，破私立公，努力改造世界观。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同全省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为把河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

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新同志代表河南省军区和驻军全体指战员在大会上讲话，表示热烈祝贺和支持新诞生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坚决维护它的革命权威。他说，一年多来，我们在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光荣任务中，经受了严峻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受到了最实际、最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更加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更加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积极、热情地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细致、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军民团结，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立新功。

河南省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和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的代表，满怀革命豪情，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热烈祝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他们一致表示：要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进一步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誓作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誓作破私立公的模范，誓作革命大批判的模范，誓作拥军的模范，誓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贡献出一切力量。

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同志和革委会的全体委员，参加了庆祝

大会。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大会通过了给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人民日报

纪登奎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8.04.25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这次全体会议，开得很及时、很好。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听了同志们的发言，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讲一点对过去一段工作的看法。

这次会议，把全省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揭出来了，这是一个大胜利。我们同戴苏理的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由来已久了。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认为有必要把去年从北京向中央汇报回来后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简要地回顾一下。

戴苏理不是攻击我们这一段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大好形势是“空空洞洞，没有内容”吗？不是攻击我们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只反右不反“左”，怕反“左”反到自己头上来吗？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去年八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革命造反派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由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很快控制了全省的局面。特别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我省视察的鼓舞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举办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当时，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曾出现一股极“左”的思潮。主要是有的人把形势估计错了，说什么河南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要“揪军内一小撮”，曾一度发生了抢枪的问题，出现了造反派的某些分裂现象。

对于这股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我们是坚决抵制了的，是坚决批判了的，是顶住了这股歪风的。当时，建勋、王新同志还亲自到中央作过汇报，并且当面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指示我们，一要反对，二要不怕，不要急，群众起来议论，反对他们，他们就收场了。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耐心地作了政治思想工作，经过造反派内部整风，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枪大部分收回来了。（王辉同志插话：当时我和刘政委、纪登奎同志一起去参加二七公社服务员会议，一晚上就收回七千多支枪。）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而是草率从事，急急忙忙往前闯，那反而会犯错误，出点乱子。

戴苏理借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我们不抓“五·一六”，什么‘一男一女’的事，攻击建勋同志。其实，这件事是建勋同志亲自处理的，协助中央把坏人抓起来送到北京的。你在这个问题上捞不到半根稻草。至于谣传我同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有什么关系，什么在王力家里办过公等等，我没有必要来批驳这些谣言。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戴苏理是大做了文章的。去年十一月，正当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出现高潮的时候，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强调了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个方向是完全对的。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大联合的具体政策、具体方法上，也就是在对待河造总这样一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下联上也联，联合不倒旗的问题上，我们认识上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没有对中央隐瞒我们的观点，我们把意见如实地向中央报告了，那时主要耽心引起老保翻天。总理、康老看了我们的报告，总理在接见铁路代表时指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不懂得群众心理，倒旗应水到渠成。当时，毛主席对浙江红暴派作了关于“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建勋、王新同志从北京把中央这个指示带回来了。我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是坚决照办，句句落实的。我们立即改正了缺点。对这个问题，我们在成立省革委的前夕，向中央汇报时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指示，这个方向是对的，承认山头，消灭山头，不要强调跨行业的组织了。这说明，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我们坚持的方向是对的。即便对基层单位的一些保守组织，我们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只要他们改正错误，调转方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戴苏理硬要我们同意搞无条件的联合，我们把这种错误的主张坚决顶回去了。在这里，戴苏理只记住了党的具体的个别的政策，忘记了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忘记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他抓住我们在大联合问题上个别的、具体的政策上、方法上的缺点，抓住某一句不确切的话，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我说过河造总是“二月黑风”的产物。这句话是不大确切的。我有缺点，说错了话，我愿意作自我批评。但是，戴苏理大肆散布什么“你们派性大发作”、“你们压了我们”、要什么“政治平等”、要“无条件联合”什么“不分左、

中、右”等等论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戴苏理的这些观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反‘左’必出右”。去年十一月，社会上就出现右倾翻案风的苗头，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前夕，这股风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把矛头指向省革筹小组，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造反派。叫嚷什么“八月逆流比何运洪还厉害”，“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要起来“抗暴”，要“砸烂派性委员会”。

戴苏理说他“憋了一肚子气”。其实，革命造反派才真是憋了一肚子气呢！连两条路线斗争都不准提，谁要是一说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派性最大”。前天戴苏理检讨时，还对我和杜河堤同志去年十二月在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大为不满，说那个讲话“派性大”。我和老杜同志又专门找出那篇讲话看了一下，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错误，你攻击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

你攻你的，我们还是讲我们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在全省农村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又讲过一次，在八二零二部队也讲过一次。建勋、王新同志在学习班把右倾翻案风狠狠地批了一通，报社还发了一篇社论。有人对这篇社论是大为不满的，大骂“派性发作”，还要揪黑手。这篇社论是张耀东他们几个人写的，有个别地方讲的不确切，提法不太科学，但总的精神是好的，给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当头一棒。尽管我们讲了很多，可是，戴苏理一概听不进去，一直骂我们“‘左’了”，“派性大”。由于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截然相反。我们认为是对的，戴苏理认为是错的。所以，戴苏理攻击我们，正说明我们作对了。

在这一段工作中，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我们的教训，主要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得不深不透，对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认识不足，对右倾翻案风打击不力，对戴苏理的两面派面目看的还不清，一度反派性讲多了，两条路线斗争讲少了。老实说，我们是有保守思想，戴苏理却攻击我们极“左”，我们明明反右反得还很不够，戴苏理还攻击我们只反右不反“左”。如果听了他的话，依照他的意见去办，我们岂不是要滑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地步了吗？

我们曾设想过，在三月底实现全省一片红。可是，三月初我们从煤矿一回来，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就向我们反映，下面大联合、三结合搞不动了。这时，我们觉察到有问题了，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不然，为什么郑州、南阳、驻马店、周口等地区都搞不起来呢？这时，我们警惕了。当然，没有提到象中央指出的这样原则高度来认识。当我们看到江青同志的讲话，指出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且不是苗头，已有行动了。而戴苏理看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感到“大吃一惊”，表示要“回家种地”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我们就紧跟中央，立即行动起来，发动了对这股右倾翻案风的猛烈的反击。

总起来看，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我们是紧跟毛主席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的，中央对我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正因为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同来自极“左”的和右的或者同时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我们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我们取得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是，在戴苏理的眼里，却把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说什么“空空洞洞，没有内容”，这不正好说明，他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毛主席、党中

央大唱反调吗？！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关于批判戴苏理问题。

关于戴苏理问题，建勋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头一天就讲得很清楚了，我完全同意。

从揭发出来的许多材料来看，戴苏理确实是我省大刮右倾翻案风和大闹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这一点，戴苏理自己也承认了。这里，我不准备再讲更多的具体材料了，只讲一下我对戴苏理这个人的认识过程。

我这个人，不仅有保守思想，而且有时还比较严重。我应当向大家作自我批评。我的保守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戴苏理问题的认识上。

最近听人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戴苏理就在背后造我的谣言，说我在地委书记中搞"特务活动"。尽管如此，在当时我主观上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支持他，他也支持我。我批评过他有点怕群众。后来文敏生装病了，躺倒不干了，戴苏理、王维群、王庭栋、张耀东还支持我领着干。

"二月黑风"一来，戴苏理突然变了。他同文、赵、杨合流了，支持何运洪的反动路线。从此，我们就决裂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同文、赵、杨还是有区别的，还是可以争取的。

到北京一见面，我就同他谈："老戴，二七一定胜利，你们错了，到我们这边来吧！"戴不但不过来，跟着他的一些人还写传单大骂我"跳得高"。（刘建勋同志插话：在北京我同他谈话，他说纪登奎态度很不好，一见面就说二七必胜。）康老同我和耿其昌谈话后，我把康老的话转告给他，二七要胜利了，要他站过来。戴说什么呢？他说："站在那一边，也能执行毛主席路线。"直到现在，他还坚持"立场错了，但没有站错队"的谬论。（王新同志插话：你是站在刘邓陶一边的，怎么是没有站错队！）

向中央汇报结束了，建勋同志把康老对戴苏理的三点意见转告给他，他还是不以为然。我碰了几次钉子，该死了心吧，但仍不死心，还想争取他，再拉他一下。回到郑州，建勋同志又要我同他谈。我说："老戴，你组织了一把'内阁'，搞四百多人签名亮相，十大总部和河造总都支持你，连公安公社都支持你，你要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这样能挽救你的命运吗？你为什么同文赵杨死抱在一起呢？你攻击刘建勋同志排斥你的事，那是赵文甫、杨蔚屏挑拨的，你不可相信"。戴苏理当时表示自己错了，但没有决心站过来。（刘建勋同志插话：老戴，我什么时候排斥过你，你能举出一件事实吗？众呼：戴苏理交待！戴答：刘建勋同志没有排斥过我，就是去年三月听了赵文甫、杨蔚屏他们讲了以后，我才有这个想法。）他讲这个话是对的，就是在省委机关造总召开的那个会议上，赵文甫、杨蔚屏煽动他起来反刘建勋。

（刘建勋同志插话：那是陶铸提出要把你调到湖北，把湖北的一个同志调来河南，我当时不同意调换，后来我给他们说了，二月黑风中，你们把一切问题都集中起来，说成我的"罪状"，说我排斥你，要把你调到湖北。是不是我排斥你？文敏生、赵文甫都没有死，可

以问吗！文敏生天天背后骂你，我说你的好话，二月黑风中你反过来造谣中伤，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党的生活你过多少年了，毫不知耻！）

尽管如此，我们为了进一步帮助他，挽救他，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支持他参加三结合。当时，革命造反派是坚决不同意的。（王新同志插话：八·二四也不同意。刘建勋同志插话：你造谣，好象八·二四对你感兴趣。申洪玉同志说：纯是造谣，根本没有这回事。）并且要开十万人大会批判戴苏理，我和王辉同志去做了工作，劝阻了。（王辉同志插话：二七公社已经发了开会的通知，我们说服以后不开了。）后来，二七公社的同志要派代表团向中央汇报，也被我们劝阻了。

有一次，二七公社的常委同志质问我："为什么要结合戴苏理？"我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第一要团结同志，第二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第三还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时，我确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顽固。在去北京向中央汇报前，我还向他表示过，我相信我们能够合作。在向中央汇报时我表示，我能同戴苏理合作。

我觉得我是以诚待人，好心对待戴苏理同志的。我没有在背后说过戴一句坏话。这点，王新同志可以作证。（王新同志插话：对戴苏理的认识，还受你的影响，你说他不再至于犯大错误，他胆小。）当社会上右倾翻案风刮得厉害的时候，王新同志曾问我："戴怎么样？会不会出坏主意？"我说："可能还不至于吧！只是胆小怕事而已。"

戴苏理参加三结合后，我们是放手让他工作的，可是他呢？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期望，辜负了造反派同志对他的信任。

我们是一直希望戴苏理同志站过来，希望他改正错误的。这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愿望。但是，客观事物总是矛盾着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戴苏理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我们的好心当作坏意，把我们对他的信任当成乞求，好象没有他地球就不转了。戴苏理不是说："河南犯了慢性病，迟早要爆发吗？"意思是说，总有一天，非靠他来收拾局面不可。

戴苏理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他把黑手伸向全省各地，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两面手法，一手扶植保守势力，一手支持分裂派。来了个"左"右合流，对革命派实行"左"右夹攻。

戴苏理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硬要把那些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和造反派站在对立面的干部抬出来，塞进革命委员会。本来，有些干部不一定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犯了路线错误，只要不顽固坚持，不一定会被打倒的。可是，当他们还没有转过来的时候，被戴苏理一支持，被保守派一保，就给保垮台了。戴苏理第一次组织了四百八十多名干部集体亮相，（刘建勋同志插话：四百八十多名干部集体亮相，害人不浅。我在北京看到传单，有三条，其中一条说何运洪支左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组织什么"内阁"，被他害了一批干部。这一次，他又要另立一个司令部，又坑害了一批干部。戴苏理这样做，到头来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戴苏理豁出"常委不当，也要大干"，他是横了一条心，充当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的，一心要为文、赵、杨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对戴苏理这个人的认识上，革命小将教育了我，戴苏理也教育了我，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林副主席的指示：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

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对党、对人民的事业负责，也为了挽救戴苏理本人，我们必须同戴苏理作坚决的斗争。纸里面是包不住火的。我们面对现实，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

在这次会前，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曾开了两夜小会，对戴苏理诚恳地、耐心地进行了批评帮助。听了前天他的检讨，态度仍很不老实，大家非常气愤，要打倒戴苏理，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看，对待戴苏理同志的问题，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关于当前工作方面的意见。建勋同志、王新同志叫我对当前工作讲几点意见，我讲一些老话，讲五点：

一、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向他们发起主动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对这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要统统揪出来；要进一步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是，群众发动的还不够充分，运动发展也不够平衡。文赵之流，还很不老实，赵文甫最近就抛出一个假检讨，至今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翻案吗！

文化大革命搞了快两年了，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明明是受坏人挑动，两派群众组织长期打内战，让敌人睡大觉。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二、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风，我们必须把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对戴苏理必须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把他批倒批臭。

社会上的右倾翻案风，不可能不反映到革命委员会中来。在彻底批判戴苏理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林副主席三月二十四日讲话，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精神，对同戴一起工作的人，认识戴的人，支持戴的人，以及戴支持过的人，应当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那就一定要揪出来；如果只是受了戴苏理的影响，参加了三结合，工作还不错，跟着他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只要承认错误，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应当欢迎他，信任他。如果打了招呼，还跟他走，坚持错误，就不能信任他，就要彻底批判他。昨天，李跃、魏世昌同志给我们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见过一次戴苏理，找他谈过事，这是一个很大错误。”这个话不对，没有阶级分析。问题不在于你同戴苏理有

没有来往，而在于你谈的什么事。如果你谈的是反对翻案风的事，那是对的；如果你谈的是刮翻案风的事，那才是很大的错误，要实事求是。

对革命委员会中群众组织的代表，有的人如果受了右倾思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除个别坏人以外，都应当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他们的路线觉悟，切不可任意拉到街上乱斗，更不可以随便清除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对革委会成员的处理，必须向批准机关请示报告。

三、通过这场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动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正确对待群众。对站错队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有的人，对叛徒、特务、走资派恨不起来，而把矛头指向站错了队的阶级兄弟，这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感情？！经过这次运动，一定要逐步团结两个 95%，不然，就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决不能因为反右倾翻案风，就动摇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既定方针、政策。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

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仍然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并在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中保留有一定席位。

对现在工厂、学校还存在的一些十大总部的基层组织，也仍然要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只要承认错误，扭转方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革命原则下，在基层同他们联合起来。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对受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不能压，要作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实行摧垮的政策，是错误的。

通过这场斗争，要把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得更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和加强“三代会”，尽快实现中央指示的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四、提高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水平，帮助造反派总结经验。目前，应当注意的，是揪斗坏头头的面，万万不可扩大化。坏头头应当同群众分开。不要互相抓人。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由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要文斗，不要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目前主要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要注意防止极“左”思潮抬头。

五、警惕坏人挑拨军民关系，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现在已发现有个别地方提出揪“小杨成武”，揪斗人武部干部的苗头。这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对军队个别人有意见，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通过适当方式，提出善意的批评。要相信军区、军分区、当地驻军党委是会正确处理的。要向一切挑拨军民关系，破坏人民解放军声誉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最后，再讲一点农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必须坚定的依靠贫下中农，集中目标，打击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决不允许下台的四不清干部翻案。对破坏文化大革命和破坏集体经济的现行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

我讲这些是请同志们注意掌握政策。有的同志可能要说我是“右倾”了。不，不能一讲政策，就说是右倾。“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

心大意。”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说的太多了，如果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也请戴苏理同志提出批评。

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8.01.31 人民日报

振奋人心的革命景象

在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河南省兰考县，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一年多来，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经历了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大搏斗。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坚决地要保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焦裕禄这面旗子；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所操纵的一部分顽固保守势力，则千方百计地要砍掉这面旗子。阶级阵线从来没有这样分明；阶级斗争从来没有这样激烈。如今，兰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县最大的贫下中农革命组织“兰考卫焦”，已经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这样深入人心，光芒四射。中国赫鲁晓夫伸进兰考的黑线，早已象瘟神一样被千万人所唾弃。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以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为首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已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光荣地诞生。踏上英雄的兰考大地，一幅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会立刻把你紧紧地吸引住。走进每一个大小村镇，许多男女社员，甚至白发苍苍的老人，都佩戴着鲜红的“兰考卫焦”的胸章。他们一见面就亲切地向你打招呼，一开口就以无限崇敬的心情赞颂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这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及每一个公社和生产队。在这里，不论是大街小巷，是生产队的办公室，还是挖河工地上，揭露中国赫鲁晓夫推行“三自一包”罪行的革命大批判专栏，到处可见。

目前，正是严冬季节。大地冰冻，北风怒吼。然而，广大贫下中农正在以从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投入热火朝天的冬季生产运动。一队队男女社员，手捧着毛主席像，携带着毛主席语录牌，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象一队队英武的战士，步伐整齐地走向田野。在那平坦的土地上，人们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摇动“铁臂”，挥舞“银锄”，开河挖渠……，以便用黄河的水，把多年的盐碱地，改造为肥沃的稻田。在那一堆堆沙丘上，人们正在大种广种泡桐树，以便让兰考全县换上新装。辽阔的兰考大地，红旗招展，人群踊跃，歌声嘹亮。英雄的兰考人民，正在以百倍的信心和勇气，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正在以英雄式的劳动，续写着焦裕禄同志没有写完的瑰丽的文章。

阶级斗争走着曲折的道路

兰考的大好形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阵什么大风吹来的，而是兰考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凭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兰考县的阶级斗争，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县委第一书记王××，正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兰考县的一个忠实门徒。他一来到兰考，就对这块连年受灾的地方看不惯。他不是领导全县人民向自然灾害作斗争，而是带着棕床、藤椅到土质最好的丰产区去“蹲点”。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赫鲁晓夫乘机抛出了“三自一包”的黑纲领。王××如获至宝，得意忘形地称赞“三自一包”是什么“救命政策”，“活命政策”，“拴人政策”（防止灾民外流）。他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反对，在城关公社大搞“三自一包”的试点，大吹大擂地推销他的“土地包产到户，牲口分槽喂养”的黑货。当时，全县以“借地”、“开荒”为名被变相侵占的土地占全部集体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城关公社胡集大队，除了种公粮的土地以外，百分之九十七的集体耕地被分配到户。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复活，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他们到处煽动社员搞单干，猖狂地破坏集体经济。树木被砍伐了，水利系统遭到了破坏。整个兰考灾区盐碱上升，内涝加剧，土地荒芜，风沙重起。严重的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的头上。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受了党的委托，带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来到了兰考县。

焦裕禄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到兰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旗抓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抓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他在灾难深重的兰考县广泛开展了忆苦思甜教育，调动和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威风。他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走进生产队的牛棚和贫下中农的家屋，大力表彰贫下中农中涌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的新事物，热情地支持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他在全县亲自树立了四个红旗大队，这就是：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进一步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冲天的革命干劲和革命硬骨头精神，向自然灾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经过三年的奋战，基本上锁住了风沙，制服了洪水，改造了盐碱。连年受灾的兰考第一次获得了好收成。

兰考人民饮水思源，有口皆碑。他们对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永远感念不忘。他们说：“毛主席咋说，焦书记咋做，句句话说在俺心窝里，件件事办得俺心满意足，真是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同志，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继续踏着焦裕禄的脚印前进。他进的是贫下中农的门，吃的是贫下中农的饭，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战天斗地，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然而，兰考县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又来了一个县委书记，名叫周××。这个人和贫下中农根本不是一个心眼。他一来到兰考，就要把林彪副主席亲笔题词表彰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这面红旗砍倒。在他看来：“兰考县的灾害还没有减轻，沙荒还没有盖好，精神还没有变成物质。”他竟然说：“宣传出去，叫全国来看什么？看沙荒和盐碱吗？”

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广泛宣传以后，全国亿万人民被深深地感动了。每天到兰考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要求周××介绍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周××却冷冷地说："我刚来，不了解情况，叫张钦礼介绍吧！"张钦礼同志介绍了，周××又怀恨在心，到处污蔑张钦礼同志"宣传焦裕禄事迹，是想捞政治资本"。一个要宣传焦裕禄，一个要否定焦裕禄。兰考县两条路线的斗争又一天天激化起来。

贫农、下中农英勇地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在兰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旧县委内以周××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们蒙蔽了一部分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

"张钦礼是政治扒手！"

"张钦礼是三反分子！"

一时间阴风四起，妖雾迷漫。千百张莫须有的大字报劈头盖脸地朝张钦礼同志打来。

"这是怎么回事？"

"张书记宣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难道错了吗？"

"县委内一些人为啥要砍焦书记这面旗子？为啥要把焦书记生前的亲密战友打成三反分子？"

一连串的问题，使兰考的广大贫下中农再也不能沉默了。

兰考的贫下中农是苦大仇深的，是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在旧社会不知有多少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他们永远不能忘记：是毛主席把他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过上了今天的甜日子。他们永远不能忘记，焦裕禄同志正是打着毛主席的红旗进兰考的。他为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焦裕禄同志和张钦礼同志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们和贫下中农是一根藤上的瓜。只有王××、周××等人才和贫下中农不一个心眼。本来周××是接焦裕禄同志的班的，可是他来兰考两年，没有交一个贫下中农的朋友。他们反对张钦礼，是企图借反对张钦礼来反对焦裕禄，反对贫下中农，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想从贫下中农的心窝里砍掉焦裕禄这面鲜艳的红旗是万万办不到的。

正因为这样，兰考的贫下中农十分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白天坚持生产，夜晚就积极闹革命，谁反对张钦礼，谁贴张钦礼的大字报，他们就和谁辩论。

就在这时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象一声春雷传到了兰考。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听到了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召唤，立刻沸腾起来了！他们说：毛主席说的要放手

发动群众，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尽管起来干！

焦裕禄同志亲自树立起来的四个红旗大队的贫下中农首先起来串连，成立了一个“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全县贫下中农一呼百应，呼啦啦都起来了。紧接着，县城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人卫焦造反司令部”，县直机关成立了“卫焦战斗兵团”，二中的学生组成了“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全县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干部一个观点，一个心眼：坚决地保焦裕禄，保张钦礼。按照他们的话说，三十八万兰考人民，绝大多数都是卫焦战士。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革敢保。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兰考的贫下中农，从切身体会中懂得：焦裕禄和张钦礼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一心一意要带领兰考三十八万人民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的。王××、周××却安的不是好心。依了他们，就等于向资本主义死路上走，向火坑里跳。因此，保张钦礼，就是为了保焦裕禄，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他们毫不含糊地提出：“周××是县委内头号走资派”，“张钦礼是革命领导干部”，“坚决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这就是他们的行动口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兰考贫下中农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和鼓舞下，六十六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举夺了旧县委、县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阶级敌人丧魂落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逃到开封的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一月夺权不久，他们就急急忙忙勾结地委、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配合社会上的一股反动逆流，在一天的夜里，重新“杀”回了兰考，对手无寸铁的卫焦战士，来了个大逮捕，大镇压。他们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老贫农、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坚强的革命领导干部，成批地逮捕入狱。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把县广播站夺在自己手里，一天到晚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

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旧县委内的走资派依观点的不同划“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所谓请罪运动。

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卑劣手法，强迫社员改变观点为。凡是信了他们的观点的，凡是赞成打倒张钦礼的，他们就发给救济粮、救济款，发给萝卜。他们还把社会上的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投机倒把、好吃懒做的人，统统搜罗起来，为他们摇旗呐喊，以壮声威。

兰考上空笼罩着乌云。兰考大地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决战时刻到来了！一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加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开始了！

赤胆忠心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在这场斗争中，兰考的贫下中农不愧为英雄好汉。不管风浪多么险恶，他们永远记着毛主席的话：“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

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坚信：毛主席是一定会替兰考的贫下中农撑腰的。谁要是把矛头指向贫下中农，他就肯定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他就是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黑线上的人。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反动路线的层层封锁下，听不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他们就在深更半夜，围坐在小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走资派的亲信们要他们改变观点，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俺们贫下中农只有一个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焦书记这面红旗！坚决支持张钦礼！你说张钦礼是个“黑帮分子”，俺们情愿作“黑帮社员”。走资派的亲信说：“改变观点，我给你萝卜！”贫下中农说：“萝卜可以不吃，想叫俺改变观点比登天还难。”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兰考的贫下中农，在和反动路线的殊死斗争中，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啊！

三义寨公社南马庄大队有一个第五生产队，是焦裕禄同志生前亲自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硬骨头生产队”。队长张应堂，是一个热爱集体、一心为公的好干部。由于这个队没有一户不是“卫焦”观点，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自然把它看成眼中钉，并把这个地方划成了“敌占区”。走资派的亲信，掂着棍子，拿着绳子，整天吆二喝三要来抓人。社员们都劝队长张应堂出去躲一躲。可是，生产队就是他的家业，他的命根子。他怎么能够离开呢？！在旧社会，张应堂一家是一个赤贫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家人住了几十年的破庙，要了几十年的饭。……在多少次忆苦会上，他都热泪横流，泣不成声。可是今天，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却象一座金刚一样坐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坚强不屈地说：“不！我不能离开大家。我走了，咱队的生产谁管呀！”这个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的形象，不正是兰考县千百个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吗？

双杨树大队有个大娘叫周玉花。在黑暗的旧社会，她父亲被地主逼死了，母亲饿死了，哥哥被日本人枪杀了。一家人就剩了她一口子。解放后她才翻了身，过上了甜美的日子，有了八个孩子。她逢人就说：“我永世不忘毛主席。”

这次文化大革命，她听说县里出了走资派，跟毛主席不一个心，要复辟资本主义。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她说：“资本主义那条路我是吃过苦头的，不能再走了，我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谁不跟毛主席一个心，俺就坚决造他的反！”就这样，她参加了“兰考卫焦”，成了一名坚强的卫焦战士。她万万没有想到，眼看县里的文化大革命就要胜利的时候，县委的走资派又回来兴风作浪。广播匣子里天天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胡说什么开封“八·二四是混蛋组织”，“兰考卫焦是反革命”。她一听就把线卡了，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

有几天听说开封“八·二四”被保守派包围了。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一心想到开封去看看。有人问她：“八·二四有你的啥人？”她说：“没有我的儿，也没有我的女。是毛主席叫我关心国家大事。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周玉花大娘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她一有空就坐在毛主席像前，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俺兰考的事，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她闺女劝她说：“妈！那是毛主席像，你说了他老人家也听不见。快吃点饭吧！”周玉花说：“不！毛主席就在咱家里。心里有啥话，就得给他老人家说。有毛主席作主，俺啥也不怕。”

周玉花大娘已经五十岁了，身边还有个四五岁的孩子。可是，她每天夜里都跑二三十

里地出去串连。一见到自己的人，她就先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她就是用毛主席的话去鼓舞贫下中农的后生们起来战斗。

走资派的亲信们对周大娘恨得要死，也怕得要死。一见面就讽刺她，挖苦她，骂她是"老顽固"，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说她"受蒙蔽太深啦！"周玉花大娘也分毫不让地说："俺受'蒙蔽'有两丈深，你看着办吧！毛主席武装我的头脑，是铜墙铁壁，谁也打不开！"走资派的亲信们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把周大娘的眼睛都打肿了。可是周大娘一家那里肯服？她的老伴站在大门口高喊："打吧！俺全家都是'八·二四'观点！"周大娘也说："俺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俺还要把毛主席的红旗举得高高的，叫它永远飘扬！"

小宋公社唐寨大队有一个阎协崇大爷。他是县贫协的副主任，出席省贫下中农代表会的代表，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慈祥的脸。头上的一顶棉帽，补了又补，缀了又缀，已经戴了多年了，还不舍得换一换。在兰考县，人们都亲切地称他"阎代表"，说"阎代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主席思想学到心里去了。"平日，听说美帝国主义轰炸越南，他就教育儿女们，用瓜菜掺着粮食吃，省出了二百斤小麦，留着支援越南兄弟。还节省了百多斤粗粮，是专门补助五保户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阎协崇带头起来造反，和韩村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杨素兰等人一起组织了"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坚决保焦裕禄这面红旗，坚决保张钦礼。他认定：周××是走资派，张钦社是好干部。坏人就是要揪，好人就是要保。

就是这样一个可敬爱的老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却被地、县委的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打成了张钦礼的"孝子贤孙"。村子的东西街和南北街，全是围攻他的大字报。连他的一个刚满八个月的孩子，也被贴了大字报，骂成是"小反革命羔"。他家本来是"满家红"，当时却成了"满家黑"。孩子们不敢去上学，不敢去放羊。羊都饿死了。阎大爷本人，也被走资派的亲信们在公社和大队"辩论"（斗争）了几十次。

就是这样千斤的压力，阎协崇大爷保卫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永远不变。他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俺的命根子，还是保卫毛主席要紧！"夜里，他带领全家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幸福是毛主席给的。俺要保卫毛主席江山万万年。"

每一次"辩论"会，阎协崇大爷都当成了忆苦会。他讲自己在旧社会是怎样的吃苦受罪。腊月天，下着大雪，他怎样在冻得红肿的双脚上绑点破布片就去要饭。他讲毛主席怎样把他从火坑里救出来，又怎样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说："我永生永世也不能忘了毛主席。你们想想，贫下中农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有什么罪？你们为啥听信坏人的话，把矛头对准咱贫下中农？！"他的话把那些一时受蒙蔽的群众感动得痛哭流涕！

阎协崇大爷越斗争，精神越旺盛。一天"辩论"他三次，他照样唱着《东方红》的歌子，背诵着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下地去打井。他说："毛主席要我抓革命促生产。我要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兰考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那样热情、勇敢、机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一个个都是小英

雄。他们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儿童，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后代。

在兰考到处流传着孩子们赶走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故事。如今，在韩村的墙壁上，仍然可以看到孩子们写的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大标语。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村大队韩村生产队除了一户以外，全都是一个观点——卫焦观点。地、县委内的走资派为了胁迫这个生产队改变观点，二十九户人家就派来了三十二人的“工作组”。他们一进门，开口就是：“你们受蒙蔽了！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韩村的大人小孩谁不知道焦书记是好人，张书记也是好人！听了“工作组”的宣传，他们心里火透了。尤其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们，他们尖着嗓子质问“工作组”:“你们是啥工作组？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工作组。快走开！”后来，他们就干脆不给“工作组”开饭。一到“工作组”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围上去说：“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路线，咱们不一个观点，不能吃俺们的饭。”有的说：“你说张钦礼是‘黑帮’，俺就是‘黑帮社员’，俺的饭也是‘黑’的，你不能吃！”桌上放上馍，孩子们把馍拿走，桌上摆上饭，孩子们把饭倒回锅里。“工作组”在韩村实在不得人心，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县城，再也不来了。

在和反动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很多孩子都自动组织起来，帮助大人站岗，放哨。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没有笔和纸，他们就用镰刀在场边和大路上到处刻写大字标语：“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场光明和黑暗的决斗，整整持续了五个多月。地、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们，已经深深地陷落在英雄的兰考人民的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骄阳似火。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整个河南开始呈现了一派大好形势。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已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央首长在北京接见了兰考的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同志和“兰考卫焦”的代表。喜讯传来，全县沸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革命人民胜利了！各个公社的贫下中农们自动涌进了县城。从兰考车站到座落在黄河古堤上的焦裕禄同志的墓前，人山人海。人们高举着“兰考卫焦”的战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发自肺腑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为了欢庆胜利，大街两旁的茶水摊也不要钱了。只有亲身参加斗争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

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他们并没有因胜利而陶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正在新生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决心在新的一九六八年，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

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正在踏着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脚印，为建设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而奋勇前进！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　申茂功 1968.11.05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省工代会主任　申茂功）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党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胜利地闭幕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会的召开，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全会发表的公报，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会议公报精辟地总结了在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亿万革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所取得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宣布把长期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宣告了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并且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令。这次会议大长了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的威风。

回顾我们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伟大最正确，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唯一的指导思想，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两年来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等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揪出了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先后击溃了“二月逆流”和今春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邪风，加速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实现辽阔中原一片红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斗、批、改的高潮。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工人阶级，我们工人阶级最忠于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到那里，我们就战斗到那里。我们一千个一万个拥护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各项决议，决心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认真完成斗批改各阶段的任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1972.11.04
中发［1972］42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军民，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王新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河南省的贯彻执行。中央耐心等待他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他至今交代问题的态度不好。中央同意你们的建议，决定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联系河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揭发批判王新的错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在河南顽固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罪责，只能由王新来负。跟着王新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只要同王新的错误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认真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不要揪住不放。对由于王新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要增强党的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人民立于新功，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刘建勋 耿起昌 张树芝

东传钧 杜河堤 李中顺

张耀东 王 辉 戴苏理

申茂功 唐岐山 文香兰

孙冠生 朱启祥 刘玉年

王文德 赵玉轩 韩怀智

支万鉴 杨 贵 张钦礼

王秉章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我们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王新同志的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讨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现报告如下：

（一）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五日，我们召开了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中央针对我省上次批林整风会议，批评我们省委领导上没有联系河南实际，捂了王新的盖子。这个批评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省委衷心拥护，并作了认真检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振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会议以毛主席教导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联系河南实际，会议集中揭了王新问题的盖子，对王新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同志们一致认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三支两军人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和政策，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党、政、军、民沿着“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奋勇前进，斗、批、改深入发展，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以路线斗争为纲，逐步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叛党叛国、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更加热爱，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战备。总的形势大好。

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河南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终于粉碎了王新的阴谋，揭开了他的盖子。经过对王新的揭发批判，省委、省军区党委和驻豫部队，进一步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决心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

大量事实证明，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庐山上第一个跳出来，煽风点火，突然袭击，发出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南组会议上，王新积极追随叶群、李作鹏，把矛头直接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恶毒发言。他说：“有的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想刮这股风，我们很气愤。这是一股子反革命妖风”，“要把这些人、危险分子的丑恶面目揭出来，把他斗倒”，“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林彪点火，叶、李煽风，王新呼应，配合得可好了。就在当天，二十四日晚，吴法宪把王新找到他的住处，策划于密室，进行了反革命串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之后，王新还和林贼死党宋城等人同游庐山，照相留念。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王新在庐山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就竭力投靠林贼一伙，被他们封为“头号的大好”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一个拉，一个靠，相互勾结，由来已久。

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贼摔死，王新同北京来往电话一百四十五次，其中同党中央联系只有三次，大都是同林贼死党来往。“林办“、“吴办”到河南活动的人，都与王新单线联系，行动诡秘。林贼指派亲信，三下河南，王新亲自迎送，设宴招待。多次密谈。死党胡萍等人到河南看工事，进行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来往，当时

就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背着正在郑州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至今还不作彻底交代。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到郑州，以挑选“女护士”、“男内勤”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勾结，使尽了种种卑劣的手段。王新奉“吴办”之命，为林贼挑选了两名历史教员，编写“文艺复兴”等历史资料，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王新为林贼、叶贼窃取古字画，派人专程送给“林办”，而他竟然栽赃诬陷，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王新为调动工作问题，不顾中央已与省委商量决定了的指示，直接打电话给“林办”，要叶群为他说话。更不能容忍的是，王新两次派专人到武汉，通过刘丰看林贼住房，了解林贼是怎样生话的，回来后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按照林贼在阴暗角落里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需要，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郑州住过的房子，改为林贼的住处。

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

王新还和林贼死党相勾结，擅自扣压了向中央报告的重要专案材料。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王新同刘丰的勾结也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经常单线联系，秘密串连，互通情报。从“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与刘丰来往电话达二百九十四次之多。他同刘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新曾同刘丰私下议论，说什么二中全会上“把叶群也牵进去了，很被动。”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叶贼鸣冤叫屈。在刘丰的盖子被揭开之后，王新还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对刘丰的揭发和批判，竭力为刘丰给林贼送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开脱罪责。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了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人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了刘丰。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嚣：“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如此等等，为林彪反党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肆意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曾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令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广大指战员遵照“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揭露了王新的反党罪行，而王新则对抵制他错误的同志，制造种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

后，王新紧密配合林贼一伙所谓“军队受压”的反革命叫嚣，一面攻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刮起了一股‘反军’风”，同时又攻击军政关系搞得好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合穿一条裤子”，恶毒诬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妄图反党乱军的正是王新。

河南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一些，毛主席曾多次鼓励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王新却极力反对，诬蔑“地方干部十几年来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习惯，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还胡说什么“和地方干部打交道要小心，今天在一块共事是朋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把你当敌人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乘“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林县、兰考是毛主席、党中央表彰过的两面红旗。林县、兰考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王新怀着刻骨的仇恨，以“派性”、“反军”、“资产阶级专政”、“独立王国”这四条罪名，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硬是要砍掉这两面红旗。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歌颂，而是恶毒咒骂，把林县的红旗渠、储备粮、粮食上纲要三大成就，诬蔑为闹派性的，“三大件”，“是说假话，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言论。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党中央耐心等待王新同志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武汉区党委甚至把揭发他的材料转给他，希望他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他却对抗中央指示，长期不向党说真话。在去年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和武汉地区座谈会上，他隐瞒罪行，不作检查交代。今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继续顽抗，不向党交心。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以后，他变本加厉，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他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他自立专案，找人为他对口径，写假证明材料。他搞假检讨，在省委和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期间，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王新同志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在大会和商丘地区小组会上的发言》的简报，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过检讨。他背着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分裂会，大肆挑拨军政、军民关系。他恶毒攻击“省委常委是联络站”，挑拨省委常委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

“九·一三”事件后，王新竟然背着省委，将他的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室，并擅自通知各地、市，要把所有关于批林整风的材料上报他所控制的这个由“王办”改成的所谓“党办”，妄图控制对林贼及其死党的揭发斗争。“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王新不但对林彪及其死党不作揭发，对自己的罪行不作彻底交代，而且用流氓手段对付党，狡猾抵赖，栽赃诬陷，威胁起来揭他盖子的同志。直到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这次中央召开的河南省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王新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已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仍然不作彻底

交代，继续顽抗，态度很坏，引起了同志们的莫大愤慨。

我们建议，中央责令王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我们仍然希望，王新同志能够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

为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肃清林贼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巩固和发展河南的大好形势，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搞好批林整风，继续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当前全党的头等大事。要遵照毛主席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教导，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在省委领导下，加强专案清查小组的工作，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贼死党在河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要联系河南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批判王新从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反党阴谋活动。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攻读毛主席著作，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河南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河南阴谋反党，忠实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是王新，三支两军人员和革命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由于路线觉悟不高，没有识破王新的阴谋，上当受骗，跟着王新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要同王新划清界限，揭发、批判，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集中批林，集中揭发批判王新，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各级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扭转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倾向。

我们打算，下一步把王新的问题先传达到县、团级，然后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到基层，发动广大群众，深入揭发批判，肃清其流毒。

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在批林整风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由于王新的错误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坚决纠正。要正确对待群众。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凡是合理的，要弄清情况，逐步加以解决。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忙于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干扰批林整风的大方向。对由于王新推行林贼反革命路线而遭受打击的同志，要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加以处理，本人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服从党的分配。

河南各级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下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大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办好“五·七”干校，坚持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各级干部要服从党的组织分配。城市知识青年，要有领导地继续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有关肃清反革命的各项专案审查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认真搞好清查“五·一六”的落实定案工作，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毛主席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对确属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被审查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三、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

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要严肃批评，耐心教育，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守工作岗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秘密串连，重拉山头，煽动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四、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批林整风中，要提高革命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严防他们破坏捣乱。对于造谣惑众，乘机翻案，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彻底揭露，坚决打击。

五、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团结

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为人民立了新功。决不能因为批判王新罪行，否定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做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进一步密切党、政，军、民的关系，增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

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元化领导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要正确处理好集中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关系。要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在接受上·级军事系统领导的同时，应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

七、以路线斗争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

要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结合

起来，同深入搞好斗、批、改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搞好工农业生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报告，请指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

附：王新的三次检查交代（略）

江青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1974.01.28

请浩亮同志亲送

河南省郏县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同志们亲启

江青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一丁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乃至每个人的历史都有 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近几年来，我翻阅大量资料，访问了许多同志，对河南 省的文化革命运动进行了回顾与思考，我觉得和其它省相比，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 有几个显著的、鲜明的特点。现将这些也许不太成熟的、不太确切的看法谈一下， 以供历史学者和文革研究者参考。

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 少数造反学生，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坚决支持造反派。这批 老干部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握河南省的党政领导大权达十 年之久。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点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刘建勋 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三 位学生，并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 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 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 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学生炮打"我 这个司令官"。八日十九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 表态支持因给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被压制、围攻的学生党言川及河南省第一个大 学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　对于刘 建勋的大字报，在河南一开始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以后还成为河南两派辩 论的焦点。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表扬刘 建勋和这张大字报，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 的。"事实证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产生了影响是巨 大的，也是附合毛泽东的意图的。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不少省份出现 围攻、欧打北京串联学生的事件，大抓"南下一小撮"，而河南省委却在九月二日 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学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刘建勋的这些举动，带动了全 省地市县大批领导干部表态支持少数派，并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沿着《十六条 》的方向健康发展。从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元月，河南省的学校、工厂、机关造反 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打司令部"中成长壮大，由少 数成为多数。河南省军区的介入使这个局面被打破。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 在６７年２月１０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说"河南郑州

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 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 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 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 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 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文敏生的信说出了河南省当时的真实 情况。

一九六七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 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 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 倒。这期间，郑州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开始分裂。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 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黎之，郑州第一书记），并把他们 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则要联合起来，先夺省委文革小 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粮食学院召开常委会，会议决 定：１、在文、纪、戴被红卫兵看管起来的情况下，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 责坚持工作。２、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 "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要求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 斗争。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 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 织——"十大总部"；公开反对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 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 军区党委。这时候，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 数领导干部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带领人到军区找第二政委 何运洪为学生说话，但何运洪拒不接见。六七年二月七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 、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 、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军区不仅 不承认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三月六日，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 大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 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坚信刘建勋 是革命领导干部。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 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 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尉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 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厉害，要 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 就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根据毛主席的 这一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为一方， 河南造总为一方，十大总部为一方）到北京谈判。５月１１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 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而支持二七的领导干部，由于高 压控制无法表明态度。为了争取领导干部在高压下站出来对二七公社的公开支持， ５月１５日，二七公社"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抢"到农学 院，他经过调查了解后，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示支持二七公社 。５月１７日，"豫农红总"又和郑大附中"红旗"一起把刚刚被批斗送回住处的 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十九日夜，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 人乘拉煤的火车

护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 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纷纷发表声明支持 二七。５月２５日，郑州市市委书记王黎之；５月２９日，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 ５月３１日，省公安厅副厅长高大同，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 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从五月到 七月，有近四百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 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支持二七公社，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 的待遇。这些待遇曾作为他们较早支持二七的"资本"被炫耀过。据一份１９６７ 年８月"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资料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共４７人 ，７月２５日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２３人，占此级干部的４９％；同情二 七公社的２人，占４。２５％；中间状态１人占２。１２％；支持河造总的１５人 ，占３２％；支持十大部的６人，占１２。７％； ７月２５日中央表态后，又有部 份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其他领导亲自参加下，河南省 三方赴京汇报团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7月１０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 题的（６７）２１６号文件。文件中指出：（１）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 线性错误；（２）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 （３）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１９６７年7月２５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７·２０"事件 反映的综合报导，在这篇报导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 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 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七、二五"后，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刘建勋 于１９６６年9月1日调到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８月２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 。在省革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实现了"二七公 社"、"开封八二四"和"河南造总"的大联合。到１９６８年初，全省百分之七 十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相当一部份参加了"三结合"。省直机关六十六个 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３９３人，已解放２８４人，占７２％，其中第一把手 ３１人。１９６８年元月２７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 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１－２名副主任暂缺。由"暂 缺"群众组织代表可以看出刘建勋并没有把"浴血奋战"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扶到 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据资料：省级革委会里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职务的： 湖北省３人，其中学生１人；陕西省７人，其中学生３人；四川省９人，其中学生 2人；湖南省２人，其中学生１人）。据河南省地（市）县７７个革委会统计、其 中有４８个革委会付主任群众代表空缺。学生头头担任县革委付主任职务的只有4 个县。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除了军队干部变动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直到１９ ７８年，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 省十年文革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坚持党 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 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２３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 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 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７０年７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 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７０年１１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７ ０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７８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 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后来还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即所谓"河南造反派掌了权"。

１９６８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四十名常委中，有二七公社代表 １４人（包括工人、干部、学生），开封八二四代表３人，其中大中学校造反派头 头８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大联委）、陈红兵（开封八、二四）、周启忠（粮院 联委）、范念民（豫农红总）、杨国雄（河医东方红）、黄宗万（新乡师院八一八 ）、丁素琴（中医学院八、三一，属"河造总"代表）、王传玉（郑大附中红旗） 。１９６８年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和大中学校学生分配，这些 红卫兵头头也毫不例外地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或基层单位接受再教育，他们 的"常委"头衔，除了偶尔去参加一次会议外，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即使省革委刚 刚成立，他们最"红"的那段时间，除了开会，就是跟随刘建勋、纪登奎等老干部 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严重的地市解决派性和大联合问题。１９７１年再教育结束后 ，他们重新分配到工厂、学校担任教师或搞技术工作。１９７３年，在各级党组织 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建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新""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 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大多数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河造总 "和"十大总部"派的。党言川、陈红兵、周启忠、杨国雄、范念民、黄宗万等学 生头头均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其它各个行业的头头也相应提拔到 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 、副校长等职。上行下效，农村到大队、工厂到车间班组都不例外。河南的这种做 法，是全国大势所趋，如王洪文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个见证。是否 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数量上高于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据义愤资料表明，河 南省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发展党员十万六千人，在全国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权"的呢？事实是他们"掌权"后，大 都在基层单位领着工人学大庆，领着农民学大寨，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贪污受贿 者甚少。以河南省几个学生头头为例，在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都做了这 样几件事：一是积极参加和领导本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二是为本公社办企业奔波 ；三是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学林县兴修水利；四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如 间作套种、玉米制种等。总之，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１９７８年，当陈红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２０年后，他的爱人从原 阳县搬家时，当了五年县委副书记和公社第一书记的他其全部家当是几个纸箱和一 个老掉牙的柜子。这与当今的"县太爷"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河南省提拔的新干部绝大部份是副职。正职大都由老干部 担任，由于这些老同志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参加过"三结合"，所以对于新干 部，他们不仅有提拔和重用的权利，也有批评和帮助的资格。在"形势需要"时， 还可能"收拾"一下。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纪登奎来到 河南把一些造反派骂成"不是好东西""四大金刚""八大赖"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次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些被点名批评的造反派又反击了刘建勋 及个别地市委书记。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河南省新老干部的这些恩恩怨怨，自然烟 消云散了。

三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首次批斗"走资派"，是从揭批原 河南省

委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在河南搞"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 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这是河南 文革的第三个特点。

提起党言川，四十五岁以上的河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对于他的响当当的名气 ，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捧起来的；有人说是何运洪（省军区第 二政委）"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撒出来的，有人说是"老保"骂出来的…… 总之，党言川在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可谓家喻户晓，妇儒皆 知。

党言川究竟何许人也？许多人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亦曾发生过许多笑话。如有 一次，郑州一位学生回家，老人们郑重其事对她说，你可不要跟着党言川跑，他是 刘建勋的小老婆，名声太坏，咱可丢不起那人，当这个同学说党言川是个男生时， 大家都笑了。其实，党言川当时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文化革命一开始，郑州大学就成了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 最早的四所大学（其它三所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一。一九六 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当天 晚上，郑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大字 报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 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大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六月三日，全校 性的反击开始了。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 派""牛鬼蛇神"。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１７４人，一 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郑大校 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六月六日凌晨，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转业军人 、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大。工作组进驻 后，继续压制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六月七日晚，党言川同学因同意王相海的大 字报观点被斗争。六月十八日，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巨幅标语。八月一日至 三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 ，信中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同日，党言川等九人贴 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而另部份学生 则贴出了《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正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 上是否定党的领导》等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等。八月六日，党言川第一个上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 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个学生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 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 ，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示了要按照党中央决定搞好河南文化大革 命的态度。八月十五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郑。当天晚 上，他们串联部份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 ），并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 参加了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其他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 革负责人要求主持会议，双方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 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与会群众，并宣 传了《十六条》精神。十五日晚上和十六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 师生辩论会"，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 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呼出"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 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接着是连续三天的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的围攻 斗争。八月十八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来到郑 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

会，听取意见。八月十九日，刘建勋、纪登奎等 又到郑大，召开了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宣读了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 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 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 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份同学认为 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他们起来闹革命 ，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 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刘建勋的大字报使郑州大 学的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八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正式成立。九 月三日，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吹响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进军号。呼吁书中这样 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 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１９５８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 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九月 四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揪吴芝圃。九月五日， 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河南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 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工人、农 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在次提到河 南省１９５９年大刮"五风"及"信阳事件"问题。九月十一日，郑大联委第二次 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会上给省委副书 记、副省长赵××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这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属首次），引 起了在场的纪登奎、张耀东的不满。纪登奎当场质问大会主席，你们说赵××是历 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其实，这里指的正是一九五九年前后，河南大搞浮夸风，高 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饿死的这段悲惨历史！党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应， 数万人起来批斗省委领导赵××（当时吴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于这个背景。从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以下两件事件可以说明。

六六年八月在郑州大学贴出的一份转抄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 剐吴芝圃，大字报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 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 ，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 的时侯，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 ，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 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 五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 口粮！"……；另一件事是六六年八月在新乡师范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的丁×得到 了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给新乡师院同学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你在第一封信 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５８－５９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哪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 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 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 人、农民，就是参加５８－－５９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 大跃进，心中就有些煌煌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 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 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 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 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 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转抄的《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和党言川１９ ６２年

的私人信件，成了党言川"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 "。刘建勋和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其他省委领导对党言川的看法也发生 了变化。文敏生在９月５日的"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上曾说"你们的大会 ，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持支持你们"，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当有 人提出郑大联委《火急呼吁书》有攻击三面红旗问题时，文敏生说，对郑大联委要 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 不是个好东西"。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战斗师也抓住这些"铁证"，向郑大联 委和党言川发动了总攻击，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 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九月七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 锋相对地发出《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 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 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 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 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 ！黎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在这种情况下，郑大 联委于九月二十五日又发出了《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 ：《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 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 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 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九月十九日，郑 大联委再次召开"揭发批判赵××、杨××大会"，并公布了《把赵××的反动嘴 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在强大的攻势下赵××、杨××、基本靠边站了。

六七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又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 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 持清算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的极"左"倾向、饿死数十万 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支持，队伍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 。

然而，到了六七年二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郑大联委被 宣布为非法组织，党言川等被捕入狱，材料被抄走，吴芝圃也被军区保护起来。

一月二十二日，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为首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出了 《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 ：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 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５９、６０年老帐？为什么在河南很多单位造反派阵 线不清？……。一月二十三日，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把《二十七个为什 么》奉若神明，两次登在《郑州晚报》上。并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对待清华井冈 山驻郑联络站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三月六日，在郑州 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代表唐× 发了言。正是在这个大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 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 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 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军区的介入，使已经被造反派批判靠边站的赵××兴高采烈，多次给军区写信， 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 ""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

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 好！你们要干到底！"。而以郑大联委为首的造反派却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被 河南省造反派称之为的"二月黑风"。

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 东生活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 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四十八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 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历史系５０名联委成员 中３人被捕，１０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３８人被斗，１０２人次被搜查，大字报 点名４０－５０人，写检查１１３份，４３４０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 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 派翻天"！４０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三月九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 封师院八二四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被捕。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 不能参加北京谈判，军区支持"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 "五、四"、"五、二六"、"五、卅"、"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 二七派的武装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 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死亡人员的墓地（５０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对于这段历史，河南省军区在６７年６月２７日给中央的检查报告中说：我们 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 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 具"；"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 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 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 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 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军区的检查报 告，白纸黑字，是非曲直，明明白白。

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中两派的群众都是革命的，以上特点的分析足以说明此 论断的正确。１９５９年前后，发生在河南省的"信阳事件"，骇人听闻、震惊全 国。虽然历史已有定论，吴芝圃曾在检查中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 也还不清"，饱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对此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党言川等在毛泽东" 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旧事重提，清算这段罪行，也是情有可原的。十八岁的党言 川，受河南省１９５９年现状的影响，对三面红旗发表了一些糊涂认识也是可以谅 解的。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也确实犯有"左"倾错误。党言川和同学在私人信 件中谈论这些问题说明他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文革中借此 给党言川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反动学生"的帽子是错误的。　说"三面红旗倒 了两个"自然坚决不答应！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郑州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的一分传单中说：《火急呼吁书》中说河南省多年来搞的不像样子，公然攻击三面红 旗，"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一个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的河南，一个居住 五千万革命群众的河南，竟被他们骂成这个样子！""他们还公然煽动要大闹河南 省委，要闹个天翻地覆，闹得越乱越好，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下，这到 底是哪家的声音？"一份批判党言川的"反动信件"的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 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党言川在这封信里不但恶毒的攻 击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了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 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人说，这封信是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写 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谅。我们说，正因为是一九六二年写的，十八岁的党言川 就有着如此系统，如此反动的观点，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从这些批判党言川 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党对毛主席一腔赤诚。当时，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 等

省委领导也认为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有一定的错误。１９６ ９年６月１日，毛主席在郑州的专列上接见刘建勋、纪登奎时问："你们不是支持 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吗？支持的是对的么！党言川怎样？"刘建勋回答说："他 是省革委委员（应是常委——作者注），表现不太好，我们批评帮助他，他给中央 写了一个检讨"。据说这个检讨是党言川参加省委常委时写的，内容就是对三面红 旗的看法问题。

四

在清算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左倾蛮乾造成"信阳事件"者 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也是河南的 一大特点。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 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 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 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 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 ，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历时 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 千人，逮捕判刑１７００人，又"突击判刑"２４００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 ，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 如一个焦作市，判刑９６人，却抓了３１８人，劳教３７人，抓一两年放的１８５ 人，死亡１１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 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７、２５ "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 "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７、２５"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 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 ，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 ："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 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 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 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２人 ，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 委负责人。

１９８４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 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 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 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１９ 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 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 "铁证如山，而他们却把打砸抢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 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 派升天，一派坐监。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时代和 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 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以人划线，把文革中支 持"河南造总"并代表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 理封为一贯正确，并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 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付书记×× 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 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 "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察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４０ 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份的２０２５人（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 看４９３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 它处份２５０人)；免于刑事处份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份的１０７人。河南 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 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份的数量远无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 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１９５４年就 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 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 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 ，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 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９７年6月，她在 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 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凄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 "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６７％，其中，判刑 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１ 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 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籍３人，留 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离休４人，降职安排２人；全省十 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 判处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开除 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 降职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 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 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 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 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 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 "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 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 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 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

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 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 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按排好，造成生 活极度困难，９８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 伴死在家里。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１９７９年底 ，河南省省委书记赵××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拆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 月１日生效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 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 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 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 ，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 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 ，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８"字前加个"１"字，改为１８年。这种做法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１９ ６７年２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 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 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２０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是否准确，还有待研究。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稿，２０００年8月修改

谈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革

我是 1947 年十七岁初中毕业怀着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严重不满奔向革命，1949 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豫皖苏一地委干部学校、太康县委、淮阳地委、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工作。文革前任宣传部秘书。在土改、土改运动中，我一直任工作组长，从头至尾参加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大大加深了我对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认识，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政治上没有犯过错误，一直受到党的信任和器重。

可是从文革开始，我踏入了一生的坎坷道路。河南文革一开始，我首先听到郑州大学一部分学生因贴出批评校党委转移大方向，点批"反动学术权威"、压制群众运动的大字报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并操纵一部分学生保党委，贴出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字报，使学生分裂成为两派相互斗。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后，仍继续维护校党委，压制给校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逼得一位学生领袖跳楼身亡。其它几所大学也相继发生类似情况，不久，运动波及工厂和省直机关。省委机关一些警卫员、通讯员、电话员、

打字员、女保育员起来向省委、省委办公厅领导提意见，也被打成反革命，进行许多次批斗打骂，限制人身自由，不许进食堂吃饭，经常在食堂门口围攻他们，往脸上吐痰。罚他们扫院子、清厕所。与此同时，省直各机关都打了一大批"反革命"、"黑帮"、"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小三家村"等等，给他们戴高帽子，脱赤脚、脖子里挂着鞋子，在近四十度阳光照射的烫脚的柏油马路上，伴随着"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和沉闷悲怆的锣鼓声，被各单位的领导人率领着臂戴红袖章的人押着游街示众。我爱人 1950 年元月参加革命，很早加入共青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只因出身地主，在赶地主婆时，一个政治扒手硬是造谣说听见她骂革命群众滚回去，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拉入戴高帽游街的行列。当时整个郑州市各街道成群结队，涌满了被游街示众的"反革命"队伍，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我爱人回到家时，脚被炙热的柏油马路烧伤，加上强迫行走在一处堆满碎玻璃渣的地面上，双脚血迹斑斑，我给她将刺进肌肉的玻璃渣一点一点挑出，用酒精消毒包扎好。在她脚疼得不能走路的情况下，仍强迫她挖土方，进行劳动改造。

所有这些耳闻目睹亲历，使我深深感到这种作法，绝不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党的一贯政策。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布后，我阅读着热泪盈眶，更感到毛主席多么英明伟大啊！他什么时候都和革命群众心连心。几天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公布他的大字报，坚决支持郑大被打成反革命的少数派学生。接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使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群从自己解放自己，组成了革命造反派队伍，并得到迅速壮大。

但是到 1967 年 2 月省军区介入，公开支持文革开始时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和从造反派队伍中分裂出去的少数派，并操纵成立了河南省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公开宣布全省造反派自动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大肆逮捕二七公社各组织的领导人。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被关进监狱，把支持二七公社的省委领导人纪登奎也监管起来。各单位都对加入和支持二七公社的人员进行清查批斗，限制人身自由。一部分坚持战斗的二七公社成员被河造总和十大总部围攻，开始发生武斗。特别在毛主席指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把两派群众组织搞颠倒了，把革命派打成了反革命，并提出要让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来北京汇报时，省军区和后来被中央文件正式定为河南省委中的走资派的赵文甫，以及河造总、十大总部的头头共同策划，要在向中央汇报前，尽快把二七公社全部消灭掉，造成既成事实，使支持二七公社的刘建勋、纪登奎成为光杆司令，无法作为一派的领导干部向中央汇报。

在这一决策下，河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对二七公社的残酷围剿，大规模武斗从此开始了，在省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下，十大总部、河造总出动数百辆大卡车，头戴钢盔、柳条帽，手持大刀长矛，在郑州市游行示威，声言要血洗二七公社，动用吊车、推土机围攻二七公社被迫退守的几个据点，先后制造了十多起大型武斗流血事件，烧毁国棉六厂大楼，许多二七公社成员惨死在血泊中，受轻重伤的不计其数。在郑州市大街上，随时可见围攻毒打二七公社成员的事件，甚至有人喊一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被认为是同情二七公社也立即遭到毒打，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

我正是由于省委宣传部的群众组织强迫我在全体人员大会上亮明观点时，坦率地讲明了我对河南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看法，指出他们背离了毛主席路线，话还没说完，会场上就喊

起了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止仁的口号，立即要拉我上大街辩论，实际是一上大街要把我打个半死。这时恰巧已到下班时间，他们宣布下午继续开会。我考虑郑州已不能存身了，就在这天中午和我爱人带上九岁、十二岁的两个孩子跑到北京我哥（杨局人，新华总社干部）家。帮助河南二七公社驻京联络站和后来从监管中被抢出来护送至京的纪登奎做些向中央汇报河南情况的准备工作。

中央开始听取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汇报报后，我同我爱人和两个孩子回到郑州，分别住到河南农学院、粮食学院两个被称为革命根据地的二七公社据点里，同学生一起战斗。在一天傍晚，我被农学院的河造总绑架走，在地下室被毒打了一夜，要我交出农学院二七派的学生领袖住处，我怕引起武斗，坚决不说，一直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天明他们无奈把我放出。我的衣服全被打烂了，身上多处创伤，幸未伤骨，疼痛数日才好。直到河南三派向中央汇报会上周总理指出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文件，并另派支左部队进驻郑州，二七公社才取得胜利。

在实现大联合建立省革委会以后不久，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军区第一副政委、省委副书记王新，借军工宣队进驻各单位领导斗批政，又将二七公社一派从新建立的革委会领导小组中整下去，很多人又挨了批斗。并将矛头指向省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纪登奎。对纪登奎的夫人王纯以反军罪名批斗数十场。

这时刘建勋、纪登奎正派我整顿二七公社报。我刚刚整顿结束，复刊出了第一张报，给刘建勋送审清样时，被刘建勋指责一通，毫无根据地怀疑我反军，让我回原省委机关受军、工宣队审查。四个月后，没审查出任何问题，刘建勋又起用我去给他搞一个工厂斗批改试点。

这个试点尚未搞完，我鉴于运动反复太多，向刘建勋申请不愿留省革委工作，坚决同原省委机关从书记、部长到全体工作人员一块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刘建勋很快批准了。我动员我爱人也向她单位申请下去。于是，我将住房交公，全家户口、粮食关系通通转下去，带领全家到予西山区队插队落户。不到两个月，又被省革委通知回郑州参加审查"五一六"和所谓四起反革命案件的学习班，关进省委党校八个月，失去自由，又对我从经济、政治、历史、作风、与各种人的联系全面彻底进行审查，仍未找出任何问题，才又放我回到予西山区插队的地方。我在农村住了三年，除 1971 年春天洛阳地委通知参加县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听取传达中央批陈整风的文件和后来又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外，完全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直到 1972 年月 10 月，我忽然接到省委要我回郑州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在会上才知道河南揪出并揭批林彪的死党王新。

刘建勋派车接我到他住处，给我讲了揭出王新的经过，对我说了些安慰话，确定将我调回省委宣传部恢复工作。任命我为宣传处处长。1974 年初又任命我为副部长。直到毛泽东同志逝世，我一直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遵照中央、省委文件兢兢业业地工作。

1975 年初邓小平一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就进行全面整顿，用三项指示为纲取代毛泽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全面整顿实际是全面翻案，又一次整造反派。河南许多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再次挨整，有的被撤消领导职务下放锻炼。毛泽东同志看清了邓小平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许诺，要借全面整顿，全面否定文革成果，又果断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扭转了政局，造反派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保护。

尽管毛主席生前多次讲述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在毛主席逝世后，在揭批"四人帮"清查帮派体系的运动中，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像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一样"的口号，彻底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实为彻底围剿忠实执行毛主席路线的革命造所派，彻底摧垮毛泽东同志借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社会政治力量。这就为邓小平彻底篡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排除了障碍。

在河南揭批查运动中，我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1932 年参加工作的老红军）、唐岐山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后到郑州铁路局当八级老技工，文革中铁路局造反派领袖、后当选为九届、十届党中央委员、省委常委、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周民英同志（1937 年参加革命，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首当其冲。

事情是这样的：1976 年 6 月，我听到纪登奎的儿子纪虎民向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在北京治病的副部长散布许多分裂中央的言论，感到这样很不好，和也听到这一情况的董万里同志不约而同地都向新华分社社长周民英同志作了反映，并希望通过内参反映给毛主席。然后，新华分社以董万里同志和我两人的名义拟写了一份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通过新华总社送到当时分管新华社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那里。姚还没有呈送到毛主席手里，就被逮捕抄家，该内参被抄出。纪登奎和刘建勋便以这件事为根据，作为和"四人帮"有联系的重大问题，将董万里、周民英和我实行武装监护审查，加上曾直接被江青接见过的唐岐山，把我们作为河南的"四人帮"在全省批斗。铺天盖地打倒"唐董杨周"的大字标语大字报遍布全省。最大的一次全省有线广播批斗大会，加上郑州市的主会场 12 万人，共参加两千万人，实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批斗会了。

奇怪的是，在监护审查三年给我作的结论经我连续三次批驳，指出上述那件事按党章规定完全符合组织原则，构不成什么错误，最后结论不得不撤掉后，剩下的全是执行中央省委文件中的问题，责任并不在我，但仍给我结论改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我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省委宣传部重新上台的文革前的几位老部长开始都不同意给我这样重的处分，提出应该留在党内，但经省委常委先后讨论十七次，仍然按照中央文件正式定为走资派又重新上台的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等人的意见做出决定。而和我同案的被人们公认为一生最耿直最坚持原则最一贯忠实于党和毛主席的路线的董万里同志，却因未得到及时治疗，于 1977 年 10 月 3 日病死在监护的牢房里；老志愿军战士、老工人唐岐山同志被判刑不久死于狱中；周民英因为新华总社坚决不同意河南省委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后来两家各让步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仍按分社社长办理离休。我出监后，给董万里同志这位老红军、坚贞不屈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写的墓碑是："生为人民四十五年鞠躬尽瘁，死为革命一生慷慨正气长存"。

我受处分后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但我最大的苦恼是考虑不出怎样继续革命，去哪里寻找培育我几十年的亲爱的党和亲爱的同志和战友。我经常吟咏的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我六十岁生日时吟诵鲁迅"老翁把酒问墨身，几许回天荡埃尘？愤愤热血无洒处，老道空存一颗心。"在这"惯于长夜过去时春时"的漫长岁月里，忽然和我素不相识的董万里同志在太行时的老战友梁心明同志由董万里同志的夫人陪同来家看望我，并给我带来了《中流》，我见到《中流》如同我初参加革命时寻找到了党和真理、革命队伍一样的兴奋至极。十多年的苦恼沉闷顿时消了，我立即投入了新时期新特点的革命斗争。

以上我毫无保留地向您谈了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以及我个人的坎坷遭遇，我对文革的认识，自然是要受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参予实践的河南文革的重大影响的。作为一个大省的河南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它向我们说明了许多问题。我认为它所提供的情况，对我们全面思考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

不再沉默

霜叶

一九六六年初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史无前例的、震憾五州四海的、由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亿万群众踊跃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这场被毛泽东称为“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来又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历经十载，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毛泽东去世二十八天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接着文革中的第二号“走资派”— —-曾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复出，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并定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于是，血泪控诉、平反昭雪、拨乱反正、揭批查、清理三种人、伤痕文学……到了一九九六年，文化革命三十周年，文革结束二十周年的时侯，国外有关文革的议论沸沸扬扬，甚至还有“试图赋于文革某些合理性、先进性”的论调，而国内- -文革的发源地---”文革这个主题却显得出人意料的沉默”(海外学者语)，虽然也有几篇关于文革的学术文章问世，其内容也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虽然也有“蠢蠢欲动”者，企图出版关于文革的回忆文集，征稿、组稿很忙乎了一阵子，也终于流产。这是为什么？是人们在对文革的咀咒声、漫骂声、彻底否定声中羞于再提往事，还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疲倦了、麻木了、忘却了……？终于有一天，我在《钟山文学》第 1 03 期上读到了冯骥才先生的文章：《终结文革》及其两篇附录：一是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对二十名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采访实录；二是关于冯先生谈《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工程采访录(瑞士)--介绍冯先生为普通老百姓纪载他们文革经历的记实文学。我不知道冯先生所写的一百个人(据说采访了四千人)能否代表亿万文革亲历者，也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否起到“唤起民众自我反省，推动民众自我拯救”的作用，然而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共鸣，触动了尘封于心底的“文革情结”。那就是：“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的、真实的记住文革”。

我的文革情结，是一种时时想鸣的不平感。作为一个六十年代的老五届大学生(1966年---1970 年)，一个文化革命的冲锋陷阵者，我深知这场席卷全国、触及人们灵魂的群众运动，其广泛性、深入性、复杂性、多面性、残酷性使得任何简单肯定或否定的说法都不免流于肤浅。对于文革的评价，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是全盘否定，还是“三七”开，毕竟是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事，但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二十多年来，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老三届中学生(1966----1968 年)以他们上山下乡的“苦难经历”为资本，出书、聚会，举行种种活动；一些具有高贵血统的老红卫兵，随着他们父辈的重新掌权而出人头地，不断炫耀自己的一贯正确；而同样为文革付出了青春的老五届大学生，特别是其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却始终沉默着。虽然沉默是金，却是以心灵的伤痛为代价的。文革乃至文革结束后相当长时间里，给我们打的烙印太深、太深了，直到文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仍有一些人因为“文革罪”背着沉重的包袱，生活无着落，子女受牵连。右

派二十年后平了反，我们什么时侯才能得到一纸公正呢？所以尽管这些人对文革这个话题始终沉默着，但决不会忘掉文革。

文革被否定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些文革后出生的年青人---非文革的经历者，对文革的认识和了解的程度又如何呢?冯骥才先生对二十余名青年的采访实录颇能说明些问题。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一代的文革概念是那样肤浅、幼稚、支离破碎、面目各异甚至荒唐可笑，当然也有疑问和迷惘者。“每个人对文革的说法都不一样，给我的印象很乱。有人说文革生活很苦，大学毕业才五十多块钱，但又有人说那时物价很低，一斤肉不到一块钱，有人说文革随便打人，社会很乱，也有人说那时干部清廉，治安很好，有人说毛主席犯了错误，可有人说毛主席很伟大，一声令下，全国闻风而动。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形不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我曾经把这些话对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说过，他说这话全对，我听了就更糊涂了” - -一个十九岁的男性青年如是说。另一个十七岁的高二学生说：“为什么对文革好象有点回避呢?考历史时老师说：不考这块，甭准备了，这块就是课本上的文革内容。家里的爷爷奶奶也常嘱咐我们对文革“千万少说”。两位青年的话道出了他们文革概念的模糊及其原因。

青年一代对文革的印象大都来自长辈口中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宣传媒体。二十多年来，宣传媒体千篇一律的把造反派红卫兵描写成打砸抢分子或不学无术只会背语录、跳忠字午的狂热者，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印象中，文革就是打砸抢，亿万文革参加者，似乎也成了令人不可理喻的、愚昧无知的、疯狂的精神病患者。(实际上一些盲目崇拜的做法在大学生中并不普遍，即是社会上也很快被纠正)。我不禁想问：如果真是这样，1967 年我国第一棵氢弹爆炸成功、1 968 年万吨级远洋巨轮高阳号成功下水、南京长江大桥提前通车，1969 年，我国造成最大的水泥厂、氮肥厂、大型轧钢厂，1970 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还有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河南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的红旗渠、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等等，所有这一切难道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那些把文革说的一无事处的人也许会说，这些成就都是工农群众创造的，你们这些青年学生只会造反、批斗。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亿万工农群众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既是充当急先锋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批斗也决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可否认，在文革初期批斗“学术权威”、横扫“牛鬼蛇神”中许多老知识分子遭到打击迫害；在以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中又使一些人遭受冤枉，但是这一些究竟是谁的责任？ 事实明明摆在那里，却让我们这些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为了争取向官僚腐败者斗争的权力，为了反抗工作组的压制而造反的青年学生来承担千古罪名，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能令人心服吗?

如今，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代人都已年过半百，染霜的鬓发是我们历经沧桑、饱尝辛酸的象征；额头上条条皱纹里记述了我们走过的坎坷的历程。当我们读着那些把时间、地点、人物、活动都搞得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文革史”、“文革纪实”“文革研究”等等文革作品的时侯，当我看到文革中的像章、语录、传单、宣传画等文革载体的碎片散落在各地的旧物市场，和古玩字画一起被收藏者或研究者讨价还价的时侯，我不禁感概万千！最大的文革载体莫过于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当我们还健在的时侯，“文革品”就成了“文物”，倘若后人就凭那些一鳞半爪的文物和莫衷一是的文革作品去研究文革、评价文革、岂不是最大的悲哀！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的记住文革。要彻底真实的记住文革，只有我们这些文革经历者不再保持沉默。

许多年来，文革给我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口时时隐隐作痛，使我常常有一吐为快的冲动。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刻骨铭心。十年文革，惊涛骇浪，我付出了青春，热血和真诚；十年反思，痛定思痛，卧薪尝胆，冷静思考，更加成熟和自信。十年改革，经济大潮，为名忙、为利忙，为权忙，损公肥私者有之；劳心苦，劳力苦，养家糊口自得其乐有之；利用职权，大贪大捞、大福大贵、大红大紫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者有之，然而更多的－ －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大多数却是无怨无悔、坦坦荡荡，不为金钱所诱惑，不为权力所动心，辛勤为立足之本，克己为国家分忧，鞠躬尽瘁、默默奉献。我们所受到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我们什么时侯都不会胡作非为，什么时侯都是国家最稳定的因素！我们这代人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我多么想为这代人讴歌一曲!当我拿起笔来的时侯，总有好心者劝阻：文革是禁区，小心闯祸!今天，虽然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闯这个禁区我仍是心有余悸，如履薄冰。我所以不再沉默，把四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公布于众，实为抛砖引玉。希望我们这代人在有生之年，对文革进行回顾与反思。把历史材料留给后人。让后人记住真实的文革。

我几乎是踏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鼓点进入学校大门的。我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从小学到大学，我无时无刻不接受到爱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共产党好，毛主席伟大，社会主义优越的信念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根深蒂固。初中时代，我正赶上大跃进，踊跃的参加大办钢铁运动，在冰冷的水里淘铁沙，把家里铁锅铁盆砸烂拿到烘炉中去练钢;我曾吃过人民公社的食堂饭，享受过“共产主义”的喜悦。一九六 O 年，我初中毕业考到地区高中，当我第一次坐上汽车走出山村，惊叹“白（柏）油路怎么会是黑的？”的时侯，第一次到许昌，看到城市风采的时侯，兴高采烈的我，兜子里装的只有用白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六元人民币和几个用野菜掺和玉米面烙的饼子- ---全年的学费和第一次出门的干粮。高中的三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嚼着树叶、吃着红薯面做成的“什锦点心”、喝着能照见五官的稀粥过来的。暑假回到家里，门上贴的“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众人心”的对联依稀可见，然而看到的是由于自然灾害和河南省当政者“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群众生活困难民不聊生的景象，听到的是群众对社队干部多吃多占、浮夸虚报、弄虚作假、大放“卫星”的怨声。对此，老百姓却说: 上面的经是好的，都叫下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学校里，政治课老师大讲苏修如何撤走专家卡我们的脖子，相信困难是暂时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尽管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仍是认认真真学习文化知识，乐呵呵地高唱反修歌曲，对共产党、毛主席忠心不二。直到八十年代毛泽东的卫士长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毛泽东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曾七个月不吃肉，其爱女李讷也忍饥挨饿的情况时，已经历经坎坷步入中年的我，仍禁不住为领袖的风采热泪盈眶。一位老友戏称我是“历尽艰辛终不悔，一代忠骨红卫兵”。是愚忠吗? 我至今还不这样认为。

一九六三年夏，我进入大学校门，成了我家祖祖辈辈第一代大学生。和其它农民子女一样享受国家助学金。每月十三元伍角钱的伙食费学校配给。白馍、包子、卤面, 和高中相比呈天壤之别。然而和城市同学相比，三大差别(城乡、工农、脑体)体现得那样充分。他(她)们时髦华丽的衣着 (当然不能和当今相比!)，把我的粗布褂子、土造西服裤子衬托得“土得掉渣”。对此，我克服了曾一度产生的自卑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实践，力图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当然, 同学中也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者,屡屡成为政治活动批评的对象。

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大学里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学习雷锋、学习王杰、学

习毛主席著作。社会上开展的文化战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更是如火如荼，如: 文学界批判“中间人物论”,电影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戏剧界的京剧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极大的激发了我们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1 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前奏”的文章当时对我们青年学生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半年后，(1966 年 5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又一篇题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第二天又在全国各报刊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是贩卖资产阶级思想的“黑店”，从此，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连篇累牍，火药味越来越浓烈，全国各省市揪出了大大小小许多“三家村”黑店“老板”，这些“黑帮分子”大都是才高八斗、德高望重兼有党政权力的人物。这无疑在大学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多年来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所积累的阶级斗争觉悟，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斗争果然太复杂、太尖锐了，竟然有人含沙射影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口殊笔伐，参加战斗。然而，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省级院校的大学生，我们没有北京- ---天子脚下----那些高干子弟学生特有的政治嗅觉和历史使命感，不可能知道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更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 • 一六通知”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侯，我们即是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冒然提，在不少人心目中，校党委就代表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所以我们大多数青年学生是随着院系党委的指挥棒，高呼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被卷入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首次把矛头公开指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吹响了向当权派开火的号角，这号角使青年学生意识到他们也有向当权者挑战的权力，于是，我们当中少数政治嗅觉敏锐者对本单位的斗争大方向产生了怀疑，并效法聂元梓等向院党委写大字报，这使一贯以党的化身自居的当权者暴跳如雷，连夜召开党委会组织反击，企图把少数造反学生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小“三家村”，校园呈一片白色恐怖，甚至出现学生被迫自杀事件。这种压制民主的做法更加激化了学生与当权者的矛盾，也无形中壮大了少数派的队伍。六月三日，我们就停课闹革命。反对院党委的大字报、声援大字报及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学校还出现揪斗党委书记的现象，学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省市委工作组进校以替代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对少数造反学生仍采取压制态度，一方面派人暗地整理这些学生的黑材料，一方面实行“反干扰”的政策组织反击：声讨会、批判会、集中交待问题使许多学生遭受过重打击。在这段时间里，工作组究竟整了多少学生，打了多少“右派”、“反革命”，我不得而知。从今天官方出版的一些资料中摘录几例可见一斑。“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的反蒯斗争中有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争，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共和国史记》第三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年出版第 104 页)；西安交大发生“六.六”事件，7、8、9 日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 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同上第 99 页)。”据北京 24 所高校的统计数字，66 年 6 月 23 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学生 1 0111 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 2591 人。(《红卫兵秘录》于辉编，团结出版社，1993 年第 340 页)。是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扭转了造反派受压的局面。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高度赞扬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毛泽东说：“在这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

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的支持使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造反派欢腾跳跃，激动万分，他们流着泪千遍万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拚到底!接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各地先后撤消了工作组，一九六六年十月，刘少奇、邓小平就派工作组问题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检讨，各省市有关领导也相继进行了检查。自此，造反派扬眉吐气，一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面向省市委当权派开炮，（谁是走资派，通常是根据群众的揭露或当权派的表现和交待）。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至年底，我们把“四大”这一文斗武器应用得淋漓尽致。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我身挂小喇叭在校园里彻夜不眠大辩论的情景。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参加辩论的权力和退出辩论的自由。(当然，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往往心有悸而充当旁观者)。为了避免双方以遭围攻为借口互相攻击，我们在围成圈辩论时留个缺口，以示随时都可以退出辩论。造反派的队伍正是在大辩论中成长壮大成为多数派的。

纵观文革初期这段历史，究竟谁是整群众的罪魁祸首？当时领导文化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明知道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采取五七年反右的办法在学生中抓右派，另一方面，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教师、知识分子。刘少奇曾对中学文化革命进行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

一九六七年元月，军队介入文化革命后，有的地方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使这些地区又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文斗逐步上升为武斗。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以后，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发生了分裂，武斗、抢枪事件不断发生，出现了毛泽东后来批评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为了制止武斗，尽快结束失控的局面，中央采取了各种措施：颁发了“七.三”、“七.二四”布告、派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制定学生分配方案等。毛泽东还在 1968 年 7 月 28 日亲自召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对打派仗、搞武斗进行了批评。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后，全国掀起中学生上山下乡的热潮。接着，大学生也相继离校、被分配到基层：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去了。这一切充分说明，造反派虽然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始终是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部署，无愧于红卫兵的称号。

红卫兵，这个曾使亿万青少年狂热并引为自豪的称号，在我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永不磨灭的印迹。至今我还放着当年的红袖章、照片和受到毛主席检阅后写下的滚烫的日记……对于我当红卫兵，至今无怨无悔，然而红卫兵运动的兴衰史却留给我许多思考和感慨……。

一九六六年五日二十九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园明园的废墟上，由清华附中几个高年级中学生凭着他们得天独厚的环境所特有的政治敏锐和历史使命感建立起来。他们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首次在大字报中披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一毛主席语录，这张极富煽动性、鼓舞性、战斗性的大字报被工作组视为“反革命宣言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赞扬和支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师生，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连同以后八次共接见红卫兵一千三百万人，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从此，红卫兵象

无数横空出世的孙悟空，挥舞着金箍棒，“搅得周天寒彻”。毛泽东利用了红卫兵的热情把文化革命推向高潮，红卫兵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充当了文化革命的急先锋。他们高唱造反歌，走向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们串联、集会、讲演、大喊大叫，在红色“恐怖”中演出了一幕幕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的正剧、闹剧、丑剧。

就在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向旧世界宣战的同时，一九六六年八月首都“红五类”红卫兵(称为老红卫兵)，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再次掀起批斗“学术权威”、“黑帮”、“黑五类”、“牛鬼蛇神”的高潮。在号称红八月里，制造出骇人听闻的事件，为红卫兵运动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当毛泽东极力把运动的矛头引向党内走资派的时侯，一些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红卫兵开始对文革的目的何在迷惑不解，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成为全国红卫兵的模范去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便在风浪中成长接班，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自己的父辈被接二连三的打倒、自己由“红五类”变为“黑七类”的事实，由困惑而愤怒，而反击，公然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1 966 年 12 月 5 日，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宣告成立。他们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自我保护的力量与在中央文革支持下，矛头始终指向走资派的造反派红卫兵相抗衡。他们怀着对“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父辈遭受迫害的仇恨，竭力发泄不满，屡屡制造事端，最终遭到中央文革的弹压。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八十年代，随着文化革命的彻底被否定，中央对“联动”平了反。当年的联动成员在历经坎坷后，有的发愤图强，凭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成了作家、科学家或受人尊敬的人民公仆；有的利用父辈的平反昭雪重新掌权或恢复名誉而飞黄腾达，终于实现了“接班”的宏愿；有的利用特殊地位成了经济大潮的弄潮儿，他们呼风唤雨，损公肥私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以十倍的疯狂向社会讨索青春失落的利息”（安文江先生语），还大言不惭的吹嘘自己是“老红卫兵”、是最早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四人帮”的“洞察秋毫”者，他们利用各种媒体宣扬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来唤起人们的同情而巧妙的掩盖文革中被推荐上大学、入党的事实。其实，他们所受的痛苦折磨，比起普通老百姓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只不过是失去了部分特权而已。所以，对于那些文革初期挥舞“血统论”的大棒，迫害知识分子、迫害“黑五类”而今又以特殊身份招摇过市者，实在令国人嗤之以鼻。

然而，在否定文革的种种媒体宣传中，往往把文革初期迫害老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强加于造反派红卫兵身上。事实上，从 1966 年 6 月至 8 月，造反派为反抗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抗争着，即是在工作组撤走后，工作组一手炮制的“文革会”“主席团”“筹委会”等组织以及以后改头换面成立的各种红卫兵组织(有的地方被称为三字兵)，仍把批“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作为大方向。大部分造反派红卫兵是在“八.一八”以后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的主体仍是出身好根子正的“红五类”，但他们不唯成分论，根据毛主席“重在表现”的政策，吸收一些出身不好、愿意革命的学生参加，也因此而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当年河南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号“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就是一个例证。实事求是的说，造反派也有错误，甚至也有犯罪者，但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在否定文革的“揭批查”中，有的地方把造反派在与打砸抢等同起来，甚至连“提浆糊筒的也不放过”，使这些文革初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军队介入后，又遭到围攻、逮捕甚至镇压的造反派最终戴上“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三种人”等帽子至今压得抬不起头来。有的人被判入狱刑满后不给出路，连做技术工作的权利也不给。十年文革中的昙花一现，却让他们用整个人生的代价去偿还。我很赞同曾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后因“炮打张春桥事件”受迫害的安文江先生 1 996 年的一段话：“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大赦是在他们关押十年之后……红卫兵造反

至今已有 29 年，对他们二十多岁左右的过失何以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我们党有魄力对沈醉先生等实行统战，我想更该对红卫兵统一统的”。文化革命没有给造反派带来任何有形的财富，却戴上一顶无形的“打砸抢”帽子。但愿这顶帽子有摘掉的那一天……。

以上粗浅的文字坦露了一个老五届大学生，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心路历程。当我放下笔的时侯，我的心一下子轻松、清亮起来，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一吐为快! 然而，当我静下心时，一种沉重感又涌现出来。作为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起来，又经过文化革命风风雨雨的一代人，仅仅为不平而鸣，实在显得渺小。我常常这样想，当年亿万人民满腔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难道都是假的？当年涌现出来的大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难道都是假的？如果当时我们对文革不够理解，是盲从的话，哪么，在历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当今社会上出现的私有化、两极分化以及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能否有所认识？文革影响了我的一生，而我也愿为研究文革付出终生代价。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出更多更有分量的文字，让后人了解文革，彻底真实的记住文革，我亦心满意足了。

1998 年 10 月初稿

以上是我两年前写的一点文字。说是不再沉默，却不敢越雷池半步；说是抛砖引玉，却不敢轻易给别人看；说是一吐为快，却仍是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原因众所周知。我希望能得到志同道合者的鼓励和帮助，也希望和不同看法的人探讨。

2000 年 3 月 霜叶

张钦礼魂归故里--送行散记

邵井延

第一个送花圈的人

清晨 5 点多钟，我就已经找到了省人民医院太平间的地方。想找个地方存自行车时，两位熟悉的工人指着太平间对面的一家鲜花、食杂店的门口空地说：“就放这，他们就是兰考的。”老板－－一位看上去十分忠厚的中年汉子－－对我说：“我是第一个给张书记送花圈的人”。“哦？”我想起了。我听钦礼同志的儿子说过。我忙用双手握住了他的双手。钦礼的亲属曾告诉我，他们的父亲刚“走”，第一个送花圈的竟是他们相互之间不认识的太平间对面鲜花店的老板，是兰考人。还说他们子女还不知道农村如何烧纸的风俗时，是他们不认识的，在郑州打工的许多兰考年青人天天守在太平间外，给他们的父亲烧纸，摆香炉，也送来花圈，上面写着：“兰考人民永远怀念您”。成群结队的兰考人民早就来这里向老书记告别了。钦礼同志在病重住院期间更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如果也用量化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至少是张钦礼同志在这所河南省最大的医院里突破了来看望病人的最高记录，有成千人来看望了他，而且很多是相互并不认识的，慕名而来。

打破我思绪的是早坐在店门口的一位老人，他对旁边人说：“我得回家换鞋，早上四点钟我起来，有只鞋穿错了，不得劲。”大家都鼓励他快去。而他胸前那一枚很大的毛主席

像章却吸引了我，这是一枚主席穿军装、有鲜艳红领章的头像像章。这是在郑州到处可以看到的人们所戴的毛主席像章的又一种现象，不是去年新制作发售的那几类，而更可能是“文革”的遗物。

长子就是养子

当钦礼的子女们到门口下车时，早等候在那里的人们随他们拥进太平间的院子，至少可以看到有五、六部摄像机，照相机高举在人群的头上。当一位新华社的老记者给端着钦礼遗像的钦礼长子张战仃和两边的二儿子、女儿合影时，我突然想起并问旁边一个熟人，哪一位是钦礼的长子？（即他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战友留下的孩子）。他们告诉我，“大儿子就是”，加上我没有看到的“摔老盆”等风俗，我感受到了我和钦礼的又一个距离。

共鸣

到火葬场，将要进行的告别仪式在大门正对面的最大一间厅。据说，火葬场的工人知道是张钦礼同志时，提供了一切打破常规的方便，其他人的丧事活动也毫无怨言。厅外的大广场上，今天是几十年来少有的一次“大会师”，许许多多几十年未见的“文革”老战友，狱中难友，互相知道都几十年未见过面的朋友们今天都在这里重逢、相逢了，又相互给自己熟悉的人介绍，进入大厅内，许多人仍忙于此。有一位朋友说，来这里的有一半都坐过牢。省直一位朋友准确道：“除了兰考来的，除了女的，恐怕会有一半。”

当浩浩荡荡的兰考迎“灵”队伍进厅时，前面哭泣声立即连成一大片，使所有在后面说话的人，不得不限制住自己。随着主持人在广播里宣布：“张钦礼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现在开始”，顿时全厅内鸦雀无声，而随即进行的“三鞠躬”就打开了“闸门”，那哭泣声推起的悲痛浪潮涌向大厅的各个角落，在大厅后部看不到遗体的人群中，也有人跪下去了，哭伏在地……。

为了缩短时间，除了钦礼长子的“答谢辞”外，没有生平介绍，没有悼词和其他的发言，但这个“答谢辞”一开始几句就掀起了我们胸中的万丈波澜，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几十年来始终平静不了的那心中的一切，刹那间在大厅内多少人的心中汹涌翻滚！ 我看到多少淳朴的农民非得用磕头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哀思，多少人在遗体前哭得站不起来。从告别遗体出来的老同志中，我又看到那些已经八、九十岁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市委书记”、“老市长”、文革中曾经风雨同舟的“老干部”。我们紧紧地握住了手，现在应该说是近“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了。包括主持人按惯例介绍的送花圈名单中的人物，按传统的地位观说，这些来送行的人中，仅担任过省、部级、市（地）级领导职务的，就有近百人之多，他们在更多的另一些送行者中的多数人还有一顶通用的帽子，就是“造反派”，“三种人”。

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向我介绍了新华社老记者××，1986 年我在狱中读《中国作家》创刊，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时，就知道这位××，通过《内参》曾揭露过原河南省委的弥天大谎和河南实际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阴暗面，而今天才知道，他后来遭报复，在狱中关了六年，至今没有解决问题。

后来到张钦礼老家后又听说，当年随穆青、周原来采访的一个小通讯员也来了。也就

是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新闻人”都来了，今天是确有新闻可做了。

格格不入的两种气氛

我们乘坐的车到兰考下了高速公路后，和前面已经先来到的几十部车都被安排在路边等候灵车等主要车队，我看了已到的这几十部车，大都是“红旗”车，听钦礼的子女们说过，他爸爸不喜欢进口车。

路旁，沟外的树荫下，有一群群的农民，大都年纪不大。据他们说，是一早就来这等老书记的。有位妇女说：“听说‘老书记’五月七号在郑州‘走’后，他们就天天来这里等着‘老书记’回来，后来我们进城后听说，还有许多人今天早上三、四点钟就来城里等啦！”

一位农村妇女对我们说，今天没来这么多当兵的了，前两天开大会（指官方纪念焦裕禄去世 40 周年的大会）把附近 5 个县的武警都调过来了，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路上根本不准有人……进城后，我们还听说，开会那一天全城的商店都不让开门，连机关干部也不让上班，在家里呆着，“不就是来了个政治局委员嘛！硬是把焦裕禄和人民拉远了！”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在各地遇到的兰考人就直言告诉我：“张钦礼是比焦裕禄更好的干部。”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焦裕禄同志毕竟只在兰考工作了一年多。近年来，一些小报刊都报道过穆青、周原等人的回忆中就有当年张钦礼把“焦裕禄”树立起来的故事，焦的女儿也亲口对我讲过，“没有张钦礼，就没有我爸爸，她对张钦礼同志说过：‘张叔，我爸不在了，你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家……’”

而焦裕禄的那些事迹也是他们两位战友一起干的，焦裕禄身后更多的工作，更大的改变兰考面貌的，是张钦礼领着兰考人干的。今天，听说焦裕禄的女儿也穿一身孝服在张钦礼的孝车上。

“是非功过，自有公论”

约 12 点 40 分，“灵车”到兰考后，整个“送灵”“接灵”的车队开始进城，前面随即传来锣鼓声，但是很快车队就走不动了，等一会儿我看到前边几十部车都下来人，跑步去前边看去了，我也下车跟过去，看到的是一个黑色、白字的横幅拦在“灵车”前面，上面醒目的大字写着：“忠诚于党，情系人民，是非功过，自有公论”。其他还没有看到，车队已经启动了。我回到车上，打开车窗，路两旁不少人含着泪和车队的人们相互致意，哭的较痛的多是年纪大的人，也有许多年青人，他们显然是被这气氛感染了，也感染了我们。在进地道口时，一个中年汉子先“嘿嘿”二声，然后大喊起来：“张钦礼的冤魂回来了，张钦礼冤死了。”车上的人都含泪向他表示敬意。

车队又停住了，我立即下车，向前跑去，一直跑到队头，看到的是张钦礼的“孝子、孝孙”们乘坐的车，被大批群众包围了，哭声，喊声，淹没了其他所有的声音，我好不容易挤到“孝车”的后面，看到钦礼的小女儿爱英已经哭得泪流满面，喉咙已经完全嘶哑了，只听清半句：“我们做子女的，一定不会忘记……”多少双手伸向她，拉住的都不想丢，也有许多人是伸向孝车上的其他人的，几位年青的姑娘也在往这边挤着，喊着：“爱英在哪？爱英在哪？”。一位看上去身体很不好的老人，拉住孝车的车后帮一直不松手，然后让车拉住

他走，一位老太太干脆在车上人帮助下爬上了车。

车队不时停下，是不少群众硬要按风俗，在车前路上烧纸，磕头，车的每一次启动，每一次停，都会引起车周围直至路旁形成的人海一次次的“涌动”。我问旁边两个女孩：“你们也熟悉张钦礼吗？”“熟悉，从小大人都给我们讲。”她们快言快语回答。现在，即使作为一个旁观者，你满眼看到的从八、九十岁的老人到妇女怀里抱着的孩子的目光，以及大批的青、壮年，在这个天地里，你不能不感慨“谁人不识君”呢？我还看到两个坐轮椅的老人，同行中也看到有的是在亲属举着“吊瓶”打点滴来的，人们似乎都不愿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在这人山人海中，哭声、呼声、喊声，甚至口号声此起彼伏，很多是要求去县委门口开大会，要为张书记申冤一类。当一位妇女又主动给我宣传：“张书记是冤死了……”的时候我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不冤，因为人民从来没有冤枉过他！”她立即接上了：“对，对，兰考人民一直认为他是毛主席的好干部。”

“学习张钦礼精神，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是在孝车前出现的又一条 20 多米长的白色横幅，特别醒目，一路上两边都有很多人在念着，我问举横幅的其中二个农民：“这是张庄支部搞的，还是你们自己搞的？”他们回答得很干脆：“我们自己搞的”。自此，这条横幅就成了这支车队，已经看不到尽头加上跟随的群众队伍前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快到县委门口时，在这条“进行到底”的横幅后面，一些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只听见几句：“打倒贪官”，“打倒腐败”，“打倒走资派”，“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成千上万的群众围着孝车，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这支队伍，从马路中的人群到两边路旁的群众，欢迎的掌声此起彼伏，路边的表达多种多样，比如，一块不大的黑板写着“钦礼同志，一路好走！”，落款是：“张子田全家”，一群孩子各拿一个汽球，一个汽球上一个字，只看见有“怀念…………等，在马路中间一部分群众举着简单的纸，上面写的是“兰考人民怀念您”，他们迎着孝车，久久不愿意离去。

一位中年人又对我说:“全是自发的啊，没任何人通知。”我问:“怎么来这么多的人？”我问了一下，“早超出了你们县城的人口，有很多是乡下来的吗？”他说：“是的，消息传得可快了，一传十，十传百……。”

一位中年人说：“自毛主席去世后，还没见过这阵式！”一个女孩接着说：“他们都说，这叫十里长街接书记啊！”另一个女孩说：“毛主席也不如他。”我对他们说：“钦礼同志病危时，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学生去看他，对他说：‘张伯伯，您为兰考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话没说完，就被钦礼同志打断，他支撑坐起，用手指着病床对面的毛主席画像，意思是说，是毛主席领导的。他在病重，病危期间，胸前一直戴着毛主席像章。路过郑州慕名来看望张钦礼的北京一位姓韩的大学老师紧握着张钦礼同志的手说：‘我一定当好毛主席的学生，把你们奋斗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此时不能说话的钦礼目不转睛地长久地注视着这位已经哭得泪流满面的青年老师……。”

然后，我对低着头的那个女孩说：“你们话也有道理，毛主席要教育出来的就是张钦

礼这样的好干部。”周围的人也七嘴八舌的附和着，“张书记就是毛主席带出来的好干部，”，“现在都啥干部，都是贪污犯……。”

一位老汉说：“他们家亲属都不收礼。”我说：“在郑州从医院到灵堂，多少人去看他，但他们家从来不收一分钱的礼，钦礼对他们子女交待过：‘我也没有任何遗产，我走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的，以后你们怎么做人，毛主席著作已经讲得很全面了，你们就照那样做人。’”县委大门内外

路过县委门口时，我有意走近几步，两个像是机关工作的年青人在议论什么事，从大楼里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人打着官腔问：“这是弄啥呢？”这大概是我今天所遇到的成千成万的人中第一个“不知道”这是啥事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外面咋不走啦？”另一个答道：“专门搁（停）这的”。大门外一些老百姓扭过头来劝他们：“你们也出来看看老书记吧！”在场的这几个人没任何表情。

县委外的大道上则是另一个世界。从兰考车站到县委门口，到县政府门口，到焦裕禄陵园前，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一声声“冲天雷”炸破白空，而置在路两旁的一条条“万头”鞭炮迎着车队到来震耳欲聋的响起，在一直不知疲倦的两辆锣鼓手和锁呐车后，又进来一支新的盘鼓队和另一支军乐队，后者奏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一辆专门采访车上站着的记者向人们展示的是香港出版的《中国焦点》杂志内的一幅幅张钦礼的画页，也成为群众包围、欢呼的中心。在车队的最前方，又出现一条引路的黑色横幅：“敬迎张钦礼魂归故里。”

一路上还看到许多小商贩把一箱箱饮料免费送到人群中，从箱中取走饮料的人们又立即挤进孝车前送给车上已太累太累的钦礼的亲人们，尤其是站在车前面的三个儿子，一直高举着钦礼的遗像，不停地向周围群众鞠躬作揖，嘴里还不停地表达着他们真挚的谢意。

在小北关十字路口处停着一大片出租车，几个司机在大喊：“去张书记家不收费啊！”我还注意到，就是在车队还没有到来之前的路两边所有人，所有的商店里，目光注视的远处还没有到来的车队，所有的言谈都是今天这件大事和老书记这个人，一些年青人对老人记述评论的细节都很注意，如此全社会的政治化，是几十年来所有反映这个社会的文字中难见的现象，今天的这些现实－－除了“文革”和“八?九”－－也是仅见的。

阵线分明

在又一个十字路口处，又一支盘鼓队迎上去还没来得及“截住”。孝车突然向右边路口拐过并急驶而去，整个车队也紧跟上。我上车后，他们告诉我，顺着原来的大路走，前面还有好几个大乡镇，甚至好多个著名的村口，都早摆好了祭品，各处都有成千成万的群众早就等在那里，那么到半夜也回不到钦礼的老家，若按风俗，天黑以前是要求回家的。再说，那些孝子孝孙们累得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那么，那些等待的老百姓怎么办呢？”我问。他们说：“已经安排好了。”

车上后排座上是两位新上来的本地的妇女，其中一位对路边的桐木加工业务很熟悉，她说，她十几岁就干这一行，十几年前看厂不行就干起“收破烂”。旁边那位老×介绍说，她是收人家收上来的破烂，是“破烂王”，并说了一句笑话：“当了三年‘破烂王’，给个县

长都不干。”她笑了，对自己现在的业务是很满意的。但是，话题随着张钦礼转到毛泽东时代，她们则十分深情地怀念。“那时人多好啊，争着当模范，早上一起来，麦子割了一大片，谁都不知道是谁割的！”当时也是其父领导的。同样的表情，在今天去火葬场路上的汽车里，我在一个机关干部模样的兰考女同志那里也看到过。那是她在谈到她的中学教育，每学期只交两毛钱时。老×说：“三年困难时期，张钦礼这个县长家也饿得很，我们家还给他们送粮票。”我接上说：“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人说老毛那时穷的啥样时，两位纺织女工站起来回击道：‘那时候刚建国，底子薄，都穷，毛主席也穷，他老人家七个月不吃肉，自己腿也浮肿。’其实，换一个时代，再穷，饿死人再多，各级贪官还照样挥霍，四十年代大灾荒时，美国《时代》记者就揭露过宋美龄和蒋家王朝的贪污腐败。前几年公布的毛家驹日记，不也记载着他们这些文人在三年困难时期去内蒙等地时，地方干部不也用山珍海味招待过他们……。”

车上这些兰考人还向我们介绍了就是在那些艰苦的条件下张钦礼这些干部又是如何工作的许多事迹。他们说，跟着张钦礼的那些干部，文革中被资反路线镇压，坐在监狱中还在研究着改造兰考的规划，一出监狱还没有平反就跑到治沙、治碱第一线去了。但是多少好干部都被整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在清查“四人帮”中除韩村的女支书逃出来外，其他三面红旗都被抓到监狱，其中一个死在监狱，钦礼的弟弟也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死在狱中。1980 年时我们就听说他的事迹，说他在全县判他的有线广播大会上奋力挣脱出来，冲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对全县人民演讲，好一条汉子啊！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多次镇压中，仅其中一次就正式逮捕了 1207 人……。

几天前在纪念焦裕禄的官方活动中，官方媒体作为继承焦裕禄事业而专门采访的人正是当年清查“四人帮”镇压张钦礼这一大批好干部的刽子手，他本人还是 1958 年搞“浮夸风”的有名干将，造成成千上万人饿死，是民愤极大的。在河南，这个阵线更是十分清楚，当年没打成“右派”“左派”的，例如省委的“潘、杨、王”（其中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就是邓小平支持吴芝圃整的），地市一级耿其昌等，县委一级的张钦礼等，“文革”中都是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造反派，河南文革中起来造反的学生写的第一个《紧急呼吁书》，就是揭露了“信阳事件”，造反派代表全省人民的意愿几下广州要揪斗吴芝圃－－这位全国最著名的“浮夸风”干将，和另一位著名干将曾其全一起，1979 年在全面镇压造反派后得到了最高级别（华、叶、邓及全部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的隆重平反。

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车队去往钦礼老家所选择的这条偏僻的路，路旁也不时有肃立的人群，完全被截住的只有一次，落款为双楼村委的黑色横幅上印着：“沉痛悼念老书记”。另一条落款是南彰大队的横幅写的是“人民的好书记”。待我们后面的车也走过，几个被扶住的老人仍在大哭。

前面鞭炮，锣鼓声响起，终于到家了。几百名少年儿童每人手持一朵白花，肃立在村外路边，进村前路上的某一个路口或拐弯处都聚集着大批老百姓。大路上空的横幅除了“怀念”内容的还有：“防风沙，治盐碱，造福人民；一生清正，廉洁为党，鞠躬尽瘁。”“寿越大旬，睦邻精神今犹在；含笑九泉，勤俭作风永世传。”

我们几个人先进了村，找到了张钦礼的家，也确实是很旧的老屋，这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县委书记（还兼地委书记和省里其他职务）的家。灵堂已摆好，两边对联是：树焦君丰

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横批：一代风范，虽死犹荣

当夜回去的路上又经过焦裕禄塑像时，我想起进城的路上大家曾讨论群众集资买块地也建个张钦礼塑像（堪称双壁）的问题时，有的同志说这不是花钱就能办成的事，这是政治。也有人说：对，是政治，可是用孙中山的话讲，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那么只要人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又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今天一天在兰考的感受，更使我们增强了这个信念。应该说，今天使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十万兰考人民从逮捕、判刑至今，张钦礼同志离开他们 20 多年了，而兰考人民不仅老一代，中年一代那么刻骨铭心地记着这样一个毛主席的好干部，而且还把他们的认识情感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兰考人。这就是兰考人，也是生活在中原腹地的一部分中国人的良心，这就是中国人的素质，这就是中国人的希望。

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韩德强 2004 年 9 月 9 日

2004 年 5 月 17 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 1978 年被捕入狱，被判 13 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 27 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

最近，怀着对张钦礼的景仰和好奇，我踏上了兰考大地，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并有幸当面向两位张钦礼的生前好友了解他的事迹。震惊，痛心，哀恸，催人奋进，令人深思！从张钦礼一生的坎坷曲折的经历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中各种复杂力量的斗争，仿佛亲临其境、亲历其事，又如此清晰地穿透历史，看到了被光怪陆离的现象所掩盖的社会骨胳、腑脏、血脉、经络，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回京后，结合其他人的访问记录，以对话体写成此文。

问：参观了焦裕禄的事迹后，我有一个疑问。焦裕禄到兰考工作 1 年 5 个月，2 个月又值肝癌晚期，弥留在医院，却战天斗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那么焦裕禄之前的兰考县委干什么去了？

答：问得好！焦裕禄之前的县委书记姓王，叫王金壁。这个人有些堕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王金壁还被称为"三排排长"。王某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 17 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壁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就讽刺地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 焦裕禄来后，

制止干部看白戏，干部的孩子看戏也要掏钱。第四，王某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问：这样的书记会不会带出一批又贪又懒还好争名夺利的干部？

答：是啊！王金壁就用那些不会干事，光会拍马屁的干部。张钦礼当时是县长，人称兰考的"活地图"，他对治理兰考的"三害"有一套办法。从 1954 年起，张钦礼就担任兰考县长。从 54 年到 57 年，兰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显著。但 1958 年"浮夸风"一来，林子被砍光了，张钦礼还因为反对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

问：这是怎么回事？57 年反右的矛头不是针对那些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怎么会把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划成右派？

答：这只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在地方上，真正要推翻共产党的人很少。但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做着共产党的官，却贪图享乐腐化名利的人却不少。这些人在党内很活跃，臭味相投，拉帮结伙，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为异类。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人，群众意见最大的也是这些人。57 年一开始是整顿党的作风，其对象就是这些人。

在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就这种人。他利用职权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是个陈世美。更加严重的是，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后，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这位复员军人关进了监狱。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县委门口就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孙跃堂，200 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北京、上海等地出了一批要求"轮流坐庄"的知识分子，他们借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否认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分子，代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势力，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但是，为了教育团结他们，把他们当作右派分子，而不当作敌对分子。毛泽东要求各地在继续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打击右派分子。

这个部署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部署谁来执行？具体地说，在河南，谁来执行保护群众、打击右派的政策？很不幸，恰好是与孙跃堂臭味相投的人，省委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和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等人。赵文甫坐镇兰考，将 200 多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激烈反对赵文甫的作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相反，孙跃堂却官升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由于吴芝圃等人的滥施淫威、排斥异己，河南的右派是全国最多的。

问：啊，竟有这种事！我听说河南的浮夸风全国最厉害，饿死的人也最多。这和吴芝圃的用人特点有关系吗？

答：怎么没有？张钦礼吃尽了吴芝圃搞浮夸的苦头！大跃进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到河南，丢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 年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由全省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县长们好歹加码到 500 斤一亩，800 斤一亩。但张钦礼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 20 万斤，小麦亩产 5000 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

他甚至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坐不住了，面带怒色，扬长而去。接着，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的会议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一批就是 8 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河南省委又给张钦礼又加了一顶帽子--"死硬派"，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你想想，说实话的人遭了殃，浮夸风还能挡得住吗？

河南的浮夸风一刮就是三年，最终闹得人人浮肿，大批饿死。在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地区书记路宪文是吴芝圃的死党。路宪文不但最积极搞浮夸，大批饿死人后，路宪文又严密封锁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二千封反映饿死人的信件。吴芝圃和秘书长戴苏理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绕过重重障碍，向省委报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一个村支部 23 名党员，饿死了 20 人，剩下 3 名写血书送到省委。但是，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了。戴苏理还扬言要查处严办。

后来信阳事件败露，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到河南考察，吴芝圃、戴苏理陪同。然而，吴芝圃倒打一耙，把路宪文的责任推给地区专员张树藩，而事实上，张树藩恰恰因说实话而倍受吴芝辅、戴苏理和路宪文的迫害。杨守绩终于盼来了大领导，却不料，在李先念等人到固始县的前一天，吴芝圃和戴苏理来到固始，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

在这种情况下，劳改中的张钦礼一身浮肿，突破重重封锁，进京上访，见到总理，反映河南浮夸和饿死人的情况，你想，吴芝圃和戴苏理等人对张钦礼该有多么仇恨！

问：难道共产党的天下竟能容忍吴芝圃一手遮天，把新中国晴朗的天变成吴芝圃黑暗的天吗？

答：1960 年 12 月上旬，张钦礼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 1961 年 6 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到任后，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河南的人民总算是拨云见日了。但是，刘建勋虽然将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却没有将吴芝圃带出来的一群坏干部撤下去。事实上，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虽无实权，但威势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团大团的黑压压的乌云，只在乌云的缝隙处漏出一点阳光。

张钦礼得到过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刘建勋亲自替张钦礼平了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张钦礼从郑州回到兰考，却仍然只能在家呆着。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仍然是紧跟吴芝圃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壁，他不但没有通知张钦礼到任，甚至没有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 1264 元工资。张钦礼长期受迫害，贫病交加，本来特别需要这笔钱，但他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兰考的生产救灾。

从落实平反政策到 1962 年底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在兰考县委仍然受到排挤。虽然身为县长，却空有一腔改造兰考的热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问：吴芝圃搞浮夸风，有没有中央的责任，有没有毛泽东的责任？

答：中央当然有责任。中央也有类似吴芝圃的人。吴在中央也有一个关系网。但是，毛泽东却不在其中。195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时，就明确批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11 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他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1958 年 10 月）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取消商业。"会上，吴芝圃提出要研究"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一再批评高指标："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11 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959 年 3 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肯定抵制共产风的瞒产私分现象，鲜明地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以上讲话均可见《毛泽东传 1949-1976》，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时，吴芝圃都在场，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反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的坚决态度。但是，吴芝圃却在河南一意孤行。1962 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向会议主持人金明发问："金明同志，你说是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一点呢？"金明自然回答："还是人聪明一点吧！"毛泽东摇摇手说："不尽然，猪一头碰到南墙上，过不去，他知道退回来，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

问：吴芝圃停职了，张钦礼平反了，被赵文甫划成右派的干部怎么样了呢？

答：仍然没有平反。那片黑压压的乌云继续笼罩着兰考。具体代表就是那位王金壁。信阳事件暴露后，毛主席认识到，干部队伍的问题很严重，局部地区甚至已经是反革命力量在统治，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民主补课"。但是，谁来负责组织"民主补课"呢？在兰考，恰恰是需要"民主补课"的王金壁在组织"民主补课"。他借此机会排斥异己，让 2000 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迫使他们交代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将本应由王金壁之流的吴芝圃追随者所负的责任推向基层干部，推向不迎合自己的好干部。

吴芝圃停职反省后，张钦礼劝王金壁放人，王某这才勉强放人，但既无平反之说，也不承认错关错审。

问：这样的草菅人命、贪污腐败的书记怎么能长期为所欲为呢？

答：是啊。吴芝圃调离后，那些善于钻营的上级领导们感到了群众压力，把王某调走了。但是，他们并不启用张钦礼，而是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兰考工作。兰考是个穷县，干部都不愿意来。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有的都发了调令，都不愿意来。最后把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焦裕禄调来了。

对于开封政治生态圈来说，焦裕禄是个外人。钻营者们以为焦裕禄对他们没有威胁。然而，他们想错了。焦裕禄是个好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 2000 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令人痛心的是，焦裕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张钦礼失去了他的好领导、好战友，兰考人民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

问；焦裕禄给 2000 多名干部平反，开封地委怎么看？

答：当时正值中央开完七千人大会，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吴芝圃失势，钻营者们不便兴师动众、问罪焦裕禄。可巧，焦裕禄病逝，去了他们的一块心病。开封地委中上与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声气相通，下与孙跃堂、王书记沆瀣一气，旁通河南各地的投机者，善于指鹿为马、见风使舵的，当数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此人早就视张钦礼为异类，对焦裕禄在兰考的业绩耿耿于怀。

焦裕禄死后，开封地委不是将深得民心的张钦礼提成县委书记，而是派一个叫周化民的当书记。周化民是秦一飞的死党。焦裕禄逝世两个月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开始了。秦一飞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有工作团成员 2000 多人，其中 260 人专门负责县委和直属机关。秦一飞和周化民领导的"四清"工作，专以焦裕禄和张钦礼带领的苦战兰考的干部为对象。张钦礼首当其冲，被当成"四不清"干部，靠边站，接受审查。秦一飞指示负责县直属机关的工作队长崔礼书，对张钦礼要进行认认真真地清查。崔礼书不敢怠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派人外调，清查了大半年，没有查出丝毫"四不清"的问题。秦一飞批评崔礼书："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县工作多年，会没有四不清问题！"显然，秦一飞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把四清运动当作了剪除异己的大好机会。秦一飞撤了崔的职务，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赵为新，指示赵为新从心直口快的潘子春身上打开缺口。赵为新对潘子春使用车轮战术，还是没有成功。最后，秦一飞没有任何理由将潘子春挂了起来，不分配工作。张钦礼名声大，又查不出问题，只好恢复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处处制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进展缓慢。

问：整个开封地委就没有好人吗？一个宣传部长怎么能如此胡作非为？

答：好人斗不过坏人啊。坏人对上拍马奉迎，对下小恩小惠，善于笼络人。好人直来直去，不会趋炎附势，投其所好，更不会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秦一飞在开封地委绝不是孤立的。

问：我记得，《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显然，这篇报道对张钦礼十分有利。周化民怎么能允许这种报道面世呢？

答：1965 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我（刘俊生，时任兰考县通讯干事）是全程陪同的。高级记者来了，我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他说："我不太了解情况，张钦礼是兰考土生土长的，又与他共事，对他比较了解。今后来记者别找我了，就让张书记介绍吧！"这样，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

报道一出来，周化民就说："焦裕禄的事是谁说的？张钦礼自己说的，他不是想宣传焦裕禄，他是想宣传他自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呢。"那天，我被请到新华社，一位同志对我说，焦裕禄的事迹已向中央汇报，中央同意将他的事迹树立为典型向全国宣传，并且要求向宣传雷锋一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宣传焦裕禄。他让我回去向县委、地委的书记汇报。我回来后给周化民汇报。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蹦出来一句话："典型？兰考出了典型？来兰考参观个啥？看咱沙荒啊？盐碱啊？焦裕禄怎么算典型啊？你去找地委宣传部长吧。"周化民不敢得罪新华社，把球踢给了秦一飞，他相信秦一飞能挡住。秦一飞一听要报道焦裕禄，气不打一处来："别说了，别说了，新华社报道焦裕禄我作为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也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听，我不同意报道。"最后，秦一飞想到毕竟要面对新华社，又留了一句："小刘，你找地委书记汇报去吧？"我便去找主管宣传的延新文副书记。延新文听后很高兴，把我领到了当天下午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上，叫我来汇报。下午汇报时，看到那么多大领导，我很紧张，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慷慨激昂的声音来讲焦裕禄的事迹。听完汇报后，秦一飞首先发言，表示强烈不同意。由于他对兰考比较了解，其他人因此不敢发言。幸而地委第一书记张申说了话："新生事物嘛。有些人对新生事物是看不惯的。焦裕禄是不错嘛，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并且在兰考一年多时间，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看这个同志不错。有时候先进事物和落后事物是要作斗争的，我们应该支持先进事物。"秦一飞反驳道："看啥哩？有啥可看的？看沙荒呢？"张书记说："怎么没有典型？你比如去年风地沙丘，把风地给封住了，再起风就没有风沙了。这不是典型吗？"秦说："那像这样的有几个典型呢？"张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由少可以到多。"由于地委一把手的赞成，其他人也都倾向于赞同，于是最后通过在全地区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县委一看地委决定了，也不得不同意。但是，新华社的稿子还要交给县委书记审查。周化民再次从中作梗。他认为新华社的通讯需要改，把兰考写得可怜了，阴暗面太多。他将文章归纳了三句话、六个字：第一句话，焦裕禄用一年时间改变了兰考面貌，共产党领导十六年都没改变好？第二句话，改变兰考面貌是焦一个人干得？为什么只报道他一人？都归到焦裕禄一人身上行吗？六个字：灾、难、病、苦、死、逃。他说："文章要发我也同意，不过得改，得做大修改。"

为此，在兰考四清工作团驻地，当着 30 多名四清工作团的骨干，秦一飞、周化民和张钦礼展开了一场激辩。秦一飞气势汹汹："试问张钦礼同志，焦裕禄是条龙他又能吸多少水？他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能改变兰考面貌，谁能相信？张钦礼同志是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最多的，我看你的话掺假不少。你把兰考县委的成绩，都记在焦裕禄一个人身上，把几年的工作成绩，也记在焦裕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上，这是夸大其辞。你内心世界里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看无非是想捞点什么。"

周化民紧跟着说："新华社的稿子一发表，穆表他们可以得到一大笔稿酬，个人也出了名，名利双得；焦裕禄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光前裕后；张钦礼同志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也跟着风光；背黑锅的是我周某人，给焦裕禄填穷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三头六臂，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

张钦礼说，"莫以时间长短论政绩"。他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是一年零五个月时间。这一点秦部长说得很对。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比我们任何人都多，都好。他为了尽到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除掉兰考的'三害'，造福兰考人民，他带着病体，严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滩里，在盐碱窝里，在沼泽地里，拄着根棍子，背着干粮，带领除'三害'调查队，把兰考县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查了一遍又一遍，咱兰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他几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余里，焦裕禄的身影是尽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边喝河水，饥了啃的是自己带的干馍，群众给他烧开水喝，他说下雨缺烧的，不让烧了。累了蹲在地上打个盹，终天没白没黑舍生忘死地工作，发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务死不瞑目，这些秦部长、周书记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只会浮在上面听汇报，懒得下去走一走。你们到兰考与焦书记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你们下基层多少次，为百姓又解决过哪些急需？

在开挖贺李河的时候，他跟群众一起劳动，他背沙袋压趴在地上，起几起没起来，是潘子春跑过去将焦书记扶了起来，搀到工棚里躺下。卓兴隆劝他住院治病，休息几天，他却说，在除'三害'大决战的时刻，我怎么能休息呢？休息的时候是有，等到同志们站在我的灵前说，焦书记，你安息吧，你没完成的除'三害'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到那个时候，我就休息个够。这虽是风趣幽默话，却体现了焦裕禄同志宁愿把生命献给兰考人民的忘我精神，这样的好书记难道不是榜样吗？当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后，他没有掉泪，平静地说'咱兰考是灾县，我死后不要多花钱，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离开那里，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说得动容，泪水模糊了眼睛，在场的一些四清队员也被感染而开始流泪。

张钦礼继续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走完了他生命的路程，他和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在群众中有口皆碑。虽然他在兰考只短短一年零五个月，准确说，只一年零三个月，但是，不能以时间长短论英雄！焦裕禄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县委的工作成绩该归于他；焦裕禄逝世以后，我们又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干工作，县委工作成绩也有焦书记的份，这不叫夸大其辞。焦裕禄来兰考时，自然条件情况比现在恶劣得多，焦裕禄同志从来也没说过背黑锅、填穷坑的话。新华社是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记者在兰考采访了上千人次，老百姓都热情接待，积极提供焦书记的事迹素材，这反映了民心，民心不可违啊！有的人却冷落记者，老是借口工作忙，不愿见记者，让别人接待记者。别人照着他的指示办了，又骂

人家有野心，想捞稻草，我张钦礼难做人啊！"

就这样，张钦礼的意见终于在四清工作团占了上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才得以发表。

问：长篇通讯发表后，全国各地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张钦礼在兰考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答：远非如此。全国学习焦裕禄掀热潮，唯独在兰考县委冷冷清清。张钦礼注意到，尽管大批记者、作家、参观学习者云集兰考，但周化民很少露面。有一次，张钦礼递给周原一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

1966 年"5·16"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照河南的情况，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路宪文、秦一飞、周化民、王书记这样的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将河南的共产党政权变成了他们的黑帮政权、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些人的。

文革初期，当大学里开始有人响应通知号召，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内阴暗面时，工作组自上而下地进驻大学，将学生们打成反革命，而保护各级党委。这样，毛泽东感到工作组在保护走资派，在打击群众积极性，阻碍揭露阴暗面，指示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在工作组领导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从此，揭发阴暗面、批斗走资派的群众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但是，受压制的群众可以团结起来斗走资派，走资派也可以动员群众斗革命派。无论是哪派，都可以自称是造反派。在兰考，秦一飞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任副组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化为文革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将张钦礼定为黑帮，批斗游街。周化民控制下的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派出"纠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穆青。1967 年 2 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跟着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骨干分子 1207 人全部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示众。城关镇一个姓管的老百姓说了一句："这绑住游街的不都是好人吗？"仅此一句话，"造反派"竟用乱棍将管某打死在街上。中央轻化部设在兰考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游街示众的人不都是跟着焦裕禄书记干的好干部吗？"这话传到秦一飞、周化民的耳朵里，刘永松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张钦礼的保皇派。

杨捍东插话：我给你们补充一些材料。"树焦"与"不树焦"是一场斗争。兰考文革开始后，周化民把"树焦"当作张钦礼的"政治扒手"的证据，大字报向全国散发。这事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看到这张大字报后，让河南省委限期调查解决。

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开封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学校又交给我，由我带队调查。

这里关乎三个人，第一个人是焦裕禄，他的事迹究竟真伪如何？二是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三是周化民到底如何？副省长王维群召见我时说得非常严厉，叫我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详实再详实。如果出了问题，严惩不贷。当时我只 23 岁啊，很年轻。我说首长放心，我从没去过兰考，在那里无亲无故，不可能带框框，一定会客观详实。

我带领一个共青团小组，领着三个学生调查一个多月。调查过程中我唯独没有见过张钦礼，因为张钦礼带焦裕禄的夫人到广东省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去了。由我执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向中央回答了三条：一、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完全是真的，且由于新华社通讯篇幅所限，好多事迹还没报道出来。二、张钦礼与焦裕禄肝胆相照，共同协作，焦裕禄去世后，由他完成焦裕禄的遗愿，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三、周化民同志身为家乡干部，却始终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前，他不同意，这是个人认识有别，我认为这不是错误。但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他仍取消极态度，仍不认真学习，那就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应该予以批评，我只是说"批评"。

报告写成后，我先给王维群汇报，再进京汇报，在中南海将报告交给国务院办公厅。我回来以后，周化民已经要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了。这时是 67 年的 1 月 29 号。（刘俊生：我也被打成该集团成员了，说我是吹鼓手）凡是当年跟随焦裕禄一块工作过的人，焦裕禄死后积极宣传他事迹的人，都被抓进监狱，全县有 1200 多人，涉及面很广，包括兰考"四面红旗"的支书，农民也抓了很多。

我有一个同学，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的调查报告印出来发到社会上了。由于报告中我肯定了张钦礼，所以我也被抓起来了。开封军分区的人听信周化民的造谣（周说我是国民党中校），逮捕我时调用军队，派了三辆汽车，还用机枪封锁路口，将我用脚镣手镣抓起来。当时我是 23 岁的大学毕业生，什么时候去当国民党中校啊？

问：下手竟如此狠毒！后来怎么样呢？

答：毕竟民心不可违。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总理，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到实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这样，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任命张钦礼担任 7249 师空降师政委。在总理联络员的安排下，张钦礼还在北京向 30 万工人做了 18 场报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回到兰考，首先给被关进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安排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对跟着周化民的干部，不开除党籍，也不关进监狱，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 1970 年 8 月近 3 年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干部和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引黄灌淤工程共挖 3000 万土方，基本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 26 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

问：犯下严重罪行的周化民到哪里去了？

答：周化民进学习班学了三个月，然后就调到安阳钢铁厂作党委书记去了。实际上，官职原封不动，物质利益还更多了。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吴芝圃、周化民这种投机分子即使在失势时，也只是推推磨、转转圈，跟着他们的人也相安无事，得势时便不可一世。焦裕禄、张钦礼这种革命干部在得势时，拼命工作，失势时进班房、蹲监狱，还会连累跟着拼命的干部群众。毛主席说党内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至少就河南来说，千真万确。只不过，这个走资派不但力量强大，还特别善于伪装。

问：1970 年 8 月以后怎么样了？

答：张钦礼又遭难了。当时，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原来吴芝圃的网络又攀上了王新，借助王新的力量来整张钦礼。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产党，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这其中就有秦一飞，他又回到开封地委了。由于张钦礼影响大，他们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将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 1200 多人，就是 1967 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干部，引黄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被关押起来了。

问：1971 年 9·13 事件后，林彪死后，张钦礼和他的干部们是不是该解放了呢？

答：林彪虽然死了，王新也失势了，但是吴芝圃的网络仍然稳如泰山，盘踞在河南，盘踞在开封，盘踞在信阳。1972 年，周总理派康克清到兰考调查，解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也了解到张钦礼落难的消息。1972 年 11 月，周总理派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一次受到总理的接见，王新同期被捕。张钦礼深感河南斗争的复杂，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会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贺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周总理答应一定帮助他，让他安心在兰考工作。

张钦礼回兰考以后，恢复了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给遭批判和关押的干部们平了反，补发了工资。一度停工的引黄灌淤的几十处工程又恢复起来。张钦礼遭软禁期间，兰考群众把工地上的物质都藏起来了，等待着张钦礼复出。

从 1973 年到 1977 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 1973 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 125 条，配套支渠 154 条，拆除阻水工程 164 处，共完成 1171 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 19 万亩，占沙荒面积的 80%治理盐碱地 22.7 万亩，占盐碱地的 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 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 5 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

佩焦裕禄。

刘建勋他们不知道，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粘稠。年轻人到了冬天，还能长出汗毛来，上了年纪的人就长不出来了。血口子是被黄河水浸过来泡过去，泡掉了表皮保护膜，形成干裂的口子。血口子裂开了长住，长住了又裂开，到冬天就脱一层皮，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的。

问：1977 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 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 年 10 月 16 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 年 12 月 24 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 1200 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 1966 年底的那份调查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 5 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在文革时期，上有毛主席、周总理，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 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 27 年前发生的政局变动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吗？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出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

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 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 27 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 30 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 5 月 7 号去世，5 月 13 号火化，结果放到 5 月 17 号下葬，为什么？因为 5 月 14 号是焦裕禄逝世 40 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事。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

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本文根据现场采访两位事件的当事人，阅读新华社记者国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中国焦点》杂志 2004 年第一期，以及赵伟浩写的《周恩来三救张钦礼》（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 年 11 月）一书，并采访其他几位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志而成。文中凡注出姓名的，均为对话实录。其他问答是根据上述材料而来。错谬之处，文责自负。并欢迎读者指正。）

一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好教材
--对有关张钦礼同志冤案几个问题的思考与评论

金草

一、可以确认的关于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几个基本事实

二、对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几点结论和看法。

三、鲜明的路线对立，尖锐的阶级矛盾

四、关于张钦礼同志的所谓"咬群"

五、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组织

六、关于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

七、认真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共产主义战士们联合起来，团结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向资产阶级展开进攻

兰考人民沉痛悼念张钦礼同志的隆重盛况，震动了中原大地，也震动了新时代的神经--互联网。为此，网上贴出了几篇文章，有邵井延的《张钦礼魂归故里——送行散记》、一丁的《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以及新华社老记者陈健的《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钟言人的《焦裕禄逝世四十年的沉思》、尼而言的《兰考张钦礼葬礼的思考》,代表了当前中国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派别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反应。这些文章，面对一个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无辜地惨遭接连不断迫害的革命老人，有的是情真意笃的不平呐喊，也有的是幸灾乐祸天良难觅的恶毒污蔑，既有振人心弦的钟鼓之鸣，也有错乱刺耳的瓦釜之音。并未远逝的历史与眼前的纷纭现实交织在一起。历史嬗变中沉重的这一页并没有掀过去。人们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追问：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为此，笔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试作以下一些回答。

一、可以确认的关于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几个基本事实、

这几篇文章的作者立场、观点、方法迥异，思想、感情、结论不同。陈健与尼而言的文章依然被框架在《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里，钟言人更是资本主义复辟派的一派极端荒唐的胡言乱语。虽然如此，从他们的文章中，我们仍可以确认这样一些基本事实：

1、在 1957 年反右斗争中，张钦礼为了反对把写了揭发腐败变质干部大字报的干部群众打成"右派"，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与当时来兰考领导反右的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激烈争辩而受到打击，被"降级处分"、"内部控制使用"。

2、在随后的大跃进中，张钦礼作为一个刚刚被"降级处分"、"内部控制使用"的干部，为抵制河南省委的"五风"，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既是省委第一书记又是自己父亲老战友的吴芝圃，结果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3、在 1960 年底，三年中受到两次无辜打击的张钦礼，又以极大的胆识，冒着危险进京向党中央反映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大量群众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被总理称为"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

4、张钦礼 1954 年就担任了兰考的县长，他一贯"深入群众与百姓同甘苦"，在焦裕禄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前，他的"先进事迹己在兰考广为流传"，在群众中就有一定威信，"在人民中有好的口碑"，"和百姓有密切联系"，和兰考人民心连心；焦裕禄当班长时，张钦礼是分工抓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的副书记，焦裕禄的事迹也"有张钦礼的汗水在里边"，张钦礼就是"多次亲自查风沙看洪水的"。他 1962 年平反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5、在 1962 年底，焦裕禄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后，张钦礼全力支持焦裕禄的工作，为贯彻党的路线、改变兰考的落后面貌一起努力奋斗，成为无可争辩的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在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大力宣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事迹和精神。"焦裕禄的素材大部分来自张钦礼"，没有张钦礼，"焦裕禄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一创造了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的党的优秀儿子，就会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张钦礼当时为在全党全国树立宣传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6、在文革前的四清中，在文革中，在有人图谋否定抹黑焦裕禄这面红旗时，张钦礼和人民群众一起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又多次遭受迫害，其中在 1967 年被打成反革命关入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百般残害，惨不忍睹；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一次又被周恩来总理得知后解救出来。张钦礼平反回县后，带领人民群众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继续为改变兰考的落后面貌奋斗。

7、文革结束后，在所谓"揭批查四人帮"中，因为拒绝省委第一书记戴苏理压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又一次被逮捕，张钦礼是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的，当时逮捕的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指的是为将二十二万亩盐碱地改造成良田而引黄河水淤灌；张钦礼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

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的是与秦一飞、周化民的思想对立），完全是不值得一驳的诬陷不实之词；刑满释放证上写着："张犯因文化革命煽动罪"被判刑。"煽动"指的是张钦礼焦裕禄共同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这一次张钦礼被以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十三年徒刑。

8、张钦礼同志以年近半百之身，在许多次惨遭迫害后，又身陷囹圄，又一次惨遭法西斯酷刑，拳打脚踢，砸镣带拷，打掉门牙，"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他满腔怒火，决不下跪！出狱后，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坚持斗争，还继续教育孩子们要按着毛主席的教导做人。

二、关于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几点结论和看法。

根据以上确认的张钦礼同志一生中基本经历的事实，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结论和看法：

1、张钦礼是一个一贯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忠诚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忠诚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党的优秀干部的代表。张钦礼完全可以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相媲美，他完全无愧于焦裕禄同志亲密战友的称号！而且由于他的经历更曲折、考验更丰富、贡献更卓著，形象更高大。

张钦礼，作为党的一个县级领导干部，与其他千千万万的高中级干部相比，不贪图已有的地位和利益，始终保持了旺盛饱满的革命斗志，战斗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第一线，为了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不管什么样的打击、挫折和迫害，都不能使他有丝毫的改变与动摇。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中，张钦礼受到各种严重迫害达七次之多，每一次之后，他都没有妥协，没有消沉，而是继续战斗。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张钦礼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共产党员！

在当前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为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张钦礼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更加重要和特殊的意义。

为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而奋斗的过程，将始终是一个充满了极为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过程，每一个立志为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都必须向张钦礼同志那样，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经受长期的曲折磨难的锻炼和考验，克服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资产阶级做坚决的彻底的殊死的斗争。

2、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最终是由人民写的。1921 年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八十多年壮烈辉煌的实践，1949 年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1966-1976 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已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种子深深地撒播在十三亿人民心中。真理种子的生命是永存的。已经播在大地上的种子是一定要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的。十数万兰考人民自发隆重悼念张钦礼同志，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怀念，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对张钦礼同志所忠诚奉献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怀念。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

3、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与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攻击诋毁毛泽东时代的"重型炮弹"。他们利用当时的一些表面现象，掺和进大量

谎言，进行蛊惑人心的歪曲和煽动，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根据前述来自各方面的资料和证据，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人借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之机打击迫害真心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干部群众？反右斗争中出现的冤案能够加到反右斗争本身和毛泽东头上吗？是什么人在大跃进中狂吹"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不顾人民死活而又百般掩盖自己的罪行？能够把"五风"和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加到大跃进本身和毛泽东头上吗？是什么人一心想当官做老爷、反对学习焦裕禄？是什么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自己而残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能够把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加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和毛泽东头上吗？张钦礼与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秦一飞、周化民的矛盾斗争是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假的就是假的，伪装与假象是不能持久的。如果说，在当时，围绕着张钦礼冤案的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在某些人思想上还难以分清的话，那么，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使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昭然若揭。

4、网文《焦裕禄逝世四十年的沉思》的作者钟言人，自以为掌握了"邓小平理论"，而又能娴熟地"与时俱进"；他无法否认焦裕禄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和县委书记的真实事迹以及六十年代宣传学习焦裕禄的巨大意义，他也无法否认"焦裕禄的事迹，知情人知道这里是有张钦礼的汗水在里边的"、"张钦礼的介绍成全了这篇大通讯（指穆青等写的新华社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张钦礼就是多次亲自查风沙看洪水的且在人民中有好的口碑"、"张钦礼......和百姓有密切联系"、"人们知道张比知道焦的还多"、"如果是有民主的话，从兰考几万党员中先选出党代表，然后开代表会选出县委书记和副书记，这个张钦礼也许早就是兰考的正书记了"；但是，他又喋喋不休地污蔑张钦礼宣传学习焦裕禄为"说谎"，攻击穆青等人宣传焦裕禄的通讯"严重失真"，据他列举的"失真"有七处之多，污蔑张钦礼靠"说谎"把自己"打扮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总怀才不遇"，"一直想当一把手"，"实现权力欲"，等等。

他所谓七处"失真"是些什么东西呢？稍微有些识别分析能力的都可以看出，没有一条是影响焦裕禄事迹和形象的关节之处。如，"焦裕禄半夜敲门和张钦礼谈心"，这是县委班子里书记和副书记两个人之间的事，他凭什么能证明此情节"不存在"呢？钟言文按照反动统治阶级诬蔑攻击革命战士的陈词烂调说张钦礼宣传焦裕禄是为了实现"想当一把手"的"权力欲"，那么，张钦礼在反右斗争中与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据理争辩、在大跃进中指名道姓的批评时任省委第一书记而且又曾是父亲老战友的吴芝圃、一直到面临大祸临头的牢狱之灾仍然拒绝省委第一书记戴苏理要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都是为了"实现权力欲"吗？

实际上，这个钟言人才是有恃无恐、满口放肆的说谎。他借 1980 年兰考县委书记之口，说什么实行邓小平"联产承包""只一两年就解决了讨饭问题"。这位与兰考县有着四十年的联系、一大把年龄的钟言文是真的不知道千百年来一直危害着兰考的"风沙、盐碱、内涝"等灾害是竟能在"一两年"就可以消除的吗？他一笔勾销兰考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和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花费几十年的血汗改天换地的成就，而归于"一两年的联产承包"，这是极端的无知呢，还是极端的无耻呢？他胡说什么"焦裕禄精神的实质是放弃一党一派的私利"，把学习焦裕禄说成是"造神"；他不得不承认现在已经找不到焦裕禄那样的干部了，"如果以焦裕禄的标准要求今天的领导，可以说是一种空想"，但又绝口不提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复辟是造成干部队伍极为严重腐化变质的原因，竟然异想天开地指望在这种现实产生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会由选民选出"新的焦裕禄"！这么一个钟言

人，习惯了二十多年资产阶级专政下无人争辩、无人反驳的胡说八道，臆测妄断，满口荒唐，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酸臭味弥漫于字里行间。

新华社老记者陈健同志秉笔直书，为张钦礼同志鸣冤，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历史事实资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的的思想依然框架在《决议》里。把张钦礼同志在文革结束后又一次受到的迫害归结为"派性"，把他在文革中、文革前以至文革后几十年所受到的迫害都归结到"极左路线"，把焦裕禄和张钦礼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说成是"人道主义精神"，是十分错误的。文革结束后，对张钦礼及广大干部群众的镇压是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是阶级斗争，哪里是什么派性？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秦一飞、周化民等人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推行的是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在改革开放后则是彻头彻尾的极右路线，何"左"之有？陈健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几十年的老记者，总是回避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科学方法去认识分析张钦礼同志冤案一类的社会问题，就无法揭露事物的本质，无法准确解释全部社会现象，也就根本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正确道路。因此，他自己也就不得不无奈地哀叹："张钦礼也许永远翻不了案，因为堆积在他上空的阴霆太浓重。"

三、鲜明的路线对立，尖锐的阶级矛盾

张钦礼同志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曲折经历，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发生在党内的尖锐、激烈、复杂、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让我们再具体地看一看这些矛盾的发生和经过。

1957 年，兰考 200 多名干部群众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揭发腐化堕落分子孙跃堂，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却为了包庇孙跃堂竟然把这 200 多名干部群众全部打成右派，而孙跃堂竟被调往另一个县升任副书记。张钦礼坚持事实真相、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争，结果自己也受到迫害，被"降级处分"、"内部控制使用"。

大跃进中，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大量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张钦礼不因为自己已经受到迫害正在"控制使用"，也不因为吴芝圃曾是自己父亲的老战友，冲破吴芝圃等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冒着危险进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

吴芝圃造成河南人民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这边被停职检查反省，那边又被任命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张钦礼在北京告状成功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省、地、县的某些领导人一方面"震惊"，另一方面又"保持沉默"，时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王某不去认真纠正吴芝圃的错误，反而把矛头对着大多数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钦礼进京告状成功，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给他平了反，而那个县委第一书记王某在上面一些人的支持下却要给"留个尾巴、不全平"，结果还是接任的焦裕禄"极为愤慨，宣布彻底为张钦礼平反，并为此发了红头文件"。

1962 年张钦礼平反后"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焦裕禄来兰考和张钦礼一起，抓阶级斗争，纠正"左倾"错误，紧紧团结依靠兰考人民，为克服暂时困难、改变落后面貌而拼死奋斗，焦裕禄多次昏倒在风里雨里、为了怕增

加群众负担，走了一天，忍受着肝部疼痛，不肯在群众家吃顿派饭；而那个县委第一书记王某却是"不顾群众的死活"，"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县委里还有一个副书记，竟贪污正在饥饿的群众的粮票，却还能被委任主持县委工作，而他在主持工作后不顾广大群众正在困难中苦度，和其他县领导躲进县医院小病大养吃小灶。

焦裕禄以身殉职，树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的优秀榜样，张钦礼以热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无私地竭尽全力地进行宣传，而当时地委、县委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秦一飞、周化民却是全力阻碍、淡化和污蔑，说什么"张钦礼宣传焦裕禄给兰考捅了个大窟窿"，"焦裕禄是张铁礼捏造的一个假典型"，"张钦礼介绍宣传焦裕禄是政治扒手"并铅印宣传品发至全国，秦、周还到处说"焦裕禄的精神没有变物质"， "早知道采访焦裕禄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初就该把他轰出兰考。""党领导兰考近二十年都没有改变面貌，焦裕禄来了就改变了？他比党的本事还大？通讯中说焦裕禄讲了这，说了那，兰考是县委领导还是他一个人领导？"秦一飞在大会上说："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是条龙能吸多少水？还什么典范、榜样，他干出了啥？是啥典型？叫外人来兰考看什么？看兰考人穷得俩人穿一条裤子。"

兰考"四清"时，这两个人一心要整张钦礼，抓不住什么把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借乱中浑水，先下手为强，给张钦礼加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漏网右派"的帽子，横加迫害。

兰考县以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为主的干部和群众，知道张钦礼十七年中屡遭迫害，现在又因为宣传焦裕禄而遭受迫害，于是，他们来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并在张钦礼的支持下，成立了"保卫焦裕禄司令部"，要"捍卫焦裕禄精神，继承焦裕禄未竟的事业。"然而，另一边，秦一飞、周化民为了蒙蔽群众保自己，成立了"卫东林司令部"，因为他二人大权在握，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加上开封军分区受地委领导，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在兰考一直支持秦一飞、周化民和"卫东林司令部"，张钦礼虽有群众支持，也难逃厄运。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钦礼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连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中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农村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大都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先进基层组织中。他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碑文涂抹得看不请字文，新华社记者的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把焦裕禄生前调整好的能带领群众除三害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积极力量一网打尽。张钦礼在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有时把他拉出去游斗，两手朝后捆绑，从卡车上猛推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流血。他们用一条凉席，把他卷住捆起来，头朝下倒竖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复多次，惨不忍睹。张钦礼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不起，为张钦礼喊冤，惊动了中南海，周总理又一次解救了张钦礼 。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所谓清查"四人帮"时，张钦礼又一次惨遭迫害，这一次和他同遭迫害的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余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四名党支部书记三人被迫害至死，一人闻讯逃跑，在外受尽千辛万苦流浪了四年，捡了一条命。张钦礼提拔的被一致公认与他和焦裕禄有着同样立场品格和能力、为改变兰考和柘城面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卓兴隆，虽然调出兰考许多年，也未能幸免于难，惨遭迫害而死。

建国后五十多年一直在河南采访、对兰考了如指掌的陈健惊讶地发现，兰考文化大革命后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和兰考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所涉及的人员姓名、数量，几乎相同相等，等于说，斗争了八年，又回到了当初。不过斗争双方的命运却有了天壤之别。如果更精确计算，应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斗争了二十多年，同样的原班人马、对立的双方，一方的人却步步高升"。他悟出了："兰考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派和那派之间的派性斗争，而是十七年斗争的继续。"

人们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几十年在兰考工作过的领导干部中，张钦礼、焦裕禄、孙跃堂、秦一飞、周化民、曾做过第一书记的王某、副书记刘某，这些人职务差不多，虽然都是在一个党中央的领导下，都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走过来，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有的无私奉献，有的特权自私；有的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鱼水血肉般联系，有的漠视脱离甚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艰苦奋斗，有的贪图享受；有的实事求是，有的唯心片面；有的坚持真理，有的实用跟风；有的坚持革命，有的蜕化变质；等等。他们虽然都在一个班子里，但价值观、世界观、立场、思想、作风迥然不同。而且，他们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又都有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现已知道，在省委里，刘建勋、纪登奎是支持张钦礼、焦裕禄的，而刘建勋、纪登奎又是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而与张钦礼、焦裕禄相对立的秦一飞、周化民、王某、刘某、孙跃堂则是由省委里的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这些人支持着，而在中央是谁在支持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这些人呢？邓小平纵然再有韬光养晦、变戏法、要花枪的本领，最后还是原形毕露，原来是他在支持着这些人。

陈健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凡是在极左路线、特别是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在三年困难饥饿年代，大都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兰考如此，全省亦然。"这是他根据自己的大量观察得出的结论。那么，为什么同一批人会有这样大的反差呢？再深入一步调查和思考，问题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大跃进中狂吹"五风"与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人祸"原因也就明明白白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了。可惜陈健没有深入下去。因为再深入下去，他就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他按照《决议》的框子，是把这所有问题都用"极左路线"解释的，而他发现的那些人的"消极态度"、"放弃领导"，显然是与"极左"挂不上勾的。如果他能够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科学方法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不仅在兰考，在河南，即使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凡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头脑发昏、忘乎所以、丧失基本常识的人，在革命低潮时，基本上都是一蹶不振的取消派、妥协派甚至叛徒。"左"是右的影子，根源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些人站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患得患失，他们心中没有人民的利益，也就不可能对人民事业有强烈的责任心，不可能吃苦在先、深入群众，不可能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不可能深入调查研究，就必然头重脚轻、嘴尖皮厚、左右摇摆、实用跟风，严重的还可能搞些阴谋破坏和捣乱。相比之下，张钦礼、焦裕禄在工作中就完全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和态度。他们在当时不仅不跟着刮"五风"，不仅不对人民群众的困难"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而是与广大最基层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顾个人安危，坚决与那些现象做斗争。如果是张钦礼、焦裕禄当时在兰考或河南省主持工作，人民生命财产怎么会受到那样的损失呢？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必然是截然不同的路线、思想和作风，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

确凿的证据十分清楚地表明，文革前到文革开始这一段时间，发生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事情是怎样紧密的联系的。从整风反右，到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到社教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革后的"清查四人帮"、改革开放，围绕着张钦礼同志的冤案发生的一系列触目

惊心的斗争是偶然的吗？发生在兰考、发生在河南、发生在全国的那几十年一幕幕变幻诡谲的风云、起落叠宕的潮汐，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不是所谓"派性"，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出现在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这种斗争的集中反映。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上到下，极为激烈，一直你死我活，十分泾渭分明。

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不仅是因为处于运动发展变化的事物从量变到质变、从表象到本质的暴露要有一个过程，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要有一个不断由量变到质变、不断确认、比较、深化的过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认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通过对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剖析和归纳，通过对建国后几十年发生在兰考县和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那么，对发生在更广阔背景范围内的斗争，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了。

实际上，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前，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就已经开始形成了。这个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成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同路人，他们或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之心、或是出于对三座大山压迫的反抗、或是到共产党里谋寻个人出路，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在建国前血与火的激烈阶级斗争中，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没有在实践中学懂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没有下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们就想到站下车，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们是十分抵触的。至于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等一类阶级异己分子，则是不言而喻地成为党内资产阶级的另一组成部分。

这个势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鼓吹"剥削有功"；在党的八大上，他们又力图把党扭上抹杀阶级斗争、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的道路；力图把中国引向一个由他们这帮新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这个势力的影响、煽动、纵容、包庇，虽然建国以后几年间，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几次党内斗争，但党内蜕化变质现象一直严重滋生和发展。

因此，在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主席领导下，采用依靠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帮助党纠正那些蜕化变质现象，解决党内的矛盾和党与人民的矛盾。但是，一些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和仇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党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反击它们的进攻，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反击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产生并形成的党内资产阶级却利用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打击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和真心帮助党整风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当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又趁机刮起了十分险恶的"五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无视人民死活，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成为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毛主席、党中央严肃处理"信阳事件"一类问题时，他们一方面包庇罪责重大的一些地区负责人，另一方面又打击一大片干部；在这段困难时期，党内资产阶级就曾企图趁机兴风作浪向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但未能得逞。

善于调查研究、明察秋毫的大师毛泽东，始终紧密地观察着这一切，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利器，领导党和人民一步一步地开展着斗争。在这几年的斗争实践中，也包括在国际上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实践中，他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的、革命的主要危险就是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概，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领导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并且为了防止党内资产阶级再次转移斗争大方向，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开展了对党内资产阶级借以兴风作浪和掩护保护自己的旧文化的批判。这些运动又一次受到党内资产阶级以"左"的和右的形式的干扰。

在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愈来愈激烈的严峻关头，毛泽东在这个斗争实践中科学总结出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成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他采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形式，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党内资产阶级展开殊死搏斗，展开总进攻。十三卷毛泽东建国后文稿清晰地记录展现了这个科学总结的线索、过程和结论。

在文革初期，当党内资产阶级又想如法炮制，转移斗争大方向时，便很快被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广大革命人民识破和粉碎。他们很快无力招架，被革命的洪流冲垮了。

但是，党内资产阶级依然有力量。他们的力量不仅在于已经篡夺的那一部分党政权力，还有他们在包括军队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多种影响，还包括社会上虽然已经遭到痛击但依然顽固而广泛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还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长时期允许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包括国外的资本主义势力，等等。因此，又有了一月革命后的"二月逆流"以及较长时间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和武斗。当粉碎了他们一系列反扑和捣乱，红色革命政权普遍建立起来以后，他们的残存势力则采用了"装死躺下、隐蔽等待、两面逢迎、以求一逞"的策略。在毛泽东晚年病重时，他们就曾迫不及待地动手。在毛泽东去世后，这场蓄满势、拉满弓的反攻倒算就分秒必争地打响了。发生在河南省，发生在兰考县，发生在张钦礼身上的，便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的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的一幕。

毛泽东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文革前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是旧中国阶级斗争的继续，改革开放后的资本主义复辟又正是文革前与文革中阶级斗争的继续。

历史和现实不就是这样确凿无误的摆着吗？资产阶级一直是自觉地紧紧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它们虽然放出了很多欺骗的烟雾，或者是只做不说，但它们紧紧地抓住这条纲，年年、月月、日日，无时无刻不在绞尽脑汁，采用文的武的、明的暗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一切形式，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攻。我们怎么能回避得了吗？眼下，党政腐败变质、企业破产倒闭、黄毒赌泛滥、三农危机、教育危机、卫生危机、环境生态资源危机，大规模私有化，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几亿农民一步一步滑向生存危机的深渊，不就是这几十年进攻的结果吗？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不是剥削压迫阶级向被剥削压迫阶级斗，就是被剥削压迫阶级向剥削压迫阶级斗。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张钦礼同志的曲折经历是印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极好教材。这个教材好就好在，它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和命运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一直到目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全过程，清清楚楚地反映出来了。

四、关于张钦礼同志的所谓"咬群"

钟言人在《焦裕禄逝世四十周年的沉思》文章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张钦礼、焦裕禄、穆青极尽歪曲、污蔑、攻击之能事。他无法否认张钦礼长期受到的无辜迫害，但他饶着弯子地为迫害者打掩护、作欺骗。他说张钦礼"一直没有被上级认可"（笔者注：这又是钟言文的谎言，周恩来总理亲自解救了张钦礼三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曾支持过张钦礼，他因而曾担任过兰考县的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开封地位书记，这怎么不算"认可"呢？钟言文心目中的"上级"是谁呢？）的原因，是因为"他咬群"。这实在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这可是真的让这位钟言文说准了一次。

"咬群"，是中国民间语言中常用的一个俚语，意指不与人合作、爱内讧和窝里斗，历来是作为贬义语使用的。

请问，张钦礼同志在与焦裕禄共事中，他"咬群"了吗？他把与焦裕禄共同出力流汗奋斗的工作都让在了焦裕禄身上。当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戴苏理以高压逼着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时，他"咬群"了吗？他冒着牢狱之灾，也要坚持事实真相而不去即使敷衍一下。当然，他也确实"咬"了一些人，如极为狠毒地要把 200 多干部群众全部打成"右派"的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反对宣传学习焦裕禄的地委社教团和县委负责人秦一飞、周化民，等。那么，被张钦礼所谓"咬"的这些人就不"咬群"吗？反右时，兰考县不到 1000 名脱产干部就被赵文甫"咬"出了 366 个"右派"；文革中的一九六七年一次就被秦一飞、周化民这些人把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咬"进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中四千名被"咬"掉党籍。这难道不算"咬"吗？看来，关键在于什么人"咬"，"咬"什么人。

在钟言文看来，你张钦礼作为县委领导班子里的一个主要成员，你只要不"咬群"，也就是说，你只要事事首先为你所在的"班子"的利益着想，有了什么矛盾出了什么事的护着大家，俚语就是"护局子"，别跟大家过不去，别当那个什么事都顶真的"楞头青"，你好我也好，遇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得糊涂，就象现在从上到下的领导班子里普遍流行的大家心照不宣的那样，人家不就都投你的票了吗？例如就象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要把那些人打成右派，关你什么事，你不吭声不就没事了吗？人家还会整你吗？作为实用主义的办法，这确实能替张钦礼免不少祸，除不少灾。然而，张钦礼偏偏就不认钟言文的这个理。

在一些人的观念里，不分真假、不辩是非、不讲路线、不讲原则、不讲事物的本质，把那些铁面无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揭露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人和事，敢于把问题大路朝天地摆到桌面上来，敢于揭露事实的真相，不盖短、不护局、不营私、不舞弊的人看作是"咬群"，这是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在中国的社会上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象钟言文这样的在中国旧文化传统的"酱缸""铁屋"里被熏染习惯了的，他怎么也不会

理解那些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战斗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具有的崭新的思想风貌。在所谓"彻底否定文革"时，把这种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的人污蔑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造反派的脾气"、"文革遗风"来加以批判。而这一点正是张钦礼同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中最有价值、最宝贵、最闪光之处。这是因为在过去的老干部队伍中，普遍缺乏的就是这种思想作风，而成为毛泽东所痛心指出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重要原因。为什么在所谓"清查四人帮"整整两年后即一九七八年的十月才逮捕张钦礼？当时是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戴苏理和张钦礼谈话"劝降"不成后执行的，这在当时相当一级的高层中是经过一番策划的。这一方面说明没有抓到他什么把柄，否则，早就"请君入瓮'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对张钦礼同志那种革命锋芒和战斗精神感到恐惧。此时，正在准备召开三中全会，正在酝酿改革开放，不把张钦礼这样的镇压住，他们怎么能睡得着觉？他们的图谋怎么能实现呢？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当然也不能例外。共产党内的右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无时无刻不想把共产党从内部腐败变质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害群之马，对这些害群之马就是要不断的把他们"咬"出来。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张钦礼同志作为一个高度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已经认识到党内斗争的重要性，他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或许更早）"咬"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受到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教育，他就更积极更自觉了，他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向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展开进攻。

钟言文把张钦礼同志这种鲜明泼辣的斗争精神说成是"咬群"，是对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诬蔑。只有资产阶级政党、政客、投机分子，为图一党、一派、一帮、一伙、说到底一己之私，为共吃一块肥肉，他们保持极为虚伪的一团和气、沆瀣一气、相互迁就包庇；一旦这肉吃的只剩下一点骨头了，这时他们就会为争吃夺喝、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而黑了眼的猛"咬"，不仅"咬"，还要往死里整，甚至火拼、雇凶杀人。

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愈演愈烈的腐败变质中，张钦礼这样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被镇压，而其他许多党性不强的人被欺骗被腐蚀，通过腐败路线和政策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驯化党员"合群"、"听话"，留在领导体制内的都是一些不"咬群"的"谦谦公子"、"好好先生"，不敢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善于内外有别、内部消化，不分是非地保面子、护局子，耍阴谋，玩手段，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党内民主、党内斗争被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被扼杀，对资产阶级的揭露批判和斗争被取消，登峰造极的黑暗、复辟和倒退。

我们今天学习张钦礼同志，就是要向他那样，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革命团体内，都要敢于在人民群众面前，把大是大非问题大路朝天地摆出来，要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彻底搞个明明白白。要对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各种机会主义，对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观点，对这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害群之马，要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就是要敢于"咬"！而且要在敢于"咬"中学会善于"咬"。要"咬"得他们无处安身，"咬"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咬"得他们不敢再耍阴谋诡计，"咬"得他们不敢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咬"得他们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改造，那样，无产

阶级革命派就可以实现空前的大团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可以万马奔腾、一日千里！

五、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组织

采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形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伟大创造。共产主义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这个事业必然是在向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中实现的，而这个斗争的主体又必然是无产阶级及其团结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人民开展大民主，必然会有各种组织形式。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各种群众组织就是这一类组织形式。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中，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当然不可能是"世外桃园"，不可能是"真空"，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每一个人都是一定的阶级的人，由这样一个一个的阶级的人组成的组织或派别，不仅在内部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斗争，其对外的观点和行为也会都打上各种阶级的烙印。

因此，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表现在广大革命群众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表现在领导班子内部革命干部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也反应在群众组织中间的矛盾和斗争中。

以前述兰考县为例，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出现了"卫焦"和"卫东林"两大派，激烈斗争了好多年，难道其中没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宣传焦裕禄和反对宣传焦裕禄就是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把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村）的1200 多名干部群众投入监狱、把全县 6000 名党员中拥护焦裕禄的 4000 名开除党籍，就是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当把两派都认定为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现大联合时，这些大是大非问题怎么可能不认识不纠正呢？

毛主席说："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派别是阶级的一翼。对文革中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各地两派存在的矛盾斗争中都有一些类似问题，有的是阶级矛盾问题，有的是路线问题，有的是思想认识问题，都要在搞清楚客观存在的全部事实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区别，不同对待。因此，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组织，正确认识和理解曾经严重发生的所谓"派性"和"全面内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方面。

那么，怎样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组织呢？笔者有这样一些思考和观点：

1、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经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发动与组合，涌现了大批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或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根本利益是与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一致的。因此，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奋起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封资修以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在十分复杂曲折的条件下，经受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最主要的方面。

但是，阶级是分为阶层的，群众的思想也是分为左、中、右的。因此，在革命运动的

潮流中，不同的群众以及由这些不同的群众组成的不同的群众组织，革命的觉悟以及对现实的阶级斗争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毫不奇怪，觉悟有高有低，革命有先有后。因此，在群众中间，在不同群众组织之间，出现一些矛盾和斗争，出现不同观点和认识，也是不奇怪的。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大民主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许多人缺乏思想准备，再加上党内资产阶级为了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有一些不明真相的或是思想落后的群众上当受骗，但是，一旦明白了事实真相后，或是经过辩论提高了认识后，大部分很快就杀了"回马枪"，反戈一击。

革命不分先后，凡是革命群众，不管什么时候认识了错误、有了觉悟、改正了错误，都是革命的行为，都是应该欢迎的，都要一视同仁。

2、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出现过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分什么"黑五类"、"红五类"，这些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后来发现，这些口号的提出者拥护者大都是受党内资产阶级蒙蔽和利用的人。

看一个人阶级属性和立场、思想，最主要的是看他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在社会实践中站在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一边。阶级属性的区分比较简单，对思想和路线的区分就不是那么简单。关键的区分，是要看他在现实的斗争中是站在党内资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造党内资产阶级反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一边，是不是反对修正主义、是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至于一个人的出身，只能说明他在社会实践中、在家庭生活中曾有过这样一个环境条件。"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一个人的出身只是这些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一个人阶级属性和立场、思想的形成，有内因的作用，也有外因的作用。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内因和外因作为对立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也是相互作用而起变化的。在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青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环境起着巨大作用。但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作用是不同的。人的思想只有改造红，没有自来红。在建国后，我们党历来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经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而那些或轻或重地相信"血统论"、"唯成分论"的人，常常是出于为了躲避思想改造或是保护某些特权利益。

文革中，有些人离开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单纯地抽象地看一个人的出身或是过去的表现，看一个群众组织则是单纯地抽象地看有多少工人贫下中农出身、有多少党团员，而形成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不理解甚至反对，被党内资产阶级所利用。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3、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所谓"过火行为"，语言上的、行为上的以及各种无政府主义等。革命敌人总是把这些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犯上作乱，恐惧的很。而一些中间阶层的人也跟着大肆指责，大叫"糟得很"。对此必须做具体的阶级的分析。

作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行为，所有的"过火行为"，与他们所遭受的种种残酷剥削压迫比起来，在程度上、时间上、数量上，简直连个"零头"都达不到。而那些所谓"过火行为"实际上也都是从统治者那里学来的。旧社会千百年人民的水深火热、生灵涂炭就不说了，就新中国建国后，在干部队伍中滋生的那些违法乱纪、打骂百姓的现象，从土改统购统

销一直到大跃进时刮"五风"，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非常严重，毛主席多次严肃批评制止，但一直禁止不了。大概一直到文革前社教时才基本好转。从人民军队刚建立，毛主席就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优待俘虏"，老百姓连俘虏也不如吗？这种打骂群众实际上就是过去历代反动派的遗风，他们对人民都是生杀预夺、视如草芥的，共产党的干部也这样，难道不是变质行为吗？人民被欺压了许多年，文革来了，有权造反了，给他们带上高帽子游街，与他们遭受的那样迫害相比，有多少过头呢？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如果仅看到人民群众的"过火行为"，而看不到他们长期遭受的压迫和不公平待遇，就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站到了压迫者的立场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曾经有人认为"革命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既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嘛，群众怎么做都是应该的。"这也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怎样革命，怎样斗争，当然会有不同做法和选择，这就是政策和策略问题。毛泽东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群众运动和掌握政策策略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革命群众运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改造世界的实践，错误和缺点当然不可避免，但是，革命群众运动既然是一场阶级斗争，任何错误和缺点都会被敌人所利用。象文化大革命中兰考县支持张钦礼的革命群众组织"卫焦""捍卫焦裕禄精神，继承焦裕禄未竟的事业"，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反击否定焦裕禄的错误路线时，强迫他们"管焦裕禄叫爹，如不叫，便遭受毒打"，还让他们"穿上孝服，手持哭棒，排成长队，在街上哭着行走，直到焦裕禄墓地"，或者可能还有其他违犯政策的行为。这些都是错误的，发生了就要及时公开检讨及时纠正。这一类行为的客观效果不可能说服教育受蒙蔽的群众，而只能是帮助党内资产阶级欺骗蒙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就明确提出："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有各种各样错误思想的人，一到实践中就会表现出来。特别是有一些坏人参与其中，兴风作浪。因此，对革命群众运动过程必须及时进行总结，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不断争取和团结群众，把党内资产阶级和各种坏人不断彻底孤立起来，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对于革命群众中出现的各种错误，进行及时总结和改正，目的是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如果是这个目的，那么就应该一个标准、一视同仁，要"一碗水要端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都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三中全会》后的彻底否定文革，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妖魔化，而把文革中走资派对广大无辜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残酷迫害则百般掩盖，以所谓"内乱"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掩盖他们对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进行的疯狂的反攻倒算。这种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问题处理的双重标准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镇压是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对待世界社会上的事物都是双重标准，我们在当前国际事务中司空见惯的帝国主义的头子们是这样，他们大大小小的徒子徒孙们也从来都是这样的。这是由他们贪婪自私的阶级本性和对人民群众的欺骗需要决定的。他们心里有鬼，他们必须要这样做。

4、群众中间混进了隐藏着坏人，也是有的，甚至是常见的。这种坏人，就是指那些抱着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以投机、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图谋个人升官发财以及各种严重违法乱纪、道德败坏、企图利用群众运动达到不可告人目的、对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的人。这些人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别动队、同盟军或后备军，他们是群众中各种错误思潮和行为的主要来源。他们和党内资产阶级一样，对待群众能利用时则利用，不能利用时则背叛、压制、镇压。由于他们总是不把自己的目的公开地说出来，总是利用欺骗的手段，因此，他

们和党内资产阶级一样，常常一时难以被群众识别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上当受骗是常常发生的。不仅是文革初期的所谓"保守派"，就是文革初期的所谓"老造反派"在以后上当受骗的事也是常有的。这本来是一个辩证唯物论的常识，但在文革中特别是在初期常常争论不休，有的人"一次正确"以后，就自以为是，就想打扮成"一贯正确"，结果就上了坏人的当，或是也受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利用，在别处又犯了错误。这常常是那些立场和世界观没有彻底改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惯病。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的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难点。因此，出现一时的混乱和争论，是难免的。

在群众组织中，或是混进了坏人，或是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欺骗操纵和利用，与群众组织中间的意见观点分歧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分清路线是非、思想是非与分清敌我，也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而且辨清事实真相、分清路线与思想是非也总是第一位的。

对混进群众中的坏人的识别与对党内资产阶级一样，要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要严格区分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犯思想错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表现，要重在现在的表现，还要看本人对所犯错误或罪行的态度和认识，要看在实践中改正错误的行动。要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评议，切忌把人一棍子打死。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最反动的敌人。

5、毛主席说："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群众组织的问题，不能象党内资产阶级那样用镇压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动不动就给人家扣上什么"反革命"、"野心家"以及其他各种名堂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谁要执意这样做，那么，这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他就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就是站到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矛盾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在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和各种坏人对群众的欺骗操纵和利用后，要十分注意保护那一部分受到他们影响的群众。对这部分群众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的问题。决不能搞所谓"以人划线站队"。在文革中，就有人鼓吹什么"站队站对了一切都对了，站队站错了一切都错了"，趁机对群众打击报复，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

6、党内资产阶级对待人民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则是完全截然相反的另外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历史上各种剥削阶级曾经使用过的镇压控制和欺骗蒙蔽相结合的办法，对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打击排挤，对落后分子操纵利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扼杀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和造反精神，把人民群众奴化为供他们剥削压迫役使的工具。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党内资产阶级在被揭露批判而逐渐原形毕露、逐渐孤立、即将垮台的时候，他们常常一反一贯蔑视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常态，以大民主为幌子，组织自己的队伍保自己，或暗中操纵、或公开利用，欺骗蒙蔽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坚决与之作斗争的革命派进行镇压。这是各地两派产生和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党内资产阶级操纵利用的群众组织常常是群众中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思想比较右倾保守落后的、受了些特权利益恩惠的、旧文化色彩较浓的、思想方法比较简单片面的那一部分。在发生的不正常争斗甚至武斗中，常常是这些人先动手或先开第一枪，在武斗或一派掌权中，也常常是这些组织表现的更不讲党的政策，表现的十分残酷甚至象法西斯，是造成"全面内战"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最主要的原因。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真理，因为他们受到坏人的操纵，不这样便不能把对方压下去，便不能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

7、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内资产阶级和混进群众中间的坏人以各种面目出现的破坏活动就已经基本上被广大人民群众识破了。然而，在文革后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中，作为"彻底否定文革"的主要理由的这些人身摧残、违法害命、破坏人民和国家财产的法西斯暴行，却受到了更多的掩饰和包庇，掩饰和包庇的理由是什么"宜粗不宜细"，而对于他们认为对他们统治有威胁的，则是象张钦礼那样，不管有没有什么可利用的把柄，而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

例如，在兰考，张钦礼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秦一民、周化民的斗争更多的是通过"卫焦"与"卫东林"两派的矛盾反映的。两派互相攻击和迫害的事即所谓"群众斗群众"，在文革那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其程度相比较却"是小巫见大巫"。根据前述资料的披露，支持张钦礼的"卫焦"对另一派，大概是因为另一派反对学习宣传焦裕禄或多有微词罢，发生了一些强迫他们"管焦裕禄叫爹，如不叫，便遭受毒打"，还让他们"穿上孝服，手持哭棒，排成长队，在街上哭着行走，直到焦裕禄墓地"。"有的老同志被打残，一副县长一宣传部长自杀。"另一派的代表人物秦一飞、周化民虽然也受到了批斗，"但他们始终受到兰考支左部队的保护，是有限度的。秦、周在文革中既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遭受过软禁。"这是反对张钦礼的资料中披露的，大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卫东林"受到"卫焦"这一派的迫害不过如此罢。而张钦礼及他这一派所受到的迫害就完全不同了。根据前面已经确认的一些事实，且不说张钦礼受到的那么多迫害以及跟着他受到牵连的其他人的情况，仅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次，"张钦礼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连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中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把焦裕禄生前调整好的能带领群众除三害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积极力量一网打尽。"在文革结束，和张钦礼同遭迫害的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余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四名党支部书记三人被迫害至死，一人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张钦礼提拔的公认的优秀县委书记卓兴隆，虽然已调出兰考许多年，也未能幸免于难，惨遭迫害而死。比较比较罢，简直没法相比。

从前述资料中披露的兰考的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而在全国，这是普遍的。河南省作为中原战略腹地，理所当然的成为两大阶级激烈斗争的战场，文革斗争之激烈复杂，在中国令人瞩目。但其他各地，虽各有特点，也同样激烈复杂。阶级斗争的本质和规律不会因地域而不同。例如，江苏省在文革中后期的所谓"深挖516"，严重迫害革命造反派和干部群众达50万之众，死伤数万，很多人至今死因不明不白。再如广西趁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之机对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也是如此。这一类的事，各地的借口、形式、做法、轻重不同，但是很普遍的。

8、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其目的和主要内容，说到底，就是与资产阶级争夺人民

群众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具有绝对的优势条件，这就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但这还不够，还要有正确的科学的策略和方法。不管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始终注意争取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文化大革命中，怎样正确对待和团结争取受到党内资产阶级影响和利用的一部分群众，毛主席曾经有一系列指示。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实践中也曾经有过许多好的成功的经验，但也有许多沉痛的教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武器，正确地组织团结领导自己的阶级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胜利地开展对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极为重要的。

对此，笔者认为，这样几点是十分重要的：

必须始终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集中力量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代理人。要不断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少数最顽固、最反动的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争议，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辩明真相，分清是非。事实没弄清，就要做周密的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再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再继续做调查研究，直到在绝大多数人中统一认识，同时允许和保护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不论是解决群众之间的一般不同观点和意见，还是解决在群众中有争议的人即所谓坏人和党内资产阶级，都要用这个办法来解决。

对待所有的欺骗谎言和阴谋诡计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把它彻底公开！彻底暴露！彻底搞清！这将使一切阶级敌人、一切错误路线、一切错误思想无藏身之地！即所谓"砍倒棵子露出了狼"。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不断识别各种骗局的过程是不断提高觉悟的过程，不断提高识别敌我友、识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识别路线和思想是非的能力。

一个是无产阶级大民主，让人民群众有充分的发表观点意见和反驳辩论的权利，一个是调查研究，对所争论的问题进行全面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两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向党内资产阶级进攻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好形式。掌握了这两个武器，才能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不断实现并推进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坚持斗私批修，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做自我批评。对本人、对本人所属组织和派别，都应该这样做。犯了错误，不掩盖，不推诿，要及时公开检查，加以改正，并欢迎群众监督。真正的革命派应努力创造机会充分听取来自各方的不同或反对的意见。要不怕挨骂。错的就检讨、就改正，正确的就坚持、就说明。要坚信，真相和真理一定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的。

9、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与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可以充分地实行大民主，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敌我和是非；而在后者，掌握着镇压和生杀大权的资产阶级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无产阶级这样掘它的祖坟，把它们埋葬吗？如果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内资产阶级都要千方百

计地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不惜制造白色恐怖或者武斗，制造混乱，浑水摸鱼，那么，在它们控制着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它们会采用一切能够采用的手段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蒋介石的"四一二"与邓小平的"六四"，虽然是两个时代，虽然是两个旗号，但在向人民开刀上，都一样毫不手软。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人民群众在与资产阶级做殊死的斗争时，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始终警钟长鸣，要随时准备以革命的两手粉碎反革命的两手。

六、关于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

根据张钦礼同志的冤案与围绕着这个冤案发生在河南省兰考县近半个世纪的变幻风云，笔者经过分析后认为，这是一场典型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内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斗争，同时也批驳了把这样一场严肃的斗争歪曲成"派性"、"左倾"甚至"权力欲"、"咬群"的错误与荒谬。

但是，一些同情张钦礼同志曲折遭遇的人可能还是不以为然。按照他们的传统思维，把张钦礼这样的那么多好人打成反革命，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典型的"左倾"。因为，按照《决议》的经典说法，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并把这些归结为"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 倾观点"。所以，笔者认为，新华社老记者陈健以及钟言文的文章依然框架在《决议》里。

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搞那些运动，不把那些运动都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上，那些人怎么可能整到张钦礼头上呢？怎么能那样整那么多人呢？在他们看来，这理由是说到家了，是绝对铁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路线造成的。

不仅象陈健这样接受和赞同了《决议》的人有这些观点，就是那些反对这个《决议》、拥护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也常常表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其他运动中出现了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怎么可能打击迫害了那么多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和群众呢？

一方面是张钦礼这样的同志积极拥护并参加毛泽东发动的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的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这样的运动中受到残酷迫害和打击；看起来还真象是瞎折腾的荒唐、混战一场的"全面内乱"。果真是这样的吗？笔者对此有如下一些认识和看法。

1、《决议》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势力采用反革命政变的镇压和篡改毛主席讲话的欺骗手法，窃据了党中央，并修改《宪法》把体现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四大"取消，从而把全国人民的口堵住手捆住以后，打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幌子，而惊心炮制的向毛泽东思想、向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攻的武器。列宁说："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而这个《决议》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连儿戏都不如的轻薄而恶毒的骗局。这个《决议》置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而辉煌的成就而不顾，用似是而非和游蛇一般的语句，回避了毛泽东时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

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这样一个关键问题，用"随便挑出来"的一些片面、孤立、歪曲了的所谓"事实"，来冒充社会实践的"全部总和"，恶毒攻击毛泽东"骄傲"、"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结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的思想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并把这些归结为"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 倾观点"。

二十多年来，所谓否定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确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产生了世界瞩目、无法掩盖、极端严重的腐败、倒退、混乱、危机，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现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在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势力培育扶植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又重新骑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直接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低潮，促进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一切巨大变化所构成的铁的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了或放松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切革命成果将得而复失，将无立足之地，将重陷水深火热的死亡深渊。

二十多年来的社会现实，象无情的耳光无数次抽打着那些抗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炮制反革命黑货的小丑们，也映射着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的光辉。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表明，《决议》对毛泽东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的评价，不仅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也是彻头彻尾反革命的。

2、从当时张钦礼同志所处的河南省兰考县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在当时没有搞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那么，是不是就一切相安无事，大家就能齐心协力地搞建设了呢？"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这件事是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之前；后来的县委第一书记王某"不顾群众的死活"，"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虽然刘某"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但还是被上级调来任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这些难道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共产党中的反映？难道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就不会发生？难道靠上级发个指示或案例警戒，他们就会改正？当时党中央毛主席三令五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经常搞着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他们还这样胆大妄为，如果没有这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了，他们就会自觉收敛？

改革开放以后，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十多年了，看一下换了好多届的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吧，吃喝玩乐、嫖娼赌博、造假欺骗、侵吞挪用、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拉帮结黑、残害人命、雇凶杀人、无恶不作、花样百般、越反越重、越反越多，到底有多少人是搞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都是搞私家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的干部队伍是中国最大的暴富集团，被人们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当年兰考县的那个组织部长孙跃堂、县委第一书记王某、副书记刘某们，如果能留任到现在的话，那可真是如鱼得水。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到头来，却反出了个货真价实的、古今中外最黑暗、最疯狂、最贪婪的象新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也就为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了最好的注解。

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告诫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阶级斗争始终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始终；阶级斗争及其影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共产党一分钟也不能忽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后，一直到近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都被打上了剥削压迫阶级的烙印。无产阶级担负着消灭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一切角落，凡是存在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影响的地方，都要开展彻底的大扫除，把它们彻底消灭。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谓"扩大"，本意指对于一个事物原本的放大。过去曾有前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提法，指的是把一些不是反革命的人打成反革命了。而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概念，是指本来不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也搞成阶级斗争的了。那么，在阶级社会里，哪些方面不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而搞成阶级斗争了呢？从《决议》里看，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明者的思想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定范围内"存在着阶级斗争；而这个"一定范围内"之外的范围，是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哪些"范围"？没有明确指出，但按《决议》行文的思路，列举了两个方面，一是"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那么，这些方面不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行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最彻底的决裂吗？很显然，《决议》的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提法完全是与马克思主义违背的。恰恰相反，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根据毛泽东时代二十九年和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正反两方面的两条鲜明的路线指导下的实践，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就在干部的作风和经营管理，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着激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党的干部队伍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上层建筑领域里"四旧"的全面复活和黄毒赌的长期愈演愈烈的泛滥，就直接与这个《决议》在这个问题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论有直接关系。

因此，无产阶级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必须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的展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一分一秒的也不能放松警惕和斗争，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

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是一个什么"提法"的问题。对于它的发明者和制造者来说，它是一个向无产阶级、向共产党、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攻的武器。对于无产阶级自己来说，如果也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则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还存在着肤浅和片面，还存在着幼稚和幻想，还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4、对于张钦礼同志这样的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建国后的屡次对资产阶级开展的斗争中却屡遭打击和迫害，以及其他许多大量的冤假错案，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界限和是非，是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势力的拿手惯技，也是他们向无产阶级、向正确路线进攻的常用手段。在平时，他们对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或敬而远之、或"穿小鞋"，用软功暗劲斗；一旦有事变，或者有运动时，他们就要浑水摸鱼、先下手为强，明枪暗箭一起来。

这种情况，不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回顾一下历史，这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中是常见的。在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和错误路线当道掌权时，为数很多的忠诚战士被他们残害而死。反动的统治者，对于普通人民群众，视如草芥，不管是不是对他们有危害的，只要他们不顺眼，随时可以打击迫害。从古到今，何其多也！象张钦礼同志这样的，已经算是幸运者了。

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被混淆的情况下，有一部分是"坏人斗好人"，也有一部分是"好人斗好人"，即人民内部的斗争，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常见的事，因此，根据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作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论述。这篇伟大的文献，对党内资产阶级利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界限和是非，是一个及时而严肃的批判；对于党和人民群众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所谓"好人斗好人"，并不一定是"好心做坏事"。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即使整人的一方看来是个好人，整错了人，也会有两个方面的主观原因要分清，一个是思想上是不是有个人主义的动机，例如嫉妒、报复、邀功等；还有就是思想方法的简单化、片面化等。对于被整的一方来说，既有一个平反纠错问题，也有一个自我认识问题，是不是也确实有一些错误或缺点；即使全错全平，也不能逞英雄、打报复。总之，发觉了错误，出现了矛盾，必须及时进行总结，要做一番调查研究，要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让群众来分辨，把被混淆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界限和是非分清，从而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教育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

七、认真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在建国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制定的一系列路线和政策，特别是他总结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既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又是从实际出发，是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的伟大创举，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每一步都受到了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从右的方面就是从"左"的方面的极力干扰和破坏，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各种机会疯狂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攻。它们的这种干扰和破坏，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遭到严重损失的最主要的原因。张钦礼同志的曲折经历对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这些丑行又一次提供了确凿的证明。

然而，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那些时而消极抵抗、时而极左疯狂、居心叵测的"英雄"们却倒打一耙，颠倒黑白，把罪过和污水全泼在了中华民族第一伟人毛泽东身上，泼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泼在了张钦礼同志这样党的优秀干部身上，泼在了革命群众身上。他们以"彻底否定文革"为纲，把文革问题作为一切政治问题的"高压线"，把"彻底否定文革"作为打倒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棒。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散布了许许多多的谎言和欺骗，制造了许许多多如张钦礼同志这样的冤案，蒙蔽了许许多多的人，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直接原因。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说明，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重的阶级斗争。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广大工人和农民，在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下，就象当年红军"抬头望见北斗星，日夜想念毛泽东"一样，日日夜夜在怀念着毛主席，怀念着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虽然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控制的宣传工具死守严把，不得有一字的泄露，但作为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近几年来，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的文章，揭露事实真相，进行理论探讨。真理的光芒通过网络传向四面八方。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却提出"应该把文化大革命问题搁置起来"，回避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

历史问题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表象。每一个历史问题都是我们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据。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是没有任何私利的阶级，它没有任何理由去隐瞒任何重大历史问题的真相。政治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把任何现实问题即时地积极地搞清楚，不把它们推诿给历史老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做亏心事，它没有任何理由把文化大革命问题搁置起来。如果搁置起来，这将使目前正在兴起的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受到扼杀，将使共产主义运动继续陷于低潮的泥泞之中。

苏东巨变，俄罗斯和东欧那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倒退和灾难，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受煎熬，由现代修正主义的可耻叛徒摇身一变的帝国主义走狗们依然维持着它们的统治，万马齐闇的局面未能冲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锻炼，就是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和清算，帝国主义的走狗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可耻叛徒们制造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领袖人物的卑鄙可耻的谎言至今没有被彻底戳穿。

面对这个惨痛的现实，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源地的中国，居然有人提出"搁置文化大革命问题"。当年，邓小平最后一次爬起来，作为一种缓兵之计，曾要把文革问题"搁置起来"，那是因为他还没力量去一手遮天。没隔几年，他就推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战略。他是极为现实的，如果不这样做，他的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要说一步，就是连一寸也迈不动。"彻底否定文革"与资本主义复辟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彻底否定文革"是压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不搬掉这座大山，人民就不能再一次解放，资本主义复辟就不能粉碎。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不能割断历史的。每一位同志，都应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当前的事业，这是必不可少的。既为了深入理解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为了总结这段历史的宝贵的经验教训。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实例，把党内资产阶级和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琢磨透，彻底搞搞明白。这段历史不仅在年轻人中由于欺骗性宣传而普遍漆黑一团，就是对于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或对于那个时代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的，也还有不少的盲点和误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过程看似纷纭复杂，实际上，只要我们真正抓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条纲，一切都迎刃而解。不把这段历史的真相彻底揭露出来，不把党内资产阶级颠倒的这段历史再颠倒过来，不把这个历史时期内的经验教训正确总结和接受，就根本不可能粉碎当前正在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共产主义事业的复兴将是一句空话。相反，如果我们通过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会极大地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复兴。

八、共产主义战士们联合起来，团结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向资产阶级展开进攻

作为阶级斗争的必然现象，与张钦礼同志同阶级共命运，有类似经历的人是很多的，

不仅发生在经历了建国后十七年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人身上，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在农村，在工厂，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进攻和破坏而受到党内资产阶级残酷迫害和压制的人和事，真是千千万万，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那些受到各种各样残酷打击和迫害的人，有的还在继续遭受着迫害，有的还在坚持着斗争，有的已经献出了生命。但是，他们散落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他们的事迹和经历可歌可泣，但是他们的斗争至今尚未形成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重新登上被资产阶级控制了二十多年的政治舞台。

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是孤立的，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反映。一个与资产阶级进行坚决、彻底、毫不妥协的斗争的战士，如果不受到他的敌人的反对甚至迫害，岂非咄咄怪事！不能用个人恩怨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命运，应跳出个人恩怨而和阶级的命运相联系而看待。他们与全国工人和农民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要看到，由于党内资产阶级专政和复辟的结果，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几亿农民一步一步陷入和旧社会那样的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永远和这些最底层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国际歌》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一条真理。在历史发展长河的各种危机中，都是人民自己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人民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谁掌握着主动权，就决定形势发展方向，其关键在于阶级对阶级的力量的对比。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自自己队伍的觉悟程度，无产阶级队伍的觉悟程度又来自先锋队的觉悟和成熟程度。

在张钦礼同志经受的多次打击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多次出面保护，这实质上是当时人民斗争力量的反映，是人民的斗争对资产阶级迫害的反击。因为不管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前，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他们来自人民，作为人民的真正觉悟和成熟的代表和领袖，带领、团结和依靠人民的力量，和资产阶级不停顿地作斗争。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仅支持不了张钦礼，他们自己也早被资产阶级打倒了。正因为人民的斗争失去了自己领袖和代表而被镇压，无产阶级司令部被敌人从内部占领，张钦礼最后一次受迫害就没有再得到解放。陈健提到的胡耀邦的那个批示完全是含糊不清的推诿，他已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了，他怎么可能解决得了张钦礼一类的冤案呢？张钦礼文革后受迫害不就是胡耀邦当时疯狂鼓吹的政策造成的吗？即使用了通天的神功，使张钦礼一个人得到了昭雪，那又怎么能解救得了被踩在脚下的其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呢？文化大革命中修改宪法把"四大"写进去，就是赋予人民反抗党内资产阶级复辟和迫害的有力武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党内资产阶级的迫害和破坏，但人民还可以用四大武器来斗争。然而，这四大武器一剥夺，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简直是上天无梯，钻地无门。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教训，这是因为人们还没有自觉掌握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武器。历史的经验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每一个真正要革命的战士，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能再做"欲静的树"，要学习毛泽东，克服一切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继续响应 156 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脚踏实地地和广大的革命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重新组织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娴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学会"聚生风雷"，牢牢地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主动地、积极地、永不停顿地、千方百计地向资产阶级发起新的更猛烈的进攻！开展殊死的斗争！要一直斗到把它们彻底消灭，实现共产主义！

2004 年 6 月 26 日